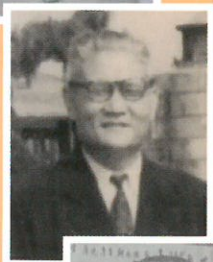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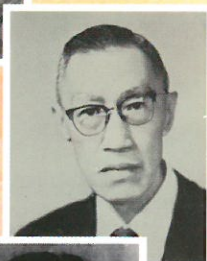


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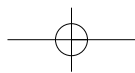


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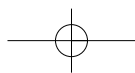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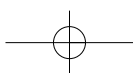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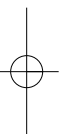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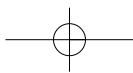
台灣教育人物誌 IV
Educational Love

國立教育資料館



98 年 10 月 出版





教育學

序

台灣歷經了數十年社會文化的變遷更迭，在不同的時空環境裡，無數優秀而偉大的教育工作者，各自在不同的教學領域中奉獻、發光，他們的行誼事蹟，不只樹立了教育專業的典範，同時，也對台灣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留下深遠影響。

審視教育先賢們的教育實踐，最重要的共同特質是—「教育愛」。「教育愛」(Padagogische Liebe) 源於希臘文中的agape，指的是精神之愛 (spiritual love)、憐憫 (compassion) 與慈善 (charity)，是一種無私的愛，沒有條件，沒有智愚貧賤的差別待遇，同時，更是一種創造的愛，使學生從無知到有知、從沒有價值到深富價值，因此，「教育愛」可說是人類最聖潔、最需要發揚的一種愛。

有鑑於此，本館自民國95年(2006年)起有系統地記錄畢生為台灣付出「教育愛」的前輩先賢，製作一系列「台灣教育人物誌」短片及傳略，這些教育典範人物涵括了美術、農業、圖書館、哲學、醫學、水產、音樂、戲劇、宗教、中小學教育、語文、文化、化學、經濟、地質學、新聞學、法政學、行政學、幼兒教育等領域。

本(98)年延續執行「台灣教育人物誌IV」紀錄影片製作計畫，本輯除記錄新聞教育學家曾虛白、史學家錢穆、地質學家林朝棨等共十一位教育家以外，特收錄了張箭、鄧玉瑛及林靖娟等三位為教育而奉獻生命的老師，並邀請長期對教育史志鑽研有成的學者專家們分別撰寫傳略，深度呈現他們的思想行誼。

本書能夠順利出版，要特別感謝協助策劃「台灣教育人物誌」紀錄影片的整個製作團隊，以及辛勤審查與撰寫傳略的學者專家，他們在忙碌的教學及研究之餘，提供本館最大的協助，謹此致上最高的敬意與謝忱。

王世英 謹誌

民國98年10月

教育學

目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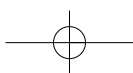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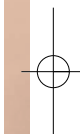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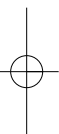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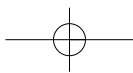
序

- 7 董作賓 (1895~1963)
甲骨文研究的權威／鍾柏生 撰文
- 23 曾虛白 (1895~1994)
新聞教育的領航者／朱立 撰文
- 41 錢 穆 (1895~1990)
史學泰斗／王吉林 撰文
- 57 薩孟武 (1897~1984)
法政教育的推手／劉恆姝·劉后安 撰文
- 85 張金鑑 (1902~1988)
行政學巨擘／雷飛龍 撰文
- 95 梁實秋 (1903~1987)
英語教育的大師／莊坤良 撰文

Contents

- 121 潘 貫 (1907~1974)
化學教育的先進／歐素瑛 撰文
- 137 林朝榮 (1910~1985)
地質學教育的先驅／周瑞燉 撰文
- 153 張漢裕 (1913~1998)
台灣農業經濟的奠基者／葉淑貞 撰文
- 169 賈馥茗 (1926~2008)
深受學生愛戴的好老師／林逢祺 撰文
- 193 張 箭、鄧玉瑛 (1922, 1956~1977)
為教育奉獻生命的師表／涂欽鴻·劉金英·王永誠·陳杰燕
葉銘恩·呂至全·彭松英·張大鵬 撰文
- 207 林靖娟 (1960~1992)
幼教界的烈士／林月琴 撰文

Educational Love



董作賓

1895~1963

◆ 甲骨文研究的權威 ◆

鍾柏生 / 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董作賓先生西元1895年出生於河南南陽，1963年逝於台北，享年69歲。董先生自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畢業後，就開始研究甲骨文字。從早期安陽殷墟發掘，直接獲得甲骨材料，長期研究創立研究方法，在殷商史、甲骨學上獲得極高成就，也得到極高榮譽，成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他深知學術成果的繼續開拓發展要從教育年輕人著手，於是不辭辛勞在海內、外授課、演講，除了引進年輕人從事殷商史、甲骨文的研究外，也讓社會瞭解殷商文明的偉大。其重建中國上古史的成就，石璋如院士讚美是「永垂不朽」。

壹、董作賓先生的生平事蹟

董作賓，本名作仁，六歲進入私塾就學後，改名作賓，字彥堂，又字雁堂，號平廬。清光緒21年2月24日（西元1895年3月20日）生於河南南陽自宅，當時董父年齡46歲，董母年齡32歲。董父名傑卿，原籍河南溫縣，當時在南陽經商。

起初私塾老師為陳文斗先生。12歲換了老師為史九先生。當年春天，董母病重，家人為了沖喜，於是娶了錢氏為妻。董先生秉性忠厚，14歲便知曉家計艱難，於課後幫助父親從事生產，刻印章，鬻春聯，勤勞刻苦。最喜歡刻印，但是沒有印石，於是取用陶片仿刻。刻印日積月累之後，出版了《平廬印存》一書。

清宣統三年（西元1911年）16歲，進入南陽元宗小學就讀。西元1912年，

奉父命廢學經商。次年，兼營書業，每得新書，必先讀畢再出售。西元1915年春季，考進縣立師範講習所。夏天，董父去世，享年66歲。西元1916年，以最優等第一名畢業，留校擔任教員。西元1918年，奉母命到開封遊學，考進河南育才館，才開始知道甲骨文字。第二年冬天育才館畢業，和同學辦《新豫日報》。西元1921年冬季到北京，認識了徐炳昶教授。第二年進入北大當旁聽生，開始用油紙摹寫《殷墟書契前編》拓本。並且遍讀沈兼士、錢玄同教授各年級的文字學教材，建立了研究文字學的基礎。西元1923年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成立，入所為研究生。考古學會成立，入會為會員。次年改任助教。擬與其同事莊尚嚴先生同往安陽考古發掘，研究甲骨的決心，自此開始。在北大期間加入方言調查會、風俗調查會為其會員。



1928-1937年在河南安陽挖掘場地中休息。
資料：(《平廬影譜》董敏先生提供)

西元1925年，任福州協和大學國文系教授。次年改任中州大學文學院講師。西元1927年暑假至北京，任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幹事，管理方言室。秋天，任中山大學副教授。當時傅斯年掌管文學院，因而認識了傅先生。

西元1928年4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於廣州，聘董作賓先生為通訊員，其使命為調查洛陽石經及殷墟甲骨出土情形。洛陽之行因土匪猖獗，而被阻擋在白馬寺。又取道輝縣而後轉至安陽，調查殷墟甲骨出土情形，確知甲骨挖掘有其必要，而且考古工作大有可為。於是謀劃發掘計畫，送達廣州。同年秋季，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受聘為編輯員，主持小屯遺址試掘工作，是為殷墟第一次發掘。發掘完畢，即在開封撰寫發掘報告，並摹寫出土的甲骨文，不到一個月報告完成。不久，會晤史

語所新聘考古組主任李濟先生。李先生十分讚賞董先生的報告，譽之「為我們在殷墟的繼續發掘奠定了理論上的基礎」。西元1929年春天，參加殷墟第二次發掘，頗有收穫。五月，王太夫人逝世。同年秋天，參加第三次發掘，發掘期間在大連坑南井井口下發現大龜四版疊在一起，每版版上刻滿文字至為重要，之後撰成〈大龜四版考釋〉發表於《安陽發掘報告》第三期，在本篇考釋中，最重要的貢獻是確定了「卜」下，「貞」上的一個字，是人名，就是古代的「貞人」（職官名）。此一見解，突破了早期三十年甲骨研究，成為驚人的創見。用「貞人」來斷定卜辭的時代，更是前人沒有發現的方法。

西元1930年，中央研究院與山東省政府合組山東古蹟研究會正式成立，從



1928-1937年在安陽殷墟挖掘工作的夥伴。
資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印行之「殷墟發掘八十年國學術研討會海報」董敏先生提供)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 IV

事山東境內考古工作，聘董先生為委員。11月7日參加第一次城子崖發掘，並調查平陵遺址。

西元1931年2月21日至23日，和李濟到南京，在自然歷史博物館，展覽殷墟及城子崖遺物，並在中央大學演講，以地下實物來證實中國文化的久遠，為學術界開一先例。3月下旬殷墟第四次發掘，在安陽擴大舉行，人員之多，盛極一時。殷墟器物之總編號自此次開始。因為九一八事變開始，考古組主任李濟留駐北平，就由董先生主持殷墟第五次發掘。在小屯村南，由其親自發掘，挖出許多甲骨，為這一次重要收穫。

西元1932年春季，河南古蹟會成立，聘為委員。同年中央研究院創辦人蔡元培院長65歲，董先生以其十年研究甲骨成就，五次發掘經驗，寫成〈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作為祝壽賀禮，此文為甲骨學研究方法上的重大突破與創獲。同年4月殷墟第六次發掘開始，考古組同仁都往濬縣辛村參加衛墓發掘，殷墟工作由董先生負責。夏季，史語所改聘為研究員。同年冬季，殷墟第七次發掘，仍由其主持。此次為殷墟發掘規模最小的一次。

西元1933年春，歷史語言研究所由北平搬遷至上海滬西小萬柳堂，安陽停

工，董先生隨所南下。秋季，調查「南陽草店」漢畫，並赴山東滕縣主持安上村與曹王墓發掘，此次發掘重要的收穫有二：1.在龍山晚期遺存中發現卜龜。2.發現銅器時代墓葬二處，均為從前所未見。

西元1934年春，返回上海，隨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入北極閣所址。接著往赴安陽主持殷墟第九次發掘，發掘地點為洹北侯家莊南地，獲得大龜版七版，為繼大龜四版之後又一重要發現。秋天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成立，聘為委員。

西元1935年春天，由於殷墟十次發掘的經驗，知道該處侯家莊西北岡為殷代墓地，不出甲骨文字，擬將一~九次出土甲骨做一總結，遂開始編輯《殷墟文字甲編圖版》。

西元1936年春，《殷墟文字甲編圖版》完成，交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6



1936年發現前所未見的YH127坑甲骨坑，整坑甲骨連灰土運往南京。

資料：(《甲骨文60年》李殿魁先生提供)

月至安陽視察殷墟第十三次發掘，因此又回到洹南發掘小屯遺址。12日發現前所未見的YH127坑甲骨坑，整坑甲骨連灰土運往南京，然後擬定室內發掘計畫，一層一圖，一版一盒，歷經三個月，始告完竣。冬季12月，到河南登封，調查周公測影台古蹟，並赴伊闕考察龍門造像。

西元1937年春季，到杭州調查黑陶出土情形。五月再到河南登封，計劃周公測影台修理工程，並且前往南輝縣視察琉璃閣發掘東周墓地工作。接著又轉赴安陽視察殷墟第十五次發掘工作。在這期間分析這次所得甲骨的期別（時代）。返回南京後繼續研究YH127坑所得之甲骨，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由董先生集結天文學家高平子、建築學家梁思成、劉敦楨等合撰〈周公測影台調查報告〉，頗受李約瑟所推崇。董先生此時在學術上的成就與聲譽，已然揚名於國際間。學界對甲骨研究卓然有貢獻的學者：羅振玉（雪堂）、王國維（觀堂）、董作賓（彥堂）、郭沫若（鼎堂）四位，合稱為「甲骨四堂」。七七事變，抗戰軍興，隨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往長沙。12月13日南京淪陷，又隨所方攜帶甲骨資料遷往桂林。

西元1938年春天，又自桂林遷往昆



董作賓先生於1940年在昆明鄉下龍頭村「龍頭書屋」工作室中摹寫研究YH127坑出土，經過編號整理的甲骨。
資料：（《甲骨文詩畫集》董敏先生提供）

明。至此生活暫告安定，立即展開研究工作。

西元1939年春，開始其「殷曆譜」的計算工作。傅斯年先生為了安定人心，乃於研究所旁棕皮營村營建新居。

西元1940年春季，新居落成，傅先生題「平廬」橫額相贈，「平廬」之名自此開始。冬季，日本軍隊封鎖滇緬公路，雲南告急。歷史語言研究所又搬遷到四川南溪李莊。

西元1941年，傅先生因公常住重慶，因此自四月開始，所裡公務由董先生代理，直到1946年遷返南京時才終止。

西元1942年春天，到重慶出席院務會議，順便拜訪郭沫若先生。

西元1943年，開始著手寫殷曆譜，每日寫一頁或二頁，不曾間斷。

西元1944年，50大壽，同仁在牌坊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 IV

頭大廳舉觴祝壽。三月時纂成《平廬影譜》一大冊，以照像記錄其一歲至五十歲事蹟。

西元1945年《殷曆譜》完稿。歷時一年又八個月。書分上、下兩編，上編四卷：1.殷曆鳥瞰；2.殷曆之編製；3.祀與年；4.殷之年代。下編十卷：1.年曆譜；2.祀譜；3.交食譜；4.日至譜；5.閏譜；6.朔譜；7.月譜；8.旬譜；9.日譜；10.夕譜。全書完成後，傅先生為書作序。稱讚董先生之所以能作出如此偉大作品，原因有三：其一，善於綜合；其二，利用新法；其三，推盡至極。這套書只印二百部，幾個月就售罄。國民政府頒嘉勉令云：

「董作賓君所著《殷曆譜》一書，發凡起例，考證精實，使代遠年湮之古史年曆，爬梳有緒，脈絡貫通，有裨學術文化誠非淺鮮，良深嘉慰。希由院轉致嘉勉為盼。」

接著胡適、陳寅恪、馬衡、唐蘭等學者，均有信函討論和讚美。國外如德效騫、李約瑟等也有英文函札相互討論和請益。

西元1946年，對日抗戰勝利，得政府抗戰獎章。

西元1947年1月，應美芝加哥大學之聘，擔任該校東方語文學系中國考古



1949年董作賓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偕李濟、陳紹馨等調查臺中瑞岩泰雅族文化（左一董作賓；左二錢思亮；右二胡適）。
資料：(董敏先生提供)

學客座教授。兩年授課四門：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國考古學研究、周代金文、中國古文字學。同時寫成《殷墟甲骨文字甲編》自序及《殷墟乙編》序。《清明上河圖》一書在本年考研攝影，1953年藝文印書館出版。

西元1948年4月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其主編《殷墟文字甲編》出版。十月，其主編之《殷墟文字乙編》上輯出版。攜眷往上海，準備赴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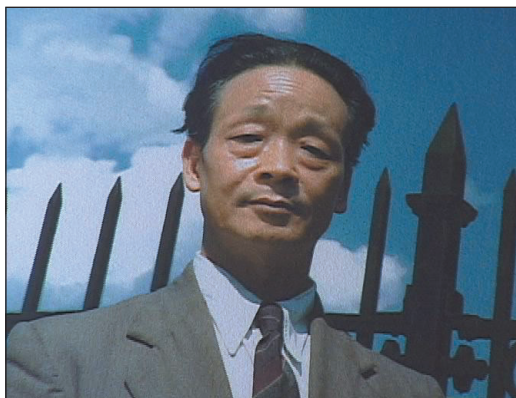
西元1949年1月，隨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往台灣。受聘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教授。遂後全家住在青田街台大宿舍，仍號平廬。開學後，在中文系教授古文字學，在歷史系教授古代史，兼任省立師範學院教授。三月，主編之《殷墟文字乙編》中輯出版。9月，台大文學院考古人類學系成立，轉為該系教授。

西元1950年7月，朱家驊創辦《大

陸雜誌》，請董先生當發行人，並說明：「為了延續這不絕如縷的學術命脈，為了搶救這勢將中斷的文化系統，為了保存這橫遭摧毀的歷史真蹟，才決定創辦這一個刊物。」使此雜誌成為國際漢學界相當有地位的刊物。在台大編《文史哲學報》，名譽編輯為校長傅斯年，實際上由董先生負責。在歷史語言研究所編輯集刊同時編輯三種學術刊物，時年56歲，精神矍鑠，不以為勞。這一年12月20日，傅斯年所長患腦溢血逝世。

西元1951年，受命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當時歷史語言研究所所址在楊梅。

西元1952年，美國東方學會推舉為榮譽會員。6月，擔任故宮、中央博物院共同理事會常務理事，後連任至第四屆。



西元1947年1月，應美國芝加哥大學之聘，擔任該校東方語文學系中國考古學客座教授。
資料：(董敏先生提供)

西元1953年春季，第二屆亞運會在菲律賓舉行，並辦書畫展覽會，董先生自台北前往參加。12月，《殷墟文字乙編》下輯出版，乙編工作遂告完成。

西元1954年1月，當選為中國民族學會監事。2月，當選中國美術學會第二屆監事及中國文字學會理事。3月，當選中國歷史學會第一屆常務理事。7月，被聘為教育部學術審議會第一屆委員，後連任至五屆。12月，宿舍全部完成，歷史語言研究所由楊梅遷往南港，並在南港集中辦公。

西元1955年3月，教育部通過西元1954年第一屆中華學術獎得獎人，董先生獲得社會科學類獎金獎章。5月與朱家驊、溥儒應大韓民國之邀，同赴漢城大學講學，並鑑定該校所藏甲骨。漢城大學研究院授予文學博士。又到日本東洋文庫講「殷代甲骨與古代文化」。到京都人文科學研究所講「殷墟發掘」，並參觀該所所藏甲骨。8月，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大樓落成，研究人員遷入辦公。董先生認為歷史語言研究所既已安定，遂接受香港大學東方文化研究院研究員的聘約，藉以整理歷年來累積的稿件，乃辭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的職務，前往香港就任。同年，所著《甲骨學五十年》單行本問世，這本書是「過去甲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 IV

骨學研究的總報告，而更是今後研究甲骨學者的里程碑」。書出版後受國際學者重視，日本遠東文化中心特別來函請准譯為英文上市。

西元1956年4月，被選為中央研究院評議會人文組評議員。香港大學聘為榮譽史學教授，並兼任崇基書院歷史學教授。此時主要工作為編著《中國年曆總譜》，書分上、下兩編，先由下編編起，自漢平帝原始元年，下至西元2000年。冬季，赴曼谷參加第九屆太平洋科學會議。返回香港後，在香港電視台演講甲骨文字。

西元1957年編著《中國年曆總譜》上編。自黃帝元年，下迄哀帝元泰二年。上、下兩編計860頁。在港兩年間，先後兼任崇基書院歷史教授，教授古史；新亞書院教授，教授甲骨鐘鼎文；又兼珠海書院教授，教授上古史。

西元1958年秋季，返回台灣。繼續擔任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教授。11月，中央研究院院務會議決議，歷史語言研究所增設甲骨文研究室，聘董先生為主任，主持研究工作。

西元1959年春季，和李濟先生前往八里鄉，視察十三行遺址發掘。歷史語言研究所為董先生刊行祝65歲壽誕論文集，列為集刊外編第四種。5月10日，

忽然中風，不能言語，入台大醫院治療，3個月後痊癒。自此之後，言語略有困難。秋季，《中國年曆總譜》由香港大學出版。

西元1960年，不顧舊疾，應馬來西亞大學聘為校外考試委員，參加第一年中文考試。8月，接受台灣大學甲骨學研究講座教授。9月，《中國文字》第一期出版。每三個月出版一冊。11月，被選為中央研究院第四屆評議員。並當選中華民國孔孟學會第一、二屆監事。

西元1961年，續任台灣大學甲骨學研究講座教授及歷史語言研究所甲骨文研究室主任。與黃然偉合編《續甲骨年表》。冬季，世界書局《董作賓學術論著》上、下冊出版。

西元1962年5月25日，心臟病發，急送台大醫院急救。翌日轉往榮民總醫



1963年，與嚴一萍合著〈廣字系〉。
資料：(《續殷曆譜》李殿魁先生提供)

院治療一個月。8月，當選中國書法學會第一屆監事。9月，任亞洲歷史學會代表，又當選中國書法學會第一屆監事。編印《中國文字》七~十期。

西元1963年3月，與嚴一萍合著〈廣字系〉，開始發表於《中國文字》第十一期。3月20日為69歲華誕，各方好友連日舉觴祝壽，倍感勞累，心臟病發，急送台大醫院診治。臥病8個月終告不治，於11月23日病逝，享年69歲。歷史語言研究所為之出版逝世紀念論文集。10月，《平廬文存》出版。《殷曆譜》再版（藝文印書館印行）。舉殯日，蔣總統中正題「績學貽徽」輓額加以褒揚。副總統陳誠親臨弔祭。學術文化界同聲哀悼。葬於南港胡適墓園。中央研究院院士陳槃撰碑文，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台靜農書丹。之後，門人嚴一萍廣事搜求，編成《董作賓先生全集》，分為甲、乙兩編共12冊，計500餘萬言，由藝文印書館出版。

原配錢夫人生二男：愚得（生物學家）、玉京（心腦科名醫），三女：愚紉、玉華、玉汴。繼室熊海萍女士生三男：敏（攝影家）、興（都市發展專家）、武（高分子化學專家），二女：萍、乙。子女十人均有專長及成就。

貳、董先生學術成就

一、考古學方面

西元1928年，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董先生主持小屯遺址試掘工作。這是古老的中國從摸索而全面以科學方法發掘遺址的開始。其後二、三、四、五、六、七、九、十三、十五次發掘，董先生不是親自主持，便是視察。殷墟發掘方法，起初是「點」的探尋，接著是「線」的連貫，由點、線擴大至小部分的「面」，因而找到了復穴竇窖的基地。第十三次開始全面平翻，地下的跡象，可以一覽無遺。這對小屯遺址，也是所有考古遺址研究最理想的方法。小屯的最後三次發掘，都是如此，因此才有許多空前的發現，這在整個中國考古學進展過程中，是極為重要的方法。董先生參加了這個過程，並改良創新了若干考古技術。李濟先生看完了董先生所撰寫的第一次殷墟試掘報告後，便稱讚這篇



1928-1937年在河南安陽挖掘甲骨文龜版的工作。
資料：（《平廬影譜》董敏先生提供）



1928-1937年在河南安陽挖掘甲骨文龜版的工作。
資料：(《平廬影譜》董敏先生提供)

報告「為殷墟的繼續發掘奠定了理論上的基礎」。在殷墟考古中，不論在理論或技術層面都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

除了殷墟考古外，董先生還參加了山東城子崖，滕縣安上村與曹王墓的發掘，視察了河南省輝縣琉璃閣東周墓的發掘。與學者高平子、梁思成等人調查周公測影台並撰寫報告，這些工作對早期的中國考古學是極重要而開創性的。

二、甲骨學與殷商史方面

董先生對甲骨學與殷商史的成就與貢獻是多方面的，從下面細目便可以詳細得知：

(一) 大龜四版與貞人的發現

殷墟第三次發掘，在大連坑出土疊在一起四塊龜版。整理研究後，董先生撰文〈大龜四版考釋〉，發表於《安陽

發掘報告》第三期。文中最重大的發現乃確定了「卜」下「貞」上一字是貞人名。貞人說法除讓人明瞭卜辭的結構和其細部意義外，同一版（龜版）出現的貞人（貞人群）與不同版出現的貞人（貞人群）之相互聯繫，可以形成貞人集團。這為甲骨文斷定時代（後簡稱“斷代”）與探索商代占卜制度打下基礎。

(二) 十個斷代標準的提出

十個斷代標準是董先生所發明而提出的，其詳細說明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蔡元培先生65歲慶祝論文集》上冊，〈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一文。所謂十個標準是：世系、稱謂、貞人、坑位、方國、人物、事類、文法、字形、書體。以此為標準，將卜辭分為五期。第一期：盤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廩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此文發表後，古史學界為之震驚。尤其是郭沫若，更為驚佩，他在《卜辭通纂考釋》後記云：「〈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三校稿本相示，已反覆誦讀數遍，既感紉其高誼，復驚佩其卓識，如是有系統之綜合研究，實自甲骨文出土以來所未有。文分十項，如前序所言，其全體乃為創見所充滿。」自此之後，龐雜難理的殷墟卜辭

不論舊藏新出，皆可依據這十項原則找出其時代歸屬。至今卜辭斷代仍然離不開這十項原則，再增加者，只有「政治技術」一項而已！這些條例不僅可用於卜辭，有些尚可用於青銅器銘文及其他古文獻的斷代上。這是甲骨文研究方法的重大創獲與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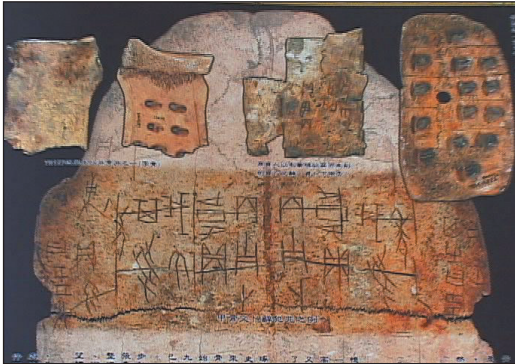
(三) 殷代曆譜的建構

西元1945年《殷曆譜》一書寫成。此部書的重要，傅斯年先生序言說的十分清楚：「殷曆譜者，吾友董彥堂先生積十年之力而成之書也。——余目睹當世甲骨學之每進一步，即彥堂之每進一步——彥堂之書出，集文獻之大小總匯，用新法則厥盡精微，曆日與刻辭勘不合，曆法與古文若符契，殷商二百七十三年之大紀，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於是中國信史上增益三百年，孔子歎為文獻無徵者，經彥堂而有徵焉。從此治殷商史者，界畫之略已具，疑年之用蓋寡，發乎勇，成乎智，質諸後人而無疑，俟諸續出史料而必合也。」董先生云：「近二十年，對於古史年曆的研究，耗費了我的一



1935年董作賓先生撰述安陽殷墟第三次發掘報告及大龜四版之論文。
資料：（《走進甲骨學大師董作賓》董敏先生提供）

大部分時間。為了解決甲骨文中所涵殷代曆法的問題，不能不考定共和以前的年代，為了考年，又不能不先解決太初以前曆法的問題，於是有古史年曆譜的推算。古史年曆譜是一個新的推步，務求先建立一部合天的曆書，然後，以甲骨金文銘刻，史籍載記，考定年代，這裡面推求真朔，用奧人奧泊爾子氏交食圖表對証定朔，由定朔以求平朔；推求節氣，用儒畧曆互相對照，更換算格列高里曆以求定氣和恆氣；以西曆紀元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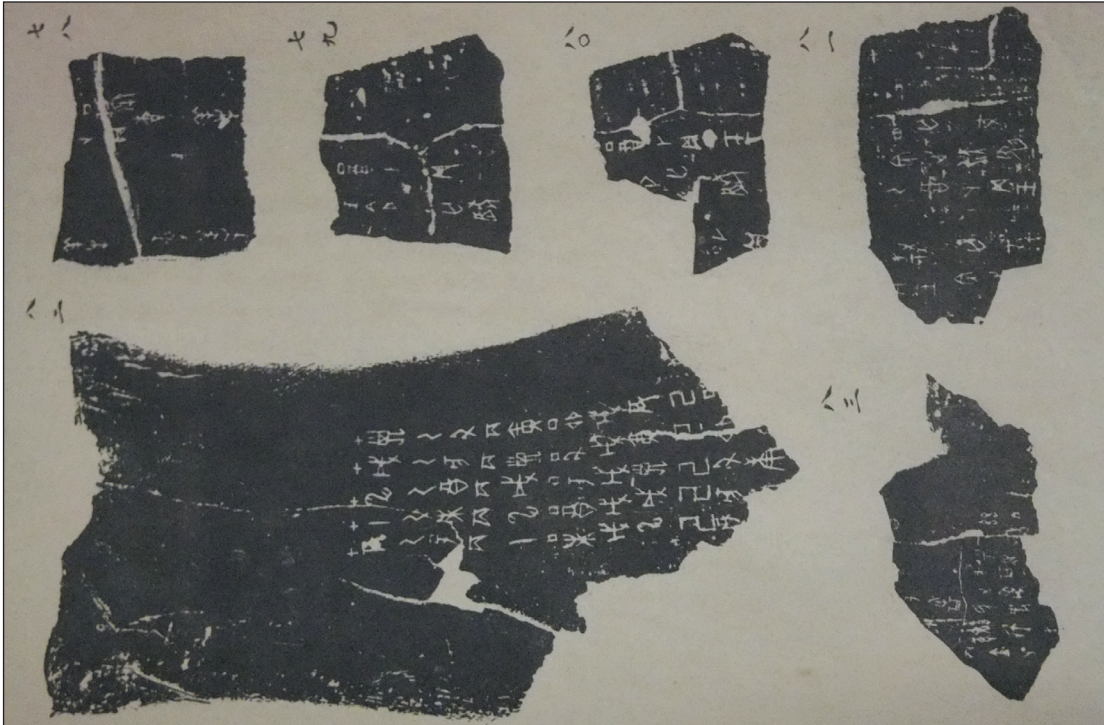
甲骨文的解說。資料：(《平盧影譜》董敏先生提供)

的長尺度，對照干支紀年，以儒略周日的長尺度，對照干支紀日。這是純粹的以天文科學做基礎而獨立推算的結果。有此絕對客觀的曆譜，然後考之載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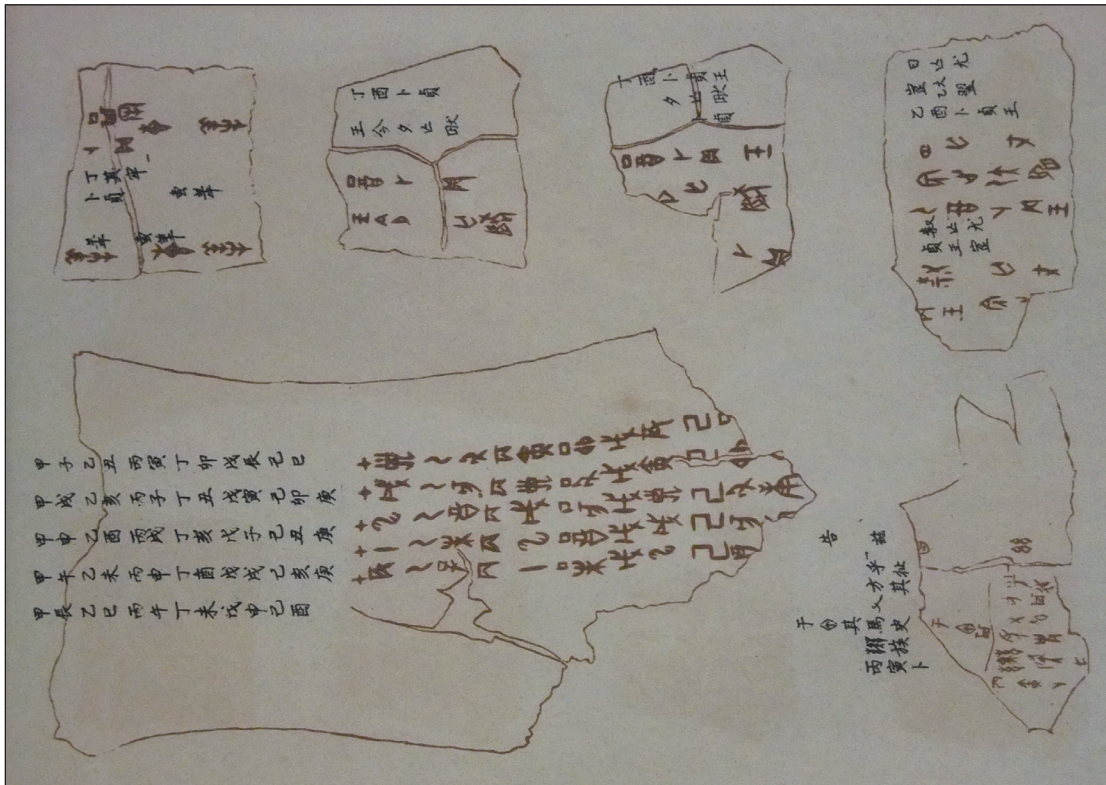
定其年代，方不至落於空疏。」要使古史年代考定令人信服，必須要有科學曆法的新根據。《殷曆譜》中重要定點，是武丁29年12月庚申的月食及帝辛10祀9月的置閏，只要這定點卜辭的解釋不出差錯，董先生所建構的殷曆便有其根據。董先生這種企圖以今日科學方法推尋古曆，在當時中國是先進方法上的嘗試。

(四) 殷代地理的推測

《殷曆譜》一書對甲骨學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地理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份



殷墟甲骨文拓本。
資料：(《殷墟文字甲編圖版》李殿魁先生提供)



殷墟甲骨文描本。資料：(《殷墟文字甲編圖版》李殿魁先生提供)

量雖不多，但對整個殷代地理研究卻有深遠的影響。在地理的研究方法上，董先生並沒有任何的創新。他充分運用了干支繫聯法，將眾多甲骨片上的干支，依據其時代、年份、月份，成組地編排成為譜表—包括旬譜、日譜、夕譜等，在這些譜表中，除了可以發現田獵地名與征伐地名的關係外，還可以由整齊地干支表上，計算兩地間的日程。雖然帝辛日譜有小部分學者們有不同意見，但是大部分是可信的。另一方面在殷代地理的構想，董先生與郭沫若是大不相同

的。《殷曆譜》中帝辛征伐夷方的歷程，有四點重要的根據點，它們是：商、亳、淮、齊。在此四點所劃成的區域裡，董先生安排了所有的殷王伐夷方經過



西元 1945年《殷曆譜》的出版對甲骨學有多方面的貢獻。資料：(李殿魁先生提供)



董作賓 (董敏先生提供)

的地名，並繪製了簡圖。而由田獵地名與征伐地名相重的事實，進一步推衍出殷王田獵在山東泰山、蒙山、嶧山的西邊山麓，而並不是如郭沫若所說，是以河南沁陽一帶為田獵的主要區域。這些意見，日人甲骨學者島邦男大致採用，而成為後人研究商代地理的基礎。

(五) 殷代制度的研究

董先生所創立的斷代研究方法，在運用它完成分期工作後，覺得甲骨卜辭分為五期的辦法，還甚粗疏。例如：將祖庚、祖甲兄弟列為第二期，可是經過仔細研究後，發現祖庚、祖甲兩王卜辭，貞人固然相同，但表現在卜辭中的曆法、字形、祀典、事類，則大有差異，所以以前者為標準，祖庚應屬於第二期；以後者為標準，祖庚應屬於第一期。

由於斷代分期實地研究的結果，發現短暫的270年間（盤庚遷殷後），殷

禮確有新、舊二派的不同。而且終殷之世互為起伏。以下為其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 舊派（遵循古法）盤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

第二階段 新派（改革新制）祖甲、廩辛、康丁。

第三階段 舊派（恢復古法）武乙、文武丁。

第四階段 新派（恢復新制）帝乙、帝辛。

在甲骨學發展到50年的時候，董先生將總帳清理如下：從認字、分句讀，斷章取義做猜謎式的論文，到斷代分期，分派研究。到分派研究，董先生認為是找到了研究的方法。除了新、舊二派禮制的發現，董先生對於殷商龜卜制度及五等爵官制的來源，也做了細緻的討論。後者的結論與中國官制的發展有重要的關連，侯、伯、子、男爵稱都在卜辭中找到了證據。

(六) 甲骨文字的考釋與解讀

甲骨文字的考釋乃瞭解卜辭、刻辭的基礎工作。董先生數十年的學術研究，有部分時間專注在此領域。由下面著作便可知大概。如：〈大龜四版考釋〉、〈釋「馭釐」〉、〈安陽侯家莊出土之甲骨文字〉、〈台灣大學所藏甲古文字附考釋〉、〈漢城大學所藏大胛骨刻

辭考釋〉、〈骨文例〉、〈說「堇」〉，以上文章或考釋一字一詞的形體與意義，或歸納分析甲骨文例，或發表新材料闡明其重要意義。雖然其中有些意見有待商榷，但是大部分受學者所肯定。

三、其他古文字資料的研究

除了甲骨文字的研究外，董先生對先秦古文字的新舊材料及其他文化的文字材料也相當重視。從《毛公鼎考年註釋》、〈司母戊大鼎〉、〈函皇父諸器之年代〉、〈虢季子白盤之時代〉、〈叔朕〉到〈論長沙出土之繒書〉、〈沁陽玉簡〉，可以看出其研究範圍之廣，不是金文便是楚帛書、玉簡。他深深瞭解中國文字發展的一貫性。

參、對教育及藝術的貢獻

董先生一生從事三項重大的工作：一是研究；二是教育；三是藝術。研究工作的概況及成就，上文已有闡述。下面只針對教育及藝術加以說明。

一、教育方面

董先生自15歲開始就從事教職，不論兼職或專任，歷經大陸、台灣、香港、美國、韓國，造就英才無數。有這種機緣和成就，當然歸功於他有豐厚的學



董作賓鑽研於甲骨文領域中。

資料：（《走進甲骨學大師董作賓》董敏先生提供）

術底子和誨人不倦的精神。他在課堂上、講演中及專業雜誌裡散播中國古文字、甲骨學、殷商史、殷商考古的學術種子，讓這些種子經過一段時光的醞釀，茁壯發芽成樹成林。至今大學裡還開這類的課程及學子繼續攻研這些學科便是最好的證明。

二、書法及篆刻藝術方面

董先生自幼便對刻印有興趣，曾努力學習篆刻。西元1928年起接觸甲骨文字及金文等古文字，深深悟得殷人鑄刻甲骨文字的刀法、各個時期金文、古文字的風格。將這些話用到篆刻上，所刻製的圖章，不論文字佈局或其字體，饒有古味而特出，可惜作品不多，今存《平廬印存》一冊。董先生書法最為人所熟悉的，就是甲骨文書法，其根基源於觀摹實物與拓本。因為研究甲骨初期喜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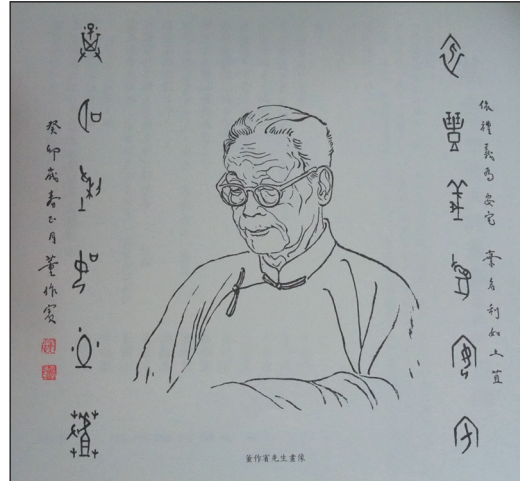
用油紙摹寫借來的拓本，摹寫日久，寫出甲骨文字自然就十分形似。後得實物再仔細觀察，所獲得的經驗更豐厚了其書法的本錢。其甲骨書法的特色是：以中鋒任筆書寫，既非全仿殷人刀筆，亦非襲用殷人墨跡，自創其風格。因其對甲骨書法刻法深入研究，運用到斷代上便成其條例之一。董先生樂於推廣甲骨文字書法，雖研究工作繁忙亦不甚拒絕遠近求墨寶者，有時更主動餽贈好友。胡適之曾言：「我從太平洋走到大西洋，幾乎沒有一家中國朋友或美國的中國學者家中沒有董作賓的甲骨文。」甚至有人言董先生書法至今為止是第一人。

肆、結語

從董先生的早年求學歷程看來，他完全是從舊社會產生出來的一位奮發自修成功的學人。他之所以成為具有多方面的才華成為文字學家、史學家、考古學家、藝術家及登峰造極的甲骨學家，除了靠機運外，大部分是靠他的天才及異於常人的努力。在重建中國上古史的工作上，誠如中研院院士石璋如先生所言：「董氏業績，永垂不朽。」

參考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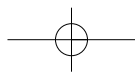
董作賓（1977）。董作賓先生全集。台



董作賓先生畫像。

資料：（《甲骨文詩畫集》董敏先生提供）

北市。藝文印書館印行。
鍾柏生（2000）。董作賓傳。國史擬傳
第八輯。國史館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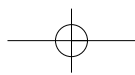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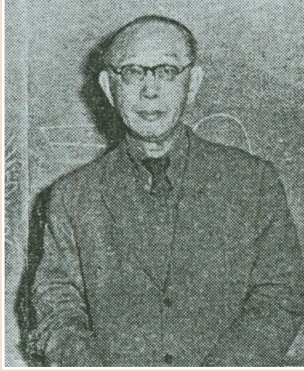
曾虛白

1895~1994

◆ 新聞教育的領航者 ◆

朱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曾虛白，江蘇常熟人，學貫中西，曾與父親辦真美善書店與編《真美善》雜誌。先生對新聞萌生興趣始於《庸報》，後在上海辦《大晚報》，多所創新。對日抗戰時，先生負責國際宣傳，來台後，任中廣副總經理及中央通訊社社長，建樹良多。一九五四年，創政大新聞研究所，任所長近十五年，開啟我國新聞傳播研究傳統。政大退休後，在文化大學任三民主義研究所所長，為國育才。先生溫文儒雅，有所為亦有所不為，是位德高望重的新聞傳播教育家與新聞工作者。

壹、幼承庭訓， 學通中西

一、鄉風、家學、慈父

曾虛白，本名燾，字煦伯，初以字行，後取其諧音改名虛白。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農曆甲子年三月二十五日），曾先生誕生於物阜民豐、文風鼎盛的江蘇常熟，是家裡的長子。曾家是當地的四大世家望族之一，先生的曾祖、祖父和父親都中過舉人，以道德文章受到鄉里的敬重，鄉風與家學陶鑄了他「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道德操守，並決心做「一個不折不扣的讀書人」（自傳，頁1-8）。曾家是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在與不下一、二十個小孩的嘻戲打鬧中，曾先生培養出了服務的精神與領導才能（自傳，頁9-15）。在常熟，曾家富甲一方，祖居「虛廓園」有如台北板

橋林家花園般，大宅第有三廳兩堂與前後天井，但這大量空間卻只能做舖張且不常有的婚喪等「禮儀典範」用，未為日常生活著想。對此設計，曾先生年輕時便大不以為然，對「老宅心懷不滿」（東海大學建築系，1973；馬之驢，1986，頁10-11）。曾先生重內涵而輕虛榮排場，這個品性是年輕時從觀察日常生活中就養成了的。

常熟的靈氣與曾氏家風之外，影響曾先生人格成長最大的是父親孟樸先生（1872-1935），民國建立後，他當過江蘇省議會議員、省政府官產處處長、財政廳長、政務廳長等職，但始終是個有原則、有理想的知識分子。齊燮元、張宗昌、孫傳芳等軍閥在江蘇，他總想方設法與他們周旋，力拒他們對省政的干預和對地方的苛索，以維護江蘇權益。

不過，孟樸先生最後還是離開了政界，回到了最鍾愛的文學上（自傳，頁22-25）。清末，孟樸先生曾在上海創辦小說林書店，五十四歲脫離政界後又開起了書店，用法國浪漫主義標榜的口號「真美善」命名，一方面好鑽研自己喜好的文學，也同時可推動社會的文藝風氣與興趣。孟樸先生將書店的經營管理全權交給了兒子，由曾先生任經理兼《真美善》編輯，是曾先生創業之始（自傳，頁81-85）。

孟樸先生的文學造詣深厚，開真美善書店時，已經鑽研法國文學二十九年，他欽敬悲天憫人的大文豪雨果，想效法他用如椽之筆揭露、批判社會的腐敗與黑暗，發動文學與政治的革命（自傳，頁86-88）。譯介西洋文學、開書店只不過是孟樸先生實踐理念的一步，他自己也在創作上下了硬功夫，《孽海花》與《魯男子》便是他對當時社會批判與期望，兩部見證時代變遷的鉅著都曾名噪一時，對文壇與社會都起了重大影響（自傳，頁16-21）。受到父親的影響，曾先生愛上了法國文學，也扎下了自己的文學根底。

父親飽讀中外古今巨著，父子兩人又開辦書店，自是往來皆鴻儒，如郁達夫、鄭君平、葉聖陶、陳望道等百多名

人都是曾府常客，把家變成了文藝沙龍。這樣的環境當然也感染了曾先生，他自述道，他最喜歡讀的有六本書：卡萊爾的《英雄與英雄崇拜》、奧斯汀的《感知與感觸》、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卡夫卡的《美國》、喬歐司的《猶利雪司》與邊勒魯意的《阿弗洛狄得》。這些書談人格領導、寫男女情愛、敘老莊無為哲理、創嘻笑怒罵新文體、試讀者難明之筆或大膽寫人生變態，啟發了曾先生的文學修養與人生哲理，而在真美善書店的三年半間，自己也寫了三十幾篇短篇小說和一部未完成的長篇小說（自傳，頁91-93）。

二、三育奠基，聖約翰打磨

在自傳裡，曾先生自述，家鄉、曾家和父親是「塑造我之為我的三柄鑿子」，使他關心家國，成了一位投入社會且勇於負責與革新的讀書人（自傳，頁1-26）。在家，三歲讀的是老師自《爾雅》選撰的方塊字，五歲讀的是《時務報》、《強學報》、《湘學新報》、《新知報》等維新報刊中選出的文章。小學，曾先生讀的是三育中學，老師講的是四書五經、《古文觀止》、《昭明文選》、《古文辭類纂》等古籍，曾先生要背、要寫讀書心得，為他的國學修養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 IV

扎下了深厚的基礎。曾先生在三育度過中學的第一年，第二年則轉到了南洋中學，又一年，也就是民國元年，考入聖約翰大學，在那兒讀了兩年中學和四年大學（自傳，頁27-32）。

聖約翰的教學與管理嚴謹，為使同學在團體生活中陶冶品性，學校規定所有中學生都必須住校，沒有家長請假信，無論平時或週末都不許外出。聖約翰實施「學長階級制」，高、低年級享受的生活條件不同，大學生除了可以外出，還可以吸煙斗，曾先生吸煙斗的習慣也是這樣養成的。聖約翰也實施軍訓，學生依西方軍隊編為班、排、連、營，並設班長、排長、連長、營長，還有值日官，全校的總司令是營長，負責召集連長開軍事會議，安排操練與人事升降與獎懲。同學的升遷全憑表現與年資，勤奮努力的曾先生，在聖約翰六年，畢業前也才升到副連長。這個制度培養了同學的榮譽感，也鍛練了同學的領導能力。聖約翰是基督教聖公會在上海開辦的大學，非常重英文，也重通識教育，可供選修的課開得很多，文學、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倫理學、心理學、天文、地理、化學、物理等都有，教師也多為一時之選。廣博的人文教育磨練出了曾先生成就事業的本領，也

在六、七十年前為我國政府與民間培育了無數棟樑大材，像昔日外交界的顏惠慶與顧維鈞，國防部長俞大維、行政院長俞鴻鈞、總統嚴家淦等都是聖約翰的畢業生（自傳，頁33-42）！

三、二樂一生，高壽九九

曾先生的夫人名吳馥貞，上海商業鉅子之女公子，為上海中西女塾的高材生。曾先生與馥貞女士乃奉父母之命成婚，但在當時聖約翰和中西女塾被公認為「門當戶對」的結合，且曾先生早從馥貞女士的同學，也就是他的小姑母處



民國63年八十壽辰曾虛白夫婦合影。
資料：(攝於《慶祝常熟曾虛白先生九秩華誕專刊》
文化大學中山與大陸研究所提供)

，掌握了不少新娘的情報，也就樂得「不勞而獲」。在曾先生的眼裡與心裡，夫人「端麗、嫵媚」，是位「溫、良、賢、淑」的好伴侶，伉儷同甘共苦超過一甲子，是令人欽羨的模範夫妻（自傳，頁45-57、頁877-901）！曾先生與夫人育有兩男一女，長子名坦，字伯平，曾任美國赫德森紙業公司總經理，回國後於裕隆汽車公司副總經理任上退休。長女名晰，字仲瑜，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聰穎孝順，夫婿為上海商業銀行總經理。曾先生晚年，便由她細心照顧。次子名培，字叔和，肄業燕京、聖約翰與嶺南大學，後在英國倫敦大學史雷德藝術學院與巴黎大學攻研藝術史，精英、法、義文，曾任中央社駐巴黎、羅馬特派員、香港中文大學藝術學系主任及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興趣和專長與曾先生最為接近（自傳，頁777-781、972-975）。

在十九歲時，曾先生生了場幾乎送命的傷寒症，九十歲時患心臟栓塞症後才必須策杖助行，九十五歲割過盲腸（自傳，頁45、976）。除此，他身體向來硬朗健康，少有病痛，九十歲前依然如年輕時般步履穩健，講話中氣十足、鏗鏘有力。一九九四年元月四日曾先生往生，享壽九十九，這得歸功他堅持天

天打坐、散步、打太極。同樣重要的是，曾先生力行自己主張的「二樂人生觀」，自我欣賞完成了的事而「自得其樂」，也重實質而鄙虛榮地「知足常樂」（自傳，頁961-962）。

貳、投身新聞傳播與新聞行政

一、《庸報》起步，《大晚》展才

曾先生投身新聞傳播實務、行政與教育，和董顯光博士（1887-1971）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董顯光畢業於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曾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就讀，只因母親病重而放棄學位回國。一九一三年回國後，他先後在上海的英文報刊 China Republican、Peking Daily News 和 Millards Review 工作，能採、能寫、也能編（董顯光自傳，頁28-38），是當時少見的老練而專業的新聞工作者。一九二五年，他用積蓄在天津創辦中文報《庸報》，一九二九年，他應聘為上海英文《大陸報》總經理兼總編輯，在這些機構，差不多將他在美所學的新聞與辦報經驗全派上了用場（董顯光自傳，頁44、55-62）。一九二一年，曾先生在天津交涉公署任英文科科長，一九二六年，他被調往漢口工作。交涉公署的工作有名無實，不



民國30年，攝於重慶，印度政治領袖尼赫魯訪華(中)；右為曾虛白先生，左為董顯光博士。
資料：(攝於《慶祝常熟曾虛白先生九秩華誕專刊》文化大學中山與大陸研究所提供)

能一展抱負，此時曾先生結識了董顯光，由於志氣相投，兩人迅即結為亦師亦友的莫逆知交，成為長期合作打拼的伙伴（自傳，頁70-71；陳新萌，1984，頁226）。

一九二七年底，曾先生應董顯光之邀參加《庸報》，客串了約一年的記者，訪問過軍閥吳佩孚，也接觸了報館的營業、印務與編採，種下了對新聞工作的興趣。一九三一年秋，在董顯光介紹下，上海《大陸報》與《時事新報》兩報董事長張竹平邀曾先生負責籌備《大晚報》，出任主筆兼經理。翌年，報紙創刊，曾先生起用年輕人，捨文言而用白話語體文，在新聞採訪、寫作、編排與發行推銷上都大膽創新，打破了上海報界不少陋習，也在上海報界創下奇蹟。當時，正值中日兩國在淞滬地區大戰，民眾關心戰事進展，曾先生掌握此一

心理，充份報導戰況時局，不到兩星期，報紙的銷數便飆到五萬份，破了報紙在地銷數的紀錄。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中，西安事變後更達到日銷八萬份。不過，《大晚報》雖然賺錢，但老闆張竹平的另三家新聞機構則經營不善，虧損年年，此時中日已爆發全面戰爭，上海終在一九三七年秋棄守，《大晚報》被迫收場，曾先生也決定投筆從戎了。自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年，曾先生總計在《大晚報》工作了六年（自傳，頁107-133、152-157、185）。

二、共赴國難，力拼國宣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爆發，中日全面開戰，中央成立國防最高委員會，董顯光被派為軍事委員會第五部副部長，專責國際宣傳，並薦曾先生兼任國際宣傳處處長職，同年十月二十八日，曾先生應董顯光之邀赴南京面謁蔣委員長，乃毅然放棄《大晚報》，董、曾二人也由此開啟了我國近代國際新聞傳播的艱鉅工作（陳新萌，1984，頁229-230）。曾先生的貢獻是鉅大的，早期國際宣傳的構思、佈局、人事、組織與運作差不多全出自其手（自傳，頁171-177）。國際宣傳處成立後，除了統籌駐紐約、華盛頓、舊金山、倫敦、巴

黎、新加坡、仰光、墨西哥等地的辦事處外，最重要的工作便是與戰時在華的外國記者聯絡，並負責軍事新聞檢查。經費不足，政策又有限制，事倍功半固然常有，有時還徒勞無功，叫人嘆息（董顯光自傳，頁121-140；自傳，頁171-352）。

匡助董顯光開展我國國際宣傳，傳達中國抗戰的決心，揭發日軍的殘暴，爭取友邦的支持，培養國際宣傳人員，這些艱鉅工作裡處處都有曾先生的辛勞與汗水，董顯光在自傳中寫道：

「在整個戰時中，分擔我這副沉重擔子最主要的人，當然就是處長曾虛白。他沒有擔任這份工作以前，就跟我先後在幾個崗位上共事了二十多年。他是位飽受中國文化薰陶的學者，又是一位能深思熟慮的設計者。我生性熱烈易衝動，處理事務時極需要這樣

一位同事來平衡我的決策。我又是個在西方受教育的人，每遇東西觀念矛盾不能取決時，虛白經常以很冷靜的幾句話或引中國歷史中的一句格言點醒我應循的方向。我在重慶工作的七年中，虛白的辦公桌子永遠面對著我的。凡是我的做事，他都參加並且貢獻意見」（董顯光自傳，頁130）。

抗戰勝利後，董顯光力辭宣傳部副部長職歸隱美國，國際宣傳的重擔便落到了「有實無名」的曾先生肩上，他先將國際宣傳處自重慶遷回南京，之後獨撐大樑達一年半（自傳，頁350-352）。隨著內戰的擴大，國事每況愈下，一九四七年四月，行政院將國際宣傳處改組成立新聞局，以因應中共宣傳。有感於責無旁貸，董顯光於五月二日復出任局長，鄧友德與曾先生任副局長，分管國內與國際宣傳，直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曾先生隨董顯光辭去新聞局職位止（董顯光自傳，頁148-157；自傳，頁413-415）。在險惡的時局和逆境裡，國際宣傳靠的是工作人員的奮鬥衝刺，相當吃力不討好，惟較令人欣慰的是，它為國家培育了傑出的外交與新聞人才，如葉公超、溫源寧、夏晉麟、汪公紀、沈劍虹、魏景蒙、朱撫松、沈錡、崔萬秋、徐鍾佩、余夢燕、王洪鈞、周森鏞、凌崇熙、陶啟湘、周翻萍、謝善才



民國49年曾虛白先生(中)訪問菲律賓總統迦西亞交談情形。

資料：(攝於《慶祝常熟曾虛白先生九秩華誕專刊》文化大學中山與大陸研究所提供)



民國59年曾虛白先生(左起第六人)在中廣主持「談天下事」，一談二十年，教育部文化局特為舉行酒會。
資料：(攝於《慶祝常熟曾虛白先生九秩華誕專刊》文化大學中山與大陸研究所提供)

、朱新民、張彼得、王家楫、倪源卿等都曾是國際宣傳處與新聞局的幹將（董顯光自傳，頁148-157；自傳，320-322；陳新萌，1984，頁234）。在國際宣傳與創設新聞局上，董顯光與曾先生闕功至偉，說董顯光是國際宣傳與新聞局的生父，那曾先生就是國際宣傳與新聞局的養父！

三、中廣發聲，再創懋績

中國廣播公司是曾先生得以發揮長才的另一重要機構，中廣的前身是一九一八年於南京成立的中央廣播電台，後

改稱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對日抗戰勝利後，政府即計畫改組為公司，惟因國共內戰漫燒全國而受阻滯。一九四九年中央政府遷台，十一月公司終於改組完成，董顯光出任第一任總經理，曾先生與吳道一任副總經理，分管節目與工程。曾先生乃汰劣立新，網羅名家以強化文藝性節目，設「青年講座」，談婚姻、讀書與修養，以吸引青年聽眾。此外，曾先生亦配合大陸中共情勢製作特別節目，幫助聽眾瞭解中共的專制作為與對藝文界之鉗制和壓迫（自傳，頁473、483-487）。第二年十月，曾先生奉命

任中央通訊社社長，乃辭卸中廣副總經理職，但仍繼續主持自撰自播的時事評論《談天下事》。從一九五零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一九七零年九月二十五日止，《談天下事》足足播出二十年整，打破了廣播政論的記錄。一九七零年與一九七一年，曾先生自二百八十萬字中選出一百九十萬字編輯成《談天下事》之「韓戰年代」與「越戰年代」出版。一九八二年三月，行政院新聞局在廣播電視金鐘獎頒獎大會上致贈特別獎，以表達曾先生對廣播電視貢獻之崇敬（自傳，



任政大新聞所所長時，曾先生陪同客座教授南伊利諾大學新聞學院院長郎豪華 (Dr. Howard Long) 教授參觀新聞所。資料：(政治大學新聞系提供)

頁493-499)。

董顯光任中廣總經理，又堅邀曾先生任副總經理，是有特別用意的，因為當時美國政府成立了一間名為西方企業公司 Western Industrial Enterprise 的機構，負責蒐集有關中共的資料情報，從事對中共大陸的反共宣傳心戰。中廣奉政府命令與西方公司在台分公司合作，而主責聯繫的便是董、曾二人，代表美方主其事者係甘露德 Rodney Gilbert，是他們在重慶國際宣傳處與中國新聞學院的同事、好友。甘露德負責中波廣播工程，節目則歸曾先生策劃。中廣與西方公司的合作愉快，但只維繫不到三年，因為甘露德於一九五一年底任滿回美，繼任者堅持將節目權劃歸美方，為董顯光所拒。為打破雙方僵局，中央乃將對大陸廣播之心戰工作移交負責對大陸工作之中央委員會第六組，另組中央廣播電台與西方公司合作，中廣對大陸的心戰廣播也就此結束（自傳，頁474-483；陳新萌，1984，頁237）。

四、建新聞通訊網，服務傳媒

政府來台初期，曾先生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四組主任，主管台灣之新聞、宣傳與文化工作，並兼中央通訊社社長。一九五零年九月二十日，曾先生接中



民國39年曾虛白先生(左)迎陳誠行政院長訪中央通訊社。

資料：(攝於《慶祝常熟曾虛白先生九秩華誕專刊》文化大學中山與大陸研究所提供)

中央社社長時，中央社位於西門町一棟老舊木屋，不但簡陋，而且擁擠不堪。在這個百廢待舉的職位上，曾先生首先安頓了各地來台的同仁，接著又四處籌措經費，盡速恢復國內外的通訊業務，成立英文部，收發外電及英文稿件，迅即與外國通訊社續約，重建各地海外辦事處，建立國際通訊網。與此同時，曾先生設法將位於鬧區的木屋出售，另擇較偏之松江路蓋建新廈，更將舊樓換新廈的七十多萬餘款作為員工福利基金。一九六四年元月，中央社喬遷入新廈。四月一日，中央社於新址慶祝成立四十週

年酒會，此時中央社已頗具規模，發展成擁有國際聲望的通訊社（自傳，頁579-650；馬之驢，1986，頁76-92）。

從一九五零年到一九六四年，曾先生任中央社社長共十四年，改任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一九七二年六月在主任委員任上退休，總計服務了二十二年。曾先生在任上的另一大功績是致力促使中央社「公司化」，使它替國家做事的身分可以名正言順、化暗為明，而不必年年為經費偷偷摸摸及四處求人。曾先生退休後十個月，中央社終於轉為公司，仿效美聯社模式，由台灣各公私營報社、電台、電視投資，並推派代表組織董監事會，使我國的新聞通訊業務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自傳，頁607-609、649-650；馬之驢，1986，頁93）。

在中央社服務期間，一九五九年一月十八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曼谷召開第一次東南亞新聞發展會議，曾先生以中央社社長專家身分出席，被主席團提名為「新聞通訊社小組」副主席，會上蘇俄塔斯社社長意圖阻擾，曾先生據理力爭、借力使力，塔斯社社長終未能得逞。會上，曾先生還提案建議成立地區性東南亞通訊社五年計畫，以抗衡西方通訊社之壟斷，並蒙大會接納研辦（自傳，頁698-703；陳新萌，1984，頁

243-244)。一九七八年四月，美國大眾傳播學泰斗宣偉伯Wilbur Schramm教授來台，出席政大新聞所與香港中文大學傳播研究中心合辦之學術會議，曾先生、馬星野、王惕武、徐佳士等新聞前輩設宴款待，筆者亦應邀敬陪末座。入席時，兩人甫坐定，宣偉伯與曾先生就互相認出來了，原來宣偉伯是二十年前美方代表，親眼目睹了曾先生與塔斯社社長短兵相接的宣傳肉搏戰。對當時激辯的情況，宣偉伯還說他記憶猶新。



民國39年曾虛白先生(左)迎葉公超訪中央通訊社。
資料：(攝於《慶祝常熟曾虛白先生九秩華誕專刊》
文化大學中山與大陸研究所提供)

這件事說明了我國處境的艱難，也反映了我駐外人員在國際場合奮力戰鬥時所受的委屈。

中央社是個服務國內外傳媒的新聞集散機構，對國內言，在上世紀的五、六十年代，訊息昂貴且不甚流通，中央社在全球各主要大城蒐集新聞，向各地方報與電台及時供應國內外新聞與資料，對提升國民的世界觀是功不可沒的。在國際上，中央社向全球各主要傳媒發佈有關台灣的新聞，使世界各友邦國家能聽到台灣的聲音、看到台灣的勵經圖治，拓展台灣的國際關係，也間接促進了台灣的外貿。

曾先生投身公職自加入中宣部主持國際宣傳處處長始，來台後服務於中廣與中央社，所從事的新聞傳播工作是領導與行政管理遠多於「火線」作業。實際上，先生在台灣的工作承繼了大陸時期的國際宣傳，所不同者為形式。當然，新聞工作比國際宣傳廣闊與超然。在承平時期，新聞與宣傳理應各自獨立，但在風雨飄搖的年代，在國家危在旦夕的對日抗戰時期、在國家隨時面臨赤化威脅的緊急階段，曾先生及同儕在國內外逆勢之中奉獻、打拼、犧牲，他們的「非常態作為」不但可以理解，而且顯得格外可敬了！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 IV

參、新聞傳播教育家

一、金陵開講，重慶育英

一九一八年，曾先生自聖約翰大學畢業，先是任上海青年會英文教師，首與教育結緣。翌年，膺湖南長沙雅禮醫學院英文教師（自傳，頁59-60）。一九三一年，任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金陵女子大學前身）中國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教授「中國文學史」、「小說研究」、「詩詞研究」等課（陳新萌，1984，頁226-227），使曾先生有機會落實合經師與人師為一的古訓，並且萌生了以教書為志業的想法（迎曦集，頁304-305）。

曾先生從政與抗日戰爭有關，參與新聞教育亦然。當時負責國際宣傳大任的是中宣部副部長董顯光，他認為國際宣傳最需要的是精通英文的人才，經核准後，一九四二年底，董顯光找上了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同學、當時任院長的 Carl Ackerman。在美國國務院的支持及 Ackerman 的大力協助下，中央政治學校於一九四三年在重慶辦起了中國新聞學院，為國家培養精通英語的國際新聞與宣傳人才。董顯光自任院長，曾先生任副院長兼實習英文報 *Chungking Reporter* 《重慶新聞》社長。哥大新聞學院則派 Harold L. Cross 任教

務長，Rodney Gilbert、Richard T. Baker、Anthony Dralle 與 Floyed D. Rogers 為教師，Ackerman 本人亦親自授課。中國教師則有甘乃光、潘公展與馬星野等，分別講授中國政府、三民主義與新聞學。中國新聞學院只辦了兩期，畢業了五十九名學生，而學院也隨著抗戰結束而結束了。重慶的經驗雖然只有兩年，卻為國培養了優秀的新聞、國際宣傳、外交、學術人才，如王洪鈞、余夢燕、周森鏞、凌崇熙、李蕙苓、殷珊姑、沈昌瑞、歐陽美生、高克方等都是該院的畢業生（董顯光，1967；Boylan, 2003, Chapters 15 & 16）。

二、木柵創所，主講民意

一九五四年，國立政治大學在台北復校，成立新聞研究所，曾先生任所長，第二年，大學部恢復新聞系，再兼系主任。翌年，謝然之接任系主任後，曾先生專任新聞所所長。曾先生是位「無為而治」的領導者，他的新聞教育哲學是理論與實務並重，做法是要在承繼傳統的基礎上從事研究，以因應快速變遷的社會，也要培養有開闊視界的通才。因此，新聞所招生不限新聞主修生，凡政治、法律、文學、藝術、社會、心理等皆可報考。優秀的學生必須有名師教



民國57年曾虛白先生(右後)偕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所主任貝克博士晉謁先總統 蔣公。
資料：(攝於《慶祝常熟曾虛白先生九秩華誕專刊》文化大學中山與大陸研究所提供)

導，曾先生乃聘請國內具有專長的新聞界耆宿擔任教授，並向美國弗爾布萊特基金申請經費，每隔一年聘一位教授來台，總計在一九六九年卸任所長止的十五年任內，共聘請了六位美籍、二位日籍的客座教授，開設公共關係、大眾傳播、民意、國際傳播、新聞採寫等課（自傳，725-728）。筆者在新聞所兩年，除曾在重慶任教的 Richard T. Baker 教授客座了一學期外，來短期講學的還有介紹行為科學研究的哥大新聞學院喻德基教授、演講民意理論的日本世論協會會長小山榮三教授與研討科學新聞的哥大新聞學院 John Foster 教授。曾先生非常重視培養學生的國際觀，在新聞所創建初期，他請我國駐日本大使董顯光協助，促成了新聞所第一班同學遠赴日本參訪一個半月，考察當地的通訊社、報紙、電台（李瞻，2005，頁205-214）。

在新聞所，曾先生自己開「民意原理」一課，從儒家的民本思想講到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到美國的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他講經典的政治公共哲學，也講當代社會科學態度與行為改變的理論。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開民意或輿論課的不多，他可能是台灣的第一位。研究所畢業後筆者赴美留學，才發現曾先生差不多已經掌握了主要的文獻，這在經費不足、訊息不流暢的年代是相當不容易的。

三、大師開創，新聞傳播研究邁步

曾先生主持新聞所，最大的貢獻不在個人的教研，而在促成、推動和開創了政大及台灣新聞傳播教育的優良傳統。首先，他於一九六二年向亞洲基金會申請款項，邀約閻沁恆、陳聖士、李瞻、亓冰峰、朱傳譽、張玉法、常崇寶、黎劍瑩等人分章撰寫《中國新聞史》，歷時四年而成，並於一九六六年印刷出版（自傳，738-743）。《中國新聞史》是一九二六年戈公振《中國報業史》出版後的第一部新聞傳播史，它跨出了傳統的報紙，涵蓋了新興的廣播電視媒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這部巨著是海峽兩岸三地許多大專新聞院系的教科書。受到經費與資料不全的限制，這本長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 IV

達七十萬字的歷史確有不少缺失，但將我國新聞傳播史研究向前推進一大步。與此同時，曾先生亦聘請蒐集了大量新聞傳播史料的朱傳譽先生來所任教，支持他研究先秦傳播、中國歷代民意、言論與新聞自由發展史，為新聞傳播歷史研究開拓了新的視野。

曾先生在新聞所的另項長遠貢獻是促成《新聞學研究》出版，第一期由朱傳譽任執行編輯，以新聞自由與自律為主題，有論文、譯介、史料和研究新聞自由與自律的參考書目，呼應了曾先生在〈發刊辭〉中的揭示：「因為傳播事業的發達，新聞學不再是一門研究技巧的學科，而變成了社會科學中重要的一門」。從一九六七年到二零零九年七月，《新聞學研究》已出版二百期，是全球華人新聞傳播學界歷史最久、審稿最嚴與水準最高的學術期刊。

我國第一位傳播學博士朱謙曾於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在政大新聞所任教，開設大眾傳播研究課程，引介社會科學量化研究方法，在曾先生全力支持下，開展傳播研究。曾先生九秩華誕時，朱謙教授寫道：

「文章道德和提攜後學不遺餘力者惟虛白先生和史丹福業師宣偉伯教授二人，宣偉伯是大家公認為大眾傳播學的泰斗，而開創

中國近代新聞學及傳播研究的大師除虛白先生外莫屬也」（九秩華誕特刊，頁85）。朱謙教授是我在美國南伊利諾大學求學與夏威夷東西中心從事研究的業師，我知道他不是位輕言取悅他人的學者，我也見證、經歷了華人地區四十年多來新聞傳播研究的發展，朱老師對曾先生的讚頌是「於吾心有戚戚焉」的！

四、再戰文大三研所

一九七三年，曾先生應中國文化學院邀為華岡教授，任三民主義研究所所長兼博士班主任。曾先生係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但對「奉命照辦」或「照本宣讀」的辦學並不苟同，他給自己的使命是要將三民主義的研究學術化和國際化。於是，他聘名師從教育、法律、經濟、社會、政治等不同角度鑽研。於是，他在招生時要審查申請者的碩士論文



民國72年曾虛白先生(右)接受文化大學授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

資料：(攝於《慶祝常熟曾虛白先生九秩華誕專刊》文化大學中山與大陸研究所提供)

，還要考他們用英文論述三民主義的能力（自傳，頁 783-826）。見到商業主導的新聞傳媒未能照顧社會大眾利益，曾先生念茲在茲的便是建立一個非謀利、「公營」的三民主義傳媒制度（舊釀新焙，頁 133-153）使傳播事業成為「非國營」、「非政府營」，而「純粹粹由整個社會全體人民共同經營管理之」（自傳，頁 758）。這個理想當然崇高，卻是不可能實現的烏托邦，因為如落實為政策可能會引發更多問題。從追尋真理的角度看，揚棄教條式的單向灌輸，運用科學理性的方法研究某一主義，這是正確的。但從學術自由的角度看，獨尊某一主義則又有違追尋真理的客觀原則。曾先生生於衰敗的清末，長於民初軍閥混戰，經歷過八年堅苦抗戰，見證了國共的慘酷鬥爭，到了台灣才有機會專心從事國家建設，他篤信並宣揚三民主義就不足為奇了。在他那一輩人中，不少人都有此執著，這是動盪亂世對他們的影響。

曾先生對教育的關心是全面而前瞻的，一九五三年九月，他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赴美訪問四個月，考察美國工人與農民現況及工商企業管理，並參觀新聞通訊社、報館、電台。當時，美國電視已經普及，曾先生特別為這個新興科技

的教學與社教功能所吸引，返國後他將心得報告呈報當局，力陳建立以公益與教育為主體的公共電視制度之社會功效及必要（自傳，頁 651-690；迎頭創建，1955；老兵記往，1978；陳新萌，1984，頁 240-241）。曾先生深知新聞傳播對社會影響至鉅，時以提升新聞傳播素質與道德為念（自傳，頁 764-773），一九七零年代初便曾函諭筆者在美留意普立茲新聞獎之運作，蒐集相關資料。一九七四年，曾先生八十壽誕，親友、學生發起籌募基金，成立「曾虛白先生新聞獎」，每年頒贈對新聞報導與新聞學術有卓越成就者獎金（自傳，頁 773-774）。一九八二年三月，新聞局在廣播電視金鐘獎大會頒贈先生特別獎，表彰他在廣播電視上的功績。同年九月，中華民國大眾傳播教育協會致贈曾先生紀念銀屏，表揚他對新聞教育之卓越貢獻。一九八三年，中國文化大學頒贈曾先生榮譽文學博士，以褒揚其對國家與教育之建樹（陳新萌，1984，頁 252，256）。一九八六年，行政院頒贈曾先生文化獎，嘉許他對復興中華文化的貢獻（自傳，頁 967-968）。

肆、結語

曾先生是「多元創業專家」，一生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 IV

都在忙，忙追求知識、忙新聞業務、忙為國宣傳、忙教書。他忙的事固然不同，但皆與大眾傳播有關，都是「無中生有」開創性的事業，而且也是他樂意做的事（馬之驢，1986，頁121）。曾先生能者多勞，經常身兼數職，無論處在什麼崗位，總把國家社會的利益放在個人利害之前，是位徹頭徹尾的愛國者。在追憶與曾先生的共事經驗時，董顯光稱讚他「是位飽受中國文化薰陶的學者，又是一位能深思熟慮的設計者」（董顯光自傳，頁130）。對日抗戰時曾在國際宣傳處追隨曾先生的朱撫松稱讚他「為一般公教人員樹立一個令人十分欽仰的楷模」（九秩華誕特刊，頁73-76），蘇雪林說他是「政論家、文學家、新聞學家」（九秩華誕特刊，頁69），陳紀澄說他是「傳播界的瑰寶」（九秩華誕特刊，頁71）。一九八三年，曾先生八九壽誕，他在中央政校和中央社的老友、新聞界耆宿馬星野賀道：「曾經滄海，虛懷若谷，白雲在天，俯覽無餘」（冷若水，1984，頁269）。這些稱讚絕非客套溢美，乃是舊雨的心語，也是眾人之共識！

曾先生伉儷鶼鶼情深，結褵六十五載，兩人晚年皆鶴髮童顏，幾乎每天都在住家附近攜手漫步。對子女，曾先生

從不疾言厲色，反倒常和他們嬉鬧，用身教代言教。曾先生身材高大，望之道貌儼然，可他待人隨和，臉上常帶慈祥笑容，在部屬與學生心中是位「即之也溫」的開明長者。曾先生一生滿懷憂患意識、時時記掛國家安危與建設，然而筆者沒在課堂上聽他誇談過什麼愛國的大道理，他只用行動實踐理念，向同胞與年輕人示範。曾先生擔任過不少要職，但最感滿足的則是從事新聞與教育工作，自喻兩者合而為一、交織成了「一根辮子」。曾先生桃李滿天下，許多學生在新聞、外交或學術界都有傑出成就，見到學生「出將入相」，自己也會「不禁歡喜若狂」（自傳，743-750；迎曦集，頁303-308）。

在曾先生任政大新聞所所長的最後兩年，筆者有幸做了他的學生，並選讀了他開設的「民意原理」。當面，同學們叫他「老師」，私底下，我們尊稱他「曾老」。筆者對老師們向來敬畏多過親近，直到我與同學翻譯貝克老師《美國報業面臨的社會問題》，筆者去請曾先生寫序並為書名題字，才和老師有了互動，後來筆者與內子文定，更蒙老師福證，使我們倍感榮寵。曾先生溫文儒雅，是位「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君子。讀研究所時，教我們「中國新聞史研

究」的朱傳譽老師蒙受不白之冤，曾先生三訪情治首腦，並聯同另兩位國民黨新聞界元老馬星野與謝然之去函警備總部為朱老師辯護，可惜依然徒勞（朱傳譽）。朱老師蒙難，我還在新聞所就學，親聞曾老師為他奔走，也曾親見老師無奈搖頭歎息！這些往事都四十年了，但老師的風采與義行，現在都依然歷歷在目。

曾先生飽讀傳統詩書，亦深受西學洗禮，一生樸實無華，凡事身體力行、努力不懈。文學本係曾先生最愛，惟因國難而放下。在自公職退休前，曾先生不是全職的學者或教育家，他留下的著作不少，惟以政論與時評為多。無論是寫文章、擔任公職或教書，他時時處處都以國家社會為念，一生夙夜匪懈。用身教，曾先生為社會留下了典範。（二零零九年二月中於警未居）

參考文獻

- 朱傳譽〈兩字破家•一葉知秋：從我的文字獄看台灣人權〉，未刊稿，約寫於1995或1996。
- 冷若水主編《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通訊社印，1984。
- 李瞻《大時代見證：萬里孤鴻》，台北：三民書局，2005。
- 董顯光〈憶本校戰時的新聞學院〉，《政大四十年》，台北：國立政治大學，1967，頁54-57。
- 董顯光《董顯光自傳》（曾虛白譯自英文原著），台北：台灣新生報社，1972。
- 馬之驢《新聞界三老兵：曾虛白、成舍我、馬星野奮鬥歷程》，台北：經世書局，1986。
- 陳新萌〈虛白先生年譜〉，《慶祝常熟曾虛白先生九秩華誕特刊》，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班編印，1984。頁223-257。
- 曾虛白〈迎頭創建電視實業的重要〉，董顯光等著，《新聞學論集》，台北：中華文化事業化出版委員會，1955。
- 曾虛白〈圓山飯店與林家花園〉，《板橋林宅調查研究及修復計畫》，東海大學建築學系，1973。
- 《慶祝常熟曾虛白先生九秩華誕特刊》，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班編印，1984。
- James Boylan, *Pulitzer's School: Columbia University's School of Journalism, 1903-2003*.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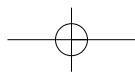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 IV

(Chapter 15. “utpost in Chungking” ;
Chapter 16, “Sweat and Tears”)

附錄：曾虛白先生 主要著作

- 1.《英雄與英雄崇拜》(卡萊爾原著之譯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台北：商務印書館，1967。
- 2.《革新芻議》，台北：新中國文化出版社，1951。
- 3.《談天下事》(第一集)(廣播評論)，台北：新中國文化出版社，1951。
- 4.《工業民主制的理論與實施》，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3。
- 5.《美遊散記》(原名《東遊散記》)，香港：亞洲出版社，1954。台北：台灣文史哲出版社，1977。
- 6.《中國新聞史》台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66。
- 7.《國父思想對時代貢獻》台北：幼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66。
- 8.《世變建言》，台北：三民書局，1969。
- 9.《屐痕心影》，台北：三民書局，1969。
- 10.《談天下事》(韓戰年代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0。
- 11.《談天下事》(越戰年代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1。
- 12.《董顯光自傳》(翻譯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Farmer)，台北：台灣新生報社，1972。
- 13.《老兵記往》台北：華欣文化事業中心，1974。
- 14.《民意原理》台北：華岡出版公司，1974。
- 15.《晨曦漫步觸感》台北：華欣文化事業中心，1976。
- 16.《外人語》台北：幼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77。
- 17.《上下古今談》台北：華欣文化事業中心，1978。
- 18.《舊釀新焙》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8。
- 19.《曾虛白自選集》，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出版公司，1981。
- 20.《擊楫中流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1。
- 21.《迎曦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2。
- 22.《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三面釋》台北：陽明山莊，1983。
- 23.《曾虛白自傳》，上、中、下三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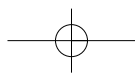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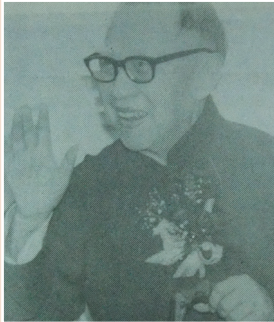
錢 穆

1895~1990

◆ 史學泰斗 ◆

王吉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所長





錢穆先生字賓四，江蘇無錫人，生於民國前十七年，時為清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初九日（乙未，西元一八九五年七月三十日），甲午戰敗後一年，清廷於是年割臺予日。民國七十九年八月三十日，逝於臺北市杭州南路寓所，享年九十六歲。

賓四先生於滿清衰敗之年，西力東侵，東洋日本崛起，政治、軍事，俱受欺於強敵，中國之傳統教育，亦受到質疑。在一切待變聲中，講究船堅砲利之不足，改革政治，學習西方教育，亦成此一時代之要求。錢氏生於此一時代，所受教育，亦是由廢科舉而進學堂，接受所謂新式教育。

以今日觀之，當時之所謂新式教育，實仍新舊兼陳，重國文而輕忽其他學科。師資不足，應是一大問題。

錢氏之學校教育，因辛亥（一九一一）革命成功而終止，回鄉任初級小學教師。

在錢先生之教育生涯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是以教為手段，以學為目的，絕不浪費光陰，更不以己為教師而滿足。其教育生涯，循序漸進，由初小而高小，再初中而高中，而師範學校，最後成為上庠名師。如非長期努力，何能有此成果。

北伐成功後，錢氏講學北大，著述、購書，為一生最愜意時期。抗戰軍興，播遷西南，雖戰火連天，而不止其傳道解惑之樂。

勝利還鄉，國共內鬥，南北不安，錢氏雖仍在大學任教，且曾任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然未再回北大。

一九四九年，錢氏由上海而廣州，轉香港。在香港辦夜間部之亞洲工商學院。次年，創辦新亞書院，以教育大陸逃亡青年為目的，延續中國文化於香江。此校之成就，為錢穆教育事業中最具理想特色之事業。

民國五十六年（一九六七）十月，來臺定居。五十八年，受聘為中國文化學院史學研究所華岡教授，每周一晚間七至九時，在素書樓客廳上課，自由聽講，旁聽者倍於史學所之學生。

從民國六十八年至七十五年，素書樓之講學，影響臺灣史學界甚深，而使臺灣青年，得親聆一代宗師之講學，知其治學方法與精神，中國文化之根，植於臺灣，錢氏有不可沒之功。

民國七十九年八月三十日上午九時，逝於臺北寓所，享年九十六歲。

壹、家世與教育

錢穆字賓四，江蘇無錫人，生於清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初九日（西元一八九

五年七月三十日）。錢氏歷代書香，其曾祖父繡屏公，為國學生。其祖父鞠如公，邑庠生，其父承沛公，以十六歲縣

試入泮，為第一名之秀才，三赴南京鄉試，皆在場中病倒，不終試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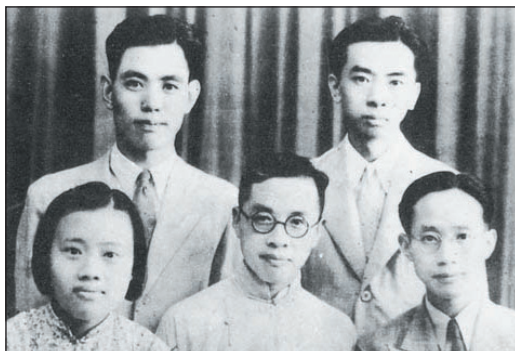
賓四先生於七歲之時，曾赴私塾就讀，此當為傳統之舊式教育。至十歲，始入無錫蕩口鎮之果育學校。此一學校為私人所辦，分初、高兩級，各四年。賓四先生入初小一年級，其兄則入高小一年級。

賓四先生在果育學校因作文優異，獲得兩次跳級，當其兄念高小四年級時，賓四先生已念高小三年級，與其兄僅差一年。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秋，與其兄聲一同考進常州府中學堂。

賓四先生入常州中學堂時，年十三。十歲入小學，初小高小各四年，錢先生肄業小學僅三年，尚未畢業即考入中學，其聰穎努力，可想而知。

在常州中學堂時，得遇經師人師之



錢先生送別侄子錢偉長(右一)留學美國時，在上海與錢偉長等人合影。

資料：(素書樓文教基金會提供)

屠孝寬、呂思勉二師，對錢氏之經、史研究，影響甚深。屠孝寬為中學堂監督，即今校長。屠孝寬為屠寄之哲嗣，屠寄為清末蒙古史大家，所著《蒙兀兒史記》為研究元史之不世名作，價值不在新元史之下。

另一影響錢氏之名師，為呂思勉先生。呂氏授歷史、地理兩科，年長於錢氏約十二歲。呂思勉先生後在上海任大學教授，著作宏富，所著《白話本國史》、《隋唐五代史》尤膾炙人口。錢氏與呂思勉先生論學互有異同，蓋錢氏信古文經，而呂先生則守常州派今文經之緒論。論學雖異，而師生情篤，且均讀史有成，亦可稱為教育史上之楷模。

賓四先生在常州中學堂念至四年級時，因被推為建議改革課程之代表，不獲校方同意，因而退學。以屠孝寬之介，轉學南京鍾英中學就讀五年級。

宣統三年（一九一一）暑假，錢氏有疾，延期返校，辛亥革命成功，時局不穩，鍾英中學解散，錢氏返鄉，從此未再受學校教育，轉而從事教育事業。

貳、教育事業更上層樓

錢穆先生自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即在學校教書，開始一生的教育事業。

錢氏的教育事業，最大特點，就是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 IV



1931年錢先生於課堂上教課。
資料：(《素書樓》素書樓文教基金會提供)

一面教學，一面自學。說是自學，實際是有很多益友，在學問方面，互相切磋，使錢氏學問，日益精進。另一方面，錢氏在教學之際，不忘研究，發表文章，漸漸有名。

民國元年，錢氏應秦家水渠三兼小學之聘，任初小學教師。此校為秦仲立所創，仲立好學，為始與錢氏互學之第一人。錢氏自言「余既決意應三兼小學聘，念自此升學絕望，一意自讀書。」有此一念，方能學問日進，所教學校，亦由初小而逐步上升，終成大學教授，其亦有教育意義，而可為後人師法者，略述於後。

賓四先生在三兼小學時，始讀乾嘉諸儒書，如毛大可之四書改錯一書，書中言四書朱注有許多錯誤，自是始知考據之學。

秦仲立與錢氏之共學，其中一例即秦氏讀過之書，令錢氏亦讀一遍，相互討論，秦氏讀嚴復所譯英人斯賓塞之群學肄言，令賓四先生亦讀一遍。以一十八歲之小學教師，讀乾嘉之書及西哲名著，不止在當時少見，亦令錢氏學問大進。

賓四先生在三兼小學任教僅一年，次年即來鴻模小學任教。鴻模規模較三兼完整，任教時數較三兼為少，而薪水則較三兼為多。最重要者，則在鴻模僅任高小三年級國文及史地課，由原先之每週三十六小時，減為每週二十四小時，月薪由國幣十四元增為二十元。辭三兼而去鴻模，則為錢先生之明智抉擇。

錢穆先生在鴻模期間，見北大招生廣告，言投考者須先讀章學誠之文史通義，因求此書而讀之，形於夢寐。影響更為深遠者，則為讀到夏曾佑之中國歷史教科書。因此書為北大課本，故錢氏讀之甚勤。由讀此書，錢氏始知經學有今古文之別。錢氏信古文而不信今文，當萌於此。再者，夏曾佑之書第一冊書末詳鈔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六國年表，不增減一字。錢氏自云此後讀史，知諸表之重要，其後著《先秦諸子繫年》，亦受此影響。

錢氏之《先秦諸子繫年》稿，為顧

頡剛所見，大為欣賞，特推薦至燕京大學任教。錢氏之能任教上庠，當奠基於其任教鴻模小學時。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夏，無錫創辦六所高等小學，設於梅村為第四高等小學。校長華澄波邀錢賓四兄弟前往任教。

賓四先生在第四小學任教時，每週授課十八小時，較鴻模減少四分之一，但鴻模堅不放行，故每週仍回鴻模兼課一天。小學老師，歷兩小時之船程，至曾任教之學校兼課，亦教育界之一大佳話！

錢氏至梅村縣立第四小學任教三年，讀書日進，尤受益於曾文正公之家書、家訓，遵其所言，逐篇讀書，自頭至尾，絕不跳讀。又寫日記，必記每日讀書進度，錢氏在小學教論語，因讀馬氏文通，仿其例論句法，積年成《論語文解》一書，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此為錢氏第一部著作。

錢先生在梅村鎮縣立第四高等小學任教時，讀書漸有規律，讀孫詒讓之《墨子閒詁》，始知孫氏改定墨子錯誤處，必有明確證據，而非闡解。錢先生之遊情乾嘉考據之學，自孫氏閒詁啟之。錢氏自言清人考據自經學入，錢氏則自子部入，因與乾嘉諸老異。錢氏之作《

先秦諸子繫年》，可為其自子部入之一明證。

賓四先生自民國元年開始在小學任教，自知無法升學，讀書反而更勤，同事互勉，學問反更精進，範圍亦更廣闊。錢氏自言：

回念余自民元出任鄉村教師，得交秦仲立，乃如余之嚴兄。又得友朱懷天，乃如余之弱弟。為交此二人，獲益甚深甚大。至今追思，百感交集，不能已。

錢氏所言之朱懷天，乃松江人，上海師範學校畢業，其人偏重思想方面，喜佛書及共產思想。賓四先生由朱懷天之介而愛讀六祖壇經，但不因朱懷天之故而不反共產主義思想，然無害於二人之感情。

在縣立第四小學任教時，錢氏已習靜坐，而若有成。在讀書方面，雜治理學家及道家、佛家言，尤喜天臺宗之小止觀，其書亦自朱懷天桌上得之。錢氏之深於理學，至老彌篤，當始於此。

錢先生在鴻模學校時之管事人須霖，約有六、七人，於暑假中請賓四先生為此諸人講莊子內篇七篇。經此講解，錢氏自認於莊子所未解者實尚多。後賓四先生撰《莊子纂箋》，實以講莊子而益求深解，遂有是書。由此觀之，錢氏於書未解處，不輕易放過，研究有得，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Ⅳ

筆之於文，其著作大都如此。

參、任教中學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秋，錢先生獲廈門集美中學聘，教高中部師範部三年級畢業班之兩班國文。在集美之一年，教課負擔輕而薪水較前高數倍，因此益能讀書。船山遺書，即在集美所讀，《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船山一章，即用在此讀書所錄資料為依據。

先生在集美僅一年，次年即轉入無錫第三師範學校任教。錢氏之能任教三師，係由錢基博之介紹。錢基博之肯推薦賓四先生，從讀其文而知其人。在三師期間，賓四先生得識錢基博及其子鍾書。時錢基博已在上海聖約翰及光華大學任教，在三師兼課，錢鍾書時在小學肄業，聰慧異常。錢先生對錢基博推崇備至，認為係其中學任教時最值得敬事之同事，故賓四先生云：

然余在中學任教，集美無錫蘇州三處，積八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學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錢氏去三師一年後，錢基博即離開三師，不復再去三師兼課。

在三師期間，對賓四先生影響最大者，厥為三師對國文老師之規定，即須

自編講義，此亦督促錢氏讀書著作之一方，而不可抄他人之講義以為己用。錢氏回憶云：

三師又規定，每一國文教師，隨班遞升，於國文正課外，每年必兼開一課。第一年為文字學，第二年為論語，第三年為孟子，第四年為國學概論。子泉穎若各自編講義，余亦循例。

錢先生第一年之文字學講義，講六書大義，以篇幅未充，沒有付印，後遂失之。第二年之講義，成《論語要略》一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第三年所編之《孟子要略》，由另一書肆出版。此二書，皆收入錢氏之《四書釋義》中。《國學概論》成書一半，後轉任蘇州中學時完稿，亦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前引文所提及之子泉、穎若，即錢基博、沈昌直二人。

賓四先生於錢基博外，尚推崇沈昌直。沈氏較錢鍾書年長，喜詩，尤愛東坡詩文。昌直為人謙和，以詩人而兼有儒家風，故為錢氏敬重，以為錢基博離三師後，沈昌直最為三師國文科之老師。

在三師時，賓四先生曾細讀三民主義，且以三民主義為其所著《國學概論》之殿。

錢氏任教三師時，獲交二前輩，一

為孟憲承，另一為唐文治。唐氏為賓四先生交遊中最年長者，曾為南洋大學校長（即上海交大），在無錫創國學專修館，地址在三師對面。唐氏與賓四先生所語為何，已不復記憶。其記孟憲承云：

時憲承將轉北平清華大學，任中文系主任。憲承告余，出國前，國學根柢未深。此去當一意通體細誦十三經注疏。俟閱讀此書完畢，庶對國學或可稍有所窺。余聞語深為感動。十三經注疏常在余案頭，然余迄今始終未通讀其全部。每念憲承言，心終不能釋。

讀書有得，進而從事研究，但喜讀某類書籍，方能從事某類研究。錢氏絕無意批評孟憲承，亦不指其讀十三經注疏為非，但賓四先生言迄今未通讀其全部者，蓋言其不喜經學，而喜子學，如此而已！

肆、風雲際會

賓四先生自民元在小學任教，後至集美中學，無錫第三師範學校，至民國十六年秋，轉入省立蘇州中學任教。錢氏從教小學至中學，自學不懈，又多有益友朋，互相切磋，發而為文，為有識者激嘆。及任教蘇州中學，為其進入大學任教成為學術重鎮之一的重要關鍵。

蘇州為江南古城，人文薈萃，錢氏任教於此，自非昔比。校長汪懋祖，留學美國，曾為北平師大校長，回籍為蘇州中學校長，其氣象自不同於一般人。

賓四先生在蘇州中學任教時，著作漸多，而為當代學者所重。其在無錫師範起草之《國學概論》，至蘇州中學時完稿出版，又由方壯猷之介，為商務萬有文庫寫《墨子》、《王守仁》二書。

錢先生在蘇州中學時，可能致力於其先秦諸子繫年，稿雖成而自覺有未妥處，必細加研究，覓前人之言，以證己之不虛，然有一插曲，即胡適至蘇州演講，時在東吳大學任教之陳天一東示胡氏，至蘇州莫忘一見蘇州中學之錢穆。錢氏後記此事云：

適之與余本不相識，蓋以詢典存，故典存招余同坐也。余時撰先秦諸子繫年，有兩書討論史記六國年表者，遍覓詢不得。驟遇適之，不覺即出口詢之。適之無以對。演講畢，典存留宴，余亦陪席。適之午後即欲返滬，典存告以太匆匆，何不再留一宵。適之謂，忘記帶鬚子刀，今晨已不耐，不可再留。典存謂，刮鬚子刀可購可借，區區小事，何足為困。適之言，積習非此常用刀不可。

錢氏與胡適之初次會面，即有如此不愉快經驗，宜乎以後之如冰炭。民國十六、七年，胡適已名滿天下，錢氏以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 IV

僻書相詢，不知為不知，無害其為名學人。錢氏與胡適初次見面，即詢以僻書，且在公開場合，胡適可能認為錢氏故意刁難，自覺無趣。

對賓四先生而言，其《先秦諸子繫年》為使其能在大學任教之憑藉，始終維護錢氏在大學任教者，則為顧頡剛氏。

陳天一曾陪顧頡剛去看錢氏，顧氏見賓四先生桌上之《先秦諸子繫年》稿，因請攜返詳讀。錢氏同意，顧遂攜稿而歸。越數日，陳天一又約賓四先生至顧宅答訪，錢乃同去。顧頡剛言其匆匆翻閱繫年稿，言賓四先生不宜長在中學教國文，宜去大學教歷史。因而彼離廣州時，副校長朱家驊託其物色新人，因薦錢氏去中山大學。越數日，得廣州中山大學電，聘其前往。錢氏持電面見校長汪懋祖。汪氏言君往大學任教，乃遲早事，明年，余亦當去大學任教，因挽錢氏多留一年，可同進退。錢氏遂辭中山大學聘。

顧頡剛曾告錢氏，彼在中山，以講述康有為今文經學中心，此番去燕京大學，仍述前志。顧氏又兼編燕京學報，囑錢氏為燕京學報撰稿。

伍、講學古都

民國十九年秋，錢氏轉入北平燕京大學任教，時年三十六，已入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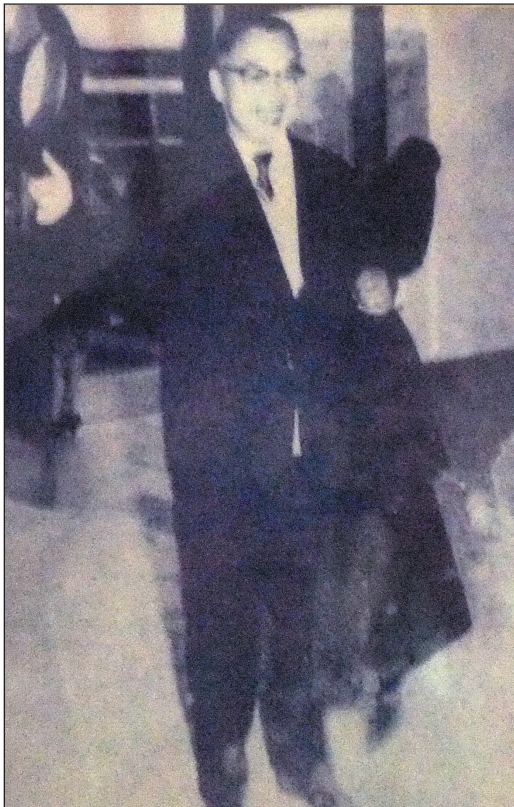
錢氏於民國十八年辭中山大學聘，次年又獲燕京大學聘，此皆由顧頡剛之推薦。世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若無顧氏，賓四先生能否進去大學任教，甚至任教第一流高等學府，都是問題。然顧頡剛何以垂青錢氏，筆者以為顧氏在民國十五年已出版第一冊《古史辨》，以後續有出版，至民國三十年，出版七大冊《古史辨》，被推許為現代卓越的史學家。顧氏初識賓四先生時，當在民國十八年，《古史辨》第二冊所收文章，止於是年。顧氏以編《古史辨》之故，對當時古史考辨之文章，自必廣為閱讀且能第其甲乙，及見賓四先生之《先秦諸子繫年》稿，自當驚其對先秦諸子之全面考定，非探究一二人者可比。且其方法之周嚴，又非前人所能。故錢氏自云：

蓋昔人考論諸子年世，率不免於三病。各治一家，未能通貫，一也。詳其著顯，略其晦沉，二也。依據史籍，不加細勘，三也。

錢氏針對前人之三失，故詳考諸子，始於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卒歲，排比聯絡，一以貫之，此非治一家者所能比。其次顯晦通考，幾無遺漏，此又非昔

人所能為。最後則詳考史記六國表之誤，還先秦史事以正確年代，諸子所處時代方可排比。錢氏於《先秦諸子繫年》之自序中，詳述此書之貢獻。《先秦諸子繫年》若無暇詳讀，但其自序當為中國讀書人所必讀。

錢氏之《先秦諸子繫年》，為其在小學、中學教書時研究之所得，彼亦先治一家一人，再及其他，所涉既多，遂為諸子繫年。其論前人之三病，錢氏可能亦曾經歷。《先秦諸子繫年》稿創於



1960年赴美國講學於香港機場留影。
資料：(素書樓文教基金會提供)

賓四先生任教無錫師範時，為民國十二年秋，及顧頡剛見此稿，已在六年之後，時為民國十八年秋。此書寫成經過，錢氏在《先秦諸子繫年》跋中已有詳述，此處不再徵引。

前文言及孟憲承氏欲通體細誦十三經注疏，錢氏自言其至今未能全讀，是知錢氏不喜經學，而鍾情諸子。關於此點，錢氏自言：

余本好宋明理學家言，而不喜清代乾嘉諸儒之學。及余在大學任教，專談學術，幾乎絕無書院之精神。人又疑余喜治乾嘉學。則又一無可奈何之事矣。

錢氏之喜理學，疑今文經學派之說，可能早在其為常州府中學堂之學生時，彼時方一十幾歲之童子，然其思辨已若老儒。錢氏曾為經今古文學之問題，與其中學老師呂思勉有所論辨，後追憶云：

惟憶誠之師謹守其鄉前輩常州派今文學家之緒論，而余則多方加以質疑問難。誠之師最後一書，臨了謂君學可比朱子，余則如象山，儘可有此異同。余不知此係誠之師之謙辭，抑更別有所指。惜後再見面，未將此問題細問，今亦終不悟當時誠之師此語是何意義也。

在基本上，清末民初今文經學派盛行，可能與其時之政治有關，希望改革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 IV

，而錢氏反今文經學者，而不認同古文經出於漢儒偽造。再則錢氏不喜乾嘉考據，而好宋明理學家言。

錢氏不喜乾嘉考據，以更精進之方法，遍考先秦諸子而成繫年一書，可謂超出乾嘉考據之上的大著作，代表錢氏三十六歲以前的成績。

陸、平息今古文經之爭

錢先生之教育生涯，約可分為三個階段。

從民國元年至十一秋，為在小學教書之時，約十餘年。民國十一年秋，至十九年秋，前後八年，任教中學。自十九年秋，始在大學任教，以迄民國七十五年六月告別杏壇，在大學任教逾五十餘年，至為難得。

錢先生去燕京大學之前，同年在燕京學報發表其〈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此非為劉向歆父子二人撰年譜，而實為證明劉向歆及王莽未嘗偽造古文經。清末康有為著《新學偽經考》，而謂古文經皆出諸王莽之新朝所偽造，而為王莽篡位立說。

有關康有為之新學偽經考，其弟子新會梁啟超嘗略述云：

偽經者，謂周禮、逸禮、左傳及詩之毛傳，凡西漢末劉歆所力爭立博士者。新學者

，謂新莽之學。時清儒誦法許、鄭者，自號曰漢學。有為以為此新代之學，非漢代之學，故更其名焉。新學偽經考之要點：一、西漢經學，並無所謂古文者。凡古文皆劉歆所偽作。二、秦焚書，並未厄及六經，漢十四博士所傳，皆孔門足本，並無殘缺。三、孔子時所用字，即秦漢間篆字，即以文而論，亦絕無古今文目。四、劉歆欲彌縫其作偽之跡，故校中秘書時，於一切古書多所羈雜。五、劉歆所以作偽經之故，因欲佐莽篡漢，先謀湮滅孔子之微言大義。（清代學術概論頁66~67）

康氏之《新學偽經考》，雖其弟子亦病其武斷。梁啟超云：

有為弟子有陳千秋、梁啟超者，並夙治考證學，陳尤精洽，聞有為說，則盡棄其學而學焉。偽經考之著，二人者多所參與，亦時時病其師之武斷，然卒莫能奪也。（清代學術概論頁67）

然在當時，今文經學為學術之重鎮，其大師則為廖平與康有為二人。康有為受廖平影響，為一不爭之事實。廖平之說，與康有為略有不同。康指古文經全為劉歆所偽造，廖則認為今文學家其家法可追至兩漢以前，此康廖之所異也。錢氏總序其兩人之失曰：

清季今文學大師凡兩人，曰廖季平與康有為。康著新學偽經考，專主劉歆偽造古文

經之說，而廖季平之今古學考，剔絕益細，謂前漢今文經學十四博士，家法相傳，道一風同，其與古文對立，則一一追溯之於戰國先秦，遂若漢代經學之今古文分野，已遠起於先秦戰國間，而夷考漢博士家法。事實後起，遲在宣帝之世。及其枝分脈散，漫失統紀，歧途亡羊，無所歸宿。不僅無當於先秦之家言，抑且復異於景、武之先師。兩漢書儒林傳可資證明。

廖平之為人，不若康氏之堅持與武斷。廖平為王闓運弟子，闓運以公羊學聞於時，所著公羊箋，梁啟超以為不逮孔廣森，梁氏言廖平云：

平受其學，著四益館經學叢書十數種，頗知守今文家法；晚年受張之洞賄逼，復著書自駁，其人固不足道，然有為思想，受其影響，不可誣也。

梁啟超以廖平「其人固不足道」評之，當責其未能守今文學家法而言。廖平之學，晚年確有改變，賓四先生任教無錫師範，曾在學校週會講先秦諸家論禮與法，講辭刊於無錫師範校刊，川人蔣錫昌在重慶任教，得此校刊，以示其同事蒙文通。錢氏追記其事云：

文通川人，其師廖平季平，乃當時蜀中大師。康有為聞其緒論，乃主今文經學。而季平則屢自變其說。文通見余講辭，乃謂頗與其師最近持義可相通。遂手寫一長札，工

楷，盈萬字，郵寄余。及余在蘇中，文通已至南京，在支那內學院聽歐陽竟無講佛學。（師友雜憶頁126）

後蒙文通至蘇州訪錢氏，同遊甚歡，讚錢氏《先秦諸子繫年》稿體大思精，可與顧炎武諸老輩中求其比，乾嘉以來，少其匹矣。

可能因廖平不再堅持其說，而蒙文通又言其師最近持義可與錢氏相通，故對廖氏，賓四先生言辭甚為平和。

賓四先生最不滿於康南海者，為其誣古文經皆出於劉歆偽造，而不追溯古文經之源流，以及其文之不同。錢氏著《劉向歆父子年譜》者，即將康有為之武斷，徹底解決，還古文經以應有之源流。

《劉向歆父子年譜》發表後對學術界究有何影響，錢氏在素書樓講課時曾云：「此後再無人爭辯今經古文問題，此一問題於焉解決。」錢氏晚年追憶此一經過云：

余撰劉向歆父子年譜，及去燕大，知故都各大學都開設經學史及經學通論諸課，都主康南海今文家言。余文出，各校經學課多在秋後停開。但都疑余主古文家言。

錢氏並非主古文家言，乃還經學以歷史真象，不可厚誣古人，以馳己說。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 IV

柒、講學於戰亂之中

自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秋，錢賓四先生得顧頡剛之介，北上任教燕京，次年，轉入北京大學。

自民國十九年至二十六年錢氏任教北大，多識古都之俊彥。時上海為商業都市，南京為國都，乃政治都市，唯北京為舊都，乃文化都市。彼時大學教授之待遇甚佳，錢氏在此七年之間，得交當時之知名學者，又能旅遊，可能為一生中較為得意之歲月。

抗戰軍興，國府遷往重慶，北京各大學亦因而南遷，錢氏亦隨北大南遷。抗戰八年，錢氏先在西南聯大任教，後轉至在成都之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此亦為顧頡剛所挽，顧氏任國學研究所主任，其經費得美國哈佛燕京學社之支持，待遇可能優於戰時之國立大學。

錢氏任教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時，



1933年錢先生與新亞書院第四屆部份畢業生合照。
資料：（《錢賓四先生與我》素書樓文教基金會提供）



1950年，錢先生(左)和唐君毅(右)等在香港創立新亞書院。
資料：(素書樓文教基金會提供)

獲一高足，即桐城嚴耕望，後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事研究，以治中國中古制度史名於世，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抗戰勝利後，錢氏曾任蘇州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後因內戰，錢氏於民國三十八年由上海而廣州，由廣州轉至香港。初至香港，辦一亞洲文商學院，借中學教室三間，夜間上課。

三十九年（一九五〇）秋，錢氏離亞洲文商夜校，與友人同創新亞書院。

新亞書院之創辦，多為大陸逃港之學者，其目的亦在教育逃至香港之青年。在思想方面，以研究中國文化為主。名為書院者，錢氏醉心於宋代書院，思辦一小而美的高等學府，傳中國文化於香港，影響於世界。

新亞書院之經費，先得臺灣之支助，其學籍亦得臺灣之承認。後又得美國耶魯學社之撥款援助，故經濟無虞。

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新亞研究所成立，使新亞書院畢業生，有深造機會。新亞所培養之人才，遍及港、臺及美國，其中如余英時、陳啟雲、遂耀東等人，皆為史學界之知名學者，其他為余所不知者，又不知凡幾。

後新亞書院與聯合、崇基合併成為中文大學，此為錢氏在教育上之有形貢獻。

民國五十六年（一九六七）十月，錢穆先生偕夫人胡美琦女士來臺定居。來台之初，集中精神在《宋子新學案》之寫定。《宋子新學案》成，又撰《朱子學提綱》以為導讀。

《宋子新學案》完稿後，錢氏於民國五十八年應中國文化大學（早日之中國文化學院）創辦人張曉峯之聘，任華岡教授，在史學研究所授課，每週兩小時。

賓四先生在臺演講多次，遍及南北大學及軍政黨團，然在大學正式授課，則僅文大而已。

錢氏在文大授課，每週兩小時，排在晚上七至九點。選課者皆為文大史學所學生，然他校學生及社會青年聞風而至旁聽者，倍於文大研究生，猶憶錢氏開課之初，筆者為文大博二學生。選錢先生之課，每週一晚趕至素書樓門前，

候至七時，開門而登臺階，至素書樓客廳，圍繞在一圓桌旁，聽錢先生講課。當時只覺錢氏精神甚好，滔滔不絕，源源本本，講說甚為清楚，偶而批評胡適，亦不覺過分，因憶臺大方東美教授，亦喜在課堂上月旦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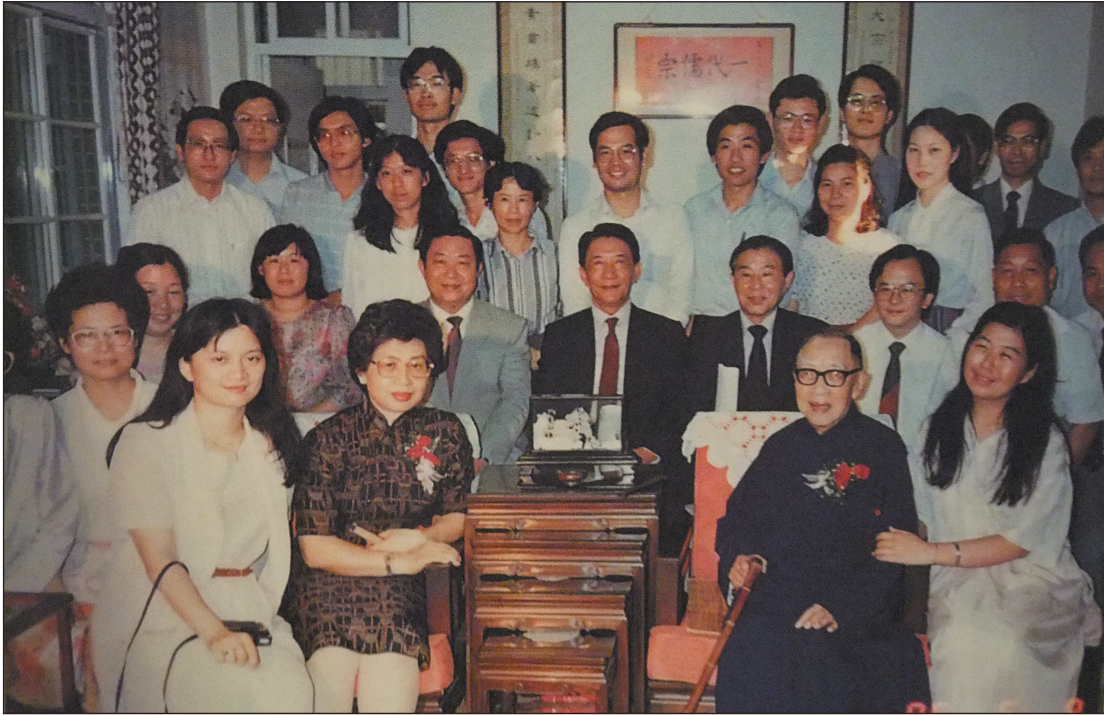
賓四先生在文大之講學，從民國五十八年起，至七十五年（一九八六）而止，前後十七年，錢氏所講內容，均錄音整理，錢氏親自審定後出版為書，流傳甚廣，嘉惠士林，其中《中國史學名著》最為學界所推崇。

文大史研所之授課外，錢氏又得故宮博物院院長蔣慰堂復璉之邀，以特聘名義為研究員，為之特闢一研究室，得讀四庫全書中宋元明三朝理學諸集，得有撰述。在日常生活費用方面，頗賴曉峯及慰堂之安排，而獲解決。



1989年10月10日錢先生於中大新亞書院四十週年校慶日。

資料：（《錢賓四先生與我》素書樓文教基金會提供）



1986年錢穆於素書樓的最後一堂課與學生的合影。資料：(《素書樓》素書樓文教基金會提供)

此時，師母胡美琦教授，亦在文化史學系講授中國教育史，而賓四先生在素書樓之生活，講學、著述以外，似無其他干擾，而師母之照顧，亦無微不至。猶憶筆者在素書樓聽課時，師母必在座，除照顧錢師外，亦如學生般盡心聽講。

錢氏之講學，至民國七十五年（一九八六）六月九日而止，蔣經國總統聘為總統府資政。二十日，行政院院長俞國華設宴款待，贈予「鴻儒碩望」之鏡屏。

民國七十九年（一九九〇）五月，



錢穆伉儷攝於新亞書院賓館。
資料：(《錢賓四先生與我》素書樓文教基金會提供)

遷出素書樓，居於杭州南路之公寓。至八月三十日上午九時去世，享年九十六歲。一代不世出儒宗，嗚然而逝，高山景行，何所仰止！

錢氏從民元任教，至七十五年告別杏壇，著述之多，及從事教育時間之久，影響之大，恐世無其人，而亦難有來者！



1978年錢先生返港主持『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並與前辛亞書院校長金耀基教授與董事長陶學祁先生合照。資料：（《錢賓四先生與我》素書樓文教基金會提供）



1969-1986年錢先生在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授課，並利用素書樓的客廳作為講學場所，慕名前來聽課的學生眾多。資料：（《素書樓》素書樓文教基金會提供）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 IV



九十五歲時的錢穆先生攝於素書樓客廳。
資料：(攝於《錢賓四先生與我》素書樓文教基金會提供)

二〇〇五)十月初版

鄧爾麟 《錢穆與七房橋世界》藍樺譯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三月第二版

印永清 《百年家族—錢穆》臺北縣新店市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二〇〇二年十月初版

梁啟超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附《清代學術概論》里仁書局

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初版二刷

錢 穆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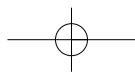
一九九七年八月 北京商務印書

參考書目

錢 穆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本》臺北東大圖書公司印行，民國七十五年十月再版。

王吉林 〈錢穆先生的思想〉《二十世紀前半葉人文社會學術研討會》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東吳大學

王吉林 〈論錢穆與梁啟超「意見相異」之處〉《錢穆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東吳大學錢穆故居管理處編印，民國九十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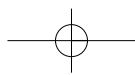
薩孟武

1897~1984

◆ 法政教育的推手 ◆

劉恆妉／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助理教授

劉后安／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大法官助理





薩孟武先生個人照。

資料：(攝於《薩孟武先生70歲》三民書局提供)

壹、家世與求學

薩孟武，原名本炎，字孟武。因為一向以字行，反以本炎為筆名。1897年3月10日（光緒二十三年二月初八日），生於福建福州。薩氏家族為西域色目人答失蠻氏，元代中期賜姓薩，原居雁

門關外。元末，其中一支遷居福州，世代經營鹽業，為福州八大家族之一。¹ 家族中人才輩出，近者如叔祖薩鎮冰（字鼎銘，1859~1952），曾留學英國，為清代、民國海軍耆宿，曾任總理南北洋水師兼廣東水師提督、海軍大臣、代理國務總理、福建省省長等。同輩中人則有曾任廈門大學校長的薩本棟、中山艦事件中殉難的艦長薩師俊、前臺大工學院院長及造船專家薩本炘等人。²

薩孟武先生幼時入家塾啟蒙，後入小學接受新式教育，對於國文、算術、歷史三門最有興趣。³ 小學畢業後，先入私立法政學校（福建學院前身）附設中學就讀。1913年春，再從上海赴日留學。抵達東京後，先以半年時間勤習日語。暑假過後，進入東京成城中學（原名振武學校）中國學生部就讀，前後達三年。在此期間，每逢暑假，都居於校外，也因而結識旅日棋手吳清源的父親吳毅，學習圍棋。⁴

1. 陶希聖，〈薩孟武先生事略〉，收於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一輯），國史館，初版，1988年，頁627；關國楨，〈薩孟武〉，原載於《傳記文學》，第51卷第4期，後收於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第二輯第十三冊），傳記文學出版社，初版，1992年，頁431；林紀東，〈我所認識的薩孟武先生〉，《社會科學論叢》，第24輯（薩教授孟武先生八秩華誕慶祝論文集），1976年3月，頁1-4。
2. 黎明眉，〈春風化雨一甲子：懷一代宗師薩孟武先生〉，《自由青年》，71卷5期，1984年，頁29；張達人，〈一心要學蘇東坡的薩孟武教授〉，《藝文誌》，118期，1975年7月，頁14。
3. 薩孟武，〈學生時代〉，頁16-22。
4. 薩孟武，〈學生時代〉，三民書局，2005年，2版，頁74-76、80-85、98-108。以下所引頁數均係此一版本，不再一一註明版次及出版者。

1916年，中學畢業後，薩孟武先生報考第一高等學校（簡稱一高，位於東京）預科，由於當時英文程度未如人意，因此落第而歸。不過自修一年之後，捲土重來，就以第一名考入第一高等學校預科，因而得以官費留學日本。依當時規定，中國學生須先進預科就讀一年，如能進入高校及帝國大學就讀者，即可獲得各省官費補助。⁵

薩孟武先生於預科課程結束後（1918年），因東京過於熱鬧，不適唸書，乃以第一志願轉往第三高等學校（位於京都）第一部（文、法科）就讀。⁶三高等畢業後（1920年），因已住慣西京（京都），乃入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學科就讀，為班上唯一的中國學生。當時京都帝大政治學科獨有課程不多，僅政治學、國法學、政治思想史等，其他則多與法律學科相同（民法、刑法、行政法、國際公法等），少部分與經濟系重疊，故常與其他兩系學生合班，也因而養成注重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知識的習慣。⁷

薩孟武先生在課餘之外，多所涉獵其他領域知識。例如因為聆聽京大文學部教授米田庄太郎的講課，於是自行接觸西洋各種有關歷史學（例如 Karl Gottfried Lamprecht, 1856-1915）、經濟哲學、動態社會學方面的著作。又如因日本著名馬克斯主義經濟學者、京大經濟系教授河上肇的講介，於是開始接觸共產主義、馬克斯主義之學說。不過由於在思想上贊同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考茨基（Karl Kautsky, 1854-1938）的看法甚深，認為中國尚處於落後的農業社會階段，所以始終並不贊成以俄國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共產主義（Bolshevism）思想。⁸

此外，為了與歐美留學生在學術能力上得以競爭，薩孟武先生在英文之外，又另行選修德文，以增強語言能力。⁹在選讀當時，由於課堂上係以奧國人 Anton Menger（1841-1906）所著「*Neue Staatslehre*」一書為讀本，為求深刻與精進，薩孟武先生於是偕同當時京大法律學科的同學陳錫符（即陳天鷗

5. 薩孟武，《學生時代》，頁140-148。

6. 薩孟武，《學生時代》，頁149-153。

7. 薩孟武，《學生時代》，頁176；薩孟武，〈我在各級學校時如何讀書〉，《讀書與進修》，中央文物供應社，1984年，再版，頁12-13。

8. 薩孟武，《學生時代》，頁194-197。

9. 薩孟武，〈我在各級學校時如何讀書〉，《讀書與進修》，中央文物供應社，1984年，再版，頁13

，返國後進入政界）將此書譯出，並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¹⁰他在這段時期所奠定的語言基礎，對於日後講學、著作，以及來台後有效利用臺大法學院日治時期極為豐富的英、德、日文舊藏圖書進行研究，影響極深。

1924年，薩孟武先生自京都帝大畢業，取得法學士學位後，因手中尚有些許剩餘官費，先與二三友人赴日本各地旅行，再乘船返回中國，結束前後共計11年的求學生涯。¹¹

貳、返國初居上海，賣文兼課為生

返國後，薩孟武先生居於上海，前後為時6年。最初由於尚無固定職業，以譯書賣文為生。因孤軍社同人多為日本帝大畢業生之關係，受邀主編《孤軍》雜誌（自政黨號開始）。此外，並與自法返國的曾琦（慕韓），共同發起創辦《醒獅》週報，反對共產黨思想。¹²

此段時期，薩孟武先生曾受邀前往私立大夏大學¹³兼課，賺取鐘點費貼補家用。其間雖一度擬往廣州中山大學講學，但因廣東時局不甚安定，最終作罷，仍停留於上海。1927年，國民革命軍攻克上海、南京，實行清黨。薩孟武先生受邀加入國民黨，並前往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擔任教官，並兼該校政治部編輯，負責宣傳工作。但工作兩個月後，因自覺無甚成果而辭職返回上海。翌年（1928），薩孟武先生再度受邀前往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部（當時主任為周佛海）附屬的編輯部，擔任上校主任一職。除負責宣傳品外，又發行《革命軍日報》。但是後來因為政治部內人事不合，乃與周佛海一同辭去軍校之職，回到上海。¹⁴

1928年1月，國民黨人戴季陶創辦《新生命月刊》雜誌，由周佛海負責編務，在上海發行，南京編輯。該刊號稱以科學方法研究三民主義，在銷路最佳

10. 薩孟武，《學生時代》，頁178-179。該書書名為《新國家論》，列為「政法叢書」之一，但不知何故，出版時僅將薩孟武先生列為著者，且誤植為「薩孟武編」。

11. 薩孟武，《學生時代》，頁240-244。

12. 薩孟武，《中年時代》，三民書局，2005年，2版，頁4-6，以下所引頁數均係此一版本，不再一一註明版次及出版者；張達人，〈一心要學蘇東坡的薩孟武教授〉，《藝文誌》，118期，1975年7月，頁16。頁74-76、80-85、98-108。

13. 上海大夏大學為一所私立的綜合大學。1924年時，由原廈門大學教授歐元懷、王翰祥、傅式說等師生共同成立，聘馬君武為校長，並以國民政府前交通部長王伯群為董事長。抗戰時一度與復旦大學合併，西遷貴州，勝利後遷回上海。1951年10月，在原址上創辦華東師範大學。資料來源：「中文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7%E5%A4%8F%E5%A4%A7%E5%AD%A6&variant=zh-tw>），造訪日期：2009/5/2。

14. 薩孟武，《中年時代》，頁26-32。

時期，據說每月發行達 3 萬本，普通時候也有 2 萬本上下。該刊自第 1 卷第 8 期後，改由薩孟武獨自接手編務，一直編到第 3 卷第 12 期，才告停刊。1936 年時，擔任《政問》雜誌編輯。在《新生命》時代，經由謝六逸先生之介紹，薩孟武先生在上海復旦大學兼數小時的課，雖然鐘點費不多，路途又遠，但因而結識不少社會科學及文學界學人，例如孫寒冰、鄭振鐸、老舍、傅東華等人。

15

參、前往南京， 執教中央政治學校

1927 年，中國國民黨決定籌設中央黨務學校於南京紅紙廊，以訓練軍政時期的黨政幹部。北伐完成後，國民政府宣布進入訓政時期。1929 年，中央黨務學校改組，更名為中央政治學校，由原屬短期訓練性質的黨校，擴充發展為培育政治人才的大學院校。該校學生在入

學之後，完全享受公費待遇，畢業後則由黨政機關分發適當工作。薩孟武先生自 1930 年前往該校任教時起，直到 1945 年轉往中山大學為止，前後一共長達 15 年之久。當時政校在大學部僅設行政、法律、財政、經濟等四系。行政系的專任教授只有薩孟武及梅思平（兼系主任）兩人，至於其他教員則多為兼任。¹⁶

薩孟武先生初到政校任教時，係接替段錫朋（書貽）¹⁷ 先生的教席，講授該校大學部第一期學生的「西洋政治思想史」以及第三期學生的「政治學」，後來又加授「各國憲法及其政府」等科目。他在教學時，由於福州國語不甚高明，因此繕發講義以補口述的不足。從此之後，他教書必有講義，也成為一種習慣。只不過他發講義的目的僅在於避免授課內容前後重複。因此授課時，並非依照講義逐字逐句念去，而是依照學習理解的需要，由淺而深依序講授，所以他的講課頗受歡迎。¹⁸

15. 薩孟武，《中年時代》，頁 33-37。

16. 薩孟武，《中年時代》，頁 39。

17. 段錫朋（1896—1948），江西永新縣人。「五四運動」領袖、全國學生聯合會主席。北京大學政法系畢業後，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英國倫敦大學留學。歷任國民政府教育部政務次長及代理部長、中央大學（1949 年改名南京大學）校長。曾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資料來源：中文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9%B5%E9%94%A1%E6%9C%8B&variant=zh-tw>），造訪日期：2009/5/3。

18. 薩孟武，《中年時代》，頁 41。

19. 朱家驊（1893—1963），字驪先，浙江吳興人，1914 年赴德自費留學，於柏林礦科大學攻讀，學成之後在北京大學任教。1918 年在蔡元培幫助下，以進修教授名義獲得公費留學。美國學成後，至廣州中山大學任教。1930 年擔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

1940 年至 1957 年間，以地質學家、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身分，擔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資料來源：中文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C%B1%E5%AE%B6%E9%A9%8A&variant=zh-tw>），造訪日期：2009/5/3。

其後，薩孟武先生又繼梅思平而擔任政校行政系主任。此外，1930年，朱家驊¹⁹先生任命為中央大學（位於南京）校長，薩孟武也受邀前往接替范揚²⁰先生的教席，講授大學部一年級的政治學課程²¹。

1932年，上海發生「一二八事變」。事變結束後，薩孟武與中大法學院教授張其昀（曉峰）、楊公達（擔任主編）、梅思平、何浩若（孟吾）等人，創辦《時代公論》週刊，以「對內鼓吹國家統一，對外號召全民抗戰」為宗旨，共出143期。同仁每週茶敘一次，交換意見，再推人分別執筆，其中關於政治者，多由薩孟武、田炯錦（青雲）寫稿。1935年1月10日，薩孟武與上海各大學教授王新命、何炳松、武培幹、孫寒冰、黃文山、陶希聖、章益、陳高備、樊仲雲等人，連署共同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主張「不守舊，不盲從，根據中國本位，採取批評態度，應用科學方法來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反對全盤西化，因而引發

一場與胡適等人之間的文化大論戰。²²

肆、先隨政校播遷重慶，繼而主持中山大學法學院

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該年冬天，政校遷往廬山上課，迨南京失守後，又遷往湖南芷江。1938年秋，政校再遷至四川重慶小溫泉，薩孟武先生舉家也隨之遷至重慶南溫泉。²³1943年，應三民主義青年團之邀，薩孟武前往兩廣及福建講學，先後至廣州大學、嶺南大學、中山大學、廣西大學等校。不過福建廈門大學之行，則因戰事轉鉅，遂告中止。²⁴

1945年8月，對日抗戰勝利後，政校遷回南京。隔年（1946）夏天，薩孟武全家乘飛機返回上海，寄寓親戚家中，行李則託政校由船運回南京。不料船至三峽，竟因觸礁而沈沒，行李沈於江中，數十年蒐集之資料卡片悉數付諸流水。²⁵

此時（1946），薩孟武先生已決定

20. 范揚（1899-1962）為我國著名的行政法學者，浙江金華人，1919年赴日留學，先後在京都第三高等學校、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法律系學習。返國後曾任南京中央大學、安徽大學、中山大學、同濟大學、復旦大學任教，著有《行政法總論》、《警察行政法》等書（商務印書館出版），均係該領域名著。

21. 薩孟武，《中年時代》，頁71-72。

22. 薩孟武，《中年時代》，頁72-79。

23. 薩孟武，《中年時代》，頁111-128。

24. 薩孟武，《中年時代》，頁143-147。

25. 薩孟武，《中年時代》，頁156-157；薩孟武，〈我與書〉，《書與我》（第一集），中華日報社，1978年，頁3。

離開政校，因受當時教育部長朱家驊之推薦，由中山大學校長王星拱聘請他擔任法學院院長兼政治系教授，至1948年辭職，前後共計2年。薩孟武先生主持中山大學法學院院務之初，適逢全國各大學學潮風起雲湧之際，驅逐院長、驅逐教員之事，層出不窮。其間中山大學法學院也曾發生諸如遺失學生全部試卷、學生因師生遊行被捕而提議罷課等重大事件，不過由於薩孟武先生一本公平與清廉之原則主持院務，因此，不但教員及學生平時對他甚為和睦，諸多重大事件也都處理得宜，和平落幕。²⁶

伍、曾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第一屆立法委員

在講學之外，薩孟武先生也曾經代表教育團體擔任民意代表。在大陸時期，自1940年起，他連續三屆（第二、三、四屆）擔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1年間，更以此一身分，偕同顧毓琇、梅公任、王世穎、胡兆祥等人，經桂、湘、贛等地，前往考察閩政，後經贛、粵、桂、黔等地返渝。²⁷

1947年憲法頒布施行後，舉行第一屆立法委員選舉，薩孟武先生受國民黨中央的提名成為「專科以上教育團體」立委候選人。選舉結果，列為候補立法委員。²⁸1949年時，由於有好幾位立法委員入閣擔任政府官員而辭去立委職務，因而立委名額出缺。在當時，第一屆立法委員不但不必改選，而且有所謂的「遞補制度」，可以由候補立委遞補擔任正式委員。依照相關規定，薩孟武先生當時亦可遞補成為立法委員，不過由於他志不在此，因此遲遲未向內政部辦理遞補手續。但也因而使順序在他之後的其他人選無法依序遞補，因而有人（黃龍先）託人代向薩孟武先生勸說辦理遞補事宜，並由張金鑑先生親到法學院攜同前往辦理手續。從第一屆第一會期擔任立法委員起，直到1984年去世為止，他前後共計擔任長達35年（1949~1984）的第一屆立法委員。

不過對於這項職務，薩孟武先生似乎興趣缺缺，並未積極參與論政，社會上一般人甚至很少知道他有立法委員的身分。²⁹他在自傳中也不諱言：「我在立法院沒有任何貢獻，前後發言只有三

26. 薩孟武，《中年時代》，頁175-181。

27. 薩孟武，《中年時代》，頁134-147；吳延環，〈薩老師—志士、學人、長者〉，《中央日報》，1976年3月7日。

28. 吳延環，〈薩老師—志士、學人、長者〉，《中央日報》，1976年3月7日。

29. 阮文達，〈悼薩孟武先生〉，《聯合報》，1984年4月21日。

次。…尸位素餐，自己覺得慚愧」，³⁰或許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志在教育及學術領域，而非從政。

陸、因緣際會來台作育英才，奠定戰後法政教育基礎

薩孟武先生之所以來台接任臺大法學院院長，其實頗為偶然。

1946年，台灣大學校長一職由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大的陸志鴻³¹接掌，並兼代當時的法學院院長。陸校長於接任之初，為尋覓法學院院長人選，先後於1946、1947年，二度約請薩孟武來台教書，並匯去旅費。惟因薩孟武已答應王星拱³²赴廣州中山大學，主持法學院院務在前，加以中大學生對薩孟武感情甚

好，故二次邀約均未答應，並將旅費匯還。³³

1948年4月，陸志鴻又匯來旅費，邀他前往短期講學。因為情理上不好一再拒絕，薩孟武先生遂前來台灣作短期講學，前後為期達3個月。中大院長職務則託法律系主任代理，政治學課程劉顯琳代授。³⁴

初到台灣之時，薩孟武先生居於廈門街臺大宿舍內，與陸校長福州街官邸甚近，因而時相往返。他在3個月短期講學的過程中，頗受法學院師生好評。不過暑假屆至後，薩孟武先生結束講學課程返回福建，本欲再赴廣州，而當時新任臺大校長莊長恭³⁵，依法學院教授的請求，又來電邀請薩孟武先生赴台主持法學院院務。但是在此同時，中山大

30. 薩孟武，《中年時代》，頁161-163。

31. 陸志鴻（1897—1973），字筱海，工程材料學家，教育家。浙江嘉興人，出生地方望族，父陸祖穀曾任浙江省立圖書館館長。1923年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工學院，畢業論文「浮遊選礦」。歸國後在南京工業學校（原江南實業學堂）任教。1927年開始，在國立中央大學（1949年在大陸更名南京大學，1962年在台復校）土木工程系任教，曾任工學院院長。1945年奉命接受台大，1946年任國立台灣大學校長。資料來源：「中文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9%B8%E5%BF%97%E9%B4%BB&variant=zh-tw>），造訪日期：2009/5/3。另可參見，周廣周，〈當代師表陸志鴻教授〉，《中國一週》，第366期，1956年，頁7。

32. 王星拱（1887—1949），著名教育家、化學家，字撫五，安徽懷寧縣高河埠王家大屋（今高河鎮凌橋村）人。畢業於英國倫敦大學帝國科學技術學院。留學期間，曾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反清運動，1910年加入中國同盟會歐洲支部。1916年獲碩士學位，回國後任北京大學教授，在《新青年》等刊物上發表文章，宣傳科學知識，反對宗教迷信。1925年「科學與玄學」論戰中，主張「科學萬能」。1928年就任安徽大學校長。後又與李四光等一起負責籌建國立武漢大學，任國立武漢大學化學系首任系主任。1933年5月，出任武漢大學校長，後任中山大學校長。1949年10月8日，病逝於上海永川醫院，與其妻葉玉芝的遺體合葬於故里。

33. 薩孟武，《中年時代》，頁242。

34. 薩孟武，《中年時代》，頁242。

35. 莊長恭（1894—1962），字丕可。福建泉州人。1921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學士學位，1924年獲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1925年任東北大學化學系主任，1933年任中央大學理學院院長，1934年任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所長，1948年接任台灣大學校長，1949年後，留在中國大陸，擔任中國科學院有機化學研究所所長，1955年被聘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並任中國科學院數理化部學部副主任。資料來源：「中文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E%8A%E9%95%B7%E6%81%AD&variant=zh-tw>），造訪日期：2009/5/15。

學方面也電請他回粵返校繼續任教。兩相邀請之下，由於中大人才尚多，而臺大教員缺乏。因此最後薩孟武先生仍然決定先到台灣，協助將臺大法學院稍行整頓之後，再返回中山大學。³⁶不料來台之後，整個中國局勢丕變，始終未能如先前規劃返粵，因而自1948年9月起接任臺大法學院院長，長達11年（1948.9.~1959.7.）之久。³⁷好在薩孟武先生的家眷，於1949年5月間，在傅斯年³⁸校長的協助安排下，搭乘飛機來台團聚。³⁹

此外，薩孟武先生辭去院長一事，與他遞補成為立法委員一事也有些許關係。⁴⁰他在遞補成為立法委員之後，原本就已寫信給傅斯年校長，表明不再支領臺大薪水。不過傅校長不肯，認為一為公費，一是薪俸，兩者不宜混同為一。到了錢思亮校長任內，他每月還是只領三百元。直到1971年前後開始，臺大才改發研究費二千元。

雖然如此，不過可能有立法委員以

為法學院院長薪水不少，因此不斷透過立法院紀律委員會要求他辭去法學院院長一職。事實上，他每年也都向錢思亮請辭，不過由於後者的不斷挽留，因此一年拖過一年，直到1959年7月，才順利辭卸。⁴¹

以下僅就薩孟武先生在擔任臺大法學院院長及政治學系教授任內的幾項主要教育事蹟，略予敘述。

（一）講學幽默風趣，課堂人滿為患

薩孟武先生在擔任臺大法學院院長同時，也是該校政治學系的教授，先則講授政治學、嗣後又於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班及博士班，開授憲法專題研究、中國政治制度研究、孔孟荀政治哲學等課程。

1954年秋天，由於教育部特准政治大學在台復校，復校初期先成立政治研究所，而未成立政治學系，薩孟武先生乃利用臺大課餘，受邀前往擔任教席，講授中國政治制度研究（碩士班）、中

36. 薩孟武，《中年時代》，頁244。

37. 臺大法學院自1946年4月成立後，至薩孟武接任前之歷任院長分別為：陸志鴻（兼代）、陳世鴻、劉漸鴻，任期均甚為短暫，分別為2個月、6個月、10個月。參見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編，《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史》，2006.1，頁24-25。

38. 關於傅斯年生平之介紹，可參見歐素瑛，〈傅斯年：臺灣大學自由學風的捍衛者〉，收於國立教育資料館編，《教育愛：台灣教育人物誌》，2006年，頁49-60。

39. 薩孟武，《中年時代》，頁249。

40. 參見薩孟武遺作，〈論言論自由〉，《中央日報》，1985年5月6日，11版。

41. 參見薩孟武遺作，〈論言論自由〉，《中央日報》，1985年5月6日，11版。

國政治典籍研究（博士班）等課程。⁴²

薩孟武先生無論是在大陸時期開始，還是來台之後的講學、授課，在課堂上一向都是極受歡迎。因為他幽默風趣，談笑風生，說理深入淺出，闡釋亦莊亦諧，使聽者如沐春風，久聽不厭，故上課學生雲集，不僅座無虛席，而且甚至窗台門外都擠滿旁聽學生。⁴³此外，他說話時帶有很重的福州口音，⁴⁴有時又會憑空加上一個「他」字，例如提到自己時會說：「我薩他孟武，如何如何…」，因此在校園中被取了「薩他孟武」的外號。⁴⁵

（二）延攬內地優良師資、培育本土青年教員

薩孟武先生主持臺大法學院院務11年間（1948年9月～1959年7月），正值國共內戰局勢逆轉後，中樞播遷來台，台海政經軍事情勢緊張之際。薩孟武先生除盡力安頓陸續遷台之學生外，並積極擴充法學院系所、增聘師資、創辦學術刊物，使外在局勢變動對校園之影

響降到最低，⁴⁶不僅奠定了臺大法學院各項軟硬體建設的基礎，也使得戰後台灣法政教育最重要的一支學術傳統得以有所發展。

他在擔任院長任內，第一項重責大任就是積極招收優良師資，並且注重培養本土人才。日本戰敗之後，國民政府派員接收台北帝國大學之初，將原本的日籍教授悉數遣返回國，由於台灣地處偏遠，外加台幣不斷貶值，學校經費亦屬有限，因而內地大學教授也多半不願來台。一時之間，臺大各院系竟然出現嚴重欠缺教授師資的窘境，其中又以法學院尤然，許多空缺甚至由學生自行尋找適格的師資出任或由政府機關人員兼任。⁴⁷

等到1949年12月，國民政府中樞遷台後，由於大批內地學者也隨同前來，此時才改善師資缺乏的窘境。薩孟武先生把握此一情勢，積極補充法學院師資，大力延攬內地優秀人才任教，例如林彬、趙琛、曾伯猷、趙蘭坪、梅仲協、林紀東、張果為、蕭公權、劉南溟、朱

42. 陶希聖，〈薩孟武先生事略〉，收於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一輯），國史館，初版，1988年，頁629。
43. 胡有瑞，〈狂狷齋的主人—訪薩孟武教授〉，《現代學人散記》，爾雅，1993年，新一印，頁132；黎明眉，〈春風化雨—甲子懷一代宗師薩孟武先生〉，《自由青年》，71卷5期，1984年，頁30。
44. 陳志奇，〈薩老師的趣事〉，《中央日報》，1970年4月18日，副刊版。
45. 吳延環，〈薩老師—志士、學人、長者〉，《中央日報》，1976年3月7日；仲父，〈薩老師〉，《中央日報》，1985年5月6日，11版。
46. 朱泮源等，《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史》，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2006年，初版，頁26。
47. 薩孟武，《中年時代》，頁243-244；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玉山社，2009年4月，增訂版，頁59。

國璋、黃正銘、沈乃正、雷崧生、徐道鄰、鄭學稼、林霖、楊樹人等在大陸已有一定成就與名氣之學者，均禮聘為臺大法學院教授。此舉不但將戰前中國所累積的學術命脈繼續延續至戰後台灣，同時更奠定了台灣的社會科學學門日後繼續發展的優良基礎。根據統計，法學院剛搬遷至徐州路校區時（在此之前接收改制之初，法學院原係在校總區與文學院共用館舍），全院僅有教授15人、副教授6人、講師6人、助教9人，合計36人。1950年前後，專任教師人數也不過43人。但是在1959年薩孟武先生卸任院長時，已達70人，增幅將近一倍，為該院教師人數成長率最高的時期。⁴⁸

除了延攬既有人才以補現有師資不足外，薩孟武先生也秉持當時臺大校長傅斯年（1949年1月接任）的政策，以拔擢台籍本土青年教師為人才培育的優先目標。⁴⁹薩孟武先生初次來台講學時，改制後的臺大法律系剛剛成立，許多

留學日本的原帝大學生，例如劉慶瑞、彭明敏、劉甲一、陳棋炎也都陸續返台繼續大學學業，薩孟武先生對當時這批學生的優秀表現印象極深。在接任院長後，這幾位台籍留日學生都陸續留在政治學系及法律學系擔任助教，先後也都升任為教授。⁵⁰

其中，薩孟武先生對於劉慶瑞、彭明敏兩人尤為器重，不僅常常鼓勵兩人寫作發表學術論文，並且親自逐字逐句修改文字及內容。根據彭明敏的回憶，當時法學院諸多年長的大陸籍學者甚至說過臺大未來這些優秀的台籍年輕學者將會成為法學院的骨幹。彭明敏也自承，他後來之所以能夠在中美文化教育基金會獎學金的獎助下，出國留學深造，其中得力於傅斯年、薩孟武等人之處甚多。在返國回臺大任教後，更直接受聘擔任副教授，因此也引起某些同仁的嫉妒與批評。不過在這個過程中，錢思亮校長及薩孟武先生卻始終支持他，而且

48. 朱宏源等，《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史》，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2006年，初版，頁26；薩孟武，《中年時代》，頁251。

49. 薩孟武先生在1967年撰寫〈我與臺大〉一文（撰寫當時並未發表，於後收錄於薩孟武，《中年時代》，三民，2版，2005年，頁241-269）中有兩段話可以作為代表：「好的學校不但要請好的先生，且要培養好的先生。當時我們都以為兩三年後即可復國，故傅校長最注重臺籍教授的培養，…此點我的意見完全與傅校長相同。傅校長兩年即死，我做院長前後十一年（最後一年休假，事實也為十年）所派遣的教員，以臺籍助教為多，這一點深受外省教員的反對。其實傅校長的觀念完全正確，因為大陸光復之後，誰人再願留在臺大教書，那除年復一年，到今年快滿二十七年了。然而臺籍教員由於傅校長的培養，確實人才輩出，這是我們不得不特別說明的。」（頁257）；「當時也有人…甚至罵我偏愛臺籍學生…其實那個時期，我們都以為反攻復國為期不遠，而培養臺籍教員，乃是臺大教育的第一任務…。那知一經變遷多年，壯者已經老耄，幼者已經成年，雖未拖累於本邦，然已算書於所託，吾人萬想不到的事。」（頁265）。

50. 薩孟武，《中年時代》，頁243。



民國39年光復後，台大法律系第一屆畢業生與師長合影。前排左起：洪遜欣教授、洪力生教授、劉鴻漸教授、薩孟武教授、梅仲協教授、查良鑑教授、蔡章麟教授、林紀東教授、戴炎輝教授。

資料：（《從帝大到台大》馬漢寶先生提供）

薩孟武先生更時常挺身為他辯護。⁵¹

此外，薩孟武先生對於劉慶瑞更是格外賞識，認為是他的得意門生。⁵²除了不時勉勵他勤作研究、發表論文，並且親自為其逐一修改中文外，更將自己先前在政校講授「各國憲法」課程所編講義：《各國憲法及其政府》，交由劉慶瑞增補，並以兩人名義共同出版，藉以提攜後進。其後，甚至有將其經典之作：《政治學》在死後委託劉慶瑞隨時增補修訂的構想，卻可惜因為劉慶瑞後來英年早逝而作罷。劉氏因病亡故多年

之後，薩孟武先生仍然感到悲痛之至。

⁵³惜才之情，可見一端。

薩孟武先生主持法學院務前後11年，所派遣的教員，以台籍助教居多，這一點深受某些外省教員的反對，不過他卻還是始終堅持此點，不但未曾退縮，並且認為台籍教員在有計畫的培養下，確實也是人才備出⁵⁴，不枉栽培。

（三）改善硬體建設

臺大在接收之初，除了教員不足外，由於政府預算有限，教育經費缺乏，

51. 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玉山社，2009年4月，增訂版，頁77、79、92-93。

52. 薩孟武，《中年時代》，頁243。

53. 薩孟武，《中年時代》，頁261-265；陳志奇，〈薩老師的趣事〉，《中央日報》，1970年4月18日，副刊版。

54. 薩孟武，《中年時代》，頁257。

台幣天天貶值，因此許多硬體設備也是年久失修，破爛不堪，木造教室一遇雨天必須打傘上課的情形，也時有所聞。

55

1949年，傅斯年接任臺大校長之初，當時臺大的經費由台灣省政府撥付，仍然極為困難。自校長以下，無不努力撙節開支。傅斯年本人更曾告訴薩孟武先生，凡費用在30元以上之開支，必由校長本人親批可否，以絕此中情弊。薩孟武主持院務，同樣也是盡可能節省不必要費用，以積少成多方式，在必要的時候，以較大的金額辦理有意義的工作。一年下來，竟然積有數萬元餘款。⁵⁶

在院務經費尚有餘裕的情況下，薩孟武先生優先用以改善教學環境，粉刷牆壁，改造黑板，布置教員休息室，使教員願意留在院內。此後，由於原有學生閱覽室面積過於狹小，於是又將日治時期原有武道場改建為學生閱覽室。此外，1954年，在美援經費的挹注下，商學館也順利落成，使商學系有自己專用的系館，與法學院及其他院系有所區隔

，奠定未來擴大獨立成為管理學院的基礎。⁵⁷

（四）創辦《社會科學論叢》

除了改善硬體設備外，為提高法學院研究學術水準，並鼓勵青年教員進修研究，薩孟武先生更運用院務經費的結餘，創辦《社會科學論叢》，每年出版一輯，第1輯在1950年4月正式創刊，當時的校長傅斯年特別為該輯撰寫一篇發刊詞，一方面從法學院刊物的型態，談到文章應該小題大作抑或大題小作、應重於求精抑或求通？另一方面又從方法論上主觀、客觀說的比較，闡發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研究的異同之處，更表達對社會科學研究的期許。⁵⁸由於第1輯出刊後的內容品質甚佳，第2輯之後的印刷費用，改由校方撥付，⁵⁹至1996年停刊為止，該刊發行歷時46年，一共出刊42輯。⁶⁰

薩孟武先生本人雖係學習法政出身，但是他為法學院所創辦的這份刊物，卻不稱「法學」或「政治」論叢，而以

55. 薩孟武，《中年時代》，頁24。

56. 薩孟武，《中年時代》，頁253-254。

57. 朱宏源等，《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史》，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2006年，初版，頁28-29。

58. 傅斯年，〈發刊詞〉，《社會科學論叢》，第1期，1950年4月。

59. 薩孟武，《中年時代》，頁254。

60. 朱宏源等，《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史》，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2006年，初版，頁27。

《社會科學論叢》名之，其用意即在於整合法政經濟等相關學科，共同促成法學院各系學術研究的精進與科學化，以為全社會所用。⁶¹

這份刊物不僅提供法學院教師研究成果一個發表園地，各系教員均以文章發表於《社會科學論叢》為榮。而且如係年輕教員而想升等者（尤其是助教），更是非有論文發表於《社會科學論叢》不可。至於該論叢刊出之文章，篇篇均由薩孟武先生親自審閱，有的文章更是由他親自逐字逐句修改，務求維持《社會科學論叢》的水準，當然也有助於精進後進學人的學問。⁶²

（五）法律系分為法學組及司法組

1951年前後，由於原國民政府時期所培訓的司法官大多並未隨同播遷來台，因此在台的司法官僅有總額二十分之一。為了培養、儲備實務所需人力，當時司法行政部（法務部前身）部長林彬及次長徐世賢乃研討釐訂儲育司法人才切實可行之方案。在商得教育部同意並經行政院核准後，藉由薩孟武院長以及

當時的法律系主任梅仲協先生的協助，自1953年起，台灣大學法律系開辦三年制法律專修科，該年9月，招收第一屆共66名學生。⁶³

法律系由於開辦法律專修科招收新生，教師員額得以增加，薩孟武院長也藉此引進許多司法實務界師資，使法律系在教學上增加司法實務經驗的傳授。1955年8月，法律系採行分組制度改革，將原本附設的法律專修科改制為法律學系司法組，原法律系學生則編入法律學系法學組。不過兩組在課程規劃上雖有些許差異，但是畢業後就業情形則無太大差異。⁶⁴



薩孟武伉儷於八十大壽致詞。
資料：(謝仁棟先生提供)

61. 朱宏源等，《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史》，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2006年，初版，頁27。

62. 參見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玉山社，2009年4月，增訂版，頁77。

63. 徐世賢，〈我所敬仰的薩孟武先生〉，《社會科學論叢》，第32輯（紀念薩故教授孟武先生專號），1984年12月，頁11；朱宏源等，《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史》，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2006年，初版，頁27。

64. 朱宏源等，《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史》，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2006年，初版，頁27。



薩孟武先生八十壽誕全家福合照。
資料：(謝仁棟先生提供)

(六) 成立法科研究所

1955年3月2日，臺大法學院決定設置法科研究所，並且自該學年度開始招生，此為薩孟武先生主持院務任內提升學術研究層次的重大創舉。值得注意的是，新設的研究所雖然名為「法科」研究所，但是事實上，除了法律系的學生外，政治學系、經濟學系學生也可報考，因此法科研究所在實際上其實是一所科際整合性質的研究所，只不過以「法科」取其簡稱而已。1957年2月，法學院又決定將法科研究所一分為三，分設法律學研究所、政治學研究所、經濟

學研究所，並自該學年度起各自招收碩士班研究生，以培養大學師資及學術研究人才。⁶⁵

柒、歸骨於田橫之島

薩孟武先生在1925年時，即與林懿民女士（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覺民先生胞妹）結褵，感情融洽，前後達六十餘年。兩人生有二男一女：長男薩公強於1949年北平圍城時，適在北京大學讀書，淪陷大陸，後來定居於美國紐約；次男薩公孚，畢業於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後任職於美國的保險公司；幼女薩公昭，1954年畢業於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後，相夫教子。⁶⁶

薩孟武先生在1971年退休後，晚年生活本以養花、寫作為樂。可惜在1980年1月20日，幼女薩公昭女士因為罹患淋巴腺癌而病逝。白髮人送黑髮人，原已悲痛萬分。孰料二年後（1982）12月3日，薩夫人林懿民女士也因病而去世。自此，薩孟武先生在精神上受到極大刺激，每日需服用安眠藥度日。在長期不活動的情況下，下肢肌肉開始萎縮，行動出現困難。住院後經由檢查，發現

65. 朱宏源等，《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史》，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2006年，初版，頁28。

66. 吳延環，〈薩老師—志士、學人、長者〉，《中央日報》，1976年3月7日。

肺部產生病變，最後於1984年4月13日，病逝於臺大醫院，享年87歲。⁶⁷

捌、學術研究及著作

一個大學教授，講學要精彩，除了一定的表達能力與思維能力之外，更重要的，還是要以深厚的學術研究作為基礎。薩孟武先生的講堂之所以時常人滿為患，主要就是仰賴他自二十餘歲學成返國後，終其一生，不斷的著述及研究。根據粗略的統計，他的一生中，有超過60年的時間，都在致力於研究與創作。單以數量來說，他光是政治學相關領域的扛鼎之作就多達22本（法學領域的著作尚不在其內），平均不到3年就撰寫出一本書，⁶⁸創作力十分驚人。

而且這種茂盛的創作能量貫其一生。在少壯時，他固然勤於治學，著譯不斷；直到晚年時，他依然白首青燈，述作不倦。舉例來說，《中國社會政治史》第四冊出版之時，他已經68歲。多達五十萬言的《中國憲法新論》，則是在他78歲時所撰成。他的最後一部著作《

儒家政論衍義：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體系及其演變》完成時，更已高達85歲。

他的研究與貢獻之所以如此豐碩，而且可以歷經時間的考驗而不被淘汰，其中主要的關鍵就在於他嚴謹的治學與寫作態度。舉例來說，他的每一本著作，在付梓之前，鮮少不三易、四易、甚至五易其稿的。即使出版後，他也往往會因為對內容不甚滿意，而於改版之時不斷進行增補修訂。⁶⁹

至於在治學方法上，有論者認為他不僅參酌西方研究架構，兼治政治學、文學、史學、法學，甚至經濟學等學門，並且取精用宏，加以整合，因而立論著說不但行文流利，引證博雅，同時邏輯分明，並且常有嚴謹的統計推論，以及極為細膩深入的列註說明，⁷⁰這種風格，始終貫穿他的著作之中。

薩孟武先生一向自認為是橫跨政治學及公法學（尤其憲法學）研究領域之人，⁷¹從他畢生所留下的著述成果觀察，大抵也確實不外如此。因此，以下僅就這幾大領域，分別略述他的學術研究

67. 薩公孚，〈安息吧，爸爸—悼我的父親薩孟武先生〉，《中央日報》，1984年5月5日。

68. 袁頌西、趙永茂，〈薩孟武先生對政治學的研究與貢獻〉，收於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編，《二十世紀人文大師的風範與思想—中葉》，台灣學生書局，2007年，初版，頁369。

69. 這種情形，在他許多著作的「序文」中，時常可見。

70. 袁頌西、趙永茂，〈薩孟武先生對政治學的研究與貢獻〉，收於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編，《二十世紀人文大師的風範與思想—中葉》，台灣學生書局，2007年，初版，頁368-369。

71. 薩孟武，〈自序〉，《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東大，1993年；三民書局，2006年6月，2版，頁2。



薩先生文學素養深厚，常能在中國小說情節中，剖析出傳統社會的種種問題。他曾用割記與隨想式的文體，編寫《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水滸傳與中國古代社會》、《紅樓夢與中國古代家庭》等膾炙人口的小冊子。

成果。

（一）政治學理論

政治學基本理論的研究，既是薩孟武先生的本行，也是他著力最多的領域之一，有論者（例如他的學生、前司法院大法官吳庚）認為，他的著作可以視為在行為主義興起之前，國內政治學研究的典範，⁷²戰後台灣政治學界的許多資深學者，也都出於他的門牆，啟發爾後臺灣政治學的研究及發展既深且遠。

73

事實上，早在1925、1928年歸國之初，他就曾經翻譯出版果日人森口繁治所撰的《近世民主政治論》（商務印書

館，政法叢書），以及奧國人 Anton Menger所撰的《新國家論》（商務印書館，政法叢書）二書。

1929年1月，他在上海新生命書局更出版《政治之基礎知識》（列為「社會科學常識叢刊」第1種），全書共7章，內容雖然包括國家、政制、階級、帝國主義、民族、社會革命、政黨等內容，不過由於篇幅有限（僅118頁），或許還只能算是年輕學人「牛刀小試」之作。

等到1930年後，薩孟武先生開始在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講授政治學、西洋政治思想史、各國憲法及其政府等三種課程。由於都備有講義發給學生，因此在1932年6月，他就將政治學備課講義修改定名為《政治學概論》，交由上海世界書局出版（同年9月立即再版）。1935年，加以修正後，又改名為《政治學與比較憲法》（列為「政治叢書」），交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篇幅遽增為595頁。9年後（1944年），復加修正後改名為《政治學原理》，自行出版（重慶文化建設印務局印行）。再過4年（1948年），綜合上述三書，留其長而

72. 黎明眉，〈春風化雨—甲子 懷一代宗師薩孟武先生〉，《自由青年》，71卷5期，1984年，頁30。

73. 袁鎮西、趙永茂，〈薩孟武先生對政治學的研究與貢獻〉，收於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編，《二十世紀人文大師的風範與思想—中葉》，台灣學生書局，2007年，初版，頁368。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 I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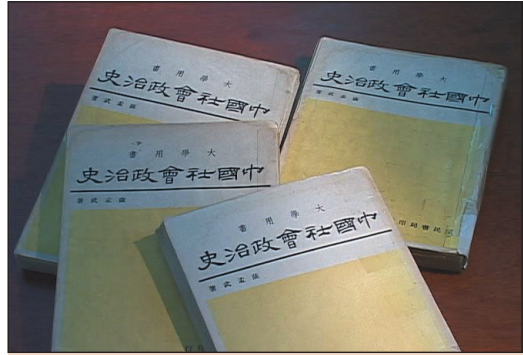
刪其短，並增補不少後，改名為《政治學新論》，交由上海大東書局出版。

1948年，他辭去中山大學法學院院長來台講學後，發現臺大法學院圖書館內存書豐富，名著不少。5年之中，讀書頗多，因此決定再加修改。雖然各章節標題仍保留舊名，但原書文字保留者已不及三分之一。1953年時，正式改名為《政治學》，自行在台出版。⁷⁴

其後，他因為不滿意，乃又多次修改，增加學說及資料。該書在薩孟武先生來台自行出版期間，前後共計4版、24刷，較之目前國內最暢銷的政治學著



薩孟武不辭辛勞整理繁浩的文獻，並針對中國社會體制立論著說，整理成一門有系統、有組織的學問，曾先後編寫《政治學》、《中國憲法新論》、《中國政治思想史》、《國家論》等專著。



1925年，薩先生開始編寫《中國社會政治史》一書。

作，只有過之而無不及。⁷⁵

1967年間，因為物價飛漲，因此停止印行，遂至絕版。但是由於坊間需者頗眾，因此他在1979年時，又參考各書，將該書做最後一次大幅修正。1982年5月，由於年歲已高，遂將版權讓與三民書局，並於1983年出版。版權易手後的「增訂初版」，截至2006年重新編排為「2版」為止，一共又印行了7刷。⁷⁶因此，該書前後總計至少印行31刷，數量當在數萬本上下。

薩孟武先生的《政治學》一書之所以能夠如此暢銷，當然主要是因為它的內容。據薩孟武先生自承，該書係依照德國傳統國家學（Staatslehre）的寫法，將政治學與比較憲法合併編著，其內

74. 薩孟武，〈序〉，《政治學》，自版，1953年，初版，頁1。

75. 袁鎮西、趙永茂，〈薩孟武先生對政治學的研究與貢獻〉，收於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編，《二十世紀人文大師的風範與思想—中葉》，台灣學生書局，2007年，初版，頁370。

76. 薩孟武，〈自序〉，《政治學》，三民書局，1983年1月，增訂初版，頁1；三民書局編輯部，〈弁言〉，收於薩孟武，《政治學》，三民書局，2006年10月，2版，頁1。

容以「統治權」為核心，分為國家論（行使統治權的團體）、政體論（行使統治權的形式）、機關論（行使統治權的機構）、參政權論（國民如何參加統治權的行使）、政黨論（統治權活動的動力）等五大部分，實已含括傳統政治學理論的所有主要範圍，⁷⁷而且可以視為是台灣政治學界在行為主義（Behaviorism）興起前，政治學研究的典範之作。或許正因如此暢銷，在1959年前後，該書數度曾經引起不肖之徒的覬覦，加以盜印。而薩孟武先生因為對此行徑深惡痛決，也曾尋求司法救濟，告上法庭。此事不僅見諸於報端，⁷⁸最高法院甚至還因為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而特別作成一號刑事判例（49年台非字第24號判例），對於盜印書籍等案件，改依刑度較重的刑法偽造文書罪論處，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歷史紀錄。

（二）憲法學及各國政府

除了政治學外，薩孟武先生也自認為是研究公法學（尤其憲法學）之人。因此，他在憲法學方面的著力甚早也甚深。早在留日期間，就已經和陳錫符一

同根據日譯本轉譯《世界新憲法》一書，在1922年8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其後，1932年，又根據日人森口繁治的著作，與堂弟薩師炯合作編譯《憲政的原理及其應用》一書（上海新生命書局出版）。

除了譯著外，他在憲法學方面的著作可以分為兩大部分：一是各國憲法及其政府，另一則是中國憲法（中華民國憲法）。

前已述及，1930年起，薩孟武先生在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講授各國憲法及其政府時，備有講義發給學生。不過直到1943年，他才在重慶刊行《各國憲法及其政府》（重慶南方印書館印行）一書，該書共304頁，內容包括英、美、瑞士、法、蘇、意、德等7國的憲政制度。抗戰勝利之後，他著手修改該書，初稿原已大半完成，只唯法國一章缺乏資料，於是擱筆，遲延數年。來台後，等到他的得意門生劉慶瑞自美進修返國後，以該書增修一事相託，才在1955年時，自費修訂出版。該書初版歷經2刷後，1958年時一度修訂增補，劉慶瑞先生去世後，雖然未能再行修訂，但是直

77. 關於該書內容的簡單評介，可參見袁頌西、趙永茂，〈薩孟武先生對政治學的研究與貢獻〉，收於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編，《二十世紀人文大師的風範與思想—中葉》，台灣學生書局，2007年，初版，頁371-372。

78. 參見《聯合報》，1959年7月14日、7月23日、7月24日、10月3日、10月30日、11月10日、1960年4月10日，4版

到1985年前後，該「修訂增補版」仍然能有6刷的成績。⁷⁹

此外，在憲法學著作方面，1945年時，薩孟武先生曾經以訓政時期約法為根據，採用比較研究的方法，撰寫《憲法提要》一書（重慶大東書局出版，列為「社會科學提要叢書」之一），用以說明憲法學上的原理。⁸⁰行憲之後，「中華民國憲法」更是他所欲寫作的對象。因此，在1960年時，他也曾應台灣聯合書局之邀，撰寫過《中華民國憲法概要》（台灣聯合書局），全書共308頁。

⁸¹

1974年，薩孟武先生三易其稿的《中國憲法新論》一書終於出版，全書已達542頁、44萬餘言，並且列為大學用書。該書內共分7章，除總論一章闡明憲法之意義、種類、性質、解釋及修改外，其餘各章則分論中華民國憲法總說、人民的權利義務、國家統治機關的組織、國家統治權力的作用、中央與地方

的關係、臨時條款等。⁸²該書在出版者於2007年改由他人增補成修訂2版前，一共歷經10刷，同樣亦屬暢銷之作。⁸³

（三）中國社會政治史

除了《政治學》之外，《中國社會政治史》的寫作，應該是薩孟武先生畢生心血之所在。據他自述，該書第一冊起草於1935年，第四冊完成於1965年，前後合計共30年。除了其間有8年時間花在政治學的著作及修改外，實際寫作該書共花22年之久。⁸⁴前政大政治系教授楊樹藩認為薩氏在學術上最主要的成就，就是對於中國社會政治史的研究。

⁸⁵

該書第一、二冊曾在中央政校摘要編為講義，發給學生，第一冊並曾在1944年時於重慶出版。來台灣後，薩孟武先生除繼續第三冊的寫作外，又將前兩冊一改再改。直到1962年才在台出版。之後，第三、四冊也分別在1963年、

79. 薩孟武，〈薩序〉，薩孟武、劉慶瑞，《各國憲法及其政府》，三民書局經銷，1985年10月，修訂增補6版，頁1。

80. 薩孟武，〈弁言〉，《憲法提要》，大東書局，1945年5月，初版，頁1。

81. 薩孟武，〈自序〉，《中華民國憲法概要》，台灣聯合書局，1960年，初版，頁1。

82. 薩孟武，〈自序〉，《中國憲法新論》，三民書局，1993年8月，初版10刷，頁1。

83. 關於該書內容的簡單評介，可參見王壽南，〈簡介薩孟武著〈中國憲法新論〉〉，《中華文化復興月刊》，7卷11期，1974年，頁66-67；袁鎮西、趙永茂，〈薩孟武先生對政治學的研究與貢獻〉，收於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編，《二十世紀人文大師的風範與思想—中葉》，台灣學生書局，2007年，初版，頁375-376。

84. 薩孟武，〈第四冊序〉，《中國社會政治史（第四冊）》，自版，1965年11月，初版，頁1。

85. 楊樹藩，〈薩孟武先生的學術思想〉，收於遠耀東編，《拓墾者的畫像》，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社，1977年9月，初版，頁163；黎明眉，〈春風化雨一甲子 懷一代宗師薩孟武先生〉，《自由青年》，71卷5期，1984年，頁30。

1965年分別出版，並且分別有4次及3次的增補改版。1975年時，因為想要繼續第五冊（清代時期）的寫作，因此薩孟武先生在大幅修改之後，將這4冊，均交由三民書局重新排印出版，⁸⁶其後幾經重印，直到今天，仍在繼續銷售。

87

據薩孟武先生自傳所述，早在1935年時，他即由中華書局購買一部《四部備要》，由商務印書館購買一部《九通》，開始編著《中國社會政治史》。每晚上床之後，必看一冊中華書局出版的線裝《二十四史》，將所需要之處，用紅筆作成記號，一史看完，就將有記號之處剪下，貼在卡片之上，而後再予分類。來到台灣之後，由於先前書籍、資料已因船難全部沈於長江，於是只得再行購買藝文社出版的二十五史兩部、十三經注疏一部及各種文集各三部，再行

閱讀一遍。⁸⁸

在具體寫作方法上，他先依正史作成草稿，而後再看有關文獻，舉凡有關政治、社會、經濟、土地、錢幣、商業、水旱、物價、軍事、地理、階級（士人、農民）各種問題的資料，均在蒐集之列。他在閱讀之後，將得到的其他資料插入其中，最後刪去重複，或對理由不大充分之處再加料說明。一朝歷史完成之後，再依上述方法敘述下一朝。⁸⁹

除了這四冊鉅著外，薩孟武先生也喜歡透過對中國古典小說的重新解讀，展現他對中國社會政治史的研究心得，正式成書的著作包括1934年的《水滸傳與中國社會》⁹⁰、1957年《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⁹¹、1977年《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⁹²。至於「三國演義」部分，薩孟武先生雖然也曾同受三民書局之邀撰寫，但僅草擬第一節：「孰是正統

86. 謝定國，〈序〉，《中國社會政治史（一）》，三民書局，1979年12月，增訂新版再版，頁7。

87. 關於該書內容的簡單評介，可參見袁頌西、趙永茂，〈薩孟武先生對政治學的研究與貢獻〉，收於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編，《二十世紀人文大師的風範與思想—中葉》，台灣學生書局，2007年，初版，頁378-380；林滿紅，〈史學與價值判斷—推介薩（孟武）著〈中國社會政治史〉〉，《教學與研究》，2期，1980年，頁205-222；張家駒，〈對薩孟武〈中國社會政治史〉一書的幾點看法〉，《思與言》，18卷2期，1980年，頁187-193；湯承業，〈讀薩孟武師中國社會政治史感論〉，《中山學術文化集刊》，2期，1969年，頁303-345。

88. 薩孟武，〈第四冊序〉，《中國社會政治史（第四冊）》，自版，1965年11月，初版，頁2-3。

89. 薩孟武，《中年時代》，頁69-70。

90. 《水滸傳與中國社會》一書初版原本是在抗戰前由正中書局出版（1946年），來台後，1967年時，應三民書局之邀，在增刪修改之後（舊著內容約只保留一半），又重新交由三民書局出版，截至2000年8月為止，初版一共10刷，2004年2月，又重新編排為2版。關於該書內容的簡單評介，可參見袁頌西、趙永茂，〈薩孟武先生對政治學的研究與貢獻〉，收於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編，《二十世紀人文大師的風範與思想—中葉》，台灣學生書局，2007年，初版，頁380。

92. 薩孟武，《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東大，1993年；三民書局，2006年6月，2版。關於薩孟武先生寫作該書的心路歷程及研究方法，可參見邱秀文，〈閒談小說—訪薩孟武教授〉，《智者群像》，時報文化，1977年，初版，頁21-27。

」後，即因自覺太過學究而放棄不寫。

⁹³

這類從歷史故事或小說人物中抽繹出與政治、社會理論交互印證的論述，由於文字輕鬆，題材又廣為人知，其所發揮的影響力，當然更在《中國社會政治史》一類的專著之上。而且也充分顯現出薩孟武先生融通政治學、法學、社會學、文學與史學之雄厚基礎，並且貫穿古今對映的功夫。

（四）政治思想史

薩孟武先生在政治思想方面的著作大致可以再細分為西洋政治思想、中國政治思想兩大領域。

在西洋政治思想方面，他在1928年回國初期，就曾經出版過一本小書：《現代政治思潮》（商務印書館，新時代史地叢書，120頁），對於馬克斯主義、布爾扎維克主義、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社會改良主義及社會連帶主義、現代國家論、國際政治思想等流行於19、20世紀的思潮加以

介紹。至於1933年所出版的《西洋政治思想史》（上下兩冊，上海新生命書局出版）一書（該書同樣也是中央政校授課講義的副產品），才是他真正有關西洋政治思想的主要著作。該書從古代、中世紀，一直論到近代的民主及獨裁政治思想。薩孟武先生來台之後，在1976年至1978年間，又利用臺大法學院圖書館館藏之便，大幅修改增補，交由三民書局出版，並印行至今。⁹⁴不過相對於其他著作來說，他的這本書似乎修改增補次數較少，內容也比較沒有大幅更新。

至於中國政治思想方面的著作，則都是來台之後才著作出版，共有1969年出版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三民書局，大學用書）⁹⁵、1978年《中國法治思想》（彥博出版社）⁹⁶、1982年《儒家政論衍義：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體系及其演變》（東大圖書，滄海叢刊）等三書。其中，《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的寫作，是薩孟武先生在研究中國政治社會史之餘，應三民書局之邀而為的副產品。⁹⁷至於1978年《中國法治思想》（彥

93. 薩孟武，〈自序〉，《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東大，1993年；三民書局，2006年6月，2版，頁1。

94. 薩孟武，〈自序〉，《西洋政治思想史》，三民書局，1978年6月，初版，頁1。

95. 關於該書內容的簡單評介，可參見王壽南，〈薩著〈中國政治思想史〉讀後〉，《中華文化復興月刊》，3卷4期，1970年，頁52-54；袁頌西、趙永茂，〈薩孟武先生對政治學的研究與貢獻〉，收於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編，《二十世紀人文大師的風範與思想—中葉》，台灣學生書局，2007年，初版，頁374。

96. 關於該書內容的簡單評介，可參見王壽南，〈簡介薩（孟武）著〈中國法治思想〉〉，《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1卷10期，1978年，頁73-76。

97. 薩孟武，〈序〉，《中國政治思想史》，三民書局，1969年9月，初版，頁1。

博出版社)、1982年《儒家政論衍義：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體系及其演變》(東大圖書,滄海叢刊)⁹⁸兩書,則是他晚年集其大成的作品。

(五) 三民主義研究

薩孟武先生畢生自認為是孫中山學說的信徒,而且自認為是首開「以科學方法研究三民主義」風氣之先者。因此,不但在1929年前後著有《三民主義政治學》⁹⁹、《三民主義之科學的研究》¹⁰⁰等書名直接冠有三民主義的著作,即使是1943年在重慶自行出版的《憲法新論》一書,其內容也是在「比較研究古今中外的政治制度,以闡明五權憲法的原理及其運用方法」為主。¹⁰¹該書共計4章,分為民主政治的轉變、五權憲法的特質、政權的組織及其運用、治權的組織及其運用。¹⁰²

(六) 其他社會科學

薩孟武先生在留學歸國後,直到前往政校任教為止,曾經或寫或譯,出版

一批財政、社會、經濟方面的著作。這固然是因為當時中國學界汲汲於吸取西學新知之下,薩孟武先生「賣文為生」的成果,但是另一方面,其實也展現出他日後從事著作、研究時,一向不拘泥於政治學、憲法學本身,而慣常採取動態觀點,並且多所擷取跨學科研究成果的學術傾向。而且這些著作在他爾後的法政專業著作中,也被屢屢引證。

薩孟武先生這段時期的著譯,除了《近世民主政治論》、《新國家論》這2本政治學譯作外,在1926~1930年這短短五年中,他合計一共翻譯8本、著作6本。平均一年編譯出版3本書,不僅速度十分驚人,而且範圍廣及法律、國際關係、社會、經濟、財政等領域,其著譯之詳目如下:

1926年時有:翻譯日人小川鄉太郎所撰《租稅總論》(商務印書館,經濟叢書)、編著《國際關係與經濟》(薩孟武、林懿民〔即薩先生之夫人〕合著,商務印書館,百科小叢書)。

1928年著有《國際紛爭與國際聯盟

98. 關於該書內容的簡單評介,可參見袁頌西、趙永茂,〈薩孟武先生對政治學的研究與貢獻〉,收於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編,《二十世紀人文大師的風範與思想—中葉》,台灣學生書局,2007年,初版,頁374-375。

99. 薩孟武,《三民主義政治學》,上海新生命書局初版,1931年7月,5版,全書共計269頁。

100. 薩孟武,《三民主義之科學的研究》,出版年份不詳,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部出版,黨軍叢書之2,全書共計104頁。

101. 薩孟武,〈例言〉,《憲法新論》,自版,1943年10月,初版;中國方正出版社,2006年10月。

102. 薩孟武,《憲法新論》,自版,1943年10月,初版;中國方正出版社,2006年10月。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 IV

》(商務印書館,政法叢書)。1929年,譯有日人穗積陳重所撰《法律進化論》(薩孟武、黃尊三、陶希聖、易家鉞合譯,商務印書館,政法叢書)、河西太一郎等撰《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發展》(上海新生命書局)、德人考茨基(Karl Kautsky)撰《社會革命論》(*Die Sozialistische Revolution*,上海新生命書局,社會科學名著譯叢)、波達諾夫(von A. Bogdanow)所撰《社會主義社會學》(*Die Entwicklungsformen der Gesellschaft Und die Wissenschaft*,上海新生命書局,社會科學名著譯叢),另著有《中國社會問題之社會學的研究》(上海華通書局)、《財政學之基礎知識:社會主義財政學》(上海新生命書局,社會科學常識叢刊)。

1930年,除編譯《最新財政思想與財政政策》(上海新生命書局)外,亦譯有日人平野義太郎所撰《法律與階級鬥爭》(上海新生命書局,新法學叢書)、嘉治隆一的《俄國經濟史》(上海新生命書局,各國經濟史叢書)、高素之所撰《馬克思十二講》(薩孟武、陳

寶驊、邢墨卿合譯,上海新生命書局,新生命高等文庫)。

他在晚年(1976年)時,還翻譯出德人奧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所著《國家論》一書¹⁰³。

玖、結論

薩孟武先生長達87年的生命歲月中,在福州16年,在日本11年,在上海6年,在南京7年,抗戰時遷往重慶約9年,在廣州約2年。在台灣,所居時間則最長,有36年之久,而且終老歸骨於此。他的一生,其實反映出20世紀中國一整個世代知識份子的生命縮影。

這些知識份子出生於20世紀初前後,在接受來自西方的學術訓練,回到戰亂頻仍的中國後,為了使國家富強,無不盡心貢獻所學。其中有些人在1949年後留在中國大陸,有的因為政治運動等外力因素,就此中斷了學術上原本可能有的精進與發展(例如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的錢端升就是著名的例子)¹⁰⁴。另外一批人,則隨同國民政府來到台灣。雖然對來到臺灣的這批知識份子來說,

103. 薩孟武,《國家論》,東大,1977年,初版。關於該書的簡單評介,可參見胡一貫,〈評薩孟武譯奧本海默著〈國家論〉〉,《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1卷6期,1978年,頁100-102。

104. 錢端升,〈我的自述〉,收於趙寶煦等編,《錢端升先生紀念文集》,中國政法大學,2000年,初版,頁390-398;陳夏紅,〈1949年後的錢端升〉,收於氏著,《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中國法制,初版,2006年7月,頁193-221。



薩孟武先生八十壽誕蔣經國總統前來慶賀。資料：(謝仁棟先生提供)

這裡始終只是暫居的異鄉，並非安身立命之所在，絕大多數人仍然心繫故國神州，期待有一天反攻大陸，回到家鄉。¹⁰⁵不過即便如此，人在台灣的他們，仍然竭盡心力將自己之畢生所學乃至於生命，全都貢獻給這塊土地及人民。

他們不僅延續了戰前中國的學術命

脈於不墜，同時也為台灣培養出一批本土人才，奠定戰後台灣學術發展的契機。沒有他們的無私奉獻，戰後台灣學術界以及教育界的發展，想必更為艱辛。或許正因如此，與薩孟武相知相交達數十年的陶希聖先生，在薩先生去世後所撰「薩孟武先生事略」¹⁰⁶一文中，曾經

105. 薩孟武先生在70歲時所撰寫的回憶錄：《學生時代》中有一段耐人尋味的話，在相當程度上顯露此種心態。他說：「青年人想將來，壯年人想現在，老年人憶過去。這話未必有錯，現今在臺人士，年齡與我相似的，大多不憶過去，而想將來。為什麼呢？那一家不是骨肉分散，那一人不想回到大陸。『黃河之水天上來』，台灣能夠看得見麼？『不盡長江滾滾來』，台灣能夠看得見麼？哈密瓜、馬乳葡萄，台灣能夠嘗其味道麼？冬天大雪，冷是冷了，而每家均有火爐，比之臺灣寒潮一來，就冷得令人戰慄，而太陽出來，又如夏天，誰人能夠忍受。大陸的冷是乾冷，臺灣的冷是濕冷。我們想未來，就是希望政府反攻，我們能夠回到大陸。」（《學生時代》，三民，2版，2005年，頁244）。

106. 陶希聖，〈薩孟武先生事略〉，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一輯），國史館，初版，1988年，頁631。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Ⅳ

說過：「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先生得一，學為人師，望重士林，遺愛常在寰瀛。」或許這句贊詞，已經適切反映了薩孟武先生的一生功業。

主要參考文獻

- 薩孟武，《學生時代》，三民書局，2005年，2版。
- 薩孟武，《中年時代》，三民書局，2005年，2版。
- 薩孟武，〈我在各級學校時如何讀書〉，《讀書與進修》，中央文物供應社，1984年，再版，頁11-13。
- 薩孟武，〈我與書〉，《書與我》（第一集），中華日報社，1978年，頁1-5。
- 薩公強整理、薩孟武遺作，〈論言論自由〉，《中央日報》，1985年5月6日。
- 薩公孚，〈安息吧，爸爸—悼我的父親薩孟武先生〉，《中央日報》，1984年5月5日。
- 朱宏源，〈光復初期臺大法學院的成立〉，收於高明士編，《東亞傳統教育與法制研究（一）教育與政治社會》，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初版，頁79-112。
- 朱宏源等，《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史》，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2006年，初版。
- 阮毅成，〈悼念薩孟武兄〉，《傳記文學》，第44卷第5期，1984年，頁47-50。
- 邱秀文，〈閒談小說—訪薩孟武教授〉，《智者群像》，時報文化，1977年，初版，頁19-27。
- 胡有瑞，〈狂狷齋的主人—訪薩孟武教授〉，《現代學人散記》，爾雅，1993年，新一印，頁127-147。
- 袁頌西、趙永茂，〈薩孟武先生對政治學的研究與貢獻〉，收於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編，《二十世紀人文大師的風範與思想—中葉》，台灣學生書局，2007年，初版，頁365-385。
- 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玉山社，2009年4月，增訂版。
- 楊樹藩，〈薩孟武先生的學術思想〉，收於逢耀東編著，《拓墾者的畫像》，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社，1977年，初版，頁163-187。
- 關國煊，〈薩孟武〉，原載於《傳記文

- 學》，第51卷第4期，後收於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第二輯第十三冊），傳記文學出版社，初版，1992年，頁431-439。
- 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1911-1949）：法律》，書目文獻出版社，初版，1990年。
- 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1911-1949）：政治》，書目文獻出版社，初版，1996年。
- 陳志奇，〈薩老師的趣事〉，《中央日報》（副刊版），1970年4月18日。
- 吳延環，〈薩老師—志士、學人、長者〉，《中央日報》，1977年3月7日。
- 阮文達，〈悼薩孟武先生〉，《聯合報》，1984年4月21日。
- 楊樹藩，〈敬悼薩孟武師〉，《中國時報》（副刊版），1984年5月5日。
- 楊樹藩，〈薩孟武先生的學術思想〉，收於遼耀東編，《拓墾者的畫像》，初版，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社，1977年9月，頁163-175。
- 徐世賢，〈我所敬仰的薩孟武先生〉，《社會科學論叢》，第32輯（紀念薩故教授孟武先生專號），1984年12月，頁11。
- 林紀東，〈我所認識的薩孟武先生〉，《社會科學論叢》，第24輯（薩教授孟武先生八秩華誕慶祝論文集），1976年3月，頁1-4。
- 陶希聖，〈薩孟武先生事略〉，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一輯），國史館，初版，1988年，頁627-631。
- 張達人，〈一心要學蘇東坡的薩孟武教授〉，《藝文誌》，118期，1975年7月，頁14-17。
- 黎明眉，〈春風化雨—甲子：懷一代宗師薩孟武先生〉，《自由青年》，71卷5期，1984年，頁29-31。
- 王壽南，〈簡介薩孟武著〈中國憲法新論〉〉，《中華文化復興月刊》，7卷11期，1974年，頁66-67。
- 林滿紅，〈史學與價值判斷--推介薩（孟武）著〈中國社會政治〉〉，《教學與研究》，2期，1980年，頁205-222。
- 張家駒，〈對薩孟武〈中國社會政治史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 I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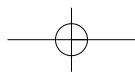
〉一書的幾點看法》，《思與言》，18卷2期，1980年，頁187-193。

王壽南，〈薩著〈中國政治思想史〉讀後〉，《中華文化復興月刊》，3卷4期，1970年，頁52-54。

王壽南，〈簡介薩（孟武）著〈中國法治思想〉〉，《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1卷10期，1978年，頁73-76。

胡一貫，〈評薩孟武譯奧本海馬著〈國家論〉〉，《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1卷6期，1978年，頁100-102。

湯承業，〈讀薩孟武師中國社會政治史感論〉，《中山學術文化集刊》，2期，1969年，頁303-3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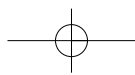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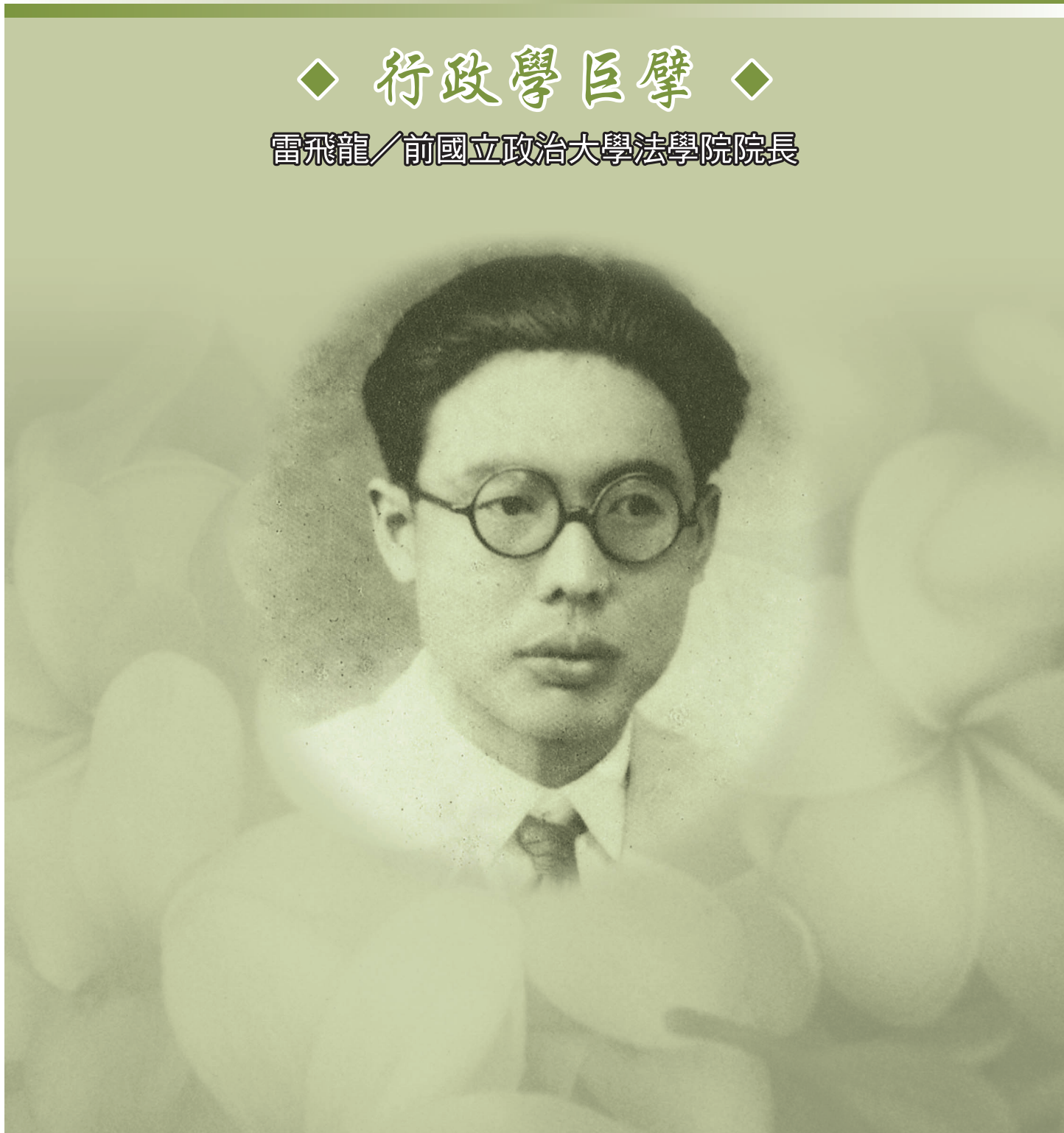


張金鑑

1902~1988

◆ 行政學巨擘 ◆

雷飛龍／前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院長





張金鑑先生，河南安陽人，生於民國前九年（1902）、歿於民國七十七年（1988），享壽八十六歲。先生家居為三代同堂之大家庭，夫人為舊式婦女，舉家和樂，白頭偕老；時值亂離，子侄皆賴先生及夫人教養成材。

先生為美國史丹福大學碩士，為行政學在中國之開山祖師。歷任政治大學教授及學系主任，及其他大學教授垂五十年。著作多達四十種，共達千萬言；尤以行政學之理論及實際、行政學典範、中國政治思想史最為傑出。所指導博碩士論文逾百數，允為儒宗。

壹、生平

張金鑑先生，號明誠，河南安陽人。祖父肯堂公，安陽名秀才，補廩生，在家裡設帳授徒，望重鄉里，但健康不佳，英年早逝。父秉文公，天資聰穎，因少年失怙，無力就學，遂家居治產兼業農商，家聲重振，膺選安陽縣西一區長兼保衛局局長。母馬太夫人，眾口稱賢。德配王松竹夫人賢淑知禮，在大家庭中善事翁姑，協和妯娌，相夫教子，敦親睦鄰，親友仰佩。雁行四人，先生居長。

先生出生於民國前九年（公元1902年）陰曆十月十七日，稟賦聰敏。十歲啟蒙，讀四書五經。民國八年入開封明誠預備中學，次年考入河南省立第十一中學，品學冠儕輩，深得師友賞識。當選學校市市長，彰德七縣學生聯合會會長、反帝國主義聯盟主席，領導愛國運

動。

民國十四年，先生舊制中學畢業；次年考入國立北京大學，一年後以張作霖在北京大捕國民黨人，先生有黨籍，遂南下考入中央黨務學校（中央政治學校前身），親承校長先總統 蔣公德教。在校肄業時，曾奉命參加北伐，任宣傳工作，躬予濟南五三慘案之役。民國十七年畢業，奉派山東省黨務整理常務委員，先後兼宣傳部部長、訓練部部長，成立全省黨務工作人員訓練所，宣揚主義、培育幹部卓著成效。討逆戰役、宣傳奏功，獲蔣總司令致電嘉勉。

民國二十年河南省招考公費留學的留美學生，先生報考榮登魁首，遂赴美入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政治學系就讀。四年中獲得學士及碩士學位，其碩士學程專攻新興之行政學，以成績優異膺選「美國榮譽政治學會」

(PISIGMA ALPHA) 會員。

民國二十四年春，先生學成回國，初任黨職，旋赴蘭州任西北日報總編輯兼任社長。不久受聘河南大學教授兼訓育主任，次年轉任南開大學教授，代表該校參加華北農村建設協進會，率領研究生至山東濟寧從事新縣政實驗工作。二十六年抗戰軍興，華北農村建設協進會遷貴陽，先生奉派主持貴州省縣政人員訓練所教務。二十七年夏起，至重慶任中央政治學校教授，先後兼任行政學系主任、法政學系主任、畢業生指導部副主任、研究部主任。三十五年政校與中央幹部學校合併為國立政治大學，先生任教授兼法政學系主任。大陸淪陷後，四十三年夏政大在台復校，先生受聘至政治研究所任教。四十八年政大與美國密西根大學(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合作創設公共行政研究所，先生以行政學權威出任所長。其後因格於法令，不再兼任行政職務，但在政大、台大、淡江大學、中興大學、中國文化大學等校兼課，前後在上庠施教垂五十年。

先生淡泊名利，所志唯在學術報國，但以國難方殷，不惶寧處。故自青年時領導愛國運動，其後參加鄉村建設工作，出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膺選立法委員，俱出愛國心之驅使。先生在立法

院一直參加法制委員會，數度擔任召集委員，主持政府機關組織編制、人事制度有關法案之審議，規劃周詳，於我國政府組織及文官制度，卓著貢獻。

先生體力素健，人謂期頤可卜。不意民國七十七年春因感冒引起肺炎，經醫治後不久復發，加以腎臟功能欠佳，年老體衰，於十月二十二日逝世，享年八十六歲。

貳、教育事蹟

所謂教育，不只是課堂中的口頭講解，還包括任教者的立身處世、行為舉止在內，此即所謂「身教」。我國傳統教育特別重視身教，故謂「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今就先生之家庭生活、從政概況、教學生涯、著作述要四者，略加敘述：

一、家庭生活

先生之家為我國舊式大家庭，父母兄弟合居，德配王松竹夫人為典型傳統婦女，幼年纏足，未受新式教育，但容貌娟秀，賢淑知禮，其婚姻乃經媒妁之言，而非兩方自由戀愛。民國十六年陰曆四月與先生結婚，時先生方肄業北京大學，婚後三十五日即赴南京投考中央黨務學校。畢業後在山東工作三年，一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 IV

方面時值革命高潮，英雄氣「長」、兒女情「短」，單獨在任所奮鬥；二方面秉文公在家治產，望先生多寄薪俸回家，不欲其攜眷在外，增加開支（明誠七十自述，頁88）。其後，先生赴美留學，夫妻闊別八年，夫人在家上事翁姑，中和妯娌，料理家務，毫無怨言。民國二十四年，先生自美回國，至河南大學任教，方相偕至汴梁居住。二年後哲嗣潤書出生，先生已因抗戰遠赴後方工作，夫人及新生幼兒則與翁姑同居故里。其後家鄉陷敵，二十八年冬，夫人及幼



1945年4月張金鑑先生全家於四川重慶郊區南溫泉合影(後排右一為張金鑑先生)。
資料：(《張金鑑先生紀念集》張潤書先生提供)

兒乃由秉文公護送至重慶團聚，時值抗戰艱苦階段，經濟困難，而二女陸續出生，夫人在家獨力照料全家生活及三位幼年子女。勝利後在南京居住不久，又舉家播遷來台，合秉文公及弟金錫、金銓、妹金蘭夫婦子女十餘人，同居於台北市信義路巷內僅有三房之日式木造房屋內，賴先生之微薄薪入維持生活，拮据情形，可以想見。其後二弟先後物故，其子女悉在先生及夫人照顧下獲得良好教育及工作。先生之孝友風義、夫人之慈愛恩，知者無不欽服。古詩有云：「型于寡妻，玉於兄弟，以御于家邦」（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引）。先生與舊式婚姻之妻室白頭偕老，情如鑽石，友于兄弟，澤及遺孤，誠足為中華文化之表率、邦人君子之楷模！

二、從政概況

先生淡泊名利，但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自中學時期之領導愛國運動、大學畢業後之參與基層鄉村建設，乃至其後之出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及立法委員，悉出愛國心之驅使。其在國民參政會及立法院之發言及提案，俱本福國利民之宗旨。在立法院一直參加法制委員會，數度當選召集委員，對健全政府法制及文官制度有重大貢獻。其最著者厥



1983年10月張金鑑伉儷。
資料：(《張金鑑先生紀念集》張潤書先生提供)

為五十三年擔任法制委員會召集委員時，完成公務人員考試法、任用法、考績法、俸給法之審查，在各法中列入「為事擇人、考用合一」、「專才專業、適才適所」、「綜覈名實、信賞必罰」、「同工同酬、計值給俸」等規定，為健全人事制度立下創舉性之原則（明誠七十自述，頁193）。

而五十七年反對考試院所提「公務人員法草案」將教育人員及企業人員列為公務人員，與現行文官法制多所衝突；五十九年反對行政院所提「政務官懲戒法草案」，以政府高級官員充任「政

務官懲戒委員會」委員，使行政權與司法權混淆不清，削弱監察院之彈劾權。卒使兩院將兩案撤回（明誠七十自述，頁198及202），是皆先生議事精審、堅持原則的精神之表現，足為後來審議立法者之楷模。

三、教學生涯

先生自稱其選擇教育為終身職業，有三個原因：1. 遵父命：其祖父肯堂公為邑貢增廩生，設帳授徒，望眾鄉里；自己幼年喪父，羨父業而痛失學，轉寄望於先生。2. 適性情：先生自認生性直爽，心直口快，不宜從政；又志趣曠達，不重細節，不適經商。而教書則不忤不求，怡然自得。3. 合時需：人才為國家富強之本，當時教育落後，彰德府屬七縣人口三百萬，只有一所四年制中學，學生不到二百名，目不識丁的文盲佔



1948年張金鑑先生任立法委員當選證書。
資料：(《張金鑑先生紀念集》張潤書先生提供)



1974年張金鑑先生七秩晉二華誕與博士論文指導學生合影。

資料：(《張金鑑先生紀念集》張潤書先生提供)

人口百分之九十。欲求國家富強，從何而得？故認從事教育，乃時代之迫切需要（明誠七十自述，頁209-210）。

由於先生熱愛教學，獻身教育五十餘年，自民國二十四年由美回國，即在各大學任教。在大陸計有：河南大學、南開大學、中央政治學校、中央幹部學校、中央大學、復旦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在台灣則有：政治大學、台灣大學、中興大學、台灣師範大學、淡江大學、政治作戰學校、中國文化大學、及各種公務人員訓練班。

對於學生，先生總是循循善誘，愛護備至。對求助者，莫不唯力是從。在台所授多屬研究所課程，指導博碩士論文以百計。諸生爾後或為學界巨擘，或

為政壇名人。先生八十述懷云：「桃李遍植五十年，杞梓成材薪火傳；孰云執鞭無甚用，千百門里是英賢。」。「自慰人老心不老，大海後潮擁前潮，愧無長才成大業，喜有弟子滿半朝。」，蓋自謙之詞，亦記實之筆也。

四、著作述要

先生一生勤于著述，嘗自謂「我之致力於寫作，既不是為了揚名，亦不是為了獲利，完全是興趣之所在。人生在世不能是無業遊民，人當各有職業，我的職業是『士』，士志於『道』，文者載道、傳道的工具。『道』就是知識，傳佈知識乃是士人的天職。所以我的書桌上總有一本未寫完的書，此書寫成後就開始寫另一本書。總有一篇未寫完的文章，此文寫完成後就開始寫彼文」（



1986年12月張金鑑先生八秩晉四華誕學術演講會。
資料：(《張金鑑先生紀念集》張潤書先生提供)

明誠七十自述，頁 255)。因此，先生著作之多，在當代知名學者中，無人能出其右。計其一生出版之著作，專著在四十種以上，報章雜誌刊登之論文三百餘篇，總字數已逾千萬言，謂為著作等身，絕非虛譽。

先生之四十種著作中，下列二十四種尚可查考（參見張金鑑先生紀念集，頁15-19）：

1. 美國政治思想史，民國二十三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2. 政治簡史（譯 E.Jonks，Short History of Politics），民國二十三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3. 行政學之理論與實際（大學叢書），民國二十四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4. 美國之市政府，民國二十五年正中書局出版。
5. 美國之市行政，民國二十六年正中書局出版。
6. 政治的經濟基礎（譯C.A.Beard，Economic Basis of Politics），民國二十七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7. 人事行政學（上、下兩冊），民國二十八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8. 行政管理概論，民國三十二年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
9. 各國人事行政制度概要，民國三十二年正中書局出版。
10. 均權主義與地方制度，民國三十七年正中書局出版。
11. 均權主義的政治原理與歷史背景，民國四十二年中央文物供應社出版。
12. 現代政治學，民國四十二年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
13. 人事行政原理與技術，民國四十三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14. 中國文官制度史，民國四十四年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
15. 行政學典範，民國四十五年中國行政學會出版。
16. 自由中國地方自治的實施，民國四十六年改造出版社出版。
17. 行政學概要，民國四十九年台灣聯合書局出版。
18. 政治學，民國五十一年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出版。
19. 政治學概要，民國五十二年三民書局出版。
20. 中國政治制度，民國五十四年三民書局出版。
21. 行政學研究，民國五十五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22. 中國現行人事行政制度，民國五十六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23. 歐洲各國政府，民國五十七年三民書局出版。
24. 各國人事制度概要，民國五十八年三民書局出版。
25. 西洋政治思想史，民國五十九年三民書局出版。
26. 明誠七十自述，民國六十一年中國行政學會出版。
27. 民生主義與福利國家，民國六十二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28. 中國法制史概要，民國六十三年正中書局出版。
29. 美國政府，民國六十四年三民書局出版。
30. 政治學概論，民國六十五年三民書局出版。
31. 動態政治學，民國六十六年七友出版公司出版。
32. 行政學新論（生態行政學），民國七十一年三民書局出版。
33. 管理學新論，民國七十四年五南書局出版。
34. 中國政治思想史（上中下三冊），民國七十八年三民書局出版。

依「明誠七十自述」（頁270），先生尚有下列六種著作，其中四種可能並未正式出版，即：1.民國十八年山東黨務工作人員訓練班印行的「中國國民黨

黨史概要」、2.民國二十一年中央時事週報刊行的「美國畸形發展的財富分配」、3.抗戰時期中央政治學校研究部刊行的「縣政論」、4.民國三十四年昌明函授學校刊行的「行政學講義」、5.民國三十六年大東書局出版的「行政學提要」、6.民國四十六年改造出版社出版的「政黨政治的真諦」。

由上述書目，可知先生著作的內容已遍及政治學、行政學之各部門，範圍廣博，在當代政治學者中，確屬少見。

參、教育影響與評價

由前述先生居家之事親唯孝，三代同堂；固守舊式婚姻，白頭偕老；友于兄弟，愛及遺孤。從政則勇於奉獻，望隆議壇；教學則「半朝弟子，功邁王通」，足見其身教言教之成就。茲再就其著作對學術與政事之影響略敘如次。

一、中國行政學之開山祖師

先生民國二十三年在美留學時，即以行政學為碩士學程之主修項目，並就課堂所得、國內蒐集之資料、參考美國學者魏勞畢（W.E. Willoughby）所著「行政學原理」（Principle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寫成「行政學之理論與實際」，計六編二十五章，約四十



1950年4月張金鑑先生(中排右一)全家福，合影於台北市信義路寓所大門。
資料：(《張金鑑先生紀念集》張潤書先生提供)

四十餘萬言。此類與時俱進之著作，不僅對我國行政學科的教學有其影響，對我國的機關管理與革新，亦有鉅大之貢獻。

二、對現行文官制度之貢獻

在行政學中，人事行政乃其重要部份，先生對之尤有深邃之研究。早在民國二十六、七年，即撰寫

萬言，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於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出版，並列為大學叢書。此為中國第一本行政學巨著，風行一時，先生因此而成中國行政學的開山祖師。

其後先生對行政學之研究與著作，從未中輟，陸續出版「行政管理概論」、「行政學提要」等書，並依二十餘年教學及研究所得，參考美國有關行政學新著，於民國四十六年出版「行政學典範」，計八編三十二章，皇皇四十五萬言；其後歷經增訂至五十餘萬言，十餘年間銷行二十版，四萬餘冊。七十一年又採「行為科學及系統分析」觀點，寫成「行政學新論」（行政生態學），亦

人事行政學上、下兩冊，共七十餘萬言，於二十八年由商務出版。其後陸續出版「各國人事制度概要」、「人事行政原理與技術」、「中國文官制度史」、「中國現行人事行政制度」、「各國人事制度概要」。由於先生對各國文官制度及我國人事行政均有透徹研究，又在立法院法制委員會擔任召集委員多年，對我國現行人事制度之改進，確有鉅大之貢獻。

三、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之成就

先生於政治發展、各國政府、西洋政治思想史，皆有著作問世。然集其對



1983年張金鑑先生於家中客廳與友人談話時神采奕奕。資料：(《張金鑑先生紀念集》張潤書先生提供)

政治科學研究之大成，而為空前之貢獻者，則為其八十歲以後六年間所著之「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此書分八編八十七章，共約一百四十萬言，有下列特點：

(一) 坊間流行之中國政治思想史，皆自先秦，即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起，本書則運用文化、人類等知識，配合中國史籍記載，上溯玉黃帝軒轅元年（公元前2698年），論述圖騰社會（totemic society）之漁獵經濟、母系社會、雛形國家、原始民主、依循天道、崇拜自然的政治思想，較一般對中國政治思想之研究提前約一千九百多年。

(二) 本書分中國政治思想時代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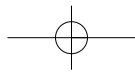
1. 遠古圖騰社會，原始民主政治思想時代。

2. 殷商氏族社會，神權政治思想時代。
 3. 西周宗法社會，封建政治思想時代。
 4. 東周封建解體，百家爭鳴的政治思想時代。
 5. 秦漢三國，重相權的王權政治思想時代。
 6. 魏晉南北朝，為軍人跋扈篡竊頻仍的霸權政治思想時代。
 7. 隋唐以迄明清，為君權獨尊的專制政治思想時代。
 8. 民國以後的政治思想時代。
- 與其他同類書籍不同。

(三) 本書視政治思想與政治環境為兩個變動變數。個人之政治思想，因其所處環境及個人特性而有不同，故一方面以宏觀觀點闡明自遠古以迄今日，各時代之社會背景與其時政治思想的關係；另一方面以微觀觀點分析各思想家的思想淵源與主張要點。與一般政治思想史家僅對個別思想寫作微觀分析者不同。

肆、結論

先生自稱為「中原學究」，由其居家、從政、教學、著作，可見其篤守傳統士人之立身處世、竭盡己力、推愛於人的忠恕之道，誠足為中華文化之表率、從事教育者之楷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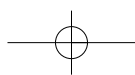


梁實秋

1903~1987

◆ 英語教育的大師 ◆

莊坤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際處處長





梁實秋先生早年留美，受業新人文主義大師白璧德（Irving Babbitt），回國後與胡適、徐志摩等人創新月雜誌，議論時政，並治文學批評，後以《雅舍小品》享譽文壇，抗戰時期因與魯迅筆戰而成為階級革命的敵人。1949年，渡海來台，延續其教育志業，翻譯莎士比亞全集合計40部、以中文撰寫英國文學史、投入教育行政工作、編輯英漢字典、中學英語教科書，在台灣的文壇與杏壇，寫下輝煌的成果與深遠的影響。

壹、大陸時期生活

梁實秋先生，本名治華，筆名子佳、秋郎，生於光緒28年（1903）。父親梁咸熙為前清秀才，他的啟蒙始自傳統的私塾教育。先在家裡和兄姐一起接受家庭教師「念背打」的傳統學習，9歲進陶氏學堂，接受私校教育。10歲進北京師公立第三小學，以第一名畢業。14歲考進清華學校。

清華學校為庚子賠款支助設立的學校，性質為留美預備學校。梁先生在此度過八年的中學歲月。清華給予他自由的學習環境，體格的鍛鍊，和一大群在往後歲月裡互相扶持的同學。在清華，上午的科目全以英文上課，下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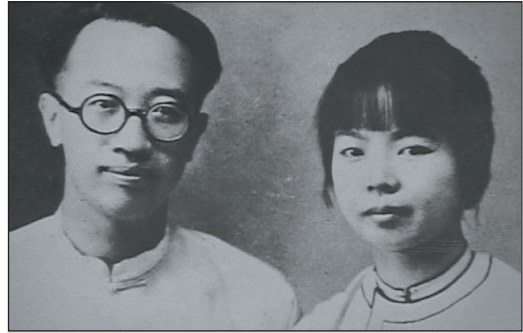
排有中文課程。英文課有林語堂等人和諸多美籍教師擔任。學校課程設計偏重英文，一般同學都重英文，輕中文。但梁先生則對中文課也熱心研讀，尤其是受到徐鏡澄先生的教誨，在作文上學會什麼是「割愛」，什麼叫文字簡鍊，句法挺拔，篇章完整。這種文字的訓練，



梁先生於1915年考入清華留美預備學校（今清華大學）。
資料：（莊坤良先生提供）

對梁先生的散文寫作，影響甚大，終身受用不盡。大體而言，清華八年，梁先生在此奠定了英文與中文的基礎，並促成他往後主修英美文學的志業。

在清華時期，梁先生逐步展現他在人文藝術上的興趣與才情。他與同學共同組織「戲墨社」，苦練書法。成立「小說研究社」，與同學共同學習新文學。民國8年，爆發五四運動，清華大學也轟轟烈烈捲入其中，在學的梁先生也參與了這個大時代的運動。隔年，他嘗試新詩創作，作品開始在《清華週刊》發表，後並擔任該週刊之文藝編輯。20歲時，初識未來的夫人程季淑女士，並展開熱烈追求。21歲，和好友聞一多撰寫〈冬夜草兒評論〉，初試啼聲寫文學評論。22歲，自清華學校高等科畢業，赴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就讀英文系。這段時間還持續創作抒情詩歌。梁先生以散文創作，獨步文壇。很少人知道他早年的文學嘗試，竟是多愁善感、感情纖細的詩歌。他吶喊、讚嘆、歌詠生命，直接表白、陳述、渲染感情，一如所有的戀人絮語。梁先生也寫小說，如記述愛人離別的〈苦雨淒風〉（1923），或留學異鄉生活的〈謎語〉（1925）。陳子



1927年梁先生與程季淑夫人結婚前合影。
資料：(師大圖書館提供)

善先生收集了梁先生在這段時期的文學創作，於1996年出版《雅舍小說與詩》，為這段起步之作，留下記錄，供後人研究。

浪漫激情的梁先生於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畢業後，獲推薦進入哈佛大學，追隨新人文主義大師白璧德，攻讀英國文學與文學批評。這段受教經驗改變了梁先生的創作風格。他從一個浪漫傾向的文藝青年，轉為追求理性清明普世人性價值的文人作家。他在接受丘彥明訪談時說：「哈佛大學的白璧德教授使我從青春的浪漫轉到嚴肅的古典，一部份由於他的學術精湛，一部份由於他精通梵典與儒家經籍融會中西思潮而成新人文主義，使我衷心讚仰」¹。這份景仰之情，影響梁先生的治學與為人一輩子。

1925年，梁先生由哈佛轉入哥倫比

1. 余光中主編《梁實秋先生紀念文集：秋之頌》。頁382。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Ⅳ

亞大學，繼續學業。隔年返國，受邀到上海的東南大學任教，主講英國文學史，開啟他長達40年橫跨兩岸的教授生涯。次年，在北京與程女士結婚。同年在上海，與胡適、徐志摩、潘光旦、聞一多等人籌設新月書店並發行雜誌，1927年《浪漫的與古典的》一書，即由新月出版。同時，他以秋郎為筆名所寫的小品文集《罵人的藝術》也在同年出版。這時，梁先生因一篇批評盧梭的文章，點燃了他與魯迅等左派作家的文學立場爭論。新月成立的同時，一批左派人士也成立了「創造社」，宣揚「無產階級的文學」。這些人批評梁等新月人士，皆留美，是一群資本家的走狗。梁先生在「新月」發表文章，駁斥魯迅等左派人士主張。梁先生認為「文學的性質在於普遍的永久的人性之描寫，沒有所謂的階級性」²。換言之，真正的文學創作，不為某個階級利益而創作，他本身具有獨立的完整性。根據劉信足（2004）的研究，梁先生的文藝思想主要論點有四：（1）反對「革命的文學」，強調文學忠於人性。偉大的文學是基於固定的普遍的人性，唯有從人心深處流露出來的情思才是文學。（2）反對「文學

的階級性」，他認為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學」只是革命口號。因文學來自人性，並無階級的不同。（3）反對「所謂的文藝政策」。他認為文藝作品與政策是兩碼子事，文學作品本身才是大家要關心的。（4）反對「文學是鬥爭的武器」。文學不是階級革命的宣傳品，更不是鬥爭的工具。梁先生秉持他對人性與文學的信念，單槍匹馬，以理性思辯，客觀的論證，回應左派的挑釁，要他們「拿出貨色來」。這場大辯論，奠定了梁先生的文學批評者角色，但也因此引發整個左派對他的圍剿鬥爭。這些對抗也埋下梁先生與魯迅等人於抗日時期第二次的衝突。

1930年，梁先生轉至國立青島大學服務，任外文系主任兼圖書館館長。青島宜人的氣候及風景，給他及家人一段美好的生活記憶。是年，胡適先生任職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翻譯委員會，邀約梁先生加入翻譯莎士比亞全集計畫。此為梁先生在往後數十年陸續完成此項艱鉅使命的濫觴。隔年，於新月月刊發表〈文學的嚴重性〉、〈所謂的文藝政策〉等文，也結束他與左派作家第一階段文學論辯。三〇年代，他陸續參與

2. 《秋室雜憶》。頁70。

了文藝刊物的編輯，如「獨立評論」、在天津益世報開辦「文學週刊」、為「圖書評論」寫書評、在北平籌辦「學文月刊」、創辦「自由評論」，鼓吹民主愛國。易言之，梁先生書生本色，以文字議論，積極參與這時期的國家文化建設。

1934年，梁先生應胡適之邀，回北平任北京大學外文系主任。返回故里老宅內務部街20號。持續出版重要著作《偏見集》、《文藝批評論》。尤其是莎士比亞的翻譯，也在這段時間陸續出版³。民國26年爆發蘆溝橋事件，北平陷入危城狀態，梁先生因發表抗日愛國言論，因此他的名字也在日軍逮捕對象的名單之中。這個國家命運的巨變，也改變了梁先生個人的命運。是年七月，他預立遺囑，隻身逃離北平，輾轉赴天津、青島、南京、長沙，後潛回北平省親。隔年，膺任國民參政員，再度隻身離家，轉香港、漢口到重慶，以實際行動參與大後方的抗日行動。

在漢口時，時任教育部次長的張道藩先生，邀梁先生參加「中小學教科用書編輯委員會」，編輯中小學教科書以

供大後方青年學子學習。教育不能因抗戰而中斷，梁先生參與教育事業報效國家。他得到李清悚先生的協助，編輯一套國文及史地課本，供戰時後方急需。因編書，他體悟：「中小學教科書的編輯需要技巧，不是任何學者都可以率爾操觚的。因為編教科書，一方面需要學識，一方面也要通教育心理，在編排取捨之間才能合用。越是低級的教科書，越難編寫。」⁴ 這段經驗與學習，開啟他編教科書的工作。抗戰末期，他應王雲五先生之邀，為商務印書館另編一套中小學教科書。可惜這套代表民間編輯的書，卻因教育部不開放民間編書，未能付梓。但這兩段珍貴的經驗，也為他往後在台灣編英文教科書埋下了種子。

抗戰時，梁先生任職國立編譯館，擔任翻譯委員會主任，暫居四川的北碚，繼續他的翻譯西洋名著工作，也給劉英士先生主編的《星期評論》寫短文。這些短文集結之後出版，就成了後來為梁先生贏得盛名的《雅舍小品》。有關雅舍的由來，首先是他將寄居的竹筋和三合土草房，取名「雅舍」：「雅舍的位置在半山腰下距馬路約七、八十層的

3. 從民國25年起，梁實秋陸續發表他的莎士比亞翻譯。總計有 Hamlet, Macbeth, King Lear, Othello, The Merchant of Venice, As You Like it, Tempest, and The Twelfth Night等八部作品，其餘到台灣後才陸續完成。

4. 見《雅舍精品》。〈回憶抗戰時期〉。頁114。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 IV

土階。前面是阡陌螺旋的稻田，後面是荒僻的榛莽未除的山坡。籬牆不固，門窗不嚴與鄰人彼此均可以互通聲息。入夜則鼠子自由行動，使人不得安枕。夏季則聚蚊成雷坵」⁵。他就在這樣的環境中：「長日無俚，寫作自遣，隨想隨寫，不拘篇章，冠以《雅舍小品》四字」。這是雅舍小品的由來。《雅舍小品》雖然在大陸時已經排版好了準備出書，但因故卻等到梁先生到台灣時，才在台灣由正中書局出版。出版後，洛陽紙貴，海內外佳評不斷，迄今再版五十餘次，為華文世界最暢銷的散文作品。

余光中評論梁先生的散文，他讚許說：「雅舍的筆法清俊簡潔，點到為止，文白相濟，放而能收，引證則中外兼採，行文則莊諧並重，時或誇張而令人驚喜，時或含蓄而耐人尋思，乃成為五四以來有數的散文大家。」梁先生寫散文，得益於清華時期的「割愛」訓練，簡短，不說廢話。如他自己所言：「文章要深、要遠、要高，就是不要長。描寫要深刻，意想要遠大，格調要高雅，就是篇幅不一定要長」⁶。

寫雅舍小品雖帶來愉悅的經驗，但

梁先生在北碚的日子，也不盡然就是順遂如意。一來單身在外，與家人分離，生活畢竟少了團圓之樂。二來他在重慶時，接編中央日報的副刊「平明」，沒想到一篇短短的「編者的話」，卻再次為他惹來左翼文人的攻訐：「現在抗戰高於一切，有人一下筆就忘不了抗戰，我的意見稍有不同，於抗戰有關的材料，我們最為歡迎，但是與抗戰無關的材料，只要真實流暢，也是好的。不避免強把抗戰截搭上去，至於空洞的抗戰八股，那是對誰都沒有好處的。」就是這段話，被左翼文人斷章取義，批評說梁先生鼓勵人家寫「與抗戰無關」的文章。在一切為抗戰的時期，這頗具煽動的言詞，對梁先生造成了相當困擾。毛澤東甚至於點名批判他，也使他成了左翼作家的共同敵人。梁先生也曾為文辯駁：「思想不能統一，只有獨裁者及獨裁之擁護者才要求思想統一……國家統一，對外團結，也只是在大處著想，人的私下行為動態仍然各享自由。」⁷但毛澤東在延安的文藝座談會上，批評「梁先生這一類人，他們雖然在口頭上提出什麼文藝是超階級的，但是他們在實際上

5. 《梁實秋先生紀念文集：秋之頌》。頁352。

6. 《梁實秋先生紀念文集：秋之頌》。頁354-355。

7. 《雅舍精品》。〈副刊與我〉。頁86。

是主張資產階級的文藝，反對無產階級的文藝的」。⁸這一番論定，把梁先生在中國打成反革命份子，使梁先生的文藝創作，長久以來，在中國受到貶抑。但隨改革開放，梁先生才慢慢得到平反。

1945年，日本投降。梁先生回北京，與父母相聚，並任北京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後因國共大戰加劇，北平情勢日亟，梁先生再度離開北平，飛廣州，應聘到廣東中山大學任教。1949年，教育部長杭立武在台北復設國立編譯館，邀梁先生參與籌畫工作，於是年6月底渡海來台，展開另一段人生旅程。

貳、台灣時期的生活

渡海來台，是梁先生生命最重要的轉折。一則他躲過了文革那段全中國人都不堪回首的歲月。他早年的文友，如老舍等人，都躲不過這段浩劫。二則台灣提供他一段長期安定的日子，一個舞台，使他得以發揮長才，延續志業，在台灣的文壇與杏壇，大放光彩。梁先生渡海來台時，48歲，時值盛年，創作力旺盛，閱歷豐富。他正需要一段安靜的日子，來沈澱自己，並重新出發，貢獻社會。他在台北過世時，享壽86。換



1959年梁先生於安東街新居的書房。
資料：(師大圖書館提供)

言之，除短暫居留美國西雅圖外，他在台灣近40年的歲月，持續作育英才，翻譯創作，特別是他在英語文教育上的著力與創舉，更是深深影響了台灣英語文教育的發展。如果把梁先生的生命，分兩段來看，他在大陸時期，深耕文學批評與散文創作，編輯文學刊物，掀起文學論戰，是一號風雲人物。在台灣時期，潛心教育與翻譯，則再創另一波生命的高峰。

目前有關梁先生的成就之討論，大抵側重他在文學創作與翻譯上的成就。反而是他在台灣師大服務多年，於其中的成就，討論的人較少。下面，將從這個方向，來詳述他在教育領域上的貢獻。梁先生自美返國後，先後在許多國內著名的大學，例如，南京東南大學、暨南大學、國立青島（山東）大學、北京

8. 《梁實秋先生紀念文集：秋之韻》。頁534。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 IV

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廣州中山大學等學校任教，主要講授英國文學。也曾在復旦大學、中國公學、光華大學、勞動大學、知行學院和瀋陽東北中正大學兼課。教學經驗豐富，教育學生無數。國民政府轉進到台灣後，1949年6月，他首先在台北的德惠街大同公司董事長林廷生提供的日式平房落腳。他先代理國立編譯館館長，同時在大同職校兼課。同年應當時台灣省立師範學院校長劉真邀請，擔任英語系專任教授兼系主任，開始他在台從事教育的第一步。1952年，他婉拒台大聘書，遷入雲和街11號師大職舍。1955年，師院改制為台灣師範大學，梁先生擔任文學院院長。梁先生一直在師大服務到1966年，屆滿65歲退休。他在師大凡17年，一面教學，一面擔任行政工作，一面翻譯與創作不懈，毅力驚人。知人善任的師大劉真校長在紀念梁先生的文章裡說，梁先生告訴他，他曾在國內很多著名的大學任教，可是「他不僅在台灣師大的時間最長，而且也以這一段時間精神最感愉快。」劉真校長以學校長官兼好友的立場說，在梁先生數十年的教學生涯中，他對師大

奉獻的心力最多，培育的人才也最眾。

」⁹與梁先生幾乎同時到師大服務的吳奚真教授則讚揚兩位說，「在歷任師大校長之中，劉真先生有其獨特無比的貢獻，因為他在短短幾年之中，使師大從一個地方性的普通的學院，一躍而為學術水準很高的第一流大學而在梁先生先生慘澹經營下的師大英語系，對於促成師大校譽的提升，尤其在人文學科方面地位的提升，是一個重大的因素。」¹⁰畢業於師大英語系及英語研究所的胡百華教授，總結梁先生對師大的貢獻，條列五點¹¹：

1. 建立一年級英文統一考試制度，不及格者不能畢業。
2. 編大一英文教科書，精選專業需要及英美當代之主流作品。
3. 與亞洲基金會合作，創立英語教學中心，採用新式教學法及現代設備，為全台灣中上學校英語教育建立新標準。
4. 開風氣之先，設立國語教學中心，訓練各國從事中國研究之學者，有助於60年代以來全球研究華學之熱潮。

9. 劉真。〈實秋先生不朽〉。《傳記文學》51.6。頁39。

10. 吳奚真。〈悼念實秋先生〉。《傳記文學》52.2。頁122。

11. 《梁實秋先生紀念文集：秋之頌》。頁544。

5. 接受教育部部長張曉峰建議，建立國文研究所，進一步鞏固台灣在國學研究上的地位。

胡教授受業於梁先生，他的觀察與評價，基於親身經驗，自是可信。作者本人也在英語系和英語研究所求學，也曾擔任過系所主任，對梁先生留給英語系的珍貴遺產，感受甚深。茲就上述幾點，作進一步說明。梁先生為提升大一學生的英語水準，立下的統一考試制度，一直沿用至今。現師大的一年級學生，期末還有統一考試。由授課老師聯合命題，對學生的基本水準，進行把關的工作。現在學校特別為英語科定了畢業門檻，也就是，全校同學大四畢業前，必須通過英語檢定，才能畢業。梁先生也主張，各學系的「基本英文」特別重要，一定要由最好的教授來擔任教學。

國民政府初到台灣之際，百廢待舉，教育事業幾乎仍是一片待開墾的處女地。那時期，優良適任的師資難覓。梁先生以其良好的社會關係，禮賢增聘優良教師到師大英語系服務。他得劉真校長的信任與授權，廣增才，但不浮濫。有一次，他聘了兩位清華留美的舊識來任教，但是發現他們教基本英文，未盡

心盡力，作業未批，上課談與教學無關的言論，乃不怕得罪人，將他們辭退¹²。因此在梁先生主持系務的時候，英語系人才濟濟，名師輩出，學生受益，學習效果也益發顯現。

民國40年代，因經濟困頓，台灣的出版事業發展緩慢。有關外文的教科書，取得困難。師生普遍缺乏適當的原文書，來進行學習。梁先生在大陸時，有過編輯教科書的經驗，於是召集系上同仁，著手編輯大一英文，供全校同學使用。這套書本，幾經修訂增補，一直沿用到80年代，版權意識崛起才告終。我在求學階段，就非常喜歡書中精彩的選文，經常閱讀，受益良多。後來為人師，還用過這幾本書當教材。這套書真的為那個學習資源艱難的時代，提供了較



梁先生於「雅舍」所使用的打字機。
資料：(師大圖書館提供)

12. 劉真。〈實秋先生不朽〉。《傳記文學》51.6。頁40。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 IV

廉價的教材，讓學子們親近英美經典的文章，對知識的傳遞與英語文能力的提升，發揮了重大的功能。

但梁先生在教育上最重要的創舉之一，卻是與美國的「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合作，創立「英語教學中心」。中心採用根據語言學發展出的教學法，由美國密西根大學派美籍教師來教學，使用現代的視聽設備，來提升學生的英語學習效能。從1955年到1962年，一共有7屆的英語教學實驗班學生。梁先生請留學密西根大學的林瑜鏗教授主其事。梁先生有識人之明，英語中心在林教授的主持下，成績斐然，替國家培養眾多人才。國內學界許多重要的學者，都受益於英語中心的教學，他們在國內的英語文教學與研究的領域，扮演重要的角色。這些傑出的畢業生，包括了李壬癸（中研院語言所院士，台師大傑出校友）、滕以魯（莎士比亞專家，曾任台師大英語系主任及研究所所長）、田維新（曾任考試院考試委員、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周英雄（中正大學副校長、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陳永昭（台師大英語系教授）、鄭良偉（夏威夷大學語言學教授）、孫筑瑾（美國匹次堡大學教授）、曹逢甫（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姚崇昆（

文化大學文學院院長）、傅建中（中國時報駐美特派員）等人。

梁先生設立英語中心的第二年，聘了陳須姬當助教，協助林瑜鏗教授處理中心行政業務，兼看圖書館。根據陳須姬教授的回憶，英語中心的教學，採用美國提供的原文教科書。書本要代代傳承使用，所以嚴禁在書本上寫字作記號。教師來源，國外和國內的外籍人士居多，例如當時在天主教耕莘文學院服務的 Father Demers, Father Mibach, Father John J. Deeney 等人，也來協助。另外也聘任國內傑出的學者來任教，如李方桂、陸孝棟、余光中、傅一勤等人。由美國聘來的外籍教師有 Thompson, Gibson, Jason B. Alter 等多人。這些老師都是一時之選，他們在林教授的領導下，熱心投入英語中心的教學工作。

英語教學中心的教學，採用全英語上課，這些課程包括「世界史」(World History)、「社會學」(Sociology)、「教育哲學」(Philosophy of Education)等，全部採用英語授課。這在那個英語教學剛起步的階段，是個破天荒的創舉。這些接受全英語授課訓練的學生，個個英文聽說讀寫能力紮實，尤其是口語表達流利，這在當時的環境是很不容易的事。後來這些口語訓練的課程，也正

式納入英語系的課程。這些學生畢業後，到全省各地的中學去教書，把英語學習的熱情，散播到台灣各地，造福了更多的年輕學生。梁先生引進外來資源，創新行政，設立新的學習方式，以今日觀點來看，仍是具有遠見、了不起的創舉。

1956年，梁先生繼續創立另一影響更加深遠的教學單位「國語教學中心」。梁先生受過中西文化的薰陶，與同時代的人相比，具有相當的國際觀，瞭解東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他先與康乃爾大學合作辦理「國語教學中心」，後由師大自己辦理。這個訓練中心，專門協助外國人來台灣學習中文。在大陸改革開放之前的年代，國語中心扮演了延續正統中華文化的角色，所有想要學習中國文字的人，都要來這裡進修。半世紀來，該中心培養熟悉中文的外籍人士，從政界到商業，從學界到外交領域，不計其數。這些人在各自的領域裡，扮演著中國通的角色。國語中心現有校友總數達四萬餘人。這些人當中包含了諸多英美涉及中國事物的高官，現任的澳洲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和日本前首相橋本龍太郎，也在其中。甚至於當紅的「海角七號」電影女主角日本美女田中千繪，也是國語中心的校友。

梁先生初設國語中心時，只有12名學生。但歷經王壽康、張在賢、吳雪曼、吳奚真、李振清、羅清哲、何慧玲、戴維揚、鄧守信、周中天等人的戮力經營，現已經成了國際著名、全球最大、也是最重要的華文學習機構。現每一季（三個月）都有1500名左右的學生，遠渡重洋，來台學習華文。換言之，每年都有6000人次左右，在台灣學習正統的中國文字與文化。這些人帶來了中西文化交流，增進台灣的國際化，而他們回到各自工作的領域時，又扮演了中華文化的傳播者。他們協助台灣以不同的方式，和國際社群連接。這個中心的國家性價值，不是用金錢所能衡量的。

國語中心創立初期，梁先生即主張採小班教學的政策。現在的國語中心延續這個傳統，繼續以最現代、有效的學習方式，教導正體中國文字。雖然現在全球各地有許多中國支助設立的「孔子學院」，教導簡體中文。但台師大國語中心，依然守護傳統正體中文的香火，為華人的文化傳承而努力。和平東路上的師大國語中心校區，是全台灣外國人密度最高的地方。國語中心的圖書館，取名「實秋軒」，就是用來紀念梁先生設立該中心的遠見與貢獻。國語中心是梁先生留給台灣師大和整個台灣最重要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 IV

的文化資產之一。

同是1956年，梁先生在教育行政上又有另一項重要的創舉。他在該年任師大文學院院長時，籌設了台灣第一個國文研究所及英語研究所。40年代，台灣的學術研究風氣未開，這兩個研究所的設立，對提升中文和外文的研究，扮演重要的角色。師大國文研究所，培養國學研究的高級人才，例如曾任教於夏威夷大學的羅錦堂教授，即為師大國文研究所畢業的第一位國家文學博士。而梁先生更加關切的師大英語研究所，也同樣為國家培養了許多人才。英語研究所成立時，梁先生自己兼任所長，講授莎士比亞。英語研究所為台灣的高等教育，培育了相當多的人才。例如，曾在國內大學任教的邱煥堂、董昭輝、許大成、紀秋郎、林連祥、陳蒼多、張強仁、張進生、張永傳、黃美序、陳次雲、林春仲等人，在海外大學服務的梁兆兵、屈承熹、葉維廉、胡百華等。在中研院當院士的龔煌城，在聯合國當翻譯官的陳達遵（《雅舍小品》的英文譯者），也是研究所的學生。

曾獲得2005年台北陶藝獎「終生成就獎」的英語研究所第一屆學生邱煥堂教授回憶，梁先生上課時對文本的講解，非常詳細。那時候，台大還沒有研究



1956年6月12日邀請中研院胡適院長蒞師大演講「中國文學的演變」。資料：(師大圖書館提供)

所，因此常有台大的學生，也跑來旁聽梁先生的課。梁先生也透過自己的關係，延攬了名家來研究所上課。例如，當時「中國郵報」(China Post)的主編陳欽仁就來研究所教英文作文課。梁先生自己也每星期額外講授一小時的西洋文化史。沒有特別的講題，目的大抵是製造機會和學生們見面聊聊，關心他們的生活及學習。

滕以魯教授也在訪談時說，梁先生的「莎士比亞」課，對他的學術研究生涯的選擇，影響甚大。他的「英國散文選讀」課，也吸引了國文系的同學來旁聽。梁先生學問淵博紮實，在英國文學史課上，講解 Shelley, Keats, Milton, Byron，旁徵博引，讓他受益良多。陳須姬教授也說，她上梁先生的課，都搶坐第一排。她現在還保有梁先生上英詩課的講義，書頁都快散掉了，但是梁先生精闢的解說和上課的風采，仍記憶猶

新。中研院的李壬癸院士也說，梁先生講課嚴謹，困難的章節，逐行逐句解釋，引導學生進入知識的堂奧。他後來走語言研究的路，但是梁先生的散文選讀課，給他很多啟發。跟梁先生讀的培根散文，到現在仍然記憶猶新。除了上述幾項在教學與教育行政的創新措施外，梁先生在師大服務期間，還作了兩件事。這兩件事深深影響了台灣學生的英語學習。那就是，編遠東版英漢字典，和中學英語教科書。早年學習英文的管道與工具書不多，梁先生以實際行動進行

此項改進英語教學的工程。首先，他得到師大英語系同仁的相助，與遠東書局合作，出版一系列的英漢辭典，供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生們使用。80年代之前，幾乎每個學生都人手一本梁先生編的遠東英漢字典。例如，《最新實用英漢辭典》初刊於民國四十九年十二月，收字四萬左右。五十二年進行修正，增訂本以新的面貌問世。參加編輯工作的先後有屈承熹、陳達遵、戚正飛、何欣、胡百華、紀秋郎等諸位先生，協助編輯的有陳秀英、陳銘銳等，收字八萬餘。五



1981年遠東版辭典、教科書編輯群於梁先生八十大壽時合影。資料：(師大圖書館提供)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Ⅳ

十八年三月，由董昭輝、王進興任編纂、朱良箴總編輯、傅一勤總校訂，開始進行《遠東英漢大辭典》之出版工作。六十年七月，全稿完成，收字逾十六萬字，這本英漢大辭典的出版，是學英文的同學或社會人士，必備的參考用書，影響深遠。

另外梁先生也發揮他在抗戰時編書的經驗，與師大英語系的同仁，編輯遠東版的初中及高中英文課本。同樣，這些英文教科書，也是人手一冊。羅青在紀念梁先生的文集裡，就以詼諧的口吻，回味他與梁先生教科書和字典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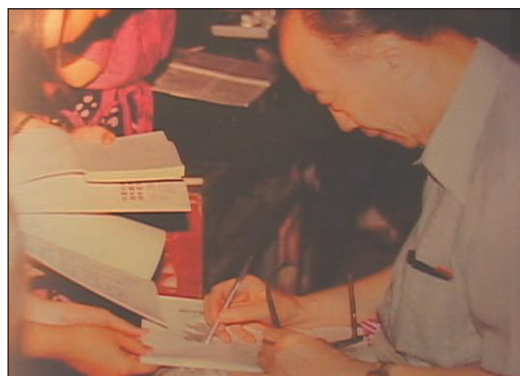
打從我念初中一年級開始，也就是民國49年，便與梁先生在英語課上結了「仇」。當時學校採用的課本是遠東版的初級英文，封面上大大的印著『梁實秋主編』五個字。放學回家，到書店去買中學適用的遠東版最新英漢字典，上面印的還是『梁實秋主編』幾個大字。就這樣，從初中念到高中，六年英文讀下來，大考小考模擬考外加專聯考，翻來覆去，每日總少不了要與『梁先生』三個字為伍……¹³。

由此可見這些字典和教科書對當時青年學子的影響有多大。

傅一勤教授回顧與梁先生共事編字典和教科書時說，這些出版品對台灣的英語教學貢獻至鉅。字典有一項特別的安排，也就是採用DJ和KK兩種音標同時標記。當時一般英語教師大都來自大陸，習慣用英國的DJ音標。來台後，美國文化對台灣影響較大，傅先生乃向梁先生建議用美式的KK音標，獲梁先生同意。但遠東書局為兼顧市場需求，採兩種並用。這個轉變，也成了台灣字典編輯的通例。KK音標也因此成了台灣英語學習上最通用的音標。¹⁴

參、退休生活，再創高潮

1966年，梁先生65歲，申請退休。在台師大服務滿17年。但他退而不休，



1966年8月梁先生於師大榮譽退休與學生簽名留影。
資料：(師大圖書館提供)

13. <我的「敵人」梁實秋先生>。《秋之頌》。頁240。

14. 杜月涵。〈專訪傅一勤教授〉。《師大校友》316期。頁17。

因為還有二件生平大事，等著他去完成。一是，莎士比亞全集的翻譯工程。二是，用中文寫一部英國文學史。梁先生從大陸時期就陸陸續續翻譯莎士比亞，後因抗戰中斷，來台後，日子總算安定下來。翻譯莎士比亞，是胡適提出的建議，是梁先生父親對他的期許，是梁先生自己的使命感，這項工作在漫長的38年之後，梁先生以無比的恆心毅力，獨力完成這個幾乎不可能的任務。莎士比亞全集37部作品外加詩三集，合計40冊，由遠東書局在1987年出版，這個劃時代的計畫，終於大功告成。

梁先生在譯完全套劇本後說，「莎士比亞先生，我從此將要和你絕交了！」這是¹⁵句玩笑話，但也是長年壓力的抒解，甩掉包袱，如釋重負，梁先生心情之愉快，可想而知。梁先生在〈漫談翻譯〉的短文裡說：

翻譯，若認真做，是苦事。逐字逐句，孜孜窮年，其中無急功近利之可圖。但是苦中亦有樂。翻譯不同創作，一篇創作完成有如自己生育一個孩子，而翻譯作品雖然不是自己親生，至少也像是收養很久的一個孩子，有如親生一般，會視如己出。翻譯又像是



1984年梁先生獲頒國家文藝獎。
資料：(師大圖書館提供)

進入一座名園，飽攬其中的奇花異木，亭榭樓閣，循著路線周遊一遭而出，耳目一新，心情怡然。總之，一篇譯作殺青，使譯者有成就感，得到滿足¹⁶。

也許就是這份成就感，驅使他在漫長的歲月裡，靜靜地孤獨地完成了這件中國翻譯史上的大事。莎士比亞是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中國人也應該有機會親炙此一傑作。梁先生的譯文信實，流暢，典雅。吳奚真教授說：「梁先生的中文譯本，將與原作同垂不朽。¹⁷」不論是專門研究文學的大學教授，或大學生，或研究生，或一般社會對西洋文學有興趣的讀者，都要感謝梁先生的辛勤付出，為我們提供一個親近、閱讀或研究這套西洋文學名著的方便之門。

15. 梁實秋。〈與莎翁絕交之後〉。《雅舍精品》。九歌出版社。頁 196。

16. 梁實秋。〈漫談翻譯〉。《雅舍精品》。九歌出版社。頁 184。

17. 吳奚真。〈悼念實秋先生〉。《傳記文學》52.2。頁 124。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 IV



1982年梁先生(左)與文建會主任委員陳奇祿，頒贈金鼎獎圖書類著作、譯者、編輯獎。攝於光華雜誌七十一年二月七卷二期。

資料：(師大圖書館提供)

一般人退休之後，總想過著閒雲野鶴般的日子。有時無所事事，反而覺得日子漫長難過。梁先生在完成莎士比亞之後，還持續寫作，幾乎年年都有出版，《秋室雜憶》、《實秋雜文》、《略談中西文化》、《實秋文存》、《雅舍小品》、《西雅圖雜記》、《看雲集》等書，為他退休後的成果。1974年，梁先生結褵近半世紀的夫人程季淑女士在美國因意外傷害不治，梁先生悲傷之餘，寫下感人肺腑的《槐園夢憶》一書。

生命無常，常在轉折處生出戲劇性的變化。正當眾人為梁先生與夫人鶼鶼情深的文字所感動之際，梁先生認識了韓清菁女士，並在眾人驚悸中，與之步上禮堂，展開他的第二段感情生活。這場轟動社會的婚禮，梁先生以智慧處理，勇敢追求餘生的幸福。新的生活給予梁先生再生的喜悅，因此也激發他的雄

心開始認真思考，在有生之年，要把自己40年來講授英國文學的心得，用中文撰寫一本英國文學史。梁先生說到做到，他總共花了七年時光，在78歲高齡的時候，完成了約一百萬字的《英國文學史》和約120萬字的《英國文學選》。這份毅力，足堪為所有讀書人的表率。但兩部書一直等到1985年才修改、校對完畢，交由協志工業叢書出版。這兩部書也同樣造福無數英、外文系的同學，《英國文學史》是外文系必修的課程，也是研究所考試的重要科目。這兩部書提供了同學們自習時的最佳參考。此外，對想要瞭解英國文學的一般讀者，或中文系的同學，這兩部書也扮演了重要的參考角色。

國共相爭，海峽相隔，親人分兩地，不得聚首，是梁先生這一代人的悲哀。梁先生在台的門生故舊，就等於是親人。梁先生在台的門生，每年大年初一都會邀約同去向梁先生拜年。陳秀英教授因為受梁先生賞識，擔任英語系助教，參與遠東字典的編輯工作而與梁先生建立深厚的師生情誼。兩家人互相關懷，一同過年過節，倒可稍解親友失散之痛。1980年，兩岸政治氣氛稍懈，79歲的老人終於見到闊別31年滯留在大陸的兒子，涕淚縱橫。1982年，再與分別34

年的女兒見面，同樣是涕淚縱橫。1984年，他獲國家文藝貢獻獎。1986年，獲中國時報文學特別貢獻獎。1987年，因心臟不適入院治療，後不治。梁先生一身殊榮，走完他人生最後的旅程，留下許多後人值得學習的風範。

肆、教育風範

梁先生是大時代的風雲人物。年輕時，好議論，以寫文學批評出名。他堅持自己的文學信仰，具有說實話的勇氣。因此才會與左翼作家發生論戰。這些理念的衝撞，也造成他長期被中共刻意貶抑。抗戰時期，他開始撰寫《雅舍小品》，引起廣大迴響，也奠定他作為民國以來散文大家的地位。他的散文創作，持續不斷，到台灣後，仍繼續出版。1986年還出了《雅舍小品》第四集。吳奚真教授說的好：「雅舍小品的文字簡潔有力，雖然自成一格，別人也並非完全不能模仿，但是，沒有梁先生那樣的見解、學識、智慧、修養、胸襟、幽默感，以及對人性和世事的透闢了解，是寫不出雅舍小品那樣的文章」，文學家朱光潛寫給梁先生的信就說「大作雅

舍小品對於文學的貢獻在翻譯莎士比亞的工作之上」¹⁸。

除了在文壇筆耕，開創一片天之外，其實梁先生前前後後在許多國內重要大學服務，凡40年。這段悠長的歲月，他堅持在教育界服務，自有他一貫的信念。他早年在瀋陽東北大學兼課時，親眼見到接收東北的貪官百態，不屑與之為伍，因此有陳祖文教授所說的「逃堯」心理¹⁹。梁先生在接受丘彥明訪問時說：

政治與做官不同，政治是學問，做官是職業。對於政治，我有興趣，喜歡議論。我嚮往民主，可是不喜歡群眾暴行；我崇拜英雄，可是不喜歡專制獨裁；我酷愛自由，可是不喜歡違法亂紀。至於做官，自慚不是那塊料子。要我為官，大概用不了一年，我會急死，我會悶死，我會氣死。所以我雖不能忘情於政治，也只是偶然寫寫文章，撰些社論而已。迨抗戰軍興，需要舉國一致外禦其辱，誰還有心批評政治？好不容易抗戰勝利結束，大亂又起，避地海外，萬念俱灰。無補大局，寧願三緘其口²⁰。

梁先生有很多做官發達的機會，但他並不熱衷於此道。他評論朋友從政為

18. 吳奚真。〈悼念實秋先生〉。《傳記文學》52.2。頁124。

19. 《梁實秋先生紀念文集：秋之頌》。頁235。

20. 《梁實秋先生紀念文集：秋之頌》。頁414。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 IV

「誤入仕途」，由此可見他的基本態度。這種心理轉折，讓其投入更多的心力於教育事業。他在台灣大半輩子，前17年在台灣師大教育體制內服務，退休後，也以不同的形式，繼續他的教育服務。一輩子獻身教育，梁先生作育英才，有熱情的投入，也有相當的成果。以下我想從幾個不同的角度來彰顯梁先生在教育場域上的表現與風範。

(一) 教學投入，著述不斷

梁先生走避官場，認為自己在教育的領域比較適性適任。他對教學相當投入，也能在教學的過程裡，自我成長。他在接受胡有瑞訪問時說：「上課前，功課如不作準備，講書便缺乏把握，不能講得頭頭是道，不但對不起學生，也對不起自己。我教的課程幾乎經常每年變動，每門課如是選讀性質則亦經常變換，我這樣做的主要動機是訓練我自己，強迫擴大自己讀書的範圍」²¹。有著這樣的教育認知，梁先生作為師大英語系與英語研究所的領航人，自然也影響這個系的研究與學習風氣。梁先生延聘優良師資，進行課程改革，為早期的英語文教育培育人才，奠立良好基礎。尤其是當時台灣師大肩負培育中學師資的

使命，因此師大英語系及英語中心培育出來的同學，大都到中學去任教，這一批受過良好英語文訓練的同學，為當時中學的英語師資，投入一股新的正向力量。除了教書外，梁先生也擅長編、寫、譯。他在大陸時期，編輯過很多的文學刊物。來台後，他的編輯轉到中學英語教科書和英漢字典。這兩項工作，學術性較低，但是影響力相對卻很高。在那個缺乏適當英語教科書的年代，他編的遠東英語課本，人手一冊，對英語學習的影響力，令人無法忽視。梁先生學養豐富，專治英國文學，但是卻願意為英語文教育的普及化，投入心力，也是令人佩服。

學習英文，需要良好的工具書。早年的台灣，百廢待舉，學英文的管道不多，想要自學，最需要的就是要有一本好的字典。梁先生看到這個需求，但在忙碌的教學研究與行政工作外，仍願意投入字典編撰的工作，為廣大的學生與社會人士提供服務，這除了遠見外，還有書生服務社會的責任感在內。

梁先生長於翻譯，眾人皆知。但他的翻譯，不是隨性，而是有計畫去完成整套莎士比亞戲劇的翻譯，從年輕一直

21. 《梁實秋先生紀念文集：秋之頌》。頁344。

到退休後，孜孜不倦，不斷耕耘。這樣的執著、恆心、毅力，才是令人欽佩感動的地方，也是最好的教育示範。

(二) 提攜後進，照顧學生

梁先生嘗言：「生平無所好，唯好交友，好讀書，好議論。」²²讀書的事，眾人皆知。議論時事，來台後，就不彈此調。他在文壇與杏壇，朋友多。除了與同輩的人交往，他也提攜後輩。梁先生在台灣師大任教，詩人余光中，不是師大的學生，但與梁先生有深交，且受梁先生提攜，在師大兼課。梁先生以其良好的關係，送他到美國愛我華大學進修²³。詩人羅青也受梁先生照顧。在台北時，他受余光中的引見，熟識梁先生，常有機會受教。梁先生欣賞後輩年輕人的才情，不忌才，反送書鼓勵，成為佳話²⁴。劉真校長也回憶說，當年有師大理工學院的年輕教師出國進修，缺少保證金。梁先生也義不容辭，動用個人與胡適先生的交情，促成年輕人進修的願望²⁵。梁先生看人才，沒有學校、課系、學門的門戶之見，只要是人才，都值得培養。這是梁先生寬闊的視野與胸襟，非我等一般庸俗之輩所能及。

梁先生對學生的照顧，也是不遺餘力。邱煥堂教授回憶說，當年他從台大畢業考上全台唯一的英語研究所，因家境清苦，住宿無著，煩惱不已。梁先生得知之後，親自帶他到校長室找劉真校長協助解決，邱教授受寵若驚，感動不已。台師大英語系退休的滕以魯教授也回憶說，有一次，一位學生犯錯，教官堅持要懲罰學生，將他逐出校門。梁先生在學生獎懲會上發言，力主學生就是要接受教育，要學習。梁先生站在教育的觀點看事情，給學生從錯誤中學習的機會。不以高壓的手段，對待學生。他的教育心，贏得了大家的敬重。

(三) 重視人品道德，主張文人有行

梁先生自幼接受傳統中國儒家思想，後雖入清華，也出國唸書，接受西式教育，但是並不崇洋媚外，而忘了傳統價值。梁錫華先生在〈實秋滿林〉的紀念文章中說：他特別推崇梁先生的「文人有行」主張。文人可以感情充沛，但仍必須謹守道德分際。不可假名士浪漫，而縱情酒色，或藉文學文化之名，鑽權營利。梁先生在《偏見集》中說：「做文人需先從做人起，不必先從無行做

22. 《梁實秋先生紀念文集：秋之頌》。頁 372。

23. 《梁實秋先生紀念文集：秋之頌》。頁 214。

24. 《梁實秋先生紀念文集：秋之頌》。頁 243-244。

25. 劉真。〈從五件小事看實秋的為人〉。中華日報。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 IV

起。『文人無行』是一件急需補救的事實；『文人有行』才是文人所應有的理想。…我們批評文學，採取文學的標準，我們批評文人的行，只能採取唯一的德行標準」。梁先生重視人品操守，胸襟氣度自然也跟著高闊。他正直守法，不佔公家便宜。他65歲時，屆齡退休。該退就退，不拖延。他把職舍交回給學校，但不像一般人要求補償金。不該得的就不要拿，不作無理要求，留得一身好名。

梁先生行事，奉行道德的最高準則。他對一個人人品的重視超過他的能力。與梁教授淵源頗深的陳秀英教授談到她與梁先生編遠東字典時的一些回憶。她說：梁先生工作態度嚴謹，交稿準時。有一回，陳教授受命尋找字典的校對人員。梁先生只交代：「你找人要注意一件事，英文能力固然

重要，人品更重要，能力差一點可以訓練，人品不行，你會很麻煩。」²⁶ 這種本於道德人世的智慧，洞察人性，誠真知灼見！

梁先生處事，文不飾過，就事論事，勇於認錯。傅一勤教授在訪問稿裡說：梁先生在主持大專聯考英語閱卷的時候，有一回有一題英文答案有爭議。地位崇高的梁先生審視題目瑕疵，選擇公開認錯道歉給分。他不因個人面子問題，而迂迴逃避問題。這種面對問題的勇氣，也不是一般人都有。



梁先生(左二)自謙棋藝不如人，1985年12月沈君山(左)先生訪梁府與梁先生之子梁文騏(右)先生對弈。

資料：(師大圖書館提供)

26. 陳秀英。〈給梁老師的一封信〉。《青年日報》。1987/11/18



2001年1月8日師大國語教學中心成立45週年，該中心圖書室「實秋軒」啟用，以紀念梁實秋教授創立國語教學中心。「實秋軒」匾額題字者羅青哲教授(左一)、台師大前校長劉真先生(左三)、九歌出版社蔡文甫先生(右三)、第一任國語中心主任王壽康教授之公子王正方先生(右一)等人合影留念。資料：(師大圖書館提供)

(四) 為人幽默謙和，長於行政創新

梁先生的散文，平淡中見真情，嚴肅中見幽默機智。他的文筆洗鍊，融合學問知識與人生智慧於一體。人如其文，梁先生人情練達，謙謙君子，接近他或上他的課，都有如沐春風的感覺。邱煥堂、滕以魯、田維新、李壬癸等人回憶梁先生上課時的情形，都印象深刻。梁先生言詞頗富機鋒，常引經據典，講授英國文學，但常引中文裡的相對應文章，來進一步比較中西異同，非常具有

啟示性。

梁先生的幽默感是有名的。邱煥堂回憶說：有一年，梁先生從香港帶了幾隻大甲蟹回台灣。海關人員檢查時，梁先生說這些螃蟹是來台灣投奔自由的。海關人員會心一笑，就讓他過關了。他不僅飽讀詩書，人情練達。邱煥堂說，有一次，有人送梁先生一條火腿。梁先生因健康關係，不適合吃火腿。他把火腿掛在門口吹風晾乾。第二天，早上晨起散步，「很高興」，發現火腿不見了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 IV

。他收了火腿，也把火腿送了出去。他的處置兼顧送的人、自己的需求、還有需要火腿的人。這是他俗世的幽默與智慧。

梁先生抽煙斗。曾任荷蘭萊頓大學副校長的梁兆兵教授當過梁先生的助教。他回憶說：梁先生擔任文學院院長時，他當助教，辦公桌就在梁先

生的院長辦公室外頭。梁先生上班，一定會經過他的辦公桌。他是個窮助教，只抽得起「新樂園」的廉價香菸。梁先生每次經過助教位置時，都覺得「新樂園」煙味不好聞。大梁就告訴小梁，以後上班可以抽他的煙絲，下班後，他就不管了。這是梁式幽默，給人暖暖的溫情。

梁先生主持英語系務，同仁們與學生們在他的領導下，一團和氣，少有爭執，偶有意見不同，他也都能秉公處理，贏得敬重。梁先生善於營造同仁們之間的凝聚力，他常安排郊遊活動，或在



2007年師大61週年校慶，圖書館推出畫壇大師陳景容與文壇大師梁實秋特展，向文學大師、也是臺師大前文學院院長梁先生致敬。

資料：(莊坤良先生提供)

當時的系館旁辦理外燴，聯絡同仁感情。這樣軟性的安排，營造一家人的感覺，其實對系務的推動，有所幫助。梁先生創立的這個郊遊傳統，一直在英語系延續著，扮演著聯絡同仁感情的重要管道。

梁先生的生日在臘八，因此早年英語系的同仁都會在這天替梁先生慶生。這個活動倒成了英語系的一個盛會與傳統。梁先生七十大壽與八十大壽時，更是學生文友雲集，眾人同聲道賀，誠當時杏壇與文壇之盛事。梁先生和當時許多同仁，都是由大陸來台。離鄉背井，

因此視同仁為親人，特別重視人情。梁先生儼然是這個大家庭的家長，對大家的善意溫情，也以厚道待之。滕以魯回憶說，他當時在系上當助教，也參加聚會。大家請梁先生吃飯，但是他回贈給大家派克鋼筆，價值超過大家的花費。

梁先生的為人如此，難怪大家敬重他。他在士林服務，除了自己的為學與做人堪為榜樣外，他也具有行政幹才。劉真校長與他有相知相惜的友誼，特別讚賞他的學識與能力。梁先生在劉校長的支持下，於擔任英語系主任，英語研究所所長與文學院院長的行政職務期間，投入學術的奠基工作，協助師大建立良好的發展基礎。尤其他具有遠見，設立的英語教學中心，引進現代的教學方法，培育無數人才。國語教學中心的設立，更是預見國際文化交流的重要。這個中心培育許多了解中華文化語言的外籍人士，更是台灣在進行國際文化及外交等交流時的重要資源。

伍、後記：師大大師

1987年11月3日早上8點20分，梁先生因心臟不適入院，經急救後在台北市的中心診所過世，享年86。梁先生風光光走完他精彩絕倫的一生，留給後代世人一個文人、學者、與教育家的典

範。梁先生走了，但是大家並沒有遺忘他。中華日報和九歌出版社為紀念他，每年都舉辦「梁實秋文學獎」，發掘文學創作與翻譯的人才。現已舉辦過21屆，每年都吸引許多人參加，培養藝文人才無數。這是梁先生精神的延續。遠東圖書公司也成立「梁實秋獎學金委員會」，獎勵青年學子向學。

學術界的朋友也沒有遺忘他。2002年，在台灣師大圖書館舉行了紀念梁先生百歲誕辰的學術研討會，並出版了《雅舍的春華秋實—梁先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師大圖書館配合研討會，也策劃「梁實秋先生百歲誕辰紀念特展」，展出梁先生的手稿、書畫、出版品、他與名人間來往的書信、他使用的打字機等文物，供後人憑弔與研究。現在台師大圖書館也在二樓闢專區，長期展出這些文物。

有鑒於梁先生之於師大的重要貢獻，台師大把梁先生尊為大師，他是師大口號「師大大師」的兩位代表人物之一。從台師大校門進來，行政大樓中庭兩側，擺了兩幅大看板照片。一邊是美術系的國畫大師溥心畬，一邊是梁先生的大照片。這兩位先生代表師大在人文藝術上的傳統與驕傲。同時台師大校方也呼應眾多校友的心聲，已在雲和街10號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 IV

的舊址，籌建梁先生紀念館。這個籌建工程已經啟動，不久的將來就會有一個類似藝文中心的建物，用來陳列梁先生的文物，並舉辦相關的藝文活動。

梁先生走了，但是他的精神長存，典型在夙昔，他依然與我們同在。

參考書目

- 吳奚真（1988）。〈悼念實秋先生〉。
《傳記文學》52卷第2期。
- 劉真（1987）。〈實秋先生不朽〉。
《傳記文學》51卷第6期。
- 劉真（1987）。〈相期無負平生：永懷梁先生教授〉。《中外雜誌》43卷第1期。
- 劉真（1987/11/18）。〈從五件「小事」看實秋的為人〉。中華日報。
- 陳秀英（1987/11/18）。〈給梁老師的一封信〉。青年日報。
- 陳敏珍（2003/1/30）。〈梁實秋先生百歲誕辰紀念特展紀要〉。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通訊55期。
- 劉信足（2004/6/21）。梁先生《雅舍小品》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惠文（2008/5/4）。〈雅舍裡的浪漫與古典：莎士比亞的知音—梁先生〉。人間福報。
- 宋益喬（1999）。《梁先生傳》。台南：文國書局。
- 余光中 主編（1988）。《梁實秋先生紀念文集：秋之頌》。台北：九歌出版社。
- 李瑞騰、蔡宗陽 主編（2002）。《雅舍的春華秋實—梁先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九歌出版社。
- 劉佳宜、張采源（2003）。〈半世紀前結下的師生緣—專訪秀英教授〉。《師大校友》第316期。
- 甘能嘉、詹涵晴、邱文正（2003）。〈專訪母校圖書館梁恆正館長〉。《師大校友》第316期。
- 杜月涵（2003）。〈專訪傅一勤教授〉。《師大校友》第316期。
- 甘能嘉、詹涵晴、邱文正（2003）。〈專訪九歌出版社蔡文甫社長〉。《師大校友》第316期。

梁先生著作

- 《冬夜草兒評論》（1923）。（評論）與聞一多合著。自費刊印。
- 《浪漫的與古典的》（評論集）（1927）。新月書局。
- 《罵人的藝術》（雜文集）（1927）。新月書局。
- 《文學的紀律》（評論集）（1928）。新月

書局。

《偏見集》(評論集)(1934)。正中。

《約翰孫》(評論)(1934)。商務。

《文藝批評論》(1941)。中華書局。

《雅舍小品》(散文集)(1949)。正中書局。

《實秋自選集》(1954)。勝利書局。

《談徐志摩》(散文)(1958)。遠東書局。

《梁先生選集》(1961)。新陸出版社。

《清華八年》(散文)(1962)。重光文藝出版社。

《秋室雜文》(1963)。文星。

《文學因緣》(散文)(1964)。文星。

《談聞一多》(散文)(1967)。傳記文學。

《秋室雜憶》(散文)(1969)。傳記文學。

《略談中西文化》(1970)。進學書局。

《實秋雜文》(1970)。仙人掌。

《關於魯迅》(1970)。愛眉出版社。

《實秋文存》(1971)。藍燈。

《西雅圖雜記》(散文)(1972)。遠東書局。

《雅舍小品續集》(1973)。正中書局。

《看雲集》(散文)(1974)。志文。

《槐園夢憶》(散文)(1974)。遠東。

《梁先生自選集》(1975)。黎明。

《梁先生論文學》(1978)。時報。

《梁先生札記》(1978)。時報。

《白貓王子及其他》(散文)(1980)。九

歌出版社。

《雅舍小品》(3、4集)(1982—1986)。

正中書局。

《雅舍雜文》(1983)。正中書局。

《雅舍談吃》(散文集)(1986)。九歌出版社。

《英國文學史》(1985)。協志工業叢書出版公司。

《英國文學選》(1985)。協志工業叢書出版公司。

翻譯書目

《阿伯拉與哀綠綺斯的情書》(散文集)英國密爾頓著(1928)。新月。

《結婚集》(短篇小說集)瑞典斯特林堡著(1930)。中華。

《潘彼得》(小說)英國巴利著(1930)。商務。

《西塞羅文錄》羅馬西塞羅著(1933)。商務。

《職工馬南傳》(長篇小說)英國哀里奧特著(1932)。商務。

《威尼斯商人》(劇本)英國莎士比亞著(1936)。商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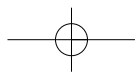
《奧賽羅》(劇本)英國莎士比亞著(1936)。商務。

《哈孟雷特》(劇本)英國莎士比亞著(1936)。商務。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Ⅳ

- 《暴風雨》(劇本) 英國莎士比亞著
(1937)。商務。
- 《吉爾菲先生之情史》(1944)。黃河書局。
- 《情史》英國喬治·艾略特著(1945)。重慶黃河出版社。
- 《咆哮山莊》(長篇小說) 英國 E. 勃朗特著(1955)。商務。
- 《百獸圖》英國奧威爾著(1956)。正中書局。
- 《莎士比亞戲劇集20種》(1967)。文星。
- 《雅舍譯叢》(詩文集)(1985)。皇冠。
- 《莎士比亞全集》(戲劇37集、詩3集)(1986)。遠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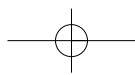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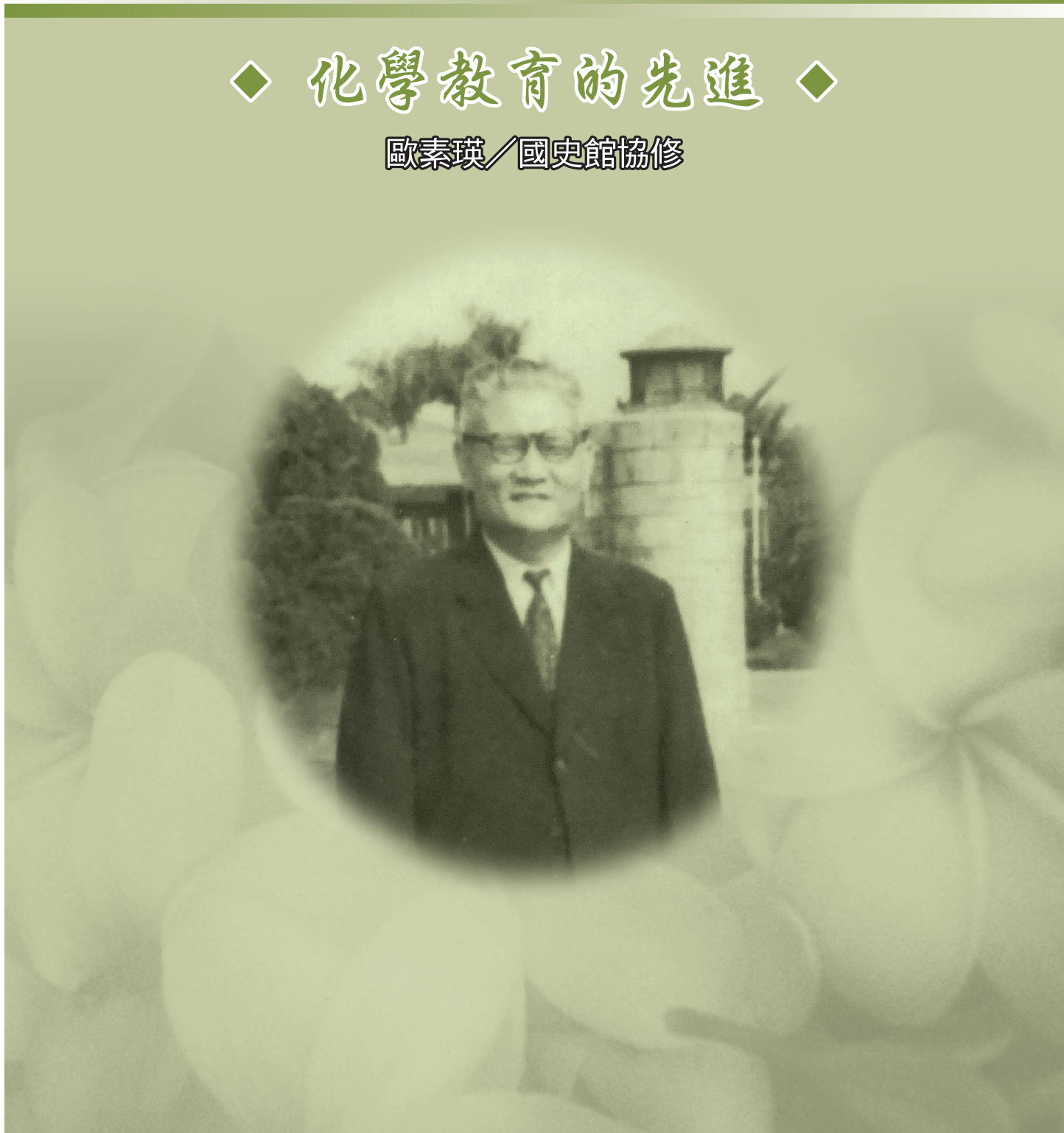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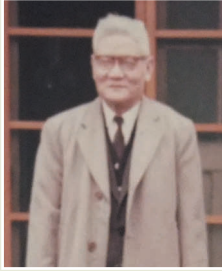
潘 貫

1907~1974

◆ 化學教育的先進 ◆

歐素瑛 / 國史館協修





潘貫，字凌雲，1907年5月29日生於台南。台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化學科畢業後，曾任教於台南高等工業學校，戰後轉任台灣大學教授，作育英才無數。其畢生致力於拉曼光譜、電化學、放射化學及分析化學之研究，開啟了台灣放射化學研究，對科學教育之發展亦甚為熱心。1958年更膺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潘教授亦能詩文，多年來常以詩明志，吟詠述懷。1974年9月2日，因肝癌病逝台北，享年68歲。著有《定性化學分析》、《理論化學》二書及相關論文六十四篇，對化學研究者提供寶貴研究資料及科學新知識，貢獻匪淺。

壹、出身府城，研習化學

潘貫，字凌雲，1907年5月29日生於台南。祖父金富公（1818-1874），為前清武科秀才，於1849年隨軍來台。父親子聯公（1861-1936）藝通文武，於1886年武科秀才後，曾掌糧房，日治以後在鄉里執業為醫，以眼科聞名於台南。子聯公因不願其子受異族教育，遇公學校教員前來勸誘入學時，即將潘貫藏起來，避不見面，故潘貫幼時在家塾研讀漢文，至1919年，十三歲時才進入台南長老教會中學附屬小學接受新式教育。之後，因附屬小學廢校而轉入台南州立第二公學校就讀。1923年，考入台南州立第二中學。期間，曾作五言絕句「夜讀」一首，謂：「秦火威雖炎，猶存壁內經。夜來勤苦讀，恐怕有人聽。」對日人疑忌台人讀中文、禁止中文書刊進口

一事，頗感到氣憤不已。

1927年，潘貫獲保送進入台北高等學校理科，首度離家北上求學，曾作「初離台南，入台北高等學校肄業」一首，謂：「二十年來出岷城，倚門白髮故鄉情。為興宗國求科學，不羨榮華不羨名」，甚早即立定「為興宗國求科學」之志向。1930年3月高等學校畢業時，因數學成績特優，獲頒「師範學校及中學校數學教員文憑」，並進入台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院化學科就讀，開始其研究化學之興趣。當時台人子弟以就讀醫學、法律者較多，工、農學科者較少，讀純化學者尚無前例，潘貫為日治時期少數研習化學之台灣青年。

1928年3月，台北帝國大學創設時，初設文政學部和理農學部。其中，理農學部以研究自然科學、開發台灣之熱

帶、亞熱帶農業為目的，計分為生物、化學、農學、農藝化學四科。化學科設有理論及無機化學講座、有機化學講座及物理學三講座。有機化學講座由加福均三教授主持，下有助教授野副鐵男及學生林耀堂、劉盛烈等；理論及無機化學講座由松野吉松主持，下有助教授中塚佑一及學生潘貫等。化學科每年僅招收學生五名，因學生人數少，師生間之關係頗為密切，且該科之研究風氣甚為濃厚，諸如有機化合物之拉曼光譜之研究、重金屬元素之無機錯鹽、複鹽之研究、表面張力與化學構造之關係研究、溫泉水之成分研究、台灣檜之成分研究

、皂苷及其配體之構造研究、羊毛脂之成分研究、哺乳動物皮脂之研究、南方石油成分分析、南方橡皮樹汁之研究等，均獲致頗佳研究成果。

潘貫入學後，即追隨理論及無機化學講座松野吉松教授從事有機化合物之拉曼光譜研究。松野吉松教授原任教於東京帝國大學化學研究所，來台後研究有機化合物的拉曼光譜。

1928年，印度物理學家拉曼（C. D. Raman, 1888-1970）發現一定波長的單色光若照射到純粹分子時就會分散，並放射出另一波長不同的新光線，原來的照射光和新生光的波長有變化，這種變

化又與分子的旋轉及振動有關，這種現象即稱為「拉曼效應（Raman Effect）」。這對當時的科學界而言，是極為新鮮之事，可說開啟了物理化學全新的研究領域，不但帶動了光學儀器的研發，且被運用於測定各種物質的物理化學特



1937年台大化學科部份師生在二號館(現稱物理館)門口留影。前排由左：中塚教授(有機化學)、仁田教授(來訪之阪大物理化學者)、松野教授(理論化學)、野副教授(有機化學)。最後排由左：立入助手、潘貫研究生、劉盛烈學生等。資料：(《從帝大到台大》劉盛烈教授提供)



1932年，潘貫完成自製拉曼光譜測定儀器，曾有詩「暗室」一首，謂：「世人地獄我天堂，暗室雙重紫外光。莫笑荒唐科學子，文明今旦陰陽。」
資料：(潘永興先生捐贈，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性。拉曼光譜為當時新興之研究課題，發現此現象的印度物理學家拉曼因而獲得1930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這年潘貫正好進入台北帝國大學就讀，對他產生極大的激勵和啟發。據台灣大學化學系退休教授劉盛烈指出，由於諾貝爾獎向來由西方白人得獎，拉曼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獎的東方人，證實學問無國境，所以潘貫希望在這方面努力以赴，為人類開拓新知識；惟松野吉松教授因身體不佳，且對新興的拉曼光譜學經驗亦不多，於是潘貫乃終日埋首研究室中，從合成各種化合物，到裝置光源、拍攝照片，皆其一人獨力為之。在經過摸索、學習及測驗出多種有機化合物的拉曼效應後，得到了頗佳的成果。

1932年，潘貫完成自製拉曼光譜測定儀器，曾有詩「暗室」一首，謂：「

世人地獄我天堂，暗室雙重紫外光。」1933年3月，即以「拉曼效應」為題，完成畢業論文，獲理學士。4月1日，進入同校大學院（研究所），為大學院特選給費生，由日本文部省科學委員會每月給獎學金六十圓，進行拉曼光譜之研究。當年大學院僅有三名學生，潘貫即為其中之一，顯見其確為當時台籍青年之菁英。

1933年至1937年間，潘貫先後與指導教授松野先生聯名發表論文八篇。其中七篇是與指導教授並列作者，1936年的第七篇由潘貫獨自具名，是為其申請博士學位之用。其論文中報告了多種有機化合物特定官能基之拉曼光譜數據，並試圖藉此解決一些化學結構上的問題，對早期的有機化合物拉曼光譜研究頗具參考價值。以潘貫這些成就，理應會成為台灣第一位理學博士才是，惜因其指導教授松野先生因病退休返日，其博士論文之審查因而擱置。至戰後才由日本東北大學授予博士學位，與台灣第一位理學博士之榮銜擦身而過。

研究生時代，潘貫住在大學正門前靠近水源地附近一家學生戲稱為「帝大Hotel」的公寓。當時台北的馬路多已舖上柏油，但台北帝國大學位於台北市郊外的富田町，水田多，馬路並未舖柏

油，下雨時，往新店的車輛將馬路壓成泥田，從「帝大 Hotel」走到台北帝國大學研究室，雖然只有幾百公尺，但走起來皮鞋的鞋底、鞋面都會沾上泥漿，一到研究室門口必需先刷洗一番，才放心進入大樓。當時工友每天會送一大壺的熱茶到各研究室，潘貫經常喝完一大壺之後，將空壺帶到樓下的工友室，裝滿第二壺，取回飲用，可見他頗喜歡喝茶。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潘貫因幼承庭訓，熟讀中國詩書，一向忠愛邦國，認為中華民族若能復興、強盛，台灣人所遭遇到的不平等對待即可解除。其幼年時，曾由塾師教說北方官話，就讀台北帝國大學期間仍常讀古文，吟詩抒懷，並曾與有機化學講座台籍學生劉盛烈等同讀漢文。不僅如此，他們亦極關心當時中國政局，每當日本人大肆慶祝占領上海、北京、南京、漢口等城市時，大家還曾多次背著日本人偷偷地感傷落淚。

1933年舊曆11月24日，潘貫和林雪治女士（1913-1995）結婚，但將妻子留在台南照顧雙親。1936年，父親子聯公過世。1937年尚未獲得博士學位，潘貫即返回台南照料家務，與妻子同侍年邁的母親，事母至孝。三年後，1940年

，潘貫執教於台灣總督府台南高等工業學校（今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化工系）應用化學科，一年後，轉任電氣化學科，講授物理化學、無機化學及礦物學等課程，前後約六年。當時能進入該校任教的台籍教師甚少，僅林茂生、顏水龍、賴再得、陳發清及潘貫等數人，可謂為台人知識精英。

潘貫上課時之講義內容頗為艱深，且速度又快，因此不能粗心聽課，其學生林耿清即回憶指出：「他教我們礦物學，他的課就不像林茂生老師那樣輕鬆愉快了，他教的速度又快，內容又深，使我們在上課中從頭到尾感覺到新奇和緊張，考試一到，大家都不得不用功溫習，以免考試不及格。他是位使人尊敬的老師。」另外，曾就讀台南高工的台灣大學化學系名譽教授許東明亦曾說：「潘先生講課，比其他日本教授都好。」



潘貫全家福合照。

資料：(潘永興先生捐贈，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 I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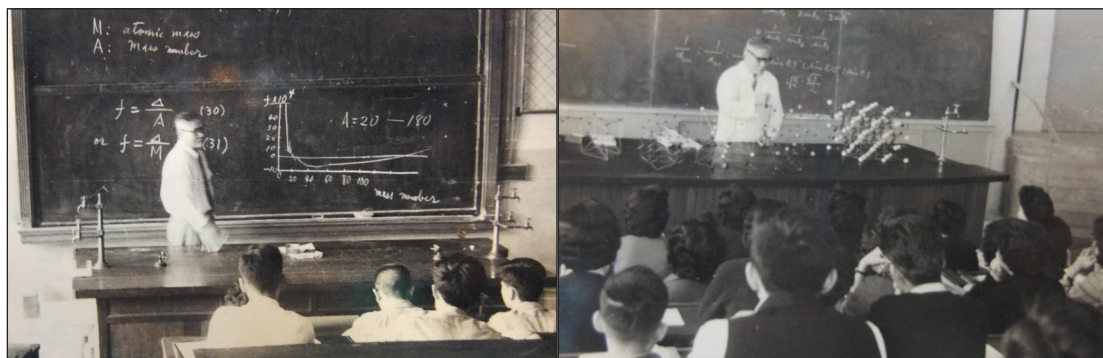
」同時，潘貫亦相當重視觀察實驗中發生之現象，並鼓勵學生如此作業，頗受到學生的歡迎，但因受環境所限，僅於1944年在《日本化學會誌》發表〈台灣溫泉の化學的研究—關子嶺溫泉〉論文一篇。1942年升任教授，敘高等官七等。1943年，高等工業學校校長佐久間巖曾勸其改換日本姓名，潘貫婉言推辭，並因憶起吳梅村詩句「誤盡平生是此官，棄官容易變名難」而寫下「偶感」一首，謂：「教育原來不是官，變名容易變心難。遺言在耳傳家訓，試把朱門仔細看。」末句係指其家中樓上朱聯為「振家科學磨心力，興族精神盡典型，祖訓無違勤與儉，國風可辨涓與涇」，冠頂四字為「振興祖國」，顯見其時之宗邦情懷。

貳、戰後任教台大，致力化學教育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潘貫大喜，曾寫詩文四首抒懷，謂：「早知霸局終難久，何苦強權逆理行」、「十年枉費皇民化，萬戶神棚一夜清」及「可憐覆雨翻雲輩，一夜門牌換舊名」等句諷刺日本皇民化政策，而以「開羅還我舊乾坤」誌此喜慶。對於台灣光復，潘貫亦有「光復後路上偶發」一首，謂：「連聲爆竹似雷鳴，仰首青天白日明。萬里河

山光復色，滿街父老笑歡聲。青年熱血須珍重，孽鼠虛心任縱橫。入眼風情多可慨，未應高唱已昇平。」歡愉之情，溢於言表。然而，台南高工因日籍教授紛紛返國，而未能羅致適當師資，因此應用化學科最初多仰賴潘貫和賴再得兩人苦撐。之後，潘貫又因為通曉北京話，乃協助政府進行接收工作，竟積勞而染肺病，於是接受台灣大學校長羅宗洛之聘，北上就任台大化學系教授，並承羅校長之同意，進入台大醫院住院治療，約兩年後始治癒。

1945年11月15日，國民政府接收台北帝國大學，更名為國立台灣大學，並依據中華民國教育體制，將相關講座分別合併，設置「系」或「科」，且將各學部改為「學院」，由若干科系組成。理學部改為理學院，由蘇步青任院長，化學科更名為化學系，整合原理論化學、無機化學及第一、第二有機化學講座，由張定釗出任系主任，除留聘中塚佑一、野副鐵男兩日籍教授及一、二日籍助教外，又分別聘潘貫為教授、劉盛烈為副教授、陳發清為講師、陳英茂為助教，師資陣容相當堅強。潘貫主要講授理論化學（physical chemistry）、化學熱力學、溶液學等課程，不但講課清楚，且習題作業安排綿密，給予學生相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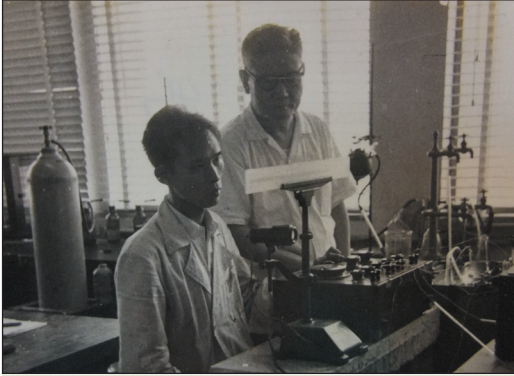
台大二號館，潘貫當時上課剪影。資料：(潘永興先生捐贈，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良好的學習和訓練。其平日待人溫和，但外表嚴肅，說話低聲而斯文，頗具學者風範，受到學生及其他教授的尊敬。其上課的習慣，是一面埋頭寫黑板，一面口中念念有詞，一席白色實驗衣常隨著寫黑板的身軀擺動。上課時之氣氛，通常較為嚴肅，學生們深怕漏聽了什麼；但潘貫偶爾會搔著一頭白髮，轉身向學生們一笑，頗令學生們受寵若驚，稍微舒緩一下上課的緊張氣氛，讓大家從一堆公式中暫時回過神來。

1940、1950年代的台灣，正處於時局紛亂，物質匱乏之際。然台灣大學師生弦歌不輟，研究未曾中斷，潘貫除教學和學術研究之外，別無旁騖，將一生的時間和精力都獻給學術工作。他每天早上八點鐘就走進他的實驗室，一直到下午五點鐘下課以後才離開，中午都是帶便當作為午餐。晚上回家後，即翻閱參考書籍，作第二天教學、研究的準備

，他說：「就是這樣，我們都感到時間太不夠用了。」對於當時國內貧乏、簡陋的研究環境，潘貫則表示說：「固然是使我們若干實驗不能完成，但是就現有的東西，我們仍然有做不完的工作要做，我們不必去整天思想那些目前力量辦不到的設備，只要能盡自己的力將可以做的工作完成，就是了不起。」確實是一位腳踏實地的學者。

當時潘貫的研究室雖沒有如今日般方便使用之整套儀器，但所使用之伏特計和安培計等儀表均十分精密，並將這些儀表組裝成電位計進行許多熱力學數據的量測。其門生陳志雄先生即指出：「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具以感應線圈驅動的懸吊反射鏡片，當極微量的電流通過感應線圈時，就可以使鏡片轉動而由反射光點的移動突顯出來，它可以讓我們察覺到0.01mv的差異，這在當時對一般儀器來說是一件困難的事，潘教



1958年與吳愛如同學，共同研究物化實驗。
資料：(潘永興先生捐贈，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授設計的這套裝置卻輕易做到了。這些經驗讓我了解到研究的精髓在於對問題根本的認識，和能融會貫通的使用手邊的工具，用心多於用力。」而蔣樹基博士亦指出：「在大四的時候（1960年），台灣化學藥品和儀器非常缺乏。記得當時整個做實驗的set-up都是自己用玻璃管、玻璃板及其他零零碎碎的東西裝置起來的。做電泳分析（Electrophoresis）需要一個高壓的電源，還好我對電器也有相當的興趣。向朋友借了九個真空管，再加上自己家裡有的零件，設計安裝了一個很穩定的電源。這個電源能產生相當高的電壓，可到810伏特，當時這種高壓電源在台灣是買不到的。」這些經驗，使其在四十餘年後，將其在美國化學工業界之成就歸功於潘教授之教誨和訓練，可見一斑。

此外，潘貫亦要求研究室內之每一

位學生必須定期為實驗用的分析天平、量瓶、滴定管進行校正，所有的量測數據均須標記誤差，即使基準級（primary standard）化學藥劑亦須分析標定，並要求實驗室應保持通風，降低環境對身體健康的傷害，這些訓練，均養成學生們日後嚴謹的工作態度。由於研究經費有限，學生必須自製甘汞參考電極，去離子水經過三次蒸餾（添加高錳酸鉀）以獲得超純水，以鋅汞齊去除氮氣中的微量氧氣以獲得高純度氮氣和純化回收的水銀。凡此種種，看似克難，卻讓學生們真正了解書中所學，並培養其自己動手組裝設備的能力，給予學生極佳之訓練和學習經驗。

潘貫教授之視力不佳，經常需借助放大鏡閱讀書報，即便如此，其仍充分利用每一刻時間，中午有時累了，就躺在破舊的長椅上稍事休息，頗令學生們感佩及些許的憐惜。不過，潘貫教授平日雖然要求嚴格，但也有其溫暖、和藹可親之一面，平日除了頻頻關心學生的課業、生活之外，其研究室之全體師生和助理們均會舉辦年度聚餐活動，可謂是年度大事。每次年度聚餐時，潘貫教授都會邀請大家到他牯嶺街的台大宿舍裡吃火鍋，除了滿桌豐盛的菜餚之外，還準備了葡萄酒，更帶動了整個晚上的

氣氛，頗令學生們印象深刻。另外，3、4月台北的春天，陽明山花季開始，潘貫教授也會在優雅的陽明山台大招待所安排另一次聚餐。當天上午，有些人坐在日本式的榻榻米上閒聊，有些人在台階下的小院子裡烤肉，宛如一家人，那情景真是令人難忘。面對著和室外的青山，襯托著各種顏色的杜鵑花，一時興起，潘貫會當場吟詩給學生們聽。這時，學生們才知道，原來平日嚴肅的潘貫教授喜歡詩文的熱情不下於科學研究。

1949年8月至1950年10月間，潘貫教授曾應傅斯年校長之聘，兼任理學院院長，謙沖自牧，鉅細靡遺，使院務大有進展。1951年起，獲聘為歷屆高等考試之典試委員，並先後擔任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委員、國家科學委員會委員、原子能委員會委員等職，凡此均與其學術報國之夙願相符。1954年，政府當



潘貫於實驗室上課的情形。資料：(潘永興先生捐贈，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局已聘其為考試院考試委員，潘貫以專注研究、教學，而懇辭不就，淡泊敬業，士林傳為佳話。1955年，潘貫教授獲日本東北大學頒給理學博士之榮銜，同年8月，並接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之資助，由台灣大學選派赴美國加州大學深造，先是進行氧化銀電極之熱力學研究，後期進行錯化合物之物理化學研究，測定或計算多種常數及數值，在熱力學研究方面頗有貢獻，並受國內外專家之矚目。期間，足跡遍至英、法、西德、瑞士等地，進行各大學化學教育和研究機構之考察，並將其訪問經過發表於《科學教育》雜誌。

返國後，1957年至1963年間，潘貫復兼任台灣大學化學系系主任，更是竭盡心力推展系務。過去化學系師生分散於二號館（現由物理系和其他單位使用）之各研究室、三號館之圖書室及其後面之平房實驗室，以及煤氣槽（現已拆除）前之紅磚平房之各實驗室（現為洗衣部、理髮部等使用）等，為求集中散在多處之教員研究室及縮短研究室和學生實驗館之距離，乃動工興建理化大樓，並於落成後，全部搬入理化大樓。不過理化大樓雖大，容納全系人員尚感不足，於是又另築同位素館於理化大樓的東邊，並將無機化學、分析化學研究室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 I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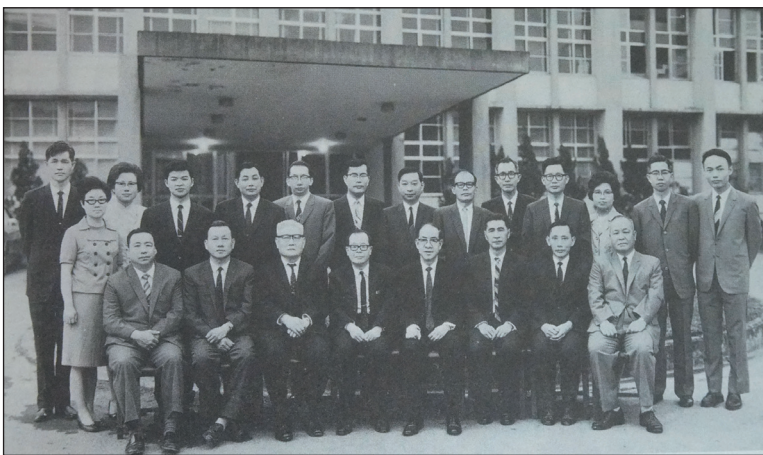
移轉到同位素館去，至此始略感寬舒。期間，潘貫曾指導許多化學系學生從事畢業論文研究，如在美國的蔣樹基、劉嘉俊、許衍南、溫文洋、盧平治、周侶芸、黃健次、張德良、楊思成，以及目前在台灣仍從事教學研究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李遠哲、林聖賢、陽明大學副校長徐明達、台灣大學化學系教授黃良平等，為化學界培養英才無數。

在台灣大學化學系任教近三十年間，潘貫平日除課務之外，終日埋首實驗室從事研究，孜孜不倦，其治學嚴謹之態度及關愛學生之情誼，使學生十分感動，例如中央研究院院士林聖賢即指出其在台灣大學求學期間，因家庭經濟情況不佳，所以指導教授潘貫乃請其擔任家教，教導潘教授的子女讀書，在生活

方面也非常照顧，令其至今仍感念不已。

1957年，清華大學於新竹復校，首即成立原子能科學研究所，聘潘貫、戴運軌為該所兼任教授、研究員，主持放射化學研究之發展，為該校之建設貢獻心力。1958年4月，潘貫因錯鹽化學、電化學及電解質的熱力學性質之研究，榮膺中央研究院第二屆數理組院士，該次選舉為國民政府遷台後之首次院士選舉，而潘貫為第一位當選院士之台籍人士。當他獲知當選院士的消息之後，很謙虛地說：「不知是獲得那一方面的推薦，我一直到現在才曉得，這使我感到非常慚愧，因為若干比我有成就的教授，並沒有入選。」之後，復獲選為第三、四屆中央研究院評議員，可以說是台灣本土最優秀之化學界前輩之一。

在研究論著方面，早期台灣幾乎沒有物理化學方面的教科書或參考書，但潘貫之授課很有計畫，並自編課本，分發給學生參考，成為學生唯一的參考資料，甚為實用。嗣後，潘貫將其授課講義，分別於



1970年歡送第十任校長錢思亮先生轉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紀念照。
前右二起：林耀堂、林渭川、錢思亮、那簾君、潘貫、劉盛烈。
資料：（《從帝大到台大》劉盛烈先生提供）



1945年潘貫上班前攝於家門，他風雨無阻，每天準時搭上午7:45校車，上午八時準時在台大化學館前上車。

資料：(潘永興先生捐贈，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1956年出版《定性分析化學》(台北：國立編譯館出版，正中書局印行)、1959年出版《理論化學》(現稱《物理化學》，台北：正中書局印行)兩書，均為教育部指定之大學用書，便於英文程度不

佳者之學習，也是其對化學教育之一大貢獻。

其中，1956年12月出版之《定性化學分析》一書，係潘貫自1945年以來在台灣大學所講授定性分析化學之大要，適用於大學理學院化學系、地質系、工學院化工系、農學院農化系、森林系、園藝系及醫學院藥學系等各系。全書分為三篇、二十二章，首先講解分析化學之基本原理，接著，將定性分析實驗法作有系統之說明，使學生了解分析化學之原理，以實驗配合理論，藉以矯正強記生吞之弊，而引入應用自如之境。第二、三篇，敘述陽離子和陰離子之定性分析法，對於實驗方法、步驟及操作方



1964年中央研究院開會(左中第六位為潘貫教授；右中第七位吳大猷教授；後中王世杰教授)。

資料：(潘永興先生捐贈，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 IV

式，均詳密闡釋，對於初學者所易犯之實驗上之錯誤及不良習慣，尤為隨時注意。

1959年9月，再出版《理論化學》上、下兩冊，旨在講述一般理論化學之基礎知識，適用於大學理論化學課程。全書分為三篇，第一篇由原子結構實驗與理論發展之過程，逐漸述及近代核子反應之概要及人造放射性元素之大要。第二篇為氣體狀態及氣體分子飛動說入門。第三篇敘述化學熱力學，以奠定各篇之基礎。接著，述及液體及固體，包括結晶學 X 射線繞射概要，並闡明物質三態間之變化及其特性；繼則講述溶液之理論和實驗，而後進入熱力學之應用範疇，即化學平衡論、電化學及相律等之理論和實驗。然後講述化學動力學，論及化學反應與時間之關係，並講述光學之大要以闡明物質與光能之關係。最後，敘述分子結構之大綱，以解釋化學結合之本性，而述及近代理論化學之進步等。

迄至1974年9月辭世為止，潘貫除出版《定性化學分析》、《理論化學》二教科書之外，並發表相關論文六十四篇，對化學研究者提供寶貴研究資料及科學新知識，貢獻匪淺。

參、熱心科學教育

潘貫認為教育至為重要，尤其「國家民族之盛衰，文化水準之高下，繫在教育工作者的雙肩。」因此，平日除致力於教學、研究工作之外，對於科學教育亦頗為熱心，並不時於報刊雜誌撰文，提供教育改革建言。早在1946年9月20日，潘貫即曾在《台灣新生報》「星期專論」上發表〈台灣科學教育的前途〉一文，其認為自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台灣的科學教育水準已大為降低，戰後又因種種因素之影響，以致科學教育水準更為降低，是故，其依古訓「君子慎始」之言，提出改善師資、實驗設備與補給、教員生活及身份的保障、考試制度、授課語言，以及知識青年就業等六大建言，作為台灣科學教育改善之方向。1947年2月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潘



1972年中央研究院第八屆評議員第一次會議。(三排左三為潘貫教授)
資料：(潘永興先生捐贈，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1955-1956年潘貫擔任中國自然科學促進會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時，參訪奧爾巴尼大學與教授 Harry L. Frisch一起參觀研究儀器。
資料：(潘永興先生捐贈，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貫深感因教育不足而致同胞間鬩牆、互鬥，曾有「二二八書感」詩二首，謂：「和平樂土起奇災，往事心酸付劫灰。萁豆慘情終自解，蕭攢禍種是誰栽。崑岡火炎玉同石，淡水春寒淚當醅。惟有精誠推化育，可能喚起國魂來。」此後乃一本初衷，專注於科學研究與教育，以培養年輕一代化學家，期望未來能致力於強盛國家。

1955年3月，中國自然科學促進會獲得教育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等機構之經費補助，發行《科學教育》雙月刊（1959年8月改為月刊，後由台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接辦，今仍繼續出版），由潘貫任發行人。該刊之前身為《台灣新生報》之「科學周刊」副刊，自1952年10月8日至1953年5月30日止，每逢週三出版一次，計出版26期、刊出文章165篇，頗獲各界好評，是故中

國自然科學促進會乃決心另創辦一永久性的獨立刊物。《科學教育》雜誌以促進科學教育、介紹國內外科學新知為宗旨，內容包括數學、天文、氣象、物理、化學、生物、心理、地質、地理等九大部門，每一部門均聘有專家、學者2至6人擔任編輯，進行稿件審閱工作。其中，化學組之編輯委員為潘貫、林渭川、程祥榮及周良翰四人，潘貫且擔任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後因於同年8月赴美研究而辭去主任委員一職，但仍繼續擔任化學組編輯。

《科學教育》雜誌自創刊以來，從未有愆期情事，而其在內容和編排上，可稱得上是早期國內綜合性科學雜誌的權威。其中，潘貫於第一期中，即曾撰述專文兩篇，分別是〈第IV族稀有元素化學〉、〈化學實驗室火災及爆炸的發生和預防〉，以及一篇「科學新聞」〈日本原子能研究計劃〉。嗣後，又陸續撰述科學論著多篇，如〈鈾化學之進展〉、〈吸收光譜化學之進展〉、〈放射性同位素與化學〉、〈人工放射性新元素〉及〈磁化學之發展與核磁共振〉等。迄至1974年辭世止，計發表47篇文章，或介紹化學新知、化學研究的最新進展，或介紹美國大學化學系現況、日本國立大學化學系及原子能研究所現況、



1955- 1956年潘貫擔任中國自然科學促進會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時，與學者 Juel Hildebrand。
資料：(潘永興先生捐贈，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台灣大學化學系及化學研究所現況，以及大學化學實驗室災害預防等，並詳列實驗內容及設備、藥品等，可以說是早年《科學教育》雜誌發表文章最多的作者，顯見其對科學教育發展的熱心。

1959年2月，因胡適、梅貽琦、吳大猷等人之倡議，行政院設立國家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由中央研究院評議員、教育部長及相關主管組成，並設置數理科學、生物科學、人文及社會科學三個專門委員會，以推動全國學術研究。1961年，潘貫出任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講座教授，並應副總統陳誠之邀，參加陽明山會談，為科學教育問題提出務實建言。

1960年至1967年，復擔任國家科學委員會及其前身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之研究講座教授。

肆、以詩寄情， 吟咏述懷

潘貫向以化學研究專長聞名，惟其以「詩者心之聲也」，故經常以詩寄情，藉詩文隱影潛行，計留下詩文270餘首。其幼承庭訓，尤痛惡日人殖民統治，習漢文至十三歲始入小學，第一首詩為1920年1月7日所作之「自感」，謂：「數年徒守舊山川，碌碌庸庸獨了然。刀斧難摧松柏志，何時撥霧睹青天。」其後，仍勤讀不懈，並常以詩抒懷，從中可見其熱愛宗邦之情懷。

1936年，潘貫父親子聯公過世，乃於翌年3月31日以紀念亡父為名，編著《鯤濤集》一冊，書名題字為其詩友、後任台南高工同事林茂生先生所書。全書蒐集其父七十五歲壽誕日友人之賀詩及過世後哀悼追懷詩章，並為抗議台灣總督府於同年4月1日取消新聞漢文版、禁止漢文新聞雜誌及禁止台語廣播、戲劇之政策。《鯤濤集》一書，計蒐錄潘貫自作二十餘首，包括「終生未展中興夢，一逝難忘後繼銘」（「先嚴冥壽之辰感賦」）、「石馬南驅雙眼底、黃葵西向寸心中」（「墓亭春夕」）、「烈日老榕心未槁，疾風勁草節難摧」（「墓亭夏日」）、「幸得遺銘能壯志，只從科學能解憂」（「墓亭秋夜」）、「已超稀壽歸何憾，未睹中興日

不暝」（「墓亭冬雨」）等，皆為追述先人對宗國之情懷。

在其晚年所撰之「鯤濤集跋」中，曾再闡述舊事指出：「回想五十年來在那淒風慘雨之中、異族鐵蹄之下，無思想學術的自由，更談不到言論之自由，一切祖國文化摧毀殆盡。在當時只有舊詩的隱影潛行。幸而對這方面他們倒也不關心，留點空隙，才得苟延殘喘。事實上詩者心之聲也。心不平則鳴，欲鳴而不得出聲，故現之於詩。但依然是法網森嚴，所以不得不藉景寓情，不得不假追懷個人以書憤，藉世俗應酬詩作煙幕以迷眼。這是時世迫人的苦心，因為在當時一切出版物要經過當局的嚴查。」故編著《鯤濤集》一書，「借先嚴以表示當時台灣同胞對祖國之懷念」。

晚年，潘貫曾選擇自己部分作品集結為《凌雲詩集》（2007年11月，台灣大學圖書館印成單行本），依其著作時期可分為《寒窗集》（1924-1937年）、



台大圖書館將潘貫的論文與文章集結成書。
資料：(台大圖書館提供)

《孤鴻集》（1937-1945年）、《光復集》（1945-1946年），以及《秋濤集》（1947年），可視為潘教授一生心情之寫照。其中，《寒窗集》所述時期，跨越潘貫自中學至研究所之學生時期，多為遊歷之作，惟寄寓意於景色之中，表達其在異族統治下之困頓心情。1937年潘貫畢業離校，亦為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開啟侵華戰爭之時，乃藉《孤鴻集》表達對戰爭之無奈，憐惜百姓所受戰亂之苦，曾撰述一首七言絕句「曉過運河」以抒懷，謂：「運河秋水碎銀灘，唱曉孤舟韻帶酸。氣節未隨時節變，天心空對道心寒。」《光復集》則書寫抗戰勝利之興奮心情。《秋濤集》之作品不多，零星有偶感、贈友、病中抒懷等。

潘貫之詩作向少示人，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校長遽然謝世，潘教授曾寫成「悼念傅校長」詩三首，載於《臺灣大學校刊》。哲學系教授方東美乃索閱詩集，讀後大為讚賞，曾贈詩「奉贈潘貫教授」一首，謂：「力止義行風骨純，換心蠲毒在亡秦，門茶密蔭瞻嘉樹，國運中興挺異人。測理神奇祛腐朽，馳情豪宕見清新。十洲雲水魚龍活，詩史長留海嶠春。」

潘教授畢生致力於拉曼光譜、電化學、放射化學及分析化學之研究，開啟了台灣放射化學研究，對科學教育之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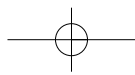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Ⅳ

展亦甚為熱心。其擔任台灣大學化學系教授將近三十年，誨人不倦，作育英才無數。1958年更膺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畢生為學術而生活，為教學而生活。再者，潘教授亦能詩文，多年來常以詩明志，科學界學者少人能之。1974年9月2日，潘貫因肝癌病逝台北，享年68歲。夫人林雪治女士，畢業於台南高等女校，持家有成；育有兩子兩女，按次為永興、淑慧、文慧及永昭，均已成家立業。

伍、參考書目

- 1、台灣大學化學系編，《潘貫院士紀念輯》。台北：編者，1999年。
- 2、台灣大學圖書館編輯，《潘貫教授著作集》。台北：編者，2007年。
- 3、潘貫，《鯤濤集》。台北：台灣新民報社，1937年。
- 4、劉廣定，〈詩史長留海嶠春—詩人化學家潘貫以詩明志〉，《歷史月刊》，第239期（2007年12月），頁85-89。
- 5、劉廣定，〈日據時期的台灣詩人化學家潘貫〉，《歷史月刊》，第153期（2000年10月），頁117-122。
- 6、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第五冊（1982年7月），頁407。
- 7、曹永和總編輯，《台北帝大的生活》。台北：台灣大學，1999年。
- 8、陳奇祿等著，《從帝大到台大》。台北：台灣大學，2002年。
- 9、丁亮等撰述，項潔主編，《國立台灣大學校史稿》。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5年。
- 10、劉盛烈，《劉盛烈回憶錄：我與台大七十年》。台北：前衛出版社，2005年。
- 11、范燕秋，〈傑出的化學家—潘貫〉，收入《台灣放輕鬆—學術台灣人》。台北：遠流出版社，2004年，頁88。
- 12、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詩人化學家—潘貫教授百年文物展〉，<http://www.lib.ntu.edu.tw/manuscript/PanKuan/index.htm>。
- 13、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三冊。台北：編者，1990年，頁363-364。
- 14、國立台灣大學化學系：《台大化學系友通訊》，第9期（2008年11月），〈台大化學（科）系80年懷舊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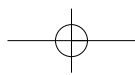


林朝棨

1910~1985

◆ 地質學教育的先驅 ◆

周瑞燉 / 國立台灣大學地質學系教授





臺灣本土第一位地質學家林朝榮博士，於1910年（明治43年）5月26日生於當時的臺中州豐原郡圳寮129番地。林朝榮博士早年畢業於臺中二中、臺北高等學校（1931年）及臺北帝國大學（1934年，現今臺灣大學），後來榮獲日本國立東北大學理學博士學位。林朝榮教授於臺北帝國大學畢業後先任理學部副手，不久任職臺陽鑛業公司瑞芳金礦地質師，從事瑞芳金鑛的探採研究工作。於1937年轉赴東北擔任長春工業大學地質學教授，自1939年至1946年擔任北平師範大學地質學系主任，同時兼任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1946年返回臺灣，任臺灣大學地質學系教授達30多年，並兼任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聯勤測量學校及中國文化大學等教授職，培養了諸多地質人才。此外也協助臺電公司設計建設奧萬大壩、霧社壩及瀧見壩等工程之地質工作、臺灣中油之小梅、竹頭崎、寶山及出磺坑等地質構造之地質調查工作及大溪—三峽煤田及澳底煤田之測勘工作等，對於臺灣能源的建設測勘工作頗有貢獻。此外，他先後在50年間完成了地球物理科學、礦業、工程地質及考古學等論文150多篇，涉獵甚廣，造詣甚深，均為國內外有關地球科學及礦業界人士的寶貴參考資料。他一生奉獻於地質學教育、研究、著作、工程建設及礦產探勘，令人感佩。

壹、生平

林朝榮博士字戟門，臺中縣豐原人，生於1910年5月26日。林博士為豐原望族林慈先生的四男。他成長於基督教



1918年，全家福照，左一為八歲時的林朝榮教授。
資料：（《林朝榮紀念文輯》林恩朋先生提供）

家庭，14歲時在豐原教會受洗成為基督徒，決心一生追求主的道，信奉「耶穌基督」為其唯一信仰。

林朝榮教授幼時深受其父林慈先生愛國思想之薰陶，常盼將來能盡一己之力，奉獻於國家社會。由於出身書香世家及熱愛國家的情懷，使他更加努力發憤讀書，以便將來報國。他為臺灣人爭氣，要上中學時，一百多人當中，他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當時只許統治者子女進入的臺中二中，成為班上僅有的二位臺灣子弟（當時臺灣人幾乎都讀臺中一中）。他畢業於臺中二中後，考進臺灣



林朝榮教授伉儷與其老師早坂一郎教授伉儷(右二右三)與次公子(右一)來華訪問。資料：(周瑞墩教授提供)

唯一的臺北高等學校（現址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理科班，而臺灣學生大約僅有日本人學生的十分之一。由此可知當時臺灣人甚不容易考進中學及高等學校，日本政府限制臺灣人就讀中學、高等學校及大學，當時臺灣人受不公平待遇。他深信礦業與地質為推動發展工業的原動力，而學地質可以開發地下資源，使國家強盛，由此他有志於地質研究。

林朝榮教授在高校二年級時於臺北日本人基督教會（現濟南教會）及基督教青年會（YMCA），結識了也是基督徒的日本知名地質學家早坂一郎教授。在早坂教授不斷地鼓勵下使他更下決心要成為「臺灣人第一位地質學家」。1928年3月臺北帝國大學創立。林朝榮教授以臺北高等學校優異的學業成績直入臺北帝大，並選讀理農學部地質古生物學教室（理學院地質科學系），而成為臺

北帝大地質古生物學教室的第一位學生。當時系中僅有一位學生，但卻有四位日籍教授，就是早坂一郎教授、市村毅教授、富田芳郎教授及丹桂之助教授。因此林朝榮教授得天獨厚奠定了優良的專業基礎，並完成了臺灣產哺乳類化石的產狀（日文）、臺灣臺中縣豐原區第三紀晚期及更新世地層之地層學研究（英文）二篇論文。

貳、奉獻地質科學教育

林朝榮教授自臺北帝大地質古生物學系畢業後，留任副手（助教），並幫助四位日籍教授做野外地質調查及研究。因為當時鄉下日語不普遍，他須擔任翻譯工作並須先去拜訪「保正」（村里長），以便安排食宿。一個學生或副手須跟隨四位教授經常赴野外調查爬山涉水，十分辛苦。當時長途跋涉都要打上綁腳，走久了足部因不通風易出汗而不舒服。他為了方便並怕蛇咬又常不用布質的而用皮製的綁腳，更是悶熱。他在山上每遇到休息時就喜歡脫掉鞋子，在清涼的小溪浸泡雙足，但因腳部溫差關係，而過度地刺激神經，加上有時為了趕時間渡溪涉水都不脫鞋，兩腳長時間潮濕，以致引起腿部的風濕性神經痛，因而使他在50多年的歲月中痛苦不堪（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 IV



1936年於瑞芳任職「台陽礦業」金礦調查。(左一為林朝榮教授)。
資料：(《林朝榮紀念文輯》林恩朋先生提供)

¹林恩朋，1986)。

林朝榮教授為求得地質與採礦工程之實際經驗，轉往臺陽礦業公司任地質師，先後從事瑞芳九份金礦及中央山脈地質探勘工作。臺陽礦業公司董事長顏欽賢先生派他去北朝鮮（北韓）考察當地的金礦開發工作，並獲得不少的金屬礦床調查探勘研究工作經驗。其後，得恩師早坂一郎教授之刻意安排，短時間內取得東北新京（長春）工業大學的任教聘書，匆匆起程獨自搭船離臺，也得以脫離日本軍方的派令，渡過危險關頭。他在長春任教二年，因為長春一帶的氣候嚴寒，常年冰天雪地，教學及野外地質調查工作十分辛苦，而且當時缺乏能源，所以一得到北平方面的聘書就轉

往北平市，任教於北京大學與北平師範大學。他擔任北平師範大學的地質學系主任，同時兼任北京大學地質學系教授。他當時是30歲的年輕教授，但對於德文、英文、日本等地質書籍全部博覽無遺，當然對國內地質學權威之著作更是瞭如指掌。

林朝榮教授平時待人和藹，但教學認真，在上課的時候多發講義，並藉板書以補不足。中午下課後，從不回家吃飯，僅在研究室內叫一碗炸醬麵，吃完後便學習國語。由於學習認真，所以不久的時間，便可用流利的國語講課了。林朝榮教授除課堂講授之外，更要求每位同學認定不同題目撰寫研讀心得，所用之書刊都是林老師私人購置之最新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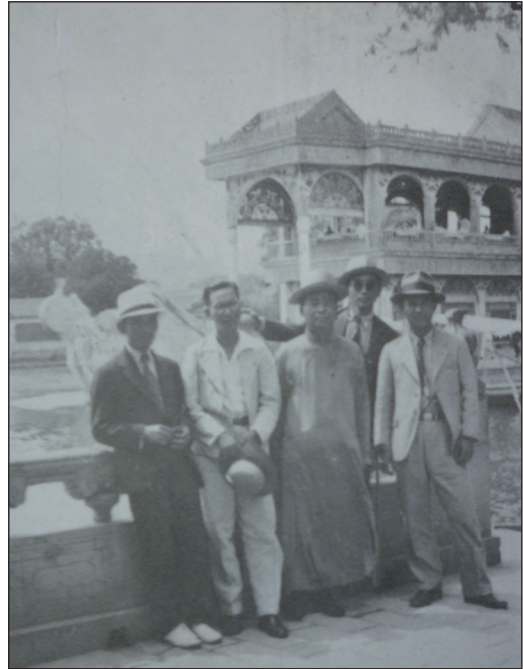
1936年於瑞芳任職「台陽礦業」野外休息。照片前方為林朝榮教授。
資料：(《林朝榮紀念文輯》林恩朋先生提供)

1. 林恩朋（1986）《我的父親》<林朝榮（戟門）先生紀念文輯>127-137頁。

書籍。以當時微薄之薪水，除負責一家五口之生活外，並購書供同學研讀。師生研究熱情之盛自不在言。每逢星期假日，林教授也常放棄休假而率領同學騎腳踏車赴玉泉山、西山做地質實習，並採取各種化石及標本帶回研究，使每一位同學的學習過程非常充實（²張奕華，1986）。

在暑假期間，林朝榮教授每年均率領高年級同學赴各地實地勘查研究。在張奕華教授的記憶中，赴東北後，第一年首先到鞍、本溪湖、撫順，其次到鐵嶺、長春、北票等各大礦廠。事後並留在北票做進一步的精密勘測，因而發現北票礦區之推複構造（Nappe）。此乃繼地質學家丁文江及翁文灝二氏後之巨大貢獻也。由於此次勘查研究成功，而於第二年又率同學赴察哈爾龍煙鐵礦、山西大同煤礦及綏遠大青山雲母礦等地。第三年更遠下江南，研究南京石灰岩及杭州西湖一帶之地質構造，因而帶動學校師生，研究風氣盛極一時（張奕華，1986）。

戰後林朝榮教授接到青島山東大學的聘書，本來欲轉往任教，但因戰後臺灣各方面的迫切需要，決定回到故鄉的



1941-1944年間於北平師範學校(今北京師範大學)任教，與北平師範學校同事合影(左二)。
資料：(《林朝榮紀念文輯》林恩朋先生提供)

母校臺灣大學教書。1946年7月他擔任團長時帶領185位臺籍同胞，搭乘國際救濟總署的船隻自天津港出發，中途轉經青島，於10日後安抵基隆港。回臺後，即與奉派接收臺北帝大的地質學家馬廷英教授共同接辦地質學系（林恩朋，1986）。

林朝榮教授返回臺灣大學地質學系後開始教授普通地質學、古生物學、地形學與地史學及實習課。他任教臺大時，對於學生的要求更是嚴格。他的上課

2. 張奕華（1986）《週年祭憶師恩》〈林朝榮（戟門）先生紀念文輯〉144頁。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 IV

資料特別多、講義特別厚。因為正常上課的時間講不完，因此只好利用假日補課。當時甚缺地質課本或講義，因此他自己編寫講義，並親手刻鋼板。因為白天要上課，所以利用晚上寫講義並刻鋼板，常常不眠不休。

林朝榮教授受邀兼任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聯勤測量學校及中國文化大學之教授，教授普通地質學、地形學及古生物學等，培育了更多地質科學人才。

參、奉獻國家工程地質、石油地質及煤田地質測勘

林朝榮教授在臺大教授地質科學之外，同時積極參與臺灣能源的測勘開發建設工作。他協助臺灣電力公司在奧萬大壩、霧社壩及瀧見壩等重大建設的工程地質設計工作。此等水壩在林教授的指導下，由工程地質師、土木工程師、電機工程師及工程公司等建設完成並營運發電。

林洋港先生擔任臺北市市長時，他竭力建議政府積極建設「翡翠谷水庫」。當時大臺北地區人口漸增，住宅與工廠也逐次增加，以致用水量也逐漸增加，因此大臺北地區供水量將會產生嚴重



1951年林朝榮教授(左二)與同仁於霧社奧萬大台電水力發電築壩地質探勘。
資料：(《林朝榮紀念文輯》林恩朋教授提供)

短缺的問題，需要增設水庫，以保證足夠的供水量。但是建設水庫的建議受到各方面以安全為由的反對，特別是立法院的反對力量更是強大。林市長不得已只好找林教授協助，請他在立法院為建設翡翠谷水庫請命。林教授義不容辭，欣然答應，以他對該處地質的深入了解及曾與服務臺電時的孫運璿先生共同設計建設多處發電用水壩的專業經驗，在立法院向立法委員演講，為地質安全及水庫壽命做保證，並願意義務參加水庫建設，擔任工程地質顧問，促使這有關未來四、五百萬人口的大臺北地區所需用水的重大翡翠谷水庫工程建設案順利通過。此水庫工程建設在林教授的指導下，經由工程地質師、土木工程師與電氣工程師及工程公司的慎重設計及施工後順利完工、蓄水並發電，對大臺北地

區的貢獻很大。若大臺北地區無此翡翠谷水庫及其他水庫蓄水並供水，臺北盆地將有更嚴重的乾旱或水災（林恩朋，1986）。

戰後初期，臺灣中油公司缺少石油地質師，因此邀請林教授調查研究嘉義縣小梅、臺南縣竹頭崎、新竹縣寶山及苗栗縣出磺坑等油氣構造，並獲得儲積油氣潛能之初步結果。此等構造後經他的學生鍾振東、周瑞燉、蕭寶宗及湯振輝等地質師進一步調查研究，並經鑽探發現油氣，成為生產性的油氣田。

戰後初期，因受大戰的影響，煤生產量減少。政府為開發新煤田以增加煤生產，委請林朝棨教授調查研究臺北縣

大溪—三峽煤田及澳底煤田之地質及煤產狀。此煤田地質由他的學生呂學俊地質師協助調查。此外林教授曾調查南庄煤田、清水坑煤田及六堵南港一帶煤層之地質及煤產狀，對臺灣西北部煤田開發具有莫大的貢獻。

戰後初期，臺灣的煤運往中國大陸。且因開發迅速，以致發生嚴重的缺乏。當時臺灣最主要的能源是煤。煤是火車、工廠、家庭、餐廳及發電廠的主要燃料，因此需要迅速加強開採煤礦。林朝棨教授受到當時擔任省政府建設廳廳長陳尚文先生的極力邀請，由臺大借調至該廳任專務委員並兼任礦務科科長，主管臺灣的礦業事務，積極加強開採煤

礦、硫化鐵礦及其他礦產業務，為期二年四個月。林教授以學者身份從政，並不是為了做官，而是為了振興臺灣的礦業發展，特別是煤礦業的發展，藉以充實國家的能源，配合整個社會國家的迅速發展。林教授以典型的學者身份做短期的



1961~1963年間，林朝棨教授(前排左三)、周瑞燉教授(前排左二)、陳章虎(前排右一)等在台灣中油公司出磺坑油氣田作地質調查研究。資料：(周瑞燉教授提供)



1954年，台灣省政府建設廳礦務科全體同仁。前排坐者右八為林朝榮教授。
資料：（《林朝榮紀念文輯》林恩朋先生提供）

從政工作，貢獻自己的學識及經驗，推行國家地下資源的開發政策。

硫化鐵為農業肥料的主要原料，在臺灣未大量生產前，均以寶貴的外匯向國外採購。當時金銅礦務局金瓜石礦山及瑞芳礦山雖然有生產硫化鐵，但均為金銅銀礦之副產物，故產量不多。1950年，臺灣鑛業公司董事周碩卿在七星山山麓七股發現黑色硫化鐵礦床後，經由礦長周瑞燉積極探勘，經過相當困難及努力之後發現多量的硫化鐵礦床。當時經由建設廳礦務科科長林朝榮的推薦，著手開採品質優良的硫化鐵礦，供應給臺灣肥料公司及高雄硫酸銨廠作為製

造肥料及硫酸銨之主要原料，節省鉅額外匯。當時在頂北投、死礮子坪及煥子坪等地也發現了硫化鐵礦，並經開採供應臺灣肥料公司及高雄硫酸銨廠。

戰後初期，臺灣僅製造玻璃瓶及玻璃杯，並不製造平板玻璃。因此自日本、美國、法國或其他國家進口平板玻璃因應建設樓房、廠房或校房時的需要。由此，前建設廳長及玻璃公司總經理的化學工業專家陳尚文先生與玻璃商業家陳啟猛先生等合作，在竹東創辦新竹玻璃製造廠公司並開始建廠。當時該廠所需之玻璃原料玻璃砂（石英砂）及白雲石尚無著落，因此董事長陳尚文先生邀

請林朝棨教授協助尋找良好的玻璃砂及白雲石。當時林教授因教學工作甚忙，無足夠的時間外出調查研究，因此邀請他的學生周瑞燉地質師去竹東—北埔—獅頭山—出磺坑一帶尋找良好的玻璃砂（石英砂），並赴臺灣東部木瓜溪、立霧溪、清水溪及和平溪（大濁水溪）一帶尋找品質良好的白雲石。經由林教授的指導，由周瑞燉地質師等在北埔鄉番婆坑及大南坑、峨眉鄉茅坪及獅頭山田美、公館鄉番子寮及上福基等處找到品質良好的玻璃砂原料。經辦理有關開採手續後開採，選洗砂後供應製造平板玻璃。又經由林教授的指導下，由周瑞燉地質師，在花蓮縣木瓜溪、立霧溪、清水溪及和平溪找到品質良好的白雲石，並經開採後供應做為製造平板玻璃之部分原料。總之，經由林朝棨教授的指導及協助，新竹玻璃製造廠公司得以找到品質良好的玻璃砂及白雲石做為製造平板玻璃的主要原料。製造的平板玻璃即供應給建設營造公司建設樓房、廠房或校房。自此後，臺灣不必自日本或歐美進口平板玻璃，而得節省鉅額外匯。

肆、奉獻培育 地球科學英才

林朝棨教授認為「作育英才」是最

具體報效國家的工作，因此他終身致力於培養優良地球科學人才。他先後執教臺北帝大、長春工業大學、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臺灣大學、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聯勤測量學校、中國文化大學等學府，歷時50多年。他始終以「學不厭、教不倦」的精神教導學生，從華北到臺灣培養的地球科學英才至多，可謂桃李滿天下，其中很多位都是國內外地球科學著名專家。他受到「一日為師，終身為父」觀念的影響，對待學生如父子。學生如有所求，必盡力幫助。教學嚴格但態度如煦，保持並推行愛



1983林朝棨伉儷。

資料：（《林朝棨紀念文輯》林恩朋先生提供）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 IV

學生勝過自己子女的教育家精神。

林朝榮教授經常主動替學生解決有關研究生出國進修、婚姻及生活上的問題。在中國大陸執教時，曾有許多學生遠離南方故鄉而獨自一人在北方，因此常常被他留在家吃飯，並多方照顧、排除寂寞。這些學生畢業後結婚時，林教授都親自出席證婚。1948年中國淪陷，一群從中國大陸逃難來臺的學生及同事，均經打聽來到林教授在東門的家暫時落腳。當時僅有40多坪的日式房屋裡住著包括學生及眷屬等人，最多時擠上了30多人。為了他們的生活，林師母只好賣了首飾來買菜、米，煮給大家吃。以後經林教授的安排，推薦進入學校繼續求學或就職。這群飽受溫情的青年各奔前程。在各人的努力之下，昔日的汪廣平（明道中學創辦人）、王洪文（臺灣大學地理系教授）、張奕華、王長春、洪紹文、高士林等學生及趙麗蓮教授（北師大同事）等成為國內外知名的人士（林恩朋，1986）。

林朝榮教授疼愛學生，但教學卻十分嚴格。他承受的日本教育背景訓練，使他深深地體會到地質科學理論與實際工作是同等重要。因此他認為地質野外調查實習課程，甚至比地質科學理論更為重要，由此他除了注重學科成績外，

更嚴格注重野外實習成績。前曾有一位國外的傑出地質學家回憶，因他曾在野外實習地質時經常走路慢，未能緊跟林教授接受野外授課，以致野外地質課被打不及格。可見林教授的教學甚嚴格。

伍、奉獻地球科學研究

林朝榮教授幼時深受嚴父愛國思想薰陶，常盼能盡一己之力，貢獻國家社會，因此志於地球科學之研究，畢生貢獻心力於地質科學教學研究與地下礦產資源之探勘研究工作，可謂功在國家社會。林教授因日間公務繁忙，當天不克辦妥的事項，經常於夜間處理，有時假日也不休息，畢生始終保持著“今日事今日畢”，絕不延到明天。由於這種堅忍不拔、刻苦耐勞的工作精神，先後五十年完成了地球科學、礦業、工程地質及考古學等論文150多篇，涉獵甚廣，造詣甚深，均為國內外有關地球科學及礦業界人士的寶貴參考資料。

1973年林朝榮教授接受王雲五先生託請，主編國內第一部科學大辭典—「中山科學大辭典」的第6冊「地球科學」，於1973年12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書之主編為林朝榮教授，編輯委員及撰稿人為王執明、王潤璞、石再添、林朝榮、周瑞燉、周聞經、陳琴、陳汝勤

、陳國彥、陳培源、張奕華、楊金章、楊萬全、潘玉生、譚立平、李英林等16人。其內容包括：

1. 太空地質學（陳汝勤撰稿）
2. 超高層大氣學（林朝榮撰稿）
3. 氣象學與氣候學（陳國彥撰稿）
4. 海洋學（陳琴、陳汝勤撰稿）
5. 陸水學（楊萬全撰稿）
6. 測地學及製圖學（王潤璞撰稿）
7. 地形學（石再添撰稿）
8. 普通地質學（陳培源撰稿）
9. 礦物學（王執明撰稿）
10. 地球化學（譚立平、陳汝勤撰稿）
11. 岩石學（陳汝勤撰稿）
12. 土壤學（陳培源撰稿）
13. 地球物理學（潘玉生撰稿）
14. 構造地質學（張奕華撰稿）



林朝榮教授(左)與周瑞燉教授(右)
資料：(周瑞燉教授提供)

15. 堆積學（周瑞燉、林朝榮撰稿）
16. 古生物學（林朝榮、張奕華撰稿）
17. 地質年代學（林朝榮撰稿）
18. 地史學及區域地質學（林朝榮撰稿）
19. 礦床學（譚立平撰稿）
20. 野外地質學（周聞經撰稿）
21. 中國地質（李英林撰稿）

計21章，本文859頁，中英文索引133頁，全書計1千多頁，至今仍為國內最完整之「地球科學辭典」。

1970年由林朝榮教授所著「臺灣地形」一書，計有4冊，臺灣省通誌，卷一，土地誌，地理篇，是匯集往昔有關臺灣地形論著的精華編寫而成者，其綱目分明，敘述中肯，圖幅精彩，文獻齊全，為最有參考價值的臺灣文獻之一。

1974年林朝榮教授與周瑞燉教授共著「臺灣地質」一書，計有450頁，插圖63，表41，由臺灣文獻委員會出版。其內容包括：

1. 地層誌（周瑞燉編著，序論、臺灣之地層、臺灣新生代地層之堆積作用、臺灣之地質構造、臺灣之火山地質）。
2. 礦物誌（林朝榮、丁志興編著，自然元素礦物類、硫化物礦物類、氟化物礦物類、氧化物礦物類、碳酸鹽礦物類、矽酸鹽礦物類、磷酸鹽



台大地質系學生於1698年在台東縣長濱鄉八仙洞(潮音洞)全景。資料：(《林朝榮紀念文輯》林恩朋先生提供)

- 礦物類、硫酸鹽礦物類、燃料礦)。
3. 岩石誌 (林朝榮、嚴致中編著，臺灣之火成岩、臺灣之沉積岩、臺灣之變質岩、岩石各論)。
 4. 古生物誌 (林朝榮、劉平妹編著，臺灣產化石研究、原生動物門化石、腔腸動物門化石、蘚蟲動物門化石、腕足動物門化石、軟體動物門化石、蠕蟲動物門化石、節肢動物門化石、棘皮動物門化石、脊椎動物門化石)。

「臺灣地質」一書匯集往昔有關臺

灣地質論著的精華編著而成，其內容豐碩，均為國內外有關地球科學、工程地質及礦業界人士的重要參考資料。

林朝榮教授為我國地史學權威，尤其精於第四紀地質學、螺類化石及脊椎動物門化石，同時亦為我國考古學土石層及地層年代鑑定之權威。三十年來先後和其他考古人類學家領導臺北縣八里鄉觀音山麓之大坵坑遺址、高雄縣林園鄉鳳鼻頭遺址、臺東縣長濱鄉八仙洞遺址等之發掘工作，並負責鑑定工作，對於臺灣的考古人類學研究工作有極大的



貢獻。尤其是林教授在1967年勘查研究長濱鄉八仙洞各海蝕洞穴時，首次發現了臺灣唯一的舊石器時代遺址（也是臺灣目前年代最早的一個舊石器時代遺址）。此外，林教授曾鑑定1961年臺灣中油公司在竹東錦水頁岩內發現的上新世早期的海洋鯨魚動物骨化石。該次是臺灣最龐大動物化石的發現，曾引起中外地質學家的重視（³劉昭民，1986）。

1976年林朝棨教授與周瑞燉教授共

著「臺灣之地質學研究」一篇，計有28頁，圖4及表3，出版於臺灣文獻第26卷。其內容包括：

1. 臺灣之地層（古生代地層、中生代地層、新生代地層）。
2. 臺灣之礦產（煤礦、石油及天然氣、金礦、銅、鐵、硫黃、石灰岩及大理石、白雲石、蛇紋岩、石棉及滑石、雲母及長石、玻璃砂、石英或水晶、黏土、高嶺土及膨潤土、石膏、鹽、獨居石、鉛石、鈦鐵礦、地熱）。

「臺灣之地質學研究」一篇再匯集新近有關臺灣之地層及礦產研究成果的精華編著而成，為國內外有關臺灣之地層及礦產研究的另一篇寶貴參考文獻。

林朝棨教授有感於第四紀的地質知識與國民生計有密切的關係，著手臺灣各地第四紀的系統研究，除了應用碳14定年資料建立臺灣各地的第四紀地層層序，並進而探討新構造運動外，且做了世界性的對比。由此於1963年寫成了「臺灣之第四紀」一文，並刊登於臺灣文獻第15卷，計有91頁，插圖15，表18，終於奠定了臺灣第四紀地質之基礎研究。因為研究第四紀地質，需要研究地形

3. 劉昭民（1986）《林朝棨》〈林朝棨（戟門）先生紀念文輯〉167頁。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 IV

學、古脊椎動物、考古學、貝塚、花粉與貝類化石及考古人類等，因此所須研究範圍甚廣。他將這些專門學問整合於第四紀研究中，並且請他的學生劉平妹博士（臺灣大學地質系教授）等推動臺灣第四紀研究。劉博士集合國內所有對第四紀有研究的學者，團結力量，共同努力探討，使林教授奠立的研究基礎，能進一步發揚光大、名揚國際。

林朝榮教授首先發現臺灣舊石器時代文化之存在。1968年他帶領臺大地質系學生在臺灣東部海岸峽谷區做地質調查工作時，發現了臺東縣長濱鄉樟原村八仙洞洞穴中的堆積物含有舊石器時代的文化層，並有年代古老的紅土層，而認為該洞穴有重大研究價值。回北後，轉告臺大考古人類學系，並經多次研討後，決定由他本人配合當時由宋文薰教授與連照美講師兩人率領的臺大考古人類學系田野工作隊，前往做全面性挖掘、採集工作。在他們不斷的努力下，一再挖出各類舊石器時代的先陶文化標本，有石器、獸魚骨、骨角器等，總計約達 4,000 件。加上林教授多方面地質學上的印証，証實了八仙洞為臺灣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同時也確定了 5,000~6,000 年前這些洞穴內也還有人類祖先居住。這對臺灣史前文化

的論述有重大貢獻。經由此重大發現，使八仙洞名噪一時，並成為熱門的風景據點。

林朝榮教授於1969年在臺灣北部外海數度發現了「龍宮翁戎螺」（龍宮翁貝），同時經由他的鑑定而証實，同時區分類別。林教授連日不眠不休地與當時省立博物館館長劉衍先生共同觀察自臺灣北部外海採到的兩個活龍宮翁貝在水族箱內的生活狀況，經過觀察了解其生活狀況後，寫了詳細的報告，並在國際貝類協會上發表，因此「龍宮翁貝」一時成名，並提昇了我國貝類學會在國際上的地位，而且直接推動了國內各界對於貝類的研究風氣（林恩朋，1986）。

陸、教育研究做事精神

林朝榮教授終身以永不停止的努力從事地球科學教育及研究，使他成為名聞國際的臺灣地質學家。不但榮獲日本東北大學的理學博士學位，在學術界還尊稱他為「臺灣第四紀之父」。

林教授堅毅執著，秉性純篤，公正不阿，廉儉自持，待人熱誠而責己嚴，對於年輕輩則提攜關懷，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教學嚴謹，畢生不斷吸取新知，培育人才，盡心盡力於學術教育研究及國家建設，有重大成就。

林教授在普通地質學的頭一堂課就勉勵我們，要以刻苦耐勞的精神用功學習研究地質學。他授課時，不停地將他所知道的知識傳授給我們。他帶領我們去野外調查地質時也不停地走、觀察，毫不保留地講解，早出晚歸，風雨無阻。有一次筆者跟他去臺灣東部調查礦床地質時，須爬上危險的鬆弛礫層斷崖。當時該斷崖的礫石隨時會崩坍下來，因此筆者建議改道攀登，以策安全。但他不畏懼，堅持要爬上去，後來筆者也沒有辦法，只好跟著冒險帶頭爬上去了。又有一次到花蓮木瓜溪上游天長斷崖一帶調查時，筆者曾站在斷崖旁邊勘查而深感危險，他立刻喊筆者不要靠近該處，以免危險。由此可知林教授做事不僅有堅毅執著的嚴格面，也有愛護後進的另一面。

林教授對待學生親如父兄，態度如煦，關心學生的研究工作、生活及將來。學生及後輩若有所求，必能盡量給予幫助。他經常提供研究資料、指導研究，並鼓勵撰寫論文。他亦時常替學生尋找工作機會，或協助解決留學進修、婚姻及生活上的問題。他待人接物的謙沖儒雅、大師風範及愛護學生、提拔後進的慈祥胸懷，更是我們終身的典範。

「守時、守信」及「認真、負責」

是林朝榮教授日常處事的原則及態度。他最痛恨不守時及不守信的人，並認為大部分的中國人沒有建立時間觀念，而且有些人不守信，以致如今不能在世界上成為真正的強國。為了改革，林教授經常赴約、上課、演講、做禮拜，一定都提前出發，準時到場。他很少接受別人解釋不守時的理由，同時認為不守時的人，大部分也是不守信的人，不值得做為好朋友。林教授凡事要快，做事注重速度及效率，但有時過於匆忙而有些許差錯，但他常以負責認真的態度來彌補自己的缺點。他在臺灣省建設廳當礦務科科長時，曾要求同事辦理礦務要正確並且要快速，而且為民服務時也要正確並迅速。但有些同事表面上答應，但事實上慢吞吞，不遵照指示，依然保持以前不良公務人員的作風。這些不良現象出於不良的家庭、學校、社會或官僚教育。這是一個不良的現象。他盼望人人不要有此種不良的習慣，而盼望人人做事要守時、守信、正確並且要認真且負責做事，為社會國家服務。

林朝榮教授是對筆者一生影響最深的恩人。林教授幼時深受嚴父愛國思想的薰陶，常盼能盡一己之力，貢獻國家社會，因此志於地球科學之研究，而畢生貢獻心力於地質科學教學研究及礦產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Ⅳ

探勘工作，可謂功在國家社會。

平常林教授出門前一定要梳洗一番，並換上整潔的襯衫或衣服，同時在不同的日子打上不同的領帶。這並不是只為外表，而是要以整潔來煥發朝氣。由此可知林教授平日求美求善的精神。

林教授是一位急公好義，學養兼備的仁厚學者，為人處事任勞任怨、認真負責、踏實穩重，絕不敷衍推託，尤能寬恕待人，分擔他人疾苦。

林教授始終竭智盡慮，奉獻心力。林教授堅苦卓絕，鏗而不捨、犧牲奉獻的敬業精神，永遠值得我們效法。謹記片斷事蹟，除了感懷師恩之外，也表示對恩師無限的景仰及懷念。

參考文獻

石再添（1986）《林教授朝榮先生與我》〈林朝榮（戟門）先生紀念文輯〉140-142頁。

林恩朋（1986）《我的父親》〈林朝榮（戟門）先生紀念文輯〉127-137頁。

周瑞燉（1986）《一位慈祥偉大的嚴師》〈林朝榮（戟門）先生紀念文輯〉149-150頁。

周瑞燉（1992）《重修臺灣省通志、卷2、土地誌、地質篇》880頁。

林朝榮（1957）《臺灣地形》〈臺灣省通志稿、卷一、土地誌、地理篇、第一冊〉423頁。

林朝榮（1973）《地球科學》〈中山自然科學大辭典第6冊〉895頁及133頁。

林朝榮、周瑞燉（1974）《臺灣地質》〈臺灣省文獻委員會〉450頁。

林朝榮、周瑞燉（1976）《臺灣之地質學研究》〈臺灣文獻、第26、27卷，第4.1期〉67-95頁。

張奕華（1986）《週年祭憶師恩》〈林朝榮（戟門）先生紀念文輯〉144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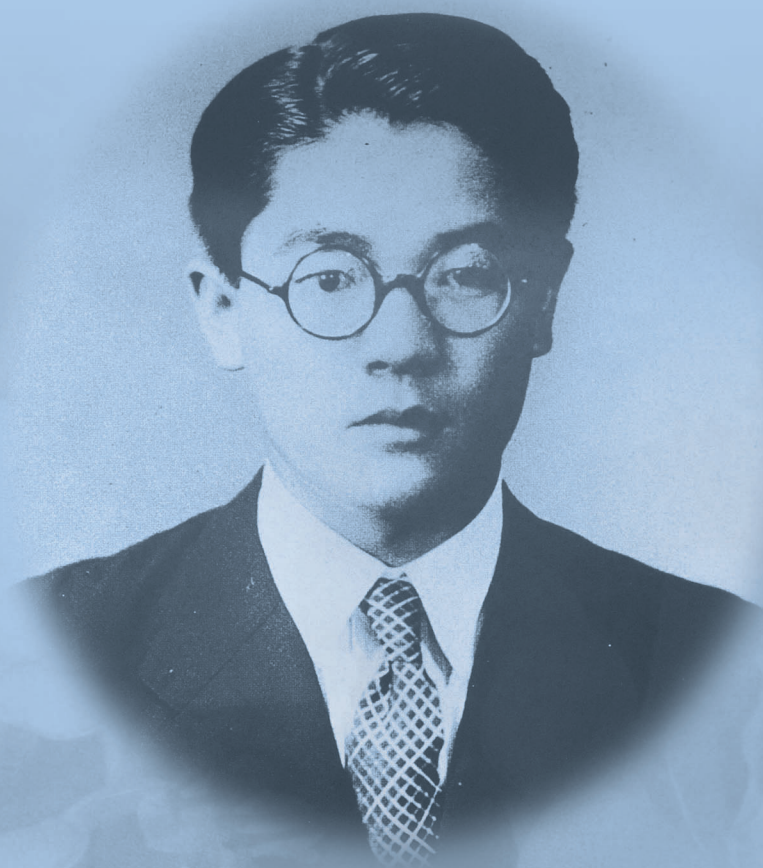
劉昭民（1986）《林朝榮》〈林朝榮（戟門）先生紀念文輯〉167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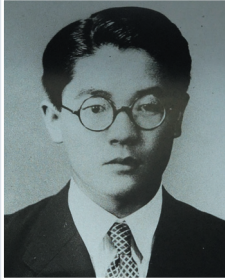
張漢裕

1913~1998

◆ 台灣農業經濟的奠基者 ◆

葉淑貞／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





張漢裕老師於1913年6月2日出生，1998年10月29日辭世，享年85歲。他堅持教學工作達50多年，培育出無數優秀的學子。他一生從事研究工作更長達60年，在許多領域上長期居權威地位；在台灣戰前或戰後的實際經濟問題上，有許多獨特的發現。他的學術研究重視人的因素，在主題的選擇上非常具有系統，且又能排除非學術干預。這是因為他具有仁慈的心、冷靜的頭腦、負責的態度、勇者的風骨、敬業樂業的精神。

壹、前言

張漢裕老師於1913年6月2日出生，1998年10月29日辭世，享年85歲。他是我們經濟史與經濟思想史的先師前輩，無論在教學上或在研究上，都締造了豐碩的成果。

透過教學與研究，張老師啟迪了無數的學子與學者。張老師從1946年獲聘任教於台大經濟系之後，在50多年的教學生涯中，培育了無數優秀的學子。從36學年度任教以來，開授了將近20門的課程。其中，西洋經濟史始自46學年度，延續至83學年度；經濟思想史也起於46學年度，且持續到他去世；

而職業倫理的開授則從83學年度開始，當時他已經80高齡了。¹

如果從1939年發表第一篇文章算起，一生從事研究工作60年，以中、日、英文，發表了文章近百篇、著書10多種、譯著7種，在學術研究上創下了豐沛



1943年4月6日張漢裕老師與台灣民主、文化運動名人蔡培火的三女兒蔡淑玲結婚，由他的老師矢內原忠雄（下圖二排左）擔任介紹人。（後排右四為蔡培火）。資料：（《島國顯影》張尚一先生提供）

1. 關於張漢裕老師授課的歷程，參考葉淑貞，2005，頁163。

的成果，這些著作中的一大部分收集在張漢裕博士論文集。²

他的研究主題環繞於台灣經濟史、西洋經濟史、經濟思想史及職業倫理等四個領域。在這幾個領域中的許多課題上，張老師都是開創者，而且迄今都還獨居權威地位。在他的著書中，《日本企業經營之研究》以及《日本社會保障制度》，分別出版於1989與1992年，當時他已近80歲高齡。此外，也有將近20篇的文章，是在他70歲以後才發表的。

張老師在每一個十年階段，都有一個大的研究主旨。他在1940年代便對重商主義展開研究，並獲得豐碩的成果。接著，以研究重商主義所獲之殖民地政策的歷史為基礎，於1950年代轉而研究日治時代的台灣經濟，發現並提出了不少與眾不同的論點。隨後，在1960年代，集中精神闡揚 Max Weber 的學說。從1960年代底到逝世為止，就持續運用從重商主義以及 Weber 學說的研究中，所得到之職業倫理的理論，探究台灣與日本經濟的發展。此外，在1950年代發現當時農民的生活程度有惡化的現象後，在1970年代，也轉向戰後台灣經濟的

研究。⁴其中，台灣經濟史中的不少課題、職業倫理、西洋經濟史中的重商主義以及思想史中的偉伯（Max Weber）學說的闡揚，可以說都是台灣學界的權威。

為了表達對張老師無限的追思與感恩，本文將介紹張老師在學術上的成就及他的治學精神。⁴

貳、重商主義及偉伯學說的闡揚

張老師在西洋經濟史及經濟思想史的研究，迄今都還是台灣經濟學界的一枝獨秀。在西洋經濟史的領域中，對重商主義的研究，更屬國內學界的權威。而在思想史方面，對德國社會學家偉伯思想的闡揚，是他另一重要貢獻。在重商主義的研究上，有文章10幾篇，著書與譯著各1冊；在偉伯學說的研究上，有文章4篇以及譯著2種。⁵

從1939至1944年，張老師每年至少發表一篇重商主義的研究心得。這些文章中的6篇，後來在1954年集成《イギリス重商主義研究》一書，該書被學界稱為經典之作。此外，在1941年時，

2. 關於張老師的著作目錄，參見《張漢裕博士論文集(七)》，頁238-259；以下將《張漢裕博士論文集》簡稱為《文集》。

3. 關於張漢裕老師的著作目錄，請參考葉淑貞2005，頁164-173。

4. 至於張老師的學術淵源，可以參考黃紹恆，2001；而關於張老師的研究方法，請參考葉淑貞，2005。

5. 關於張老師這方面的著作，請參考葉淑貞，2005，頁134。

他就已經將重商主義文獻中最居重要的一書：*Thomas Mun, England's Treasure by Foreign Trade (1644)*，翻譯成日文。這一系列的研究，除了為張老師往後的研究奠下堅實的基礎之外，也成為該領域研究的權威。

經由這些著作，張老師提出了他對重商主義的獨到見解。所謂重商主義大別為兩種：一種是財政性的；另一種是產業性的。只有後一種才對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有貢獻，其最純真的典型可見於17世紀30年代到18世紀中葉的英國。

資本主義的發展須要資金，而當時英國銀根短缺，因而從17世紀初以來，就有一連串的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之論爭，最早的論爭是主張重金主義的保護主義與湯姆斯曼（Thomas Mun）的自由貿易論間的爭辯。前者主張為增加國民的就業與財富之生產，應禁止金銀的輸出；後者認為禁止金銀輸出，將導致物價上漲，輸出減少。自亞當思密以來，一般都認為湯姆斯曼的主張超越重金主義。但是，張老師從17世紀初英國國

內生產性向旺盛，且未利用資源豐富的情況，認為當時重金主義之主張，比較有助於英國近世初期資本主義的發展。⁶

18世紀的重商主義較之前一世紀而言，已出現劃時代的變化。當時的保護主義領導者為查理士金（Charles King），他們的主張與前時代保護主義的主張相比，有重視消費、重視國內市場及主張自由貿易等三大轉向。這些轉向與18世紀英國經濟力量的提升有關。當時英國資金已豐裕，生產力也大幅提高。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主張保護主義的重商主義，乃轉向自由貿易的主張。張老師因而提出：這轉向及其理由暗示，亞當思密於半世紀後主張全面自由放任的歷史背景；而關於此點，應重新研究（張漢裕，1984b，201-238）。

在思想史方面，張老師最為人稱道的就是對德國社會學家偉伯學說的闡揚。張老師對偉伯的研究著作有四篇，除了介紹偉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之外，也詳細地闡述經濟學界對「資本主義」的各種定義。偉伯所謂的「資本主義」乃

6. 所謂生產性旺盛指的應該是提高產量的潛力相當大，一般我們認為如果資源已經達到充分利用，也就是充分就業的狀態，也就沒有多餘的資源可供利用，因此無法生產更多的物品。而張老師認為當時英國國內的生產性旺盛，且未利用的資源豐富，也就是說當時英國應該擴張產量的空間還相當大。重金主義的主張是為增加國民的就業與財富之生產，應禁止金銀的輸出；而自由貿易主義則認為禁止金銀輸出，將導致物價上漲，輸出減少。英國當時資源尚稱豐富，因此禁止金銀的輸出，不會導致物價的上漲，因為還未達充分就業的狀態，還有可用的豐富資源。相反地，自由貿易論之所以認為禁止金銀的輸出將導致物價上漲，乃是因為當時英國實施金屬本位的貨幣制度，因此在有貿易出超的狀態之下，如果禁止金銀的輸出，將使國內貨幣供給增加，則將使國內的需求增加，這時如果國內物資的生產不足以支應國內增加的需求的話，將會造成物價的上漲。但是既然張老師認為當時英國的資源還豐富，而且生產性旺盛，因此國內的供給可以增加至足以應付國內增加的需求的程度，將不至於導致物價的上漲。



1950年六月張老師(中坐者)與「中國經濟專題研究班」的學員攝於台大法學門正門。
資料：(《島國顯影》葉淑貞教授提供)

是指工業社會，「資本主義精神」則指實業精神或企業精神。而關於偉伯的研究，另有兩種譯著，一為中文，是偉伯不朽的名著《馬克司·偉伯：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張漢裕，1960）；另一者為日文，名稱是《マックス・ウェーバー：「儒教と清教」》（張漢裕，1958）。

經由張老師的這些著作，我們得以瞭解近代資本主義之所以成立以及資本主義精神是如何形成的。關於近代資本主義的成立，許多研究者都重視商業資本的角色，但偉伯提出這並非英國的發展路線。英國早期手工場主及勞工階級，主要由中小生產者階級成長演變而來。而關於資本主義精神的形成，偉伯認為最有力的因素是清教，且認為清教主

要的信奉者是中小生產者階級。從清教對資本主義的發展所扮演的角色，偉伯提出一個社會如果有某種宗教，能有效培育制慾勤勞的職業倫理，則現代企業組織與工業社會之發展將愈強盛。

參、台灣經濟史

以1940年代對重商主義的堅實研究作為基礎，張老師在1950年代展開日治時代台灣經濟的研究，爾後於1970年代又將焦點轉向戰後。在台灣經濟史的研究中，張老師關懷的主題很廣，但是若從篇數或篇幅來看，則以農民經濟以及所得分配為最主要的焦點。這些研究所涵蓋的時間序列，起於日治時代，迄於戰後。⁷

張老師特別關懷台灣農家的生活，《文集（一）》的標題便是《經濟發展與農村經濟》，而在其它6冊文集中，也或多或少都有這方面的文章。在〈台灣農民生計之研究〉中，他比較了日治時代到戰後農民生活水準的變化。該文的研究結果顯示：農家的實質生活，在戰後的1950年代初期還低於1930年代的日治時代。又透過食、衣、住、行等許多指標，他也指出：戰前農家的生活水準

7. 關於張老師這方面的著作，請參考葉淑貞，2005，頁137-138的表2所列著作。

，已經不低了。在1950年代，選擇此一主題的研究，並敢於提出這樣的發現與結論，顯示了張老師的勇者風範。

該文中精闢縝密的每人熱量攝取量之估計，獲得國際學術會議高度的肯定。⁸該方面的估計與分析，迄今還無人能出其右。學者Ho（1968，1978），雖曾重新推算戰前台灣平均每人每日攝取的熱量，但是只是簡要地以每人消費的米與甘藷量，加以推算；張老師則逐一推算各項消費品的熱量。而在資料性質上，Ho用的是總體資料，張老師用的則是家戶個體資料。此外，張老師的估計方法也比較精細。⁹由於這些差異，兩人所獲結論也有相當的歧異。

發現1950年代農民的生活程度有惡化的現象後，張老師接著在1970年代，將研究焦點轉向戰後經濟的研究。那麼，台灣人民的生活水準在戰後何時才開始改善呢？根據〈台灣人民生活水準之測量〉一文的研究，全台可支配所得、消費支出及儲蓄，在1961-68年間，成長率低且不穩定；直到1968年間，才有持續而高度的增長（張漢裕，1984a，頁193-234）。不過，在此一期間，農

民的生活水準，雖也有相當的改善，但若與非農民相比，卻仍然偏低。這個結論促使他更進一步探討1950、1960、1970年代，農民相對所得的變化，並解析其間的影響因素。在〈台灣農家所得的變化及其影響因素的分析〉一文中，他指出原因在於該期間農家相對扶養率較重、交易條件不利、與國民農糧消費增加率比國民所得增加率落後等3個因素（張漢裕，1984a，頁71-128）。

張老師又從農、非農間所得差距的探討，擴大到全台家庭所得分配的變化趨勢。關於所得分配的變化趨勢，學者指出許多已開發國家，在長期成長的早期階段，所得分配的不均度有擴大的傾



張老師探討1950至1970年代影響臺灣農民所得的因素，也為研究日治時代台灣農民生活與經濟發展奠定紮實的基礎。其研究書籍集結成《張漢裕先生全集》。

8. 在美國社會科學研究協會（SSRC）與美國學術會議日本研究委員會，於1979年聯合舉辦之「日本殖民帝國」學術會議中，獲得高度的評價，（見文集（二）P.XII的說明）。

9. 詳見葉淑貞（1994a，1994b）的討論。

向，直到後期階段才趨於平均化。然而，關於台灣所得分配的變化，許多研究卻提出，隨著經濟的發展而呈均等化的趨勢，因而將此一現象視為戰後台灣經濟發展的奇蹟。但是，張老師的研究卻指出：（1）在1953-1973年間，1968年以前的所得分配有不均等化的趨勢，該年以後才轉為均等化；（2）儘管分配平均化了，但此一現象並不穩定，所以應該預防分配差距之再度擴大（張漢裕，1983a，頁 49-88、頁 89-92；Chang Han-Yu，1983，PP.112-137）。

而台灣總督府為了開展台灣的經濟，在統治初期便經由土地制度的改革，而建立了現代化的財產權；統一幣制與度量衡；建立現代化的交通系統。這些基礎設施的建立降低了交易成本，促進了市場經濟的發展。總督府又從技術的改革，開發米糖等產業。米穀技術的開發最重要的是蓬萊米技術的研發；而糖業的開發包括甘蔗農業與砂糖工業兩方面。在蓬萊米與甘蔗技術的變革中，政府扮演了品種引進與改良、水利灌溉設施的投資、獎勵化學肥料的使用等等角色。而在現代化糖業的建立上，政府更是不遺餘力，推出了不少補貼政策，又建立原料採取區域的制度。這些措施都是促使糖業在短期內快速發展起來的重



張老師一生從事研究工作60年，發表中、日、英文文章近百篇、著書10餘種、譯著7種等。是開創臺灣經濟史科學方法研究之先鋒。

要因素。

這些技術的開發與快速的推廣，主要是透過中央與地方政府部門的研究機構與農會組織。為何這些機構與組織能夠有效率地運作起來？為何各種政策能夠適切地達到目的？這與日治初期總督府所羅致的一群具有強烈事業精神的官僚有關，他們所制訂的殖民地開發政策基本上也是後繼總督努力的方向。張老師在〈日據初期殖民地開發政策〉一文，對這一官僚團體有以下的形容：「這團隊以後藤為中心經常集會。他們發掘問題，擬定新的政策，後藤經常加以鼓勵、批評，要求更好更有效的表現。」

後藤以任務之重，責任之艱巨，鼓舞這團隊，以期望能實現他和兒玉所懷

抱的遠大目的。」¹⁰

而歲入的穩定增加支應了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財源，那麼政府歲入的穩定增加是否構成台灣人沈苛的負擔呢？張老師分別從政府的歲入結構、台日人平均每人稅額與稅率、以及政府的支出結構來解答此一問題。他發現政府的收入主要用在經濟發展事業上，而人民食、衣、住、行等生活方式與品質有相當的改善。綜合多種論據，最後提出：人民的財政負擔雖然不輕，但是政府財政也促進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張漢裕，1984a，頁395-502）。此處政府財政促進人民生活水準改善的論點，與前述農民生活水準研究中，所發現之戰前生活水準已經不低的結論，有相互呼應之效。

張老師的此一論點不同於戰後其它相關研究的主張。對於此一課題的研究，戰前以矢內原（1929）與北山（1934）為主。矢內原主張負擔苛重，戰後的周憲文（1958）與黃通等人（1987）延續此一論調。北山主張負擔不如一般人想像的重，張老師則延續北山的觀點。經由對日治時代的研究結論，張老師不僅提出了好些與他人迥異的看法，也對日

治時代的經濟進行了相當全面且有系統的分析，對於有志研究日治時代的後輩學者有相當的助益。

肆、職業倫理

受到偉伯學說的影響以及自己研究重商主義的心得，張老師自然特別重視現代職業倫理與資本主義的關係。從1960年代起，張老師的研究就延伸到職業倫理這個領域。並且有感於職業倫理的觀念須及早深植人心，他也於1983年開始開授該方面的課程。在台灣經濟學界中，職業倫理的研究領域，張老師可說是開創者，令人惋惜的是，迄今這方面的研究仍然十分稀少。¹¹

在職業倫理的研究中，張老師觀察



1943年張老師於研究室的照片。
資料：（張尚一先生提供）

10. 本文原以英文發表，文章名稱為“Japanese Colonial Development Policy in Taiwan, 1895—1906: A Case of Bureaucratic Entrepreneurship”，後來蒯通林先生將之翻成中文，刊載於《文獻專刊》16：3；後又輯錄於文集（二）。

11. 張老師該方面的研究成果，見葉淑貞，2005，頁142的表4所列各文中。

到在西洋世界中，發達的現代工業社會普遍具有勤勞、誠實、篤信、敬業、樂業等風氣。因而在〈論現代工業社會的企業家作風及職業倫理〉一文中提出：「這種觀念與作法，在工業社會裡並不限於企業家這一階級本身，在經理人員、技術人員以及勞工之間亦有相當顯著之表現。甚至於營利性企業以外的普通及專門性職業的人員，如公務員、教師、研究者、醫師等行業中亦不乏這種觀念與作法。」（張漢裕，1984b，頁47-56。）

張老師也應用偉伯學說，研究日本經濟，所獲得的研究成果發表於〈職業觀念與技術變遷〉（張漢裕，1994，頁25-40）《日本企業經營的研究》（張漢裕，1989）以及“The Japanese View of Business and Work”（張漢裕，1995，頁140-180）等論著中。受到偉伯所主張之經濟與宗教的關係之啟迪，張老師進而探索日本德川時代以來的武士道、佛教、儒教，以及一些特別具有職業倫理與經營文化意義之人物團體的思想理念。他發現這些人的精神薪火相傳，生生不已，提高了二次大戰後日本年壯經營者的經營理念與成就。

在1970年代初，台灣經濟正面臨一個轉型時，張老師也從職業倫理的研究

，勉勵企業家發揮現代職業倫理精神。他說：「我們的經濟現正處於一重要轉機。因而，如果要在世界市場中仍然屹立生存，則非提高勞動、技術、經營的品質不可。這除須要提高知識技術、激勵、加強經營以外，根本就要以提高職業倫理、企業家精神為基礎。而提高職業倫理，又如同一切倫理教育，唯有領導人物、師長以身作則去教化薰陶，是不待言的（張漢裕，1983a，頁289）。」另一方面，他也強調有志貢獻於學術的人，必須專業於學術工作。他說：「學術研究者若不把握有限的時間與精力，專門貢獻於學術工作，很難在有生之日留下有價值有份量的成果（張漢裕，1983a，頁285-291）。」

伍、治學精神

張老師除了的好幾個研究領域具有權威地位，在研究主題的選擇上特別重視人的因素，且研究具有系統性，最後且最重要的，就是他能排除非學術因素的干擾。而他的研究之所以具有這些特點，乃是因為他在學術研究上具有一些個人的特質，這些特質形成了他個人獨特的治學態度。

一、學術研究的特點



張老師於台大校園拍攝。

資料：(《中華民國褒揚令集續篇(七)》葉淑貞教授提供)

從前面幾節的介紹中，我們發現張老師在重商主義、偉伯學說、職業倫理等領域的研究，迄今在台灣都還獨領權威地位；而在台灣經濟史中的農家生活水準、所得分配、日治時代人民的財政負擔等許多問題上，也都提出了獨到的見解。而他之所以能獲致這些成就，主要是因為他的學術研究具有幾項特點：特別重視人的因素，在主題的選擇上非常具有系統，而且又能排除非學術的干預。他的研究以人們實際碰到或發生的經濟問題為中心，因此非常重視人的因素。曾在一篇學生的訪問稿中，當學生問他對於現在經濟學強調數學工具，有

何看法時，他說：「經濟行為有人，各民族社會人的感情思想制度習慣不同。institution 不同，behavior 也不同，reaction，function 也就不同，也就是應該有不同的 model。由於各個國家的特殊性，不能只靠計量的 model（張漢裕，1983a，頁333）。」

而且在主題的選擇上非常具有系統。例如40年代的重商主義、50年代的台灣戰前經濟、60年代的偉伯研究、以及70年代以後的台灣戰後經濟與職業倫理。而台灣經濟以及職業倫理的研究，則是以先前對重商主義及偉伯學說的研究，作為理論基礎。又無論對戰前或戰後研究，所發表的一系列論著，其間的主旨也都有關連，尤其是具有因果關係。透過這種系統性的主題選擇，才能讓他洞見到前人所未發現之事實。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能以勇者的精神，排除非學術因素的干擾。在研究課題的選擇與結論的提出上，在在都顯示了他勇者的風骨。在解嚴以前，特別是1950年代，許多人不敢觸及許多課題；既使觸及也不敢深入分析；就算進行分析，也多流於帝國主義論的框架。然而張老師卻敢於選取因政治因素所致，致使別人不敢觸及，但又是當時經濟問題中的重要環節。農民生活水準的變遷以

及日治時代台灣人的財政負擔的研究，以及從中所獲結論的公諸於世，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在他的時代或甚至直到解嚴以前，儘管有一些研究像他一樣，或是環繞於日治時代的經濟問題，或者對戰前與戰後的經濟問題作比較分析。然而這些研究的方向都集中於生產技術和生產力的探討，甚少深入分析臺灣人民生活水準的課題，即使有也多僅是蜻蜓點水般地觸及而已，而且往往流於帝國主義剝削的意識型態論。

張老師是第一個有系統探討此一課題的學者，內容以〈台灣農民生計之分析〉一文為題發表。他的一些這樣的文章曾引起一部分人士的擔心或不悅，例如〈台灣農民生計的研究〉一文投稿至《台銀季刊》後，台銀雖願意付稿費，但對於發表與否有虞慮；也有人從旁告訴他，那文章若發表，可能對他不利。但他卻表示：願意退稿費，不過要珍惜保留發表的自由（張漢裕，1983a，頁288）。

二、治學態度

張老師的學術研究之所以具有上述這些特點，乃是因為他具有一些獨特的個人特質：仁慈的心、冷靜的頭腦、負

責的態度及勇者的風骨，而他的治學態度更是具有敬業樂業的精神及長久的時間概念。而這些特質乃是受到幾位經濟學大師，例如西洋學者亞當斯密、馬夏爾與東洋學者矢內原忠雄、大內兵衛等人的薰陶。

在選擇研究主題時，秉持著仁慈的心。曾在接受學生訪問時，他說：「Marshall 主張經濟學家應具有 warm heart（溫暖仁慈的心），cool head（冷靜的頭腦）。其本為數學家，後來看到倫敦貧民窮苦的情形，激發了仁慈心，想使他們脫離貧窘，因而研究經濟。我們在研究時，也要像馬夏爾一樣，以溫暖仁慈之心為出發點，俾能找對問題（張漢裕，1983a，頁335）。」因為懷著這樣的胸懷，他特別關心台灣農家的經濟以及所得分配等層面的問題。

以仁慈的心與冷靜的頭腦進行研究工作的態度，乃是受到馬夏爾的薰陶。他曾說：「這樣的研究態度，才能對任何社會、民族、國家的經濟也好，政治也好，究竟對不對或應如何辦法，加以正確的科學分析乃至判斷。」冷靜的頭腦使他的研究得以擺脫意識型態的束縛，而此一精神可能也受到亞當斯密的薰陶。亞當斯密在研究英國重商主義時代，殖民地的開發政策帶給殖民地人民的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Ⅳ

利弊損益等問題上，便拼棄意識形態與民族感情的價值判斷，而作冷靜客觀的分析與科學的評估。張老師也本著這樣的精神，看待日治時代的經濟問題。

仁慈的心促使他的研究以人的問題為關懷的核心。他之所以特別強調人文因素，其來有自。在學生訪問他時，他曾說：1930年代是我一生中的黃金年代，在高等學校所受的教育真的是自由教育，校長、教師都努力從事於「人」的教育，皆有為國家、社會造「人」的志

氣。這種特質可能也是受到幾位經濟學大師的薰陶。他曾說亞當斯密的道德哲學是很廣的，涵蓋了倫理、文化科學，甚至較社會科學還廣。他稱文化及社會科學為道德哲學，是一種研究「人心」的學問，亞當斯密是位「人心」學者（張漢裕，1983a，頁333）。

此外，張老師也曾指出米爾及馬夏爾都把人性、品格的研究，納入財富經濟的研究。例如在馬夏爾的《經濟學原理》第二頁便說：「一面，經濟學是財



1935年張漢裕老師考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在東大赤門前留下入學紀念照，東大以培養日本文官著稱，故其校門稱「赤門」，又稱「朱門」（官府之門）的意思。（左一持帽者為張漢裕）
資料：（《島國顯影》張尚一先生提供）

富的研究，更重要的另一面，是人的研究。」所以，張老師在1991年，中國經濟學會召開的「政治經濟研討會」的理事長專題演講中，語重心長地提出，經濟學者要效法這些前輩，在經濟研究中注入人的因素（張漢裕，1994，頁3-7）。

負責任的態度使得他的見解都有堅實的論據作為基礎。他曾說治學與做人，都要秉持著「真知」的精神。所謂真知就是「有三分說三分，沒有就說沒有，『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知』是要相信，到此程度，才是『真知』，無論學術的，生活都是如此，也唯有這樣才能讓人相信（張漢裕，1983a，頁336）。』秉著真知的態度治學，以堅實的論據作為基礎，張老師的研究以及發現才能一直到今天都還有其存在的價值。

勇者的風骨以及負責任的態度使他能夠排除非學術的干擾，將獨到但可能



1994年退休歡送會上與師長同仁合影。左起：林大侯、張漢裕、黃金茂、右一許嘉棟。資料：（《從帝大到台大》黃金茂教授提供）

對自己不利的發現公諸於世。他這種維護真理的精神是從他的老師矢內原忠雄那兒學來的。¹²他曾說：「我在東大，最初參加的 seminar 就是矢內原師的那一班，他的課是殖民政策，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帝國主義下之台灣』等書。我從老師那兒學來的就是他敢於維護真理的精神。所謂真理，不但是學術上的，也是道理上的真理。我們除了談真、求真之外，還要衛真、維護真理，縱令千萬人，該說不是就說不是，該說是就說是，這種無畏的精神如今是最難能可貴的（張漢裕，1983a，頁330）。」

敬業樂業的精神，使他一生專業於

12. 矢內原以敢言著名。他在中日戰爭開始時，曾因「日本國沒有滅亡，則不會重生。」一語而遭筆禍（張漢裕，1983a，頁330）。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Ⅳ

學術研究，而且直到去世時，都還致力於研究與教學工作，因而能夠獲得豐沛的研究成果。他常提起留學東京大學時代的一位老師大內兵衛教授的話：「學術工作或成績，好比是屋簷上滴下來的雨水，經過很久很長的歲月，才留下一點點水垢在石頭上，而常為人所忽略。」這句話常提醒著他，必須把握有限的時間與精力，專業於學術工作。他的敬業樂業精神是眾人皆知的。他常說：「做學問要像唸『經』，要有恆心、天天唸、天天想、天天做，才会有結果。工作尤其是精神上的工作最初與修行一樣是痛苦（pain），但透過專業、敬業的過程後，反而會感到樂趣（pleasure），變成樂業（play），苦中有樂了（張漢裕，1983a，頁334-335）。」

在他的研究當中，時間序列都拉的很長。這種重視時間因素的精神可能與他研究經濟史有關。歷史的研究就是從時間的推移中，觀察問題發生的因果或史事的演變。時間序列可以無限地向前推，只要史料存在，而且又有必要。文化制度是一個社會人們的行為習慣所組成，人們行為習慣的形成與轉變通常要歷經相當長久的時間。所以，舉凡真正關懷經濟問題與文化制度之關係的研究者，其內心世界的時間觀念是相當長久

的。張老師內心世界的時間概念長久，這可能是他得以堅守教學崗位50多年，致力研究工作60年的關鍵因素之一。

陸、結論

張老師的學術成就可以歸納為四方面：（1）在教學上，他堅持教學工作達50多年，培育出無數優秀的學子；（2）在「許多」研究領域上「長期」居權威地位；（3）在台灣戰前或戰後的實際經濟問題上，有許多獨特的發現；（4）從著作的數目來看，也有豐碩的成果。這些成就的獲得與他獨特的治學方法與治學態度有關。他的學術研究具有幾項特點：特別重視人的因素，而在主題的選擇上非常具有系統，而且又能排除非學術干預。這是因為他具有仁慈的心、冷靜的頭腦、負責的態度、勇者的風骨、敬業樂業的精神、長久的時間概念。而張老師的這些精神，是我們效法的對象，不只是學術界的我們，其他領域的我們，也需要這樣的精神。

參考文獻

- 北山富久二郎著，周憲文譯（1959）。日據時代臺灣之財政。收於臺灣經濟史八集（87-163頁）。臺北：臺灣銀行。（原書成於1934）

-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1964）。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臺北：臺灣銀行。（原書出版於1929年）
- 周憲文（1958）。日據時代臺灣經濟史。臺北：臺灣銀行。
- 張漢裕（1958）。マツクス・ウーエーバ：「儒教と清教」。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アズア文化研究委員會。
- 張漢裕（1960）。馬克司・偉伯：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臺北：協志工業叢書。
- 張漢裕（1983a）。經濟發展與所得分配：張漢裕博士文集論文集（三）。臺北：張漢裕博士文集出版委員會。
- 張漢裕（1983b）。途上地域開發と近代化：張漢裕博士文集論文集（五）。臺北：張漢裕博士文集出版委員會。
- 張漢裕（1984a）。《經濟發展與農村經濟：張漢裕博士文集（一）》。臺北：張漢裕博士文集出版委員會。
- 張漢裕（1984b）。《經濟發展與經濟思想：張漢裕博士文集（二）》。臺北：張漢裕博士文集出版委員會。
- 張漢裕（1989）。日本企業經營之研究。臺北：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經濟研究處。
- 張漢裕（1992）。日本社會保障制度。臺北：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經濟研究處。
- 張漢裕（1994）。職業倫理與日本研究：張漢裕博士文集論文集（六）。臺北：張漢裕博士文集出版委員會。
- 張漢裕（1995）。東アジア現代化を念う：張漢裕博士文集論文集（七）。臺北：張漢裕博士文集出版委員會。
- 黃通、張宗漢、李昌權（1987）。日據時代臺灣的財政。台北：聯經出版社。
- 黃紹恆（2001）。張漢裕老師的學術源流考。載於張漢裕教授紀念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大經濟研究所學術基金會。
- 葉淑貞（1994a）。論台灣經濟史研究的歷史解釋觀點。載於經濟論文叢刊，22：4，477-503頁。
- 葉淑貞（1994b），台灣「新經濟史」研究的新局面。經濟論文叢刊，22：2，127-167頁。
- 葉淑貞（2001）。張漢裕教授的學術成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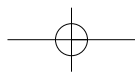
就。載於張漢裕教授紀念研討會
論文集。35-76頁。臺北：臺大
經濟研究學術基金會。

葉淑貞（2005）。台灣經濟史大師—張
漢裕教授的學術成就。兩岸與國
際事務季刊，2：1，131-172頁。

Chang Han-Yu (1983) .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aiwan*. Taipei : Ho-Yu Printing Co.

Ho, Samuel P.S. (1968) .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under Colonialism :
the Case of Taiwa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8 : 3, 313-340.

Ho, Samuel P.S. (1978) .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1860-1970*.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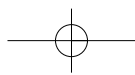


賈馥茗

1926~2008

◆ 深受學生愛戴的好老師 ◆

林逢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賈馥茗教授1926年出生於河北省青縣，祖父及父親皆為法官，自幼在兼容儒學傳統及民主作風的環境中成長。八年抗戰期間因故鄉淪陷而失學，然勤奮自學無輟，終能於抗戰勝利後，考取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惜因國共內戰，被迫隻身流亡，輾轉來到臺灣。1949年夏考入臺灣省立師範大學教育系，隔年畢業。1958年赴美留學，主修教育心理學、輔導及諮商。1964年獲加州大學博士學位後，旋即在田培林教授的敦請下返回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任教。在該所任教期間，不僅將教育科學方法引進國內、進行多項大型教育研究計畫、開辦在職教師碩士學分進修班、設立教育博士班，更結合中西思想，深入探索教育之本質，主張教育乃本諸「誠」與「仁」的「成人」志業。1972獲蔣中正先生聘任為考試委員，其後連任兩屆，一共擔任十八年。任職考試院時期，仍然義務在臺灣師大授課，直至1988年。1990年自考試院退休。退休後活躍於研究，除編成及出版（2000年）中華民國第一部教育大辭書，並撰寫完成表現其教育學思想體系的五大著作（《教育的本質》、《教育認識論》、《教育倫理學》、《融通的教育方法》、《教育美學》），可謂著作等身。2008年春，賈教授經醫師診斷罹患肺腺癌，治療無效，是年五月七日驟然與世長辭。

天地化育萬物本乎「誠」與「仁」，教育之道，亦不外乎此。

當學界一片沉醉在崇尚西學的氛圍時，賈馥茗教授堅定地指出儒家的「誠」與「仁」是為教育之本，並默默用其一生深刻而清晰地說明「誠」與「仁」如何而能構成教育的「天」和「地」。

壹、童年歲月

賈師馥茗民國十五年農曆五月初一（陽曆六月十日）出生於河北省青縣。祖父培亭先生，是青縣的刑名師爺，主

管全縣司法事務。父親桂馨先生，號一齋，為民初法官，歷任河北省望都、長垣、新民、大城等縣承審，為人正直謙和，廉潔愛民。賈師是一齋先生的么女（上有兄長及姐姐各兩位），自幼聰穎活潑，甚得一齋先生疼愛。賈師印象深刻的是，一齋先生寫字時，自己總喜歡一旁幫忙磨墨、拿文具，兩人配合無間。另外，因為一齋先生在外縣擔任法官，經常要一段時日，才能回來探視家人，返鄉時，一齋先生總是坐轎車，但都在城外下車，然後步行返家，以示尊重

鄉親。賈師記得自己和二哥喜歡算準時間，到城外等候父親，父親一下車，賈師就拉著他的手，一起走回家，這段小小的路程，洋溢著無比的愛，賈師說：「那份溫暖、親切、外帶榮寵的感覺，至今還暖在心中。」（賈馥茗，2007）等賈師年紀稍長，父女成了論學、閱讀的伙伴。賈師回憶道：「…如果我看的書他也喜歡時，他會拿去看，有時也叫我替他找本書看。在我整個印象中，父親是我自幼就親愛、長大後成了心靈相通的人，在作學問方面，我受了父親很大的影響。」（王萍，1992:3）

父親在公職上，剛正守紀，不畏權勢，不為利誘的節操，亦深深烙印在賈師的心中。賈師說：「一次和二哥在門外玩，一個人手提一盒食物說是來看父親，那時父親正在午睡，我們商量了一下，認為應該先請他進來，再去喚醒父親，父親坐起來，那人已經自己進到屋裡，父親一見就很高興的說：『你只管打官司（訴訟），不要到我家來』。立即叫我們把他送出，待那人出門後，父親大聲說：『不要隨便讓不認識的人進門！』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受父親大聲叱喝。大概那人是來送禮（賄賂）的。

」父親的正直、廉潔，對賈師影響深遠，也因此，立身行事始終只求「問心無愧，不在意被別人誤解或批評，也不在意有錢無錢。」（王萍，1992 :22）

賈師的母親（姓顧，名若愚）是賈師心目中最能幹的人。由於父親在外地工作，一切家務全由母親操持，不僅要指揮工人耕田，照顧五個孩子的生活和求學，還經常受人請託去為鄉民、親友排解困難，每每忙碌到深夜。最讓賈師印象深刻的是，母親諳練醫術，農人中暑時，常由母親扎針治療；一次賈師吃了食物，嘔吐不止時，經母親針灸，立刻復原。

母親日夜辛勤忙碌的景象，除了激起賈師心中無限感念，也引發一些生活形式的反省，她說：「由於看到母親為了做飯忙得不暇喘息，使我早有了一個觀念，認為人對吃飯不應該太挑剔，免得讓做飯的人那麼辛苦。」（王萍，1992 :3）跟隨賈師學習二十餘載，我們看到老師最常以餃子、饅頭、大鍋菜果腹，不僅不以為苦，遇到學生關心，總是津津樂道她的「極簡飲食哲學」，規勸大家節制口腹之欲，一來養生；二來惜物；三則體貼辛勞準備食物的家人。

註解：本文改寫自拙作「賈師馥茗先生小傳」，原載於教育資料與研究2005年2月第62期。

童年時期的賈師，由於和二哥年紀最為相近（相差五歲），兩人經常玩在一起，賈師也由此感染了男兒的豪俠之氣。二哥後來就讀河北工學院市政水利系，今為山西省極受敬重的水利工程師。大哥是北洋大學的正取生，但因健康因素，完成預科學業之後，便選擇就業，任職於天津市中華書局會計，一直是弟妹們的重要經濟支柱。兩位姐姐都念河北省立女師學院，大姐還擔任過賈師寫字課的老師。有一回，賈師的習字本被大姐判了「丁」，心中難過極了，回到家裡見母親和客人談話，不便訴苦，只好躲到牛棚去哭了起來。這事件說明大姐雖然疼愛妹妹，但教學時「公事公辦」，並不偏袒，表現家門一貫的正直作風。而小小年紀便有不服輸之精神的賈師，經歷這個「打擊」，開始臥薪嚐膽地練字，甚至暑假期間，別人午睡，她卻練字，再配合上大嫂（邵紉蘭女士）的調教，進步神速，到了小學五年級，寫的字就經常被學校選出來展示。凡受賈師教導的學生，都知道賈師寫的字，外型娟秀，內蘊蒼勁，可謂剛柔並濟，因此經常向賈師求取墨寶。例如，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學生會的招牌，便是出自賈師之手；師大教育系系館中田培林先生紀念雕像下的刻字，以及臺北

市立教育大學教育系的系牌，也都是老師的書法傑作。

貳、苦難試煉

民國二十五年小學畢業之後，賈師考上天津河北省立女師學院附中，那時大哥在天津中華書局工作，二哥在天津河北工學院就讀，而二姐則是河北省立女師學院師範部的學生，兄妹齊聚天津，一同工作、求學，享受著人生中一段難得的美好時光。

賈師回憶中學生活說：「中學時代，我已能自動唸書，而且非常守規矩，成績也很好。」（王萍，1992：10）賈師的父母親極為重視孩子們的教育，這可從他們收到成績單的反應中，見出一些端倪，賈師說：「每學期二哥和二姐和我的成績單寄來時，父親要第一個拆看，看完後說：『都是甲（成績只載每科等級，不載分數）』，繼說：『我的人力車沒白拉！』母親接過去也要看看，父親說：『你不讀書，怎麼看！』母親立即回道：『我生的小孩會讀書就夠了，哪裡還用我讀書？』父母之間，常有這樣幽默的對話。」賈師的中學生活裡，還有一樣記憶深刻的事，那就是同學之中，有一位和賈師一樣喜歡文學，兩人志同道合，時常約定一同到圖書館

借書，玩起比賽讀小說的遊戲。只不過同學選的是新小說，而賈師卻喜好傳統小說，雖然如此，仍然無害遊戲的進行，最後，兩人成了莫逆之交。

正當賈師陶醉在求學之樂的甜蜜時，七七事變突然於民國二十六年爆發，一切歡笑嘎然而止，接踵而來的是一連串艱苦的逃難歲月。

是年暑假期間，日軍開始轟炸青縣附近的要塞（滄縣），一齋先生基於「大難避鄉」的原則，帶著一家大小投靠鄉下親戚。然而日軍步步逼近，只好輾轉往南方未淪陷地區裡逃。一路走向山東，途中處境之難，甚至到了行乞度日和住進救濟院的地步。逃難的艱辛，賈師點滴心頭，他說：「我們每天要走幾十里路，到晚上停下來休息時，腳掌腫得好厚，疼痛不堪，再要站起來，就會痛得眼淚直流。」（王萍，1992:15）賈師的母親纏過足，一路走來竟從不叫苦，堅強照顧一家人。後來山東省也泰半淪陷，一齋先生認為與其流落異鄉，進退不得，不如返鄉。由於經濟困窘，搭不起船，一家人循舊法，一步步艱苦地踏上返鄉之路。回到青縣，家裡的用物以至食糧早被洗劫一空，向伯父家借來一斗玉米，才能吃上一頓飯。

回到青縣之後，賈師輟學在家，幸

好大姐、二姐和二哥念過的書都留著，於是就通通拿了來，按年級進度一本一本地自學，把初中到高中的書就這樣念完了。同時，賈師亦藉此機會看遍中國的名著、小說、四書、史記、前漢書、後漢書、資治通鑑、歷代演義、近代史也全不放過，甚至讀了中山全書，一齋先生說賈師讀書「手不釋卷」，只聽到一頁頁翻書的聲音。而抗戰八年之中，父女朝夕相處，久之，反倒變成論學、談心的「同道」，可說因禍得福。賈師說：「這段期間我在知識與為人處世方面受父親的啟發很大。」（王萍，1992:21）

民國三十年暑假過後，在灤縣師範附小任教的二姐，通知賈師有個小學教師資格檢定（當時具有小學畢業學歷，即可報考）的機會，賈師應考通過，並受聘到樂亭縣雲祥國小任教一年半。後來因為大嫂邵紉蘭接任青縣縣立女子完全小學（賈師母校）的校長，學校欠師資，就把賈師和二姐都召回青縣任教，二姐任高年級級任，賈師則擔任科任老師。於是賈師在畢業五年之後，當了母校的老師，教初級常識、低年級唱遊、中年級音樂、中高年級體育，和高年級史地。由於年紀輕，能和學生玩在一起，所以學生總是喜歡親近賈師。賈師說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 IV

：「常常放學後，我們還在吃晚飯，學生就擠滿一地，說是要找小賈老師來玩。」（賈馥茗，2007b）賈師的母校教學生涯，就在這樣師生和樂融融的氣氛中，度過了兩年半。

抗戰勝利後，賈師為了繼續求學，辭去教職，專心準備大學入學考試。由於對自學沒有十足把握，加上求學若渴，一有機會馬上報名就讀天津的中學進修班，後來轉往北平中學進修班，完成高三課程。民國三十五年，參加大學入學考試，報考了三個學校：天津女師學院、南開大學、北京師範大學，都是教育系，結果都錄取了。這件事讓父親高興無比，一改不誇獎孩子的慣例，逢人就說：「念了一年初中考大學，考三個取三個，真是不可思議。」

賈師選擇北師大就讀，入學後卻只過了一年較為安穩的大學生活。二年級開始，左派學運風起雲湧，校園從此沒有平靜過。隨著共黨逐漸佔領北方，三十七年四、五月間，賈師獲知父親在毫無理由的情形下被捕落獄，從此失去聯繫，母親慌亂中逃出青縣，與賈師及二姐在天津租了簡陋的小屋棲身。三十八年初春傳來一齋先生獄中過世的噩耗，賈師和二姐不敢將消息告訴母親，強忍痛苦，裝作若無其事。然而時局愈來愈

危急，賈師為了完成學業，匆忙間拜別母親，帶著大姐學生支助的二十元美金，與一些同學踏上了孤獨的流亡生涯。一行人先到山東，後至上海，再赴湖南南嶽師範學院就學，從上海要到湖南等火車的那一夜，由於盤纏將盡，無力住進旅館，只好在火車站枯等。三月的上海夜，極度寒冷，國難家變齊上心頭，不勝唏噓。賈師說到當時的心情：「七七事變時逃難的感覺重新進入我的腦海，不過這一次沒有父母的蔭庇，我只是隻身，流浪向一個完全不可知的未來。」（王萍，1992:39）

賈師和同學們到了南嶽師範學院之後，院長陳東元先生告訴他們湖南時局亦漸失控，建議大家考了期中考之後，取得成績作為轉學的憑據。於是賈師和同學們考了期中考之後，一行人又轉往廣州，幾經艱辛，渡海來到臺灣。

到了臺灣的賈師，有一段時間露宿街頭，最後在友人的協助之下，才得以在晚間借宿小學教室，但為了避免影響學生上課，一早六點前就得起床離開。白天的時候省教育廳（今監察院）餐廳有為流亡學生準備簡單的飯菜，但由於菜量少，吃的人多，賈師索性一碗飯加些醬油和醋，一天就這樣打發，其餘時間就到圖書館看書。這樣艱難的生活，

要一直等到接了家教才稍有起色。

三十八年暑假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招收轉學生，賈師把握機會應考，順利錄取，九月進入教育系四年級就讀，終於有了穩定的求學環境。

參、夙志得酬

三十九年賈師大學畢業之後（同年考取高考），分發到臺北女子師範學院（今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任教，兼任訓育組長，並兼管一個宿舍。先生為了順利訓育工作之進行，建議並協助完成學生資料及訓育規章的建置，使訓育工作有了運作的根據。而除了訓育工作之外，賈師還擔任「教育概論」、「測驗統計」和「教育史」等科目的教學任務；後來不兼行政職務，加上同事要求換課，竟然要同時教六個班的「測驗統計」，幸好賈師一向對測驗統計別有心得，教學時甚得學生歡迎，因此也就減輕了許多反覆教授同樣教材的枯燥感。由於賈師行事穩健、公正，又得學生愛戴，民國四十三年新校長秦則賢先生上任之後，敦聘賈師出任訓導主任。民國四十四年，賈師考取臺灣省立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為了重拾課業，決定離開臺北女師。

在研究所求學期間，賈師深受所長田培林先生賞識，並在教育哲學家黃建中先生的指導下，完成碩士論文「朱子教育思想」。畢業之後，由於賈師具有行政資格，又得田先生重視，原本已向教育廳推薦擔任校長，但因為賈師立志留學，只好作罷。

民國四十六年賈師自研究所畢業，原計畫直接出國留學，然因健康因素留了下來，並獲聘在師大教育系擔任講師。民國四十七年肺病痊癒，通過出國健康檢查，賈師隨即開始辦理留學事宜，並於四十七年九月由松山機場搭機前往美國留學。出國的經費是一位學生的母親借給的，賈師說：「我開不出口向人借錢，他知道我要留學，自動借給我。我寫了一張借據給他，他不收。我說：孤身一人在台，去了美國，便似斷線風箏，如果不還你錢怎麼辦？他說：我信任你！信任！我很快還了錢，此後成了終身的朋友」。（賈馥茗，2006）

肆、負笈美國

賈師在美國念的第一所學校是「奧立岡大學」（The University of Oregon）。初到奧立岡大學，由於沒有研究生宿舍，賈師在田培林師母友人及學校的協助之下，找到了一對林姓（Lynn）老夫



民國48年耶誕節賈師(右一)在 Eugene 與房東全家合影。資料：(《賈馥茗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提供)

妻的家作為寄宿家庭。老夫妻的女兒也是奧立岡大學心理系研究生，兩人可以開車一起上下課，頗為方便。房東供應早晚餐，午餐則在學校吃，一個月房租只需四十美元。特別的是，房東夫婦對賈師的照顧無微不至，常說賈師是他們的另一個女兒，於是賈師就稱呼她們為「洋媽媽」、「洋爸爸」。

賈師在奧立岡大學主修教育心理學，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完成碩士論文口試，取得學位。碩士畢業之後，賈師在多所學校之中選定了「加州大學」(UCLA)繼續攻讀博士，一來是因為加州大學當時在教育學方面師資陣容堅強；二來是加州大學離房東夫婦最近（一日車程），洋媽媽於是較為贊同。

賈師的博士課程雖然主修輔導，但教育哲學和教育史等科目仍是所裡的必修主課。賈師回憶當時教育史的課是由歷史系的講座教授主授，光是參考資料的目錄就有厚厚一疊，課前預習壓力很重；加以其他學科的要求也很嚴格，整個博士班的求學生涯，顯得極為緊湊。賈師說：「我每天就是依賴咖啡和香煙支持下來。我不吃早餐，午餐也是力求方便，一面吃麵包，一面看書寫字。那時我很懷疑自己究竟能不能撐下去。」（王萍，1992:69）

結果賈師還是順利地通過了各項課程的要求和考驗，於一九六三年完成學分的修習，並應聘為耶魯大學暑期亞洲中文學院的講師，教授了一季的中文。一九六三年底，賈師回到加州大學繼續其論文的撰寫工作，原本賈師已經做好了博士論文所設計之人格測驗的施測準備，不料甘迺迪總統突然遇刺身亡，美國社會上上下下陷入一片哀悽。為了避免影響測驗效度，賈師一直等到一九六四年的第二個學期開學才施測，然後撰寫論文，並於同年六月通過博士論文口試，取得博士學位。

取得博士學位之後，賈師對於去留

註解：該校在民國四十四年便給了賈師講學金，只是賈師健康不允許，請求該校保留講學金資格，獲得應允，並保留了三年之久，該校之行政彈性及寬厚作風，頗為值得教育工作者借鑑。

美國之間，有一番掙扎：「留在美國不但待遇比臺灣高出許多，只要有能力，肯努力就能出頭，縱然有其他因素，其影響力也是小之又小。一旦回國，情形就可能不同了，國內的阻力可能大於發展力量。所以這段期間，我相當苦惱。」（王萍，1992:75）後來賈師認為自己學的是教育，不回到自己的土地去貢獻實在說不過去，加以田培林先生來信期許儘速返國開課，最後終於決定回到臺灣。因為政府當時對於歸國學人都提供免費船票，賈師於是取水路返台。船在海上一共航行了四十天，一九六四年十



民國49年求學時攝於舊金山。
資料：（《賈馥茗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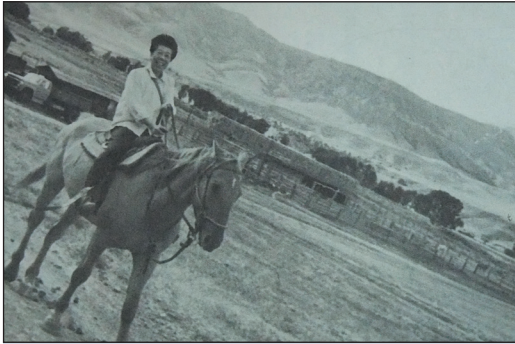
月三日抵達基隆港，航程中賈師善用時間，熟讀了心理學史文獻。

伍、教育樹人

回國後，賈師在臺灣師大教育研究所任教，依田培林先生之指定，教授「心理學史」。賈師有感於研究法之重要，建議開設「教育研究法」乙科，田先生同意並要求賈師負責該科教學；此外賈師也在教育系講授哲學概論。賈師回憶剛回國時的情形說：「田先生囑咐我不要在外面兼課，以免影響研究工作。所以直到今日我一直在師大任教，從未兼過課。」（王萍，1992:81）

民國五十六年，賈師返國擔任副教授第三年，田先生提醒賈師可以開始準備教授論文的撰寫，結果賈師答以：「已經寫好了」。田先生一聽深感詫異。是年，賈師論文獲得全票通過，升為教授。這件事其實反映了賈師給人的一貫印象：凡事預作準備，永遠氣定神閑。

除了研究及教學，賈師也積極關心國內教育現狀。例如賈師有感於師範及高中教師進修無門，建議田先生設立研究進修班，自己則志願承擔整個課程的設計工作，當時進修班的全名是：「師範和高中教師研習班」。該班自民國五十七年暑期開課之後，廣受好評，在需



民國76年賈師在美國黃石公園，生平第一次騎馬的經驗。資料：(《賈馥茗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提供)

求廣大的情形下，開授對象、班次及時間不斷地增加，成了今日教師各式進修課程的範例和先鋒。此外，賈師還參與並主導了多個極為重要的開創性教育研究，例如：民國五十七年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承教育部委託，主持「普通能力測驗」之編製，俾為國中實施編班之用；民國六十年間，受國科會補助，進行資優教育研究。賈師一度並有開設實驗幼稚園及小學的計畫，可惜因為校地問題及後來出任考試委員，而未能如願。

民國五十八年田培林先生退休，賈師接任所長職務。擔任所長期間，賈師除了奮力維持傳統優勢，更一心提昇研究所至國際水準。除不斷設法擴充圖書，設立研究所圖書館，並計畫性的延攬各方人才到所任教。由於努力和成就有目共睹，五十九年在校長孫亢增先生的敦促下，提出設立博士班的申請，並順

利地通過，從此國內的高級教育研究人才有了培育的搖籃。

賈師領導研究所一秉大公無私及敬重每一位師生的精神，不但捐出個人各項審查費、研究費、演講費作為所裡的公積金，連版稅也一併捐出。曾經擔任所務助教的洪仁進教授回憶說，有時賈師一年捐出的版稅就有十幾萬之多。賈師敬人及寬大的教育胸懷也表現在研究所圖書館的管理態度上。當時每一位師生都有閱覽室和圖書室的鑰匙，填書單就可把書借走，有人擔心書本會遺失。但賈師說：「要一本書都不丟是不可能的，可是我們得慢慢培養學生的榮譽心，只要建立風氣，養成習慣就行了。」（王萍，1992:102）賈師有遠見而富教育之愛的辦學風格，使得教育研究所師生情感深厚，大家同心向上，至今培育出的人才，遍佈臺灣各個角落，成為全國教育的中流砥柱。

在教學上，賈師有高度的實踐智慧，展現出大教育家的風範，值得有心人深入研究。歐陽教教授（2008:19）認為「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等語，最能狀述賈師「師嚴道尊」的形影。凡親炙賈師上課風采的學生，都能印證歐陽教授的詮釋。例如，現任臺灣師大教育學系主任譚光鼎教授（2008:77）說

：「賈老師專注而嚴謹的態度，總能營造一種無形的氣氛，敦促學習者全心投入……。」有的學生（鄭玉卿，2008:133）認為這是「大師的魔法」，因為「不費吹灰之力，學生都自然『乖乖地』用功。」而賈師的嚴肅、敬謹、真誠，並不只在「外在形象」，其內涵亦如此，故能令學生發自內心的「敬重道業」。修平技術院校長李星謙教授說（2008:75）：「賈老師平日神情嚴肅，較少言笑，講話慢條斯理，一字一句地，但都有嚴密的邏輯順序。所以我習慣專注聽老師說話，以免聽漏了一句，前後就不連貫了……。」方志華教授（2008:129）也有相似而不完全相同的體會：「賈老師說話一向緩緩流露自肺腑，一字一句吐出，字字打在學生的心坎中，即使到現在，我都還能感受到那鏗鏘有力、讓學生受用的諄諄教誨。」這個觀察，除了說明賈師的嚴謹，更清晰點出「誠於中而形於外」的境界。

然而賈師授課，並不一定全程開「講」，其不「講」時，

也有深意。吳明清教授（2008:45）分析自己碩士班時受業於賈師的情形，他說：「在課堂上，老師總是好整以暇，耐心等待我們發言，教室裡鴉雀無聲常常超過20分鐘，但老師的耐心『等待』，卻讓同學們坐立難安。從此我們學會課前準備，學會適時發言……。」賈師認為教育要有實效，必須讓學習者知道受教是「為己」，而學習成效也「在己」，如此方能化被動的「填鴨」為主動「求知」。換言之，教育的主體應該是學習者，教者只是輔助。「可是，無論中外，一樣的，把主體放在『教』的人身上，是那個教的人主宰了『教』，而真正需要學的人，在『教育』兩個字裏面不見！」（賈馥茗，2005:12）就因為



民國77年在新加坡參加國際傳紀年會與該地畢業同學及眷屬聚會。
資料：（《賈馥茗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提供）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Ⅳ

教育的主體是學生，所以即便是「愛深責切」，也要重在指出事實，不必疾言厲色。鄭熙彥教授修習賈師的「心理學史」時，一次被抽到上台報告當天要討論的心理學家的思想，由於課前預習所得資料有限，報告時就說：因為該位心理學家的相關資料不多，所以只能簡單報告。賈師聽完，評論道：「不用功，就老實承認；不要找藉口，說什麼資料不多！」（鄭熙彥，2008:35）值得玩味的是，賈師規勸學生並不總是「直說」，有時刻意採取「諷喻」，降低「說教」或「責備」的意味，但保有導引的實效。（賈馥茗，2007a:306）特別是學生的「偏失」有其「可愛」之處，要提醒其修正時，可用「諷喻」。總統府秘書蔡崇振先生，為人正直不阿，有時為了堅持理念，冒犯權貴也不在意。蔡先生拜訪賈師時，每每據實陳述這些經驗，賈師一面聽，一面微笑，評論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蔡崇振，2008:53）

賈師教育風範貴在於「嚴」之外，兼富自然、親切而又睿智的「愛」。誠如崔光宙教授（2008:65）所言：「賈先生教育學生，表面上如程門立雪般嚴厲，骨子裡又有春風化雨的溫柔。」無數學生，都曾得到賈師溫柔、富啟發性

而又令人難以忘懷的關愛。例如，謝文豪教授雖然遠在花蓮，仍然經常來臺北探望賈師，有一次拜訪，賈師知道其下午五點必須離開，以便搭乘火車回花蓮，時間一靠近，賈師獨自進入廚房忙了起來，謝教授（2008:101）說：賈師走出廚房後，「交給我她親手做的三明治及水果，要給我在火車上當晚餐用，當天在火車上我是含著淚水享用這份晚餐……。」當學生面臨困頓，賈師的開導，也經常蘊藏於慈祥、親切的舉止中。王秋絨教授（2008:73）回憶道：「我因學術生涯受阻而心情低落時，去找您（筆者註：指賈師）訴苦，您竟然在和平東路老家的附近小店買了兩包『乖乖』帶我去七號公園餵魚解悶氣，至今對您的睿智，仍銘感五內。」賈師亦師亦友的風格，正是學生念念師恩而難忘的理由。

國家講座教授楊深坑先生，對賈師教育風範的刻畫，貼切表達了賈師給予學生的全人啟發：

懷於教育與文化的責任，賈師對於學生的要求非常嚴格，因此，不怒而威，在學術鑽研上，鮮少有人稍有懈怠。發乎對於學生的愛護，賈師對於學生的照拂可說無微不至，其細膩處常令人感動得熱淚盈眶難以自己。（楊深坑，2008:）

作為一位師者，賈師可說經師、人師雙全，其超絕處，更在學生心中建立起一種既神聖且神秘的印象（譚光鼎，2008:77），正所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所有受教於賈師的學生，都可說是萬般幸運。

陸、公職生涯

民國六十一年夏天，賈師在完全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經由報載才得知自己獲得總統提名為考試委員，旋即於是年九月一日上任。當時女性出任政府高職者極為罕見，賈師之外，只有兩位特任官，一位是考試委員張邦珍，另一位是大法官張金蘭。賈師第一任考試委員任滿之後，連任兩屆，總計三任，共

十八年的公職生涯。如果加上考試院退休（民國七十九年）之後，自民國八十五年起的獲聘為國策顧問的三年，則賈師總共服了二十七年的公職。

考試院委員任內，賈師參與院務之工作，主要秉持三項原則：「建立制度」、「講求證據」及「本諸寬厚」。

就「建立制度」一項而言，公務員考試錄取之後的名額，在分發上時常有缺額不符、無處派任及民代關說的困擾。賈師一再強調應當依照考試成績列冊備用，並依序分發遞補，因為如此不但較能達到「考用合一」之效能，也可用制度來回應民代請託之困擾。

在「講求證據」方面，主要是針對政策擬定而言。亦即任何政策或行政決

定都應該於了解實際情況後，再作定奪。例如，有一年行政院研考會認為考試院錄取醫師員額不足，造成醫師短缺的現象，考試院為此召開審查會，當時的審查會由賈師召集。考試院的主管司（第二司），遭受研考會質疑之後有些心慌，賈師見狀



民國73年賈師(右一)參與考試院第七屆院長、副院長、考試委員就職典禮。
資料：(《賈馥茗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提供)



民國61年賈師(左四)獲蔣中正先生聘任為考試委員，其後連任兩屆，一共擔任十八年。其照片為任第五屆考試委員時，考試院自強活動。資料：(《賈馥茗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提供)

告以：「假如考試有錯，我們考試院應該改正，但是要有實際資料為證」。(王萍，1992:140) 結果賈師請行政院衛生署提供相關資料，依其資料顯示：如果不分地區，我國醫師比例並不比其他國家低，缺少醫師的主要是偏遠地區。於是這就證明了，問題在分配而非考試，所謂醫師考試錄取員額不足的說法是有誤的，爭議於是落幕。

「本諸寬厚」的原則也是賈師極為強調的重點。考試院的銓敘部經管全國性的人事事務，賈師認為人事人員的主要職責是在協助單位主管為機構之中的人員謀福利，結果許多人事人員不但未能掌握此一原則，反而濫用、誤用職權來處處刁難、阻礙人，造成人極大的痛苦與不便。例如，得重病而又確知是不治之症者，如果過世之前趕緊辦理退休

註解：賈師在其他地方對於「成人」的條件，曾經提出誠和仁以外的德目。例如在《教育的本質》一書中，賈師認為發展人性，以三個綱目即足，包括：誠實不欺、推愛和正直無私(賈馥茗，1998：228-229)；在《教育倫理學》一書中則指出每個人賴以立身處世的「普遍原則」有五：「仁」、「義」、「禮」、「智」、「信」，然而卻同時指出此「五常」，可以涵攝在「仁」和「誠」兩大德目之中(賈馥茗，2004：356-357)。在《人格教育學》一書中，賈師論及教育目的之確定時，也主張「以致誠修仁為本」(賈馥茗，1999：423-425)。可見「仁」和「誠」的陶養，仍然是賈師認定的人之教育的大本，只是細而觀之，可以分出更多德目罷了。

，可以多領一些錢。可是有的人事人員就是堅持不准，一定要等到當事人亡故，再依另一套方式來辦。對於此種態度，賈師頗為感慨：「老實說，一個人遭遇到疾病死亡，最可憐的莫過於其親人，在這方面大方一點，所費不多，卻可以讓遺屬感念政府的德意，豈不是一件好事。」(王萍，1992:154)

柒、著書立說

賈師一生耕讀、著述不輟，用「著作等身」一詞來形容再也貼切不過。賈師的著作大約有兩個發展脈絡及三個發表階段。兩個脈絡之中，一是由西學的應用走向中學的探源，另一則是由科學的研究走向哲學的關懷。三個階段則包含：「教育科學期」、「教育哲学期」、「集成究本期」。

第一階段「教育科學期」是賈師將西方教育科學之研究方法及成果，應用於探究臺灣教育現況的成果，發表的專著共有五冊，包括：

兒童發展與輔導(臺灣書店，1967)
心理與創造的發展(臺灣書店，1968)
英才教育(開明書店，1976)
教育概論(五南，1979)
教育與人格發展(復文，1979)

第二階段「教育哲学期」是賈師逐

漸將研究重心轉回中國哲學的探索，企圖為教育之根本尋一終極答案的初期，發表專著有四，包括：

教育哲學(三民，1983)
教育原理(三民，1989)
全民教育與中華文化(五南，1992)
教育與成長之路(師大書苑，1997)

第三階段「集成究本期」，此期賈師思想進入圓熟階段，一方面總成幾十年來的研究結論，另一方面則進入教育之哲學根柢的全面考掘階段，發表的專著多達十冊，包括：

人格心理學概要(三民，1997)
心理學史概要(主編)(師大書苑，1999)
教育的本質(五南，1999)
中庸釋詮(五南，1999)
人格教育學(五南，1999)
先秦教育史(五南，2001)
論教育(主譯)(五南，2002)
教育認識論(五南，2003)
教育倫理學(五南，2004)
融通的教育方法(五南，2007)

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六年之間，看似賈師著作出現中斷狀態，事實上這一段期間正是賈師出任教育大辭書總編纂的時刻。該辭書動員國內七百餘位學者專家，收錄一萬四千餘個條目，解釋文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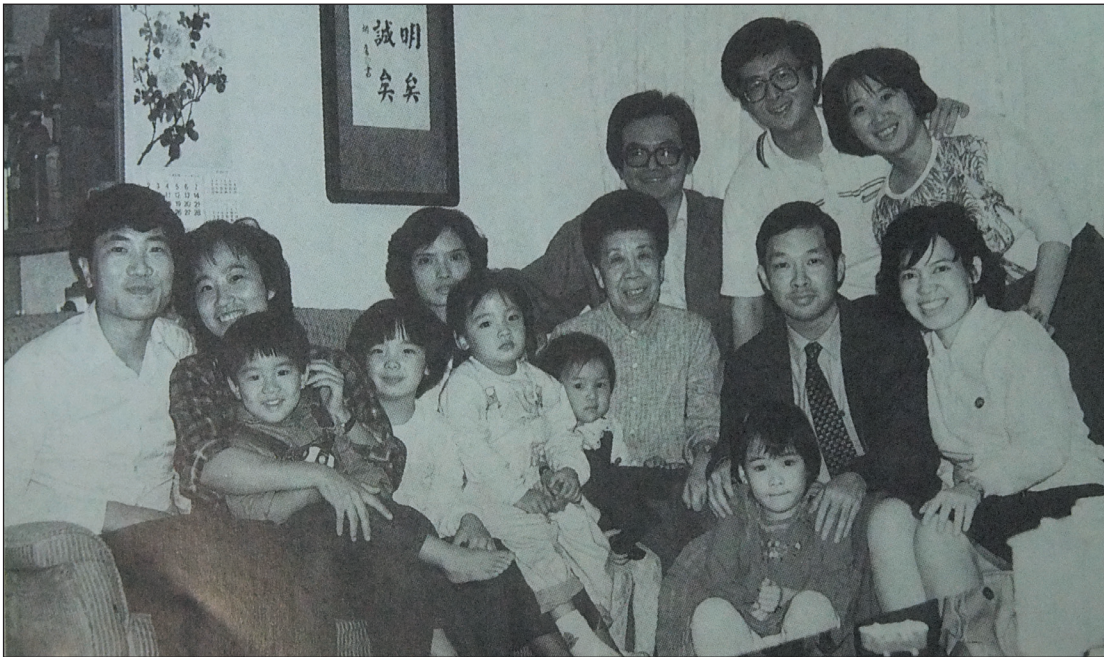
字高達一千一百餘萬字，賈師字字過目考究，備極艱辛。民國八十九年，辭書正式出版，中華民國立國以來最為周詳之教育工具書也於焉誕生。

賈師的思想博大精深，需要專文才能深入探討，於此僅簡要說明賈師的一個核心觀點。在諸多教育議題中，賈師思考最久、最深的乃是：「教育本質」為何的問題。賈師自認這個問題在北師大求學時不了解，研究所畢業後依舊沒有答案，於是興起了出國的念頭，可是到了國外，學分修完了，卻還是不得其門而入。最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有了靈感，並且找到了滿意的解答：



民國75年賈師應邀在教學觀摩會中講演。
資料：(《賈馥茗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提供)

我修過了好幾次教育哲學，看了很多外國教育哲學家的理論，還是得不到答案。一直到有一天，我去了加大中文圖書館，在隨意翻閱四書時找到了答案，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這幾句話



民國77年教研所畢業同學攜眷會於北投。資料：(《賈馥茗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提供)

從前是知道的，卻從未深思過。此時靈機一閃，就此找到了教育的根本。教育主要是教人，人的根本就是道，道是宇宙的本體，以此做基本出發點，做教育的準則，也是最高不變的原則，教人認清自己的立場和自己應有的發展方向，然後才能決定自己該怎麼做、如何做和做些什麼。這就成了教育的中心原則，這原則是「教人成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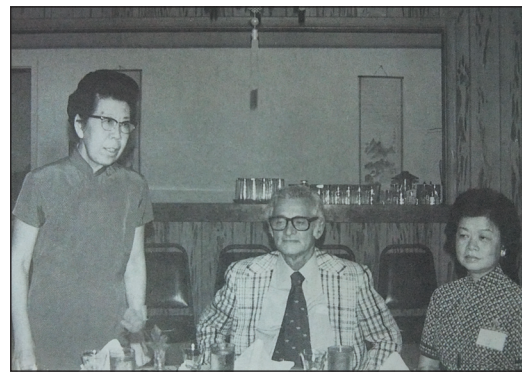
（王萍，1992:168）

若「教人成人」是教育的「最高不變」原則，則如何才能教人成人呢？這首先要了解如何才算「成人」、才算符合作為人的基本條件？賈師認為（王萍，1992:168）「誠」（誠實）和「仁」（能愛）等兩項是作為一個「起碼的人」最基本的條件。誠者不自欺、不欺人，仁者自愛、愛人、愛物，人人都能做到誠和仁，就是有了建立和諧關係的能力，不僅社會的安和可以確保，個人的「價值生命」也可得到開展，如此，教育的基本工作庶幾可說完成。賈師認為教育雖然必須隨現況而有所調整及適應，但是調整與適應不能捨本逐末，動搖了以「立德」為著眼、發展人性、教人成人的教育之「大計」。賈師說：「教育活動有本有末，本固則人道立，應變則人道日新」。（賈馥茗，1998:227）教育如果只求近利，不計遠功，由於不

能「慎始」，自然得不到「善終」，甚至窮於應付變化，政策朝令夕改，失去大本和章法，落得「教育以人為芻狗」的結果。

教人成人是一種發展人性的過程，在此過程中，賈師特別強調「順人情」、「重實踐」和「立楷模」的原則。（賈馥茗，1998:229-239）

就「順人情」而論，教育者須了解人喜歡愉悅，而不喜歡沉悶的「常情」，並教導兒童經由此一常情的了解，進而調節自己的情緒和作為來與人相處，一方面減少不快的情事；另一方面則增加產生愉快之可能。肯於調節自己的情緒和作為以創造愉悅情境，是一種仁愛的表現；而仁愛的根苗需要在「愛的環境」中培養。賈師認為親情之愛是幼兒愛苗萌芽茁壯的基本來源，也是發展人性



民國72年賈師（左一）參與美國密蘇里大學聖路易分校校長Grabman（中坐者）來華訪問。
資料：（《賈馥茗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提供）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Ⅳ

的根本之道。到了學齡，兒童於親情之外，又增加了「教育愛」的關懷。在教育愛裡，教師以「化育之愛」來教導學生，使學生在愛的滋潤中，助長「愛人愛物」的情操。要言之，賈師認為教育者若能為幼兒創造「順人情」的情境，幼兒便可感受到被愛的愉悅，進而將內在的滿足外推到愛人的行為上。

其次就「重實踐」而論，賈師主張人性發展的成效須由行為表現來檢證，所以強調師者應注重學生行為的觀察、鼓勵和指正，聽其言而觀其行，確實「親眼目睹」學生「有恆而無例外」的實踐，才能斷定教人有成。換言之，「誠」和「仁」的實踐，不是一時，必須「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成為一種「行的習慣」，宛如「生來就是如此」，不如此便有「失去自我」的不適之感；而要達到這種要求，教育者對於學習者行為的觀察、鼓勵和指正，不能有所懈怠。這是個艱鉅的任務，但是徒有「教言」而無「觀行」，對於學習者行為習慣的建立將助益不多，如果了解這點，就該戮力以赴。

最後就「立楷模」而論，賈師指出：典範或楷模的模仿是兒童學習行為中極重要的一環，也是人類「英雄崇拜」心理的表現，善用之可激發學習的興趣

及潛能。近來「尊重個性」及「否定傳統」的思潮盛行，造成楷模學習被視為落伍，甚至是反教育。對於這種趨向，賈師認為有過度否定楷模學習之嫌。因為對兒童（甚至成人）而言，缺少楷模，很容易在心理上產生一種無可言宣的缺憾、失落和空虛之感。其結果是兒童和青少年隨性選擇「自己的英雄」，因此而誤入歧途者時有所聞，值得注意。總之，依人性發展的心理需要而言，慎選楷模實為不可忽視的教育任務。

「順人情」、「重實踐」和「立楷模」等樹人的工作必須自胎兒降生起，便有計畫的進行，不能等到入學，因為習慣一旦養成，再要改變就艱難萬分。其次，執行教人成人的工作，不能認為課本才是教材，不「讀書」就不算學習。這種觀念容易讓人誤以為生活不是教育，學校裡才有教育和學習。賈師說（賈馥茗，2003:191）

認為只有在學校才有學習，是第一個錯誤；以為課本就是教材，是更大的錯誤；否定了學前學習，所成的錯誤，影響到基礎教育。

學校教育普及之後，大眾及政府經常誤認「重要」的學習主要發生在學校教育階段，於是造成幼兒教育及親職教育受到輕忽，即使現在親職教育開始得

到關注，仍然把焦點放在學齡兒童的父母身上，實為教育政策的一大缺陷。

深入認識賈師「教人成人為教育之本質」的見解，幼兒教育和親職教育的重要性才能得到完整認識；而學校教育也可因為此一認識而脫離升學主義及功利主義的漩渦。



民國 75 年新加坡僑生黃崑生(中間左二)通過博士學位考試與同學來拜訪賈師。
資料：(《賈馥茗先生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提供)

捌、達觀書鄉

民國八十八年臺北市政府徵收師大職舍為龍門國中用地，賈師因而搬離臺北市，定居新店山區達觀鎮。新居面對嫵媚青山，潺潺溪流，時有鳥兒翱翔天際，景色沁人心脾。

住在達觀，賈師重溫童年最樂：閱讀。「時代雜誌」(Time)、「傳記文學」、「哈佛教育評論」(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都是常看的雜誌，每遇雜誌中刊載重要研究發現，總樂於分享給來訪的友人及學生。此外也愛閱讀各式中外小說；逛書店時，則常買回一些和自己研究興趣相關的專業書籍來讀。有書為伴，賈師細品著一生辛勤耕耘之後的美

好滋味。賈師為自己編了一幅對聯，作為生活寫照：「室留一人書作伴，心存古今理即燈。」

確實，來達觀的訪客雖然絡繹不絕，但長時間與賈師為伴的只有「書和理」，而對此賈師甘之如飴。民國六十二年應師大學生社團「崑崙雜誌社」之邀，演講「幸福的設計」時，即以「君子坦蕩蕩」來說明幸福根源(梁恆正，2008)；有「坦蕩之理」為伴，賈師縱使獨居，卻有著身心安頓的幸福。

總之，賈師在新店山區半隱居式的生活，既是安逸的，也是進取的。安逸面裡，賈師陶醉在「晨覽青山夜觀星，風聲雨聲皆由興，達觀居裡書海臥，神遊古今到天明」的悠閒；進取面裡，則

是學習電腦，親自繕打完成代表畢生教育學思想精華的《教育的本質》、《人格教育學》、《先秦教育史》、《教育認識論》、《教育倫理學》、《融通的教育方法》及《教育美學》等著作，短短七年間，寫成近兩百萬字文稿，真可謂君子行健不息。

玖、永恆希望

民國九十二年，賈師經診斷罹患乳癌，住進台大醫院開刀，手術順利，麻藥退去後毫無疼痛感，連醫師都大為驚奇，同時後續化療過程也都平順，無一絲一毫的不適，故能持續學術創作，從無間斷。然而九十七年初化療接近完成時，白血球數量突然激增，三月檢查結果出爐，是肺腺癌。立刻接受標靶治療，無奈癌症已到末期，治療不見成效，五月七日晨間八時三十五分，逝世於台大安寧病房。

賈師一生飽嘗戰亂及家破人亡的苦痛，但對世界只有愛而沒有恨，對一己只有鞭策而無悲嘆自憐。他在教育實踐上，成功地示範了「順人情」、「重實踐」、「立楷模」的「教人成人」之道；在教育學術裡，鮮明描繪出融通中西，涵蓋形上學、知識論、倫理學、美學及心理學的整全教育學體系。賈師的驟

逝，帶給國內教育界無比的震驚與哀痛。「一代師範」雖遠去，其磅礴大氣的誠與仁，卻成就了賈師高深思想和傲人事功，並為我國教育播種下永恆的希望種籽。

參考文獻

- 王 萍（1992）。賈馥茗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賈馥茗（1998）。教育的本質。臺北：五南。
- 賈馥茗（1999）。人格教育學。臺北：五南。
- 賈馥茗（2003）。教育認識論。臺北：五南。
- 賈馥茗（2004）。教育倫理學。臺北：五南。
- 賈馥茗（2007a）。融通的教育方法。臺北：五南。
- 賈馥茗（2007b）。記青縣縣立女子完全小學。未出版。
- 方志華（2008）。誠於中而形於外、師嚴而道尊—永遠的賈老師。載於達觀：賈馥茗教授追思文集。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賈馥茗教授教育基金會。
- 王秋絨（2008）。第二盤土豆的夢想。

- 載於達觀：賈馥茗教授追思文集。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賈馥茗教授教育基金會。
- 李星謙（2008）。懷念師恩，教育典範。載於達觀：賈馥茗教授追思文集。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賈馥茗教授教育基金會。
- 吳明清（2008）。賈老師門下受教的一些回憶。載於達觀：賈馥茗教授追思文集。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賈馥茗教授教育基金會。
- 梁恆正（2008）。愛在燈火闌珊處—悼恩師賈馥茗教授。載於達觀：賈馥茗教授追思文集。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賈馥茗教授教育基金會。
- 崔光宙（2008）。賈老師的教育愛。載於達觀：賈馥茗教授追思文集。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賈馥茗教授教育基金會。
- 楊深坑（2008）。永懷師恩。載於達觀：賈馥茗教授追思文集。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賈馥茗教授教育基金會。
- 歐陽教（2008）。師嚴道尊。載於達觀：賈馥茗教授追思文集。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賈馥茗教授教育基金會。
- 鄭玉卿（2008）。悼逝去的教育魔法大師。載於達觀：賈馥茗教授追思文集。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賈馥茗教授教育基金會。
- 鄭熙彥（2008）。老師，感恩您。載於達觀：賈馥茗教授追思文集。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賈馥茗教授教育基金會。
- 蔡崇振（2008）。老師，您走了，安祥地走了！。載於達觀：賈馥茗教授追思文集。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賈馥茗教授教育基金會。
- 謝文豪（2008）。追念恩師賈馥茗教授。載於達觀：賈馥茗教授追思文集。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賈馥茗教授教育基金會。
- 譚光鼎（2008）。其德永馥，其學如茗。載於達觀：賈馥茗教授追思文集。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賈馥茗教授教育基金會。

附錄：賈馥茗教授大事年表

- 1926年 農曆五月初一（陽曆六月十日）生於河北省青縣。
- 1930年 就讀青縣縣立女子完全小學。
- 1936年 小學畢業，考入天津河北省立女師學院附中。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 I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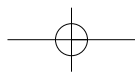
- 1937年 七七事變爆發，為躲避日軍襲擊，舉家逃難，也因而輟學八年，初二到高中的學習內容全以自學完成。
- 1940年 通過小學教師檢定考試，應聘到樂亭縣雲祥小學任教師，任職一年半。
- 1941年 暑假後，應聘回母校青縣縣立女子完全小學任教（校長為大嫂邵紉蘭女士），直至1945年抗戰勝利，才因準備報考大學而去職。
- 1946年 三月入天津中學進修班就學，後轉往北平中學進修班完成高三課程，同年報考南開大學、北京師大及天津女師學院，皆獲錄取，選擇北師大教育系就讀。
- 1948年 四、五月間共軍佔領青縣，父親賈桂馨先生遭共黨拘留。
- 1949年 春節間得知父親於共黨拘留處去逝（得年六十六）。由於北方動亂，決定南下繼續求學，先赴湖南南嶽師範學院就學，考畢期中考後，由於時局不穩，轉至廣州，未久，遷至臺灣。是年九月考入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教育學系（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就讀四年級。
- 1950年 大學畢業，高考及格，並任教於臺北女子師範學院（今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兼任訓育組長。
- 1954年 出任臺北女子師範學院訓導主任。
- 1955年 考取臺灣省立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離開臺北女子師範學院，重拾課業，成為臺灣省立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首屆碩士班研究生。同年獲得美國奧立崗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獎學金。
- 1957年 研究所畢業，在黃建中教授指導下完成碩士論文「朱子教育思想」。因健康因素未立即出國留學，應聘省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擔任講師。
- 1958年 肺病痊癒。九月前往美國奧立崗大學就讀碩士，主修教育心理學，兩年後，取得碩士學位。
- 1960年 赴加州大學（U.C.L.A）攻讀博士，主修諮商輔導。
- 1963年 完成博士學分的修習，應聘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擔

- 任亞洲中文學院的講師，教授一季的中文。年底回加州大學繼續論文的寫作，因美國總統甘迺迪（J. F. Kennedy）遇刺身亡，延後預定施作之人格測驗。
- 1964年 六月通過博士論文口試，取得博士學位。同年搭船返台，歷經四十天的航行，於十月三日抵達基隆港（航程中熟讀心理學史文獻）。應聘省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任副教授，教授心理學史、教育研究法、輔導、測驗、高級統計。
- 1967年 升等為教授，並出版《兒童發展與輔導》（臺灣書店）。
- 1968年 受教育部委託，主持編製「普通能力測驗」，用為實施九年國民教育後，國民中學學生編班之依據；獲國科會獎助講座研究案，在臺北市古亭國小及中山國小進行「創造力發展」實驗研究；出版《心理與創造的發展》（臺灣書店）；創辦在職教師研究所進修學分班。
- 1969年 田培林教授退休後，接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主任；與田培林教授等合著《教育新論》（文景出版社）。
- 1970年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申請設立博士班；蔣中正先生於教師節邀宴，垂詢教育發展大計（次年教師節再度邀見）。
- 1971年 受國科會獎助進行「資賦優異學生教育實驗」。
- 1972年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班開始招生；總統提名為考試委員，九月一日正式上任，此後連任兩次，共擔任三任合計十八年，期間續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授，無薪義務上課；與黃昆輝教授等合著《教育論叢》（文景出版社）。
- 1976年 母親顧若愚女士逝世。出版《英才教育》（開明書店）。
- 1979年 出版《教育概論》（五南）、《教育與人格發展》（復文）。
- 1980年 帶領在職校長及教師赴美參加「密蘇里大學研習班」，親任課程翻譯；該班學生學成返國後，二十八年間，年年邀請聚會、講話。
- 1982年 自來台後，首度與家人（二姐賈馥蓉）取得書信聯繫。
- 1983年 出版《教育哲學》（三民）。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Ⅳ

- 1985年 在日本東京與二哥賈葆民、二姐賈馥蓉重逢。
- 1988年 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授職。
- 1989年 出版《教育原理》(三民)。
- 1990年 自考試院退休；首度返鄉探親。
- 1992年 出任國立編譯館《教育大辭書》之總編纂；出版《全民教育與中華文化》(五南)。
- 1996年 獲聘為國策顧問，其後連任兩次，共擔任3年。
- 1997年 出版《教育與成長之路》(師大書苑)及《人格心理學概要》(三民)。
- 1999年 臺北市政府徵收師大職舍為新建龍門國中用地，搬離臺北市，定居新店山城達觀社區。編成《心理學史概要》(師大書苑)，並出版《教育的本質》(五南)、《中庸釋詮》(五南)、《人格教育學》(五南)。《教育大辭書》編纂工作完成。
- 2000年 獲聘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名譽教授。《教育大辭書》(文景出版社)出版，收錄一萬四千餘條目，釋文達一千一百多萬字，共十二冊。
- 2001年 出版《先秦教育史》(五南)。
- 2002年 獲選北京師範大學榮譽校友；主譯《論教育》(五南)。
- 2003年 罹患乳癌，赴台大醫院開刀，手術後復元良好，化療療程順利；出版《教育認識論》(五南)。
- 2004年 出版《教育倫理學》(五南)。黃昆輝教授及簡茂發教授等發起並成立「財團法人臺北市賈馥茗教授教育基金會」。
- 2006年 獲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榮譽校友。
- 2007年 七月最後一次返回大陸探親；出版《融通的教育方法》(五南)。
- 2008年 三月診斷罹患肺腺癌，接受標靶治療無效，五月七日上午八時三十五分逝世於台大醫院安寧病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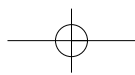


張箭、鄧玉瑛

1922 · 1956~1977

◆ 為教育奉獻生命的師表 ◆

涂欽鴻、劉金英、王永誠、陳杰燕、葉銘恩、呂至全、彭松英、張大鵬
／花蓮縣長橋國小教師



一條隔絕花蓮縣鳳林鎮與山興里兩地交通往來的花蓮溪，看似平靜無波，卻曾在三十年前的一個寧靜清晨，無情地奪走了山興國小張箭、鄧玉瑛兩位老師的寶貴生命...

這是三十年前發生於鳳林鎮上驚動全國的不幸事件，張箭及鄧玉瑛兩位老師為了到山興國小上課，在跨越花蓮溪險惡的河水時，不幸被溪水所吞噬而殉職，這樣的悲劇震驚了社會，翻騰了人心...

流水依然悠悠，三十年過去，身為鳳林子弟的我們，不願意讓這段傷痛僅化為追思與回憶，期待透過文字，尋回記憶的斷簡殘篇，也藉此讓我們的孩子瞭解在地的故事，更希望透過我們的紀錄告訴大家，曾經有兩位熱愛生命的老師，用熱情灌溉教育、用生命成就永恆——他們是張箭與鄧玉瑛。

壹、兩位教師的生平

一、春風化雨好老師-張箭

張箭老師原名張義溥，出生於安徽六安的望族，全家篤信佛法，而自幼父親對子女明辨事理而尊重的管教，塑造出張箭老師堅毅而溫厚的處世態度。在家中排行老么的張老師，自幼天賦優異且好學，小學中年級時即常旁聽高年級課程。國中後，因社會局勢動盪，不顧家人反對毅然加入青年軍，其後隨國軍轉戰四方最後來到台灣。隻身來台的張箭老師退伍後，在台北做過一些小生意，存了一筆積蓄卻因合夥人需要而全部借他，再次身無分文的張箭老師，於此時投考了退伍軍人師資訓練班，更在當年（1967年）與年方二十的蔡清妹奶奶結婚，至此張箭老師在台終於有了家人。

張箭老師是一位認真、願意付出的人，任何事情無論於公於私只要他能幫忙出一點力，他就會認真去做。連三女張立雯出生那一天，因為適逢學校開學，老師並沒請假，直到工作完成才匆匆忙忙回家照顧妻子、見小孩子第一面。張箭老師出生於安徽的世家，在短短相處的十年，老師每天為了養家，除了上班，每天還要幫忙種菜、種甘蔗，他和蔡女士的第一棟房子就是這樣每天存十五、二十塊存下來的，日子過得雖苦，卻踏實而美好。

張箭老師真的很疼老婆，她想吃肉，就算正中午，市場都休息了，他就是會騎著腳踏車去幫她買肉回來給她，常常對她說：「等環島鐵路一通車，就帶妳出去玩」。

儘管生活過得再苦，張箭老師每個



張箭老師結婚照。
資料：(蔡清妹女士提供)

禮拜總會帶全家人去電影院看電影，順便解釋電影中的情節給很少出門的妻子與小孩聽，總希望她們增廣見聞，眼光不要只停留在鄉下。張老師妻子回想說：「每次我從台糖的甘蔗田工作回來，張箭老師總是把家裡大小事打理好，帶著三個小孩在家門口等我，因為張箭老師覺得我每天為了養家，在台糖蔗園工作很辛苦，總會和孩子們戲稱媽媽才是一家之主，要孩子排好隊迎接媽媽回家。」

師母蔡女士曾說：「我珍惜我們夫妻這段十年的緣分，我感恩上天給我十年的時間和張箭在一起，他是個很照顧家的人，是一位很好的先生」。張箭老師除了是一位好先生、好父親、更是一位好老師，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認真的老師，期望年輕一輩的老師能夠以他為榜樣，用耐心、愛心帶領孩子，讓學

生知道讀書的重要，讓學生了解什麼是榮譽，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

張箭老師對子女相當疼愛，往往一回家就會把孩子們抱在身上然後問：「哪裡想爸爸？」如果孩子說鼻子，張箭老師就會在孩子的鼻子上捏一下；如果孩子說肚子，張箭老師就會在孩子的肚子上捏一下，逗得小孩樂不可支。身為小女兒的張立雯老師回憶到，小時候一聽到爸爸的下課鐘聲總是迫不及待的跑去纏爸爸，爸爸總會變魔術似的從口袋中掏出五毛錢給女兒買她最喜歡的炸彈麵包…這是三十年前一位五十歲父親給孩子們的愛。



張箭老師(後排中間) 家族唯一的一張合照。
資料：(蔡清妹女士提供)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Ⅳ



張箭老師昔日身影。
資料：(蔡清妹女士提供)

張箭老師在教育孩子時總是尊重他們的意見並鼓勵子女獨立思考。對於子女不懂的地方，身為父親的張老師會一教再教，總是鼓勵凡事仔細想、慢慢學習，在做出決定之前，先想清楚這個決定的後果，不要做會讓自己後悔的事。並交代孩子：「做事情要勤快、要能吃苦要有榮譽感」，最重要的是心中要常存感恩心，在這樣身教之下，今天他們於家庭於工作才都能有一番成就。

他也常叮囑孩子們要熱心公益。戰亂時期的張箭老師是軍旅中少數識字的人，即便日子再顛沛，張箭老師總是會想辦法幫軍中同袍寫信；到了台灣，老師仍常主動幫助街坊鄰居處理生活的大小事，早在山興村與鳳林之間還沒有正式交通往來時，只要山興村的壯丁們約好要搭蓋竹橋，張箭老師的身影便不曾缺席。「父親也是一個知恩及念舊的人

」張立雯老師回憶著「父親年輕時和國民軍逃難到四川，有一回連續好幾天都沒有東西吃，餓的實在受不了，當他經過一戶人家時，遇到一位大嬸，張箭老師脫下腳上的一雙鞋對她說：『請您行行好，我用這雙鞋，和你換一碗白米飯好嗎？那位大嬸看了看他說：『你的鞋子太小了我也穿不下，你自己留著吧！』說著便回房端了一碗白米飯給張箭老師吃，這件事一直到孩子們都大了仍不時會聽到父親提起，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到四川，再次拜訪那位大嬸，好好謝謝她。」這樣對人的友善與溫厚，正是自幼得到家庭的薰陶。

陳國義校長是當年張箭老師的同事，從鳳林國小退休以後，仍在故鄉熱心於各項服務，在陳國義校長的回憶中，張箭老師是一位可敬和藹的同事，張老師相當照顧晚輩，他總會主動協助年輕老師處理他們不熟悉的校務。此外，或許是因為曾經擔任軍職，張箭老師於工作於生活均流露著嚴謹與一絲不苟；在張老師與陳校長共事的五年中，陳校長在該校擔任教導主任，張箭老師擔任總務主任。雖然張老師年紀長了陳校長將近十歲，但張箭老師仍十分尊重陳校長的決定，對於工作的認真亦從未因為年紀而稍有懈怠，這樣敬業與尊重自己與

他人的態度，至今仍讓陳校長津津樂道。閒暇之餘張箭老師最大的興趣就是下象棋，下班後老師總喜歡和街坊鄰居坐在街角的大樹下，彼此廝殺個幾回合，伴隨著濃濃的鄉音，在族群隔閡仍深的年代，老師運用文化素養與熱忱為社區經營了最溫馨的片刻。回想起張箭老師遇難那天的光景，陳校長感慨的說：「張老師為了工作，不顧危險在河水湍急的情況下勉強涉水而過，以現在的眼光看來似乎不是一種很理性的行為。」而教書數十年的陳國義校長卻能深刻體會張箭老師急著想渡河上課的心情。

陳校長的回憶，道出張箭老師是一位把學生當作自己孩子的慈祥導師，更是一位對教育盡忠職守的良師典範。由於當時山興大多數的人家，經濟狀況都不是很好，早在三十年前，張老師就知道要擺脫貧窮羈絆，唯一的辦法就是苦



鄧玉瑛老師(左一)小時候與爸爸合影。資料：(鄧連友先生提供)

讀。於是張老師挨家挨戶的拜訪每個學生的家庭，透過溝通，實際了解學生家庭狀況，了解學生的需求與個性後，再依學生

不同的特質因材施教，永不放棄的愛，是張箭老師教學的特質。陳校長說：「農忙時節，田裡人手不夠，學生往往會留在家裡幫忙而未到校上課，張老師為了學生的未來，不分學生資質、家境，更是一家接著一家的拜託學生家長讓孩子們上學，不放棄任何一個學生，認真給予學生完整的學習機會。為了讓學生喜歡上學，更為了讓原住民孩子與平地孩子沒有隔閡的玩在一起，張箭老師常常和學生比賽踢毽子、打籃球，就算十幾個學生和老師一個人比賽，五十幾歲的張箭老師也不見得會輸給這群十來歲的小孩呢！」，老師用一切方法鼓勵學生上學，他用耐心與愛心悉心灌溉孩子，給他們夢想，告訴他們世界有多大，就是希望每個孩子都能為自己累積足夠的能量，踏實的迎接未來。

在那樣的年代，教書是一種榮譽也是一種責任，老師往往視學生為己出，不但關心學生的課業，當學生生病時，也會為生病的學生煮稀飯，甚至關心他們交友及生活方式等等。張箭老師殉職一事，以現在而言或許是一種愚勇，但這樣的行為就是一種責任，一種敬業，一種對教育的熱忱與執著。「經師易求，人師難得」陳國義校長期盼在今日活潑多元教育的背後，有更多為人師表者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Ⅳ

能夠回歸教育的本質，務實的培育下一代。

二、刻苦成長的歷程—鄧玉瑛老師

1956年9月26日玉瑛（字小囊）生於這充滿著鄉土氣息且樸質的家庭。那時家中除了父母之外還有哥哥和姊姊，排行第三；小學就讀於鳳林國校（鳳林國小前身），六年後畢業時，適逢政府決定實施九年國民教育前的最後一屆，憑著優異成績考進鳳林初級中學（鳳林國中前身）就讀，在讀初中的時候，因為家庭經濟狀況不好，再加上家中三個兄弟姐和自己的學費，使家中陷困境。母親時常為了金錢，四處向親友、鄰居借貸；當夜深人靜的時候，鄧老師每每在睡夢中，就會聽見父母親為了明日的的生活費商討著。初中畢業時，鄧爸爸及鄧媽媽希望她將來能光耀門楣進入大學而鼓勵她報考花蓮女中，也順利考取了花蓮女子中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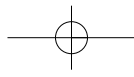
居住的鳳林鎮上到達花蓮女中所在的花蓮市路程超過五十公里，以現在的交通狀況都需四十分鐘車程，更何況三十多年前的鳳林鎮，每日通學需耗時將近二小時的車程，上學必須早出晚歸，那時鄧老師的哥哥也正就讀花蓮高工，上學時兩個人有伴比較不孤單，鄧媽媽

當時為了他們的早餐及午飯的便當，清晨四五點就起床做飯菜，一直到孩子走出家門，才安心的回到房裡睡覺，尤其是寒冷的冬天裡，天還沒亮玉瑛老師就聽見廚房中傳來的洗菜、切菜聲，飯菜弄好母親才親切的呼叫他們起床，這種聲音一直在鄧玉瑛耳邊繚繞了三年。可以想見當時玉瑛家裡的辛苦，或許很多出生在現代的人們，根本無法體會在偏遠鄉下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家裡還有兩位年事已高的阿公阿婆，全家生活主要靠著鄧爸爸教書的微薄收入和那難以維持的破舊豆漿攤來維繫著。當時四周鄰居數數只不過三、四家罷了，所幸鄰舍的嬸嬸、伯伯都非常關照玉瑛的家。

性情溫和順從的鄧玉瑛，深受兄姐的寵愛和弟弟們的尊敬，在家時除認真於自己的功課外，常照顧弟弟們的功課。晚間弟弟們如有功課未完成，就會在



鄧玉瑛老師(後排左四)於花蓮女中與同學合影。
資料：(鄧連友先生提供)



鄧玉瑛老師(右三)與家人合照。
資料：(鄧連友先生提供)

旁陪至深夜而不自己先入睡。早上上學前必替弟弟們照顧妥一切後才一起上學去，不必父母操心。她性情溫和外向，偏愛樸素簡單的生活，平日除了功課外還愛打乒乓球、彈吉他、畫水墨畫。在她高中畢業後，有一段期間在鳳林水文工作站服務，在伯父鄧向勤大力鼓勵與指導下，認真學習書法，稍有成就。我們都可以深深感覺到玉瑛這樣的女兒是爸爸、媽媽一生的驕傲。

沒能考上大學是鄧玉瑛永遠的痛，放榜那天，鄧玉瑛看遍了整個榜單，就是沒看見自己的名字，鄧玉瑛失望至極，爸爸、媽媽不但沒責難反而鼓勵玉瑛說：「沒關係，明年再考一次」，這樣貼心的父母更讓玉瑛老師心中難受，後來在報上看到「國防部招考女青年工作幹部」，可是這次的考試又再次落榜。在隔年的聯考中，媽媽為了女兒，到廟裡燒香，求神明保佑能順利考上，結果又再一次名落孫山令玉瑛老師傷痛，在自傳中玉瑛老師感激母親這番心意，字裡行間卻恨自己不成材，辜負了母親的

期望這一切，玉瑛多次哭泣，還一度抱怨為什麼上天這麼不公平，只讓父母親為他們的子女付出代價，而不讓玉瑛為父母親盡點心意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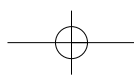
後來一心想改善家庭經濟，協助弟弟們有更高學業的鄧玉瑛，放棄了學業，與姊姊相伴，一同前往台北工廠工作一年，鄧爺爺感傷的說這期間玉瑛老師必定受了不少的苦，每次寫信回來都說，她們工作如意、生活很快樂，決不讓家人操心。

之後因為鳳林鎮北林托兒所有保姆之缺，鄧爸爸便寫信叫她辭去工作。接到這封信時，鄧玉瑛著實猶豫了許久，在台北的工作人事已有了感情，實在捨不得離開，但若能有機會參與教育工作，且離家又那麼近，還可以照顧父母，亦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和姊姊商量後，鄧玉瑛決定回到花蓮一圓她擔任教職的夢，展開她這一生最愛卻也是極為短暫的教職生涯……。

貳、生命的殞落

一、消逝的身影

一條隔絕花蓮縣鳳林鎮與山興里兩地交通往來的花蓮溪，看似平靜無波，卻曾在三十年前的一個寧靜清晨，無情地奪走了山興國小兩位老師的寶貴生命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Ⅳ

，當天清晨並沒下雨，鳳林鎮山興國小六位老師正準備橫越花蓮溪，涉水過河至山興國小上班；河面上沒什麼特別徵兆，唯一有的就是大家渡河的小船，因為上一次被大水沖走了，這也就逼著必須涉水過河才能到學校上班，因先前「黛納」颱風及連日暴雨之故，使得花蓮溪溪水暴漲，讓當天準備涉水過河的老師們深陷暗潮洶湧的無情溪流中，張箭老師拉著鄧玉瑛老師的手；陳國義校長則牽著林寶炫老師隨行在後，才走不到一半，鄧玉瑛老師就滑倒了，正牽著鄧玉瑛老師手的張箭老師也跟著落水，不到一會兒，兩個人就不見蹤影。緊接著身陷渾渾惡水中的陳校長，也擋不住溪水衝擊，被無情的溪流沖走，陳國義校長和林寶炫老師在水中浮浮沉沉、掙扎翻滾了約兩百餘公尺後，所幸有驚無險，終於擺脫惡水肆虐，脫險上岸，在安置好林老師後，陳校長趕緊回頭詢問在

岸邊焦急等待的另外兩位老師，其中一位鍾老師說她在岸邊有看到張老師和鄧老師被溪水沖往下游渡船頭方向而去，於是一群趕緊沿著河岸往下游尋找。走到渡船頭後，陳校長詢問撐船的年輕人是否看到有人上岸，年輕人說沒看見，不過好像有瞥見一些東西漂過河面，於是陳校長更加擔心起來，這時剛好有一群人準備渡河，陳校長便拜託他們回鳳林鎮上通報消防隊前來搜救。

接著，陳校長便與撐船的年輕人趕緊沿著溪流往下游尋找，走到位在下游的中興國小後，詢問當時的校長傅文欽先生和學校職員，是否有看到兩位被溪水沖走的老師，這時，傅校長回想起上班途中，似乎有看到些許漂流物浮在水面上，疑似便當、衣服之類的東西，陳校長當下念頭一轉，立刻廣播通知村裡的人前往河邊幫忙搜尋兩位老師的下落，但一無所獲。



陳國義校長回憶當年涉水渡河的驚險情形。

二、悲痛的事實

鄧玉瑛父母在得知女兒不幸落水的消息後，帶著焦急不安的心情趕赴事發現場，由於當時花蓮溪河水深達腰際，因此增加了搜救上的困難，隨著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大家的心情也越來越沉重，一行人沿著溪流往下游搜尋了一整

個早上，仍然沒有箭、瑛二師的下落。大家顧不得身心的疲憊，依然加緊腳步繼續往下游搜尋，就在當天下午二時，鄧玉瑛老師的遺體先在米棧村的花蓮溪畔被尋獲，而這晴天霹靂的噩耗更讓傷心欲絕的鄧家父母痛苦萬分，無法接受這「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殘忍事實。這令人鼻酸的事實讓隨後趕至搜救現場的張箭夫人蔡清妹女士心情更加跌落谷底，眼看夜幕低垂，張老師依然下落不明，焦急與等待的折磨摧殘著蔡清妹的身心，讓早已哭得不成人形的她整夜無法成眠。

事發當天遍尋不著張老師下落的警民，於隔日再組搜救隊伍，繼續往下游搜尋，終於在事發第二天晚間九時，在離事發現場數十公里遠的壽豐鄉月眉村附近找到張老師遺體，這大家最不願意面對的真相依舊成真，讓早已哭得柔腸寸斷的蔡清妹陷入絕望的深淵，看著一生的最愛已撒手人寰，聲聲的呼喚已無法喚回逝去的丈夫。眼看天倫夢碎，教人情何以堪？午夜夢迴時分，獨留人憔悴！

三、震撼人心

長久以來，位處花蓮縣偏遠地區的山興里因受花蓮溪阻隔，兩岸居民往來



民國74年電影拍攝重建當年的竹橋景象。
資料：(蔡揚名導演提供)

山興里和鳳林鎮間，均需涉水往返，險象萬分。地方父老為了安全起見，曾多次建議縣政府協助興建大橋，好讓兩地居民及師生們免去涉水之苦，無奈礙於工程浩大、經費無著，始終毫無結果。三十年前一個寧靜的清晨，兩位準備涉水過河上班的老師慘遭溪水無情吞沒，不幸罹難。消息傳出後，震驚地方人士，紛紛要求縣府儘速興建過水大橋，以保障當地居民與師生的生命安全。想到這多年的老問題，竟需要犧牲兩位老師的寶貴性命才得以解決，實讓人不勝唏噓！

1977年10月10日上午，鳳林鎮各界代表由鎮長張乾倉率領，分別至張、鄧二府公祭。社會各界代表亦前來悼念因公殉職的張箭老師與鄧玉瑛老師。有感師恩浩蕩，無以回報，山興國小學生代表在學校老師和高年級學生家長的護送



民國66年中國時報報導悲痛的事實。資料：(中國時報)

下，由六年級班長劉光鶯帶領學生過河至公祭現場，向他們心中最敬愛的張箭和鄧玉瑛老師表達最高的敬意。只見悲傷的氣氛瀰

漫整個鳳林鎮上，靈柩所經之處，民眾莫不垂首致哀，感嘆英才早逝。

兩位老師盡忠職守，因公殉職，不僅震驚了偏遠山城，更震撼了全國民心，報章雜誌陸續報導這則感人心弦的真實故事，他們對教育工作的熱忱與奉獻不僅彰顯教師的偉大人格，其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更足為後世表率。三十年來每逢箭、瑛二師週年紀念活動，社會各界無不主動追思與悼念，因為這樣發人深省的「箭瑛精神」早已深植人心，並



民國69年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下鄉視察。資料：(鄧玉瑛老師家屬提供)



民國68年紀念公園落成時景象。資料：(鄧連友先生提供)

鼓勵無數莘莘學子努力上進。而他們對教育的犧牲與奉獻不僅已成為傳唱千古的人間典範，同時也催生了日後造福山里的生命之橋-----「箭瑛大橋」。

參、造福山里

一、箭瑛大橋的興建

張箭與鄧玉瑛兩位老師的事蹟震驚了全臺，輿論一片嘩然。經報紙大篇幅報導，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立即下鄉視察，除了全力慰問家屬之外，也責成中央撥款興建水泥大橋，以張箭老師姓名當中的「箭」，鄧玉瑛老師的「瑛」字為名，新的水泥大橋就命名為「箭瑛大橋」。

大橋興建工程就此展開，地點就選在舊有便橋旁，也即是張箭、鄧玉瑛老師生命隕落的現場。但是，當時中央低估了花蓮溪的水勢。劉光鶯老師說：「

只要大雨一來，滾滾洪流襲捲而下，當時的大水，要說多大就有多大，我永遠無法忘記，水泥橋總共修建了兩次，第一次建的橋剛蓋沒多久就給洪水沖毀了，到了第二次才建好。前前後後，也花了三年的時間。」

就在箭瑛犧牲後的第三年，這座用生命搭起的箭瑛大橋終於完成，通車那天，山興社區請來原住民跳舞大肆慶祝，所有人都非常高興。陳國義校長感慨的說：「我的感觸很深，為什麼總要歷經這樣痛苦過程與無數的家庭破碎才換得這一座大橋的興建。」

其實，當年在花蓮溪下游同樣也有其他村落必須橫跨湍急的溪水才能過河，就在箭瑛大橋興建後的幾年，米棧大橋也因此誕生，近年更興建了月眉大橋與花蓮大橋的改建工程，箭瑛不僅造福了山興，也造福了來來往來的無數生命。

二、永駐橋畔

當時張箭、鄧玉瑛兩位老師的犧牲引起了台灣杏壇非常大的迴響，更讓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



民國69年各界蒞臨紀念公園致敬。
資料：(鄧玉瑛老師家屬提供)

國先生非常感動，對於偏遠地區交通的建設更加重視，馬上專款補助，下令花蓮縣



民國69年蔣院長(左二)蒞臨公園。
資料：(鄧玉瑛家屬提供)

政府及鳳林鎮公所著手進行修建橋樑和紀念公園的工程，民國六十八年公園的工程很快就完竣，真的很感謝政府當局和鳳林鎮公所的積極和用心，給家屬及感念兩位老師的師生、村民們有一個很棒、很美的紀念園地。

雖然經過了三十年的歲月，大橋仍然堅固，公園及銅像依舊巍峨，潺潺流水聲好似仍在為兩位逝去的老師哀泣著！我們要感謝建設當局的用心建造和村民時時的養護，聽說至今從未維修過，唯一的缺點是橋面太窄了些，車子來往稍嫌擁擠。鳳林鎮公所已將此地列為觀光景點，現已規劃完成，正呈報計畫爭取專款增建設施，如：表演舞台、親水廣場、休閒垂釣、原野體能訓練場、機動性活動長廊、紀念花園及散步、漫步道等，希望今後到此一遊的遊客們能帶著崇敬的心情到公園給這兩位老師行禮。

肆、電影憶當年

金格影藝公司為了感念兩位教師，在事件發生後沒多久就把它取材為電影的劇本。根據鳳林鎮公所劉秘書的口述得知金格影藝公司為了把這段感人的真實故事拍成電影，大批劇組浩浩蕩蕩來到鳳林鎮。聽說當時住在鳳梧旅社，由於小黑蚊非常的多，許多女演員個個叫苦連天，都快受不了！當時東部各方面還不是那麼方便，相信他們為了拍這部電影也吃了不少苦頭！

電影女主角為了揣摩鄧玉瑛老師的性情和生活點滴，特別到鄧老師家去深入了解住家環境，並和鄧媽媽深談，由於她的用心難怪會把鄧玉瑛老師的角色演得絲絲入扣。鄧爸爸當時服務於北林國小，所以許多上課的場景都是在北林國小拍的，根據鄧爸爸的描述，因為北林國小周圍種了許多的竹子，所以小黑蚊特別多，女主角被叮得受不了都哭出來了。鄧爸爸說這部影片的真实度大約有六成，主要是講究效果和完整度，聽說當時這部影片轟動了一陣子，還差一點得優良電影獎，著實給教育現場帶來極大的震撼與鼓舞。

現今的社會正需要這種教化人心的好電影重現，只是年代已久遠，箭瑛大橋這部電影只能把它當成老電影來欣賞，若要拍製有賣點又要現今年輕人能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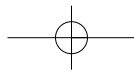
民國66年事件發生後，經國先生前來慰問張箭的家屬。資料：(張箭家屬提供)

受、且有教化意義的好電影，電影製作人要絞盡腦汁了，若這些幕後功臣肯為教育下一代與我們共同盡一份心力，讓社會更純淨祥和美好的話，相信我們的明天會更好。

伍、展望未來

一、始料未及的影響

眾所期盼的水泥大橋建好之後，山興的社區居民不再需要涉過洪流滾滾的花蓮溪，要到鳳林鎮，只需走過一條舒適的箭瑛大橋就可以了。箭瑛大橋的落成，對當地而言，真是一件好事，它不但縮短了山興社區與鳳林鎮的距離，更重要的是，對保全當地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居功甚偉。但在交通改善的亮麗外表下，同時間山興社區也付出了始料未及的代價。



但是，橋建好，交通也就方便許多，社區居民當然也意識到這個改變，為了家庭生計與孩子們的就學方便，也就紛紛舉家搬遷至鳳林鎮內，一時之間，社區人數大為減少。

「沒有小孩子在玩的聲音」，這是我們對山興社區一開始的印象。走在街上，四周靜悄悄的，沒有一台車經過；走近民宅，偷偷往裡面看一看，也是黑朦朦的，好像沒有人在家似的。當我們一群人步入山興國小後，這種感覺就更明顯了。以前山興國小在全盛時期本來有二百多位學生，最後卻也落得因人數不足而廢校。如今，滿地碎玻璃的教室，老舊的司令台和油漆已經剝落很久的遊樂器材，都在在的訴說著這裡已經廢校的事實，沒有了小朋友的笑聲，整個社區就好像少了什麼似的，逐漸為人所淡忘。教室裡的黑板像是不想忘記這個曾經擁有二百多個學生的風光日子，日期寫的依然是民國八十年，時光就停留在這個令人難過的時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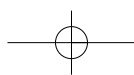
二、大橋的危機

箭瑛大橋像個巨人伸展它的雙臂，緊緊地抓住河的兩岸，任憑三十年來橋上行人、車輛絡繹不絕通行而過，它都默默承受著，毫無一句怨言。但無情的

風雨，卻讓堅固的橋面留下凹凸不平的痕跡；強勁的水流，也無時無刻地沖刷著橋下支撐的樑柱，讓這條用生命搭起的大橋也不得不向歲月低頭，在經過專家鑑定後已把箭瑛大橋列為危橋，有待改建。

這些年來，因他們犧牲而誕生的箭瑛大橋使得兩岸居民不用再冒著生命的危險涉水過河，但在風雨和水流的雙重夾擊下，讓這條連絡鳳林鎮與山興里間交通往來的水泥大橋有了安全上的顧慮，因此橋樑改建工作也勢在必行。目前，由於往來車流量日益增加，加上橋下支撐樑柱直徑寬度稍嫌不足，因此橋樑本身的安全已有潛藏的危機；橋上部份由於橋面間的連接縫隙過大，容易加重橋面的承重壓力，也已危及橋樑結構安全。此外，橋面寬度過窄，也使得車輛在橋上會車時總是險象環生。在此期待這些問題於未來危橋改建時都能得到改善，以保障兩岸居民交通往來的安全；所幸這樣的危機在地方人士和在地議員的努力奔走下，目前已得到有關單位的重視，並建議列入地方建設的要項之一，倘若危橋能獲得改建，則兩地居民的交通往來與行車安全必可得到更大的安全保障。

如今箭瑛大橋已於98年3月封閉整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Ⅳ

修，也期望改建後的箭瑛大橋能為山興部落產業與休閒觀光發展帶來新的契機，重現往日山興風華。

陸、生命價值

在浩瀚的宇宙中，我們的生命渺小如滄海之一粟；在世代的更迭中，我們的生命短暫如蜉蝣。生命存在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是享樂？是磨難？還是單純的傳承？每一個人的答案可能都不一樣，但對事發當時，正值壯年與青春年華的張箭、鄧玉瑛老師而言，生命的意義，是對教育的熱愛、是責任的承擔，更是無私的奉獻。

就是這份對教育的愛與執著、就是這種責任與敬業精神，驅使張箭和鄧玉瑛老師為了摯愛學生的受教權，堅守他們的職責，不畏激流、強行涉水，徒留親友難以抹滅的傷痛。

但是，他們的犧牲是有價值的，因為他們用自己的生命，換來了社會大眾對偏遠山區學童受教權的重視；他們用自己的生命，促成了山興村堅固水泥橋樑的興建和交通往來的便利；他們更用自己的生命，塑造了一個讓後人景仰的楷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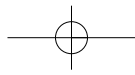
如今，當年的山興國小已然廢校、水泥鑄造的箭瑛大橋亦成危橋，但我們

相信，張箭和鄧玉瑛老師的教育熱忱、敬業與奉獻的精神將會永遠留存在大家的心中，成為人們不斷追隨、學習的典範。

柒、後記—在平凡中活出璀璨

「如果還有明天」這首歌是歌手薛岳在最後一場演唱會裡的主旋律，演唱會結束後，薛岳在媒體寫了一篇文章：「幕總是有起有落，現在對我個人來講，就是落幕的時候了」…誠然、當生命走向寂滅，我們能否勇敢的去面對、灑脫而無怨無悔？

張箭老師與鄧玉瑛老師逝世至今已三十載，用虔敬的心，我們試著整理了「用生命搭起的箭瑛大橋」這段漸為人所遺忘的史料。我們相信，無論過去、今日、亦或未來、總有同樣無私奉獻的教育夥伴默默耕耘著這塊福田。今天透過文字的力量，希望張箭老師與鄧玉瑛老師的故事能幻化為楔子，告訴世界「認真過每一天、世界將因自己而豐富美好…」無論今後世事如何變遷，身為教育工作者的老師們仍能熱愛著教育，以自己的工作為榮，一如張箭與鄧玉瑛兩位老師，在平凡中活出璀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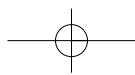


林靖娟

1960~1992

◆ 幼教界的烈士 ◆

林月琴／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西元1992年5月15日是台北市健康幼稚園戶外教學的日子，就在前往動物園的途中，所租用的遊覽車突然起火燃燒，整車陷入一片火海。車上領隊林靖娟老師先是救出8名幼童後，仍再度衝回車內企圖搶救其他幼童，但因為車內濃煙瀰漫，最後連靖娟老師也葬身火海，事後，救火人員發現靖娟老師焦黑的遺體裡還緊緊擁抱著4名幼童…

犧牲奉獻的靖娟老師，本著慈愛之心，全心獻身幼教工作，視學生如己出且教學認真，深獲家長及同事的讚許與肯定，其捨身救人、義勇雙全的精神，深具教育性，堪為教師典範。

姓名：**林靖娟**

籍貫：台灣省彰化縣

生日：西元1960年12月15日

卒於：1992年5月15日

學歷：▲1973年台北市螢橋國小畢業

▲1976年台北市古亭女中畢業

▲1979年台北縣智光商職畢業

▲1982年台灣省立台北師專幼進班夜間部結業

▲1985年台灣省立台北師專夜間部二年制幼稚教育師資科畢業

經歷：▲1980~1982年台北市萬華區私立國花幼稚園教師

▲1982~1989年台北市私立道生關係幼稚園（如華泰、華城、華園等）教務主任、園長

▲1990~1992年台北市中正區私立健康幼稚園教師、總務主任

個性：疼愛小孩、心地善良、孝順、乖巧、幽默、樂於助人、勤奮好學

榮譽：▲1986年獲道生幼稚園董事長頒發「教學卓著」獎牌

▲1988年獲道生幼稚園董事長頒發「道生因您的茁壯，您因道生而成長」獎項

國立編譯館將林靖娟捨身救人之壯烈義行，以〈林靖娟教師——負責〉為題，列入1993年國民小學教科書《生活與倫理》第四冊第七單元，使其用生命捍衛他人生命之懿德得以長存，並為後人典範。為感念護幼犧牲充滿教育愛的林靖娟教師，罹難者家屬與國民黨立委林志嘉等社會熱心人士，更於1993年4月3日共同發起並成立「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積極推動「兒童安全」之教育宣導，以提高社會大眾對兒童安全的重視，並協助處理兒童意外傷害事件。前總統李登輝於1992年邀請台灣雕刻家蒲添生為不幸罹難的林靖娟教師和20位學生及2位學生家長雕塑紀念雕像，並於1998年的教師節（9月28日）完成，將之豎立於台北市立美術館中山二號公園內供後人憑弔，也藉此表揚林靖娟教師感人肺腑的教育愛。此外，1999年9月3日，林靖娟的牌位更被安置於台北忠烈祠，成為第一位入祀忠烈祠的非軍人烈士，也是首位入祀忠烈祠的女性。林靖娟教師大愛無言的偉大其實來自於平凡。

靖娟的童年：出身清苦，病危仍心繫家計

林靖娟，1960年出生在彰化，排行



右上角為幼年時的靖娟老師。
資料：(林明珍先生提供)

老二，還有四個姐妹。當時的林家和大部分的鄉下人家一樣，藉著幾分田地，種些菠菜和洋菇以維持生計。當時家裡沒有電視機，也沒有收音機，靖娟的童年幾乎是在稻田中度過。

小時候的她十分乖巧，不是和鄰居或表兄妹們一起玩耍，就是依偎在母親身邊，看著長輩們忙著切洋菇、做家事；農忙時她就一個人在大樹下靜靜的等待並迎接摘完洋菇回家的爸爸，給爸爸意外的驚喜和溫馨的擁抱。幼年時，靖娟並沒有機會上幼稚園，但是聰明的她，從來不讓家人擔憂煩心。靖娟五、六歲時，靖娟的爸爸決定隻身先到台北為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Ⅳ

事業打拼，靖娟也因此進入台北市螢橋國小就讀。

小學一年級時，一場淋巴腺引起的四十度高燒不退，當時年幼的靖娟竟仍在半昏迷狀態中喃喃對父親說：「阿爸！失禮啦，開您這麼多錢！」（台語）。聽在爸媽耳中，心疼不已，後來幸得老天眷顧，挽回了小小靖娟一息僅存的生命，此後，靖娟就像一朵含苞的花朵，在其人生旅程中一次次地綻放美麗與光輝。

靖娟的求學階段：個性開朗，獨立、積極又進取

因為靖娟個性活潑開朗又隨和，所以人緣很好，在班上常擔任學藝股長。記得小學三、四年級，大姐幫愛漂亮且留著長髮的靖娟燙頭髮，當鉗子夾上靖娟的長髮時，髮絲竟不知怎的斷了一大截，靖娟雖然傷心懊惱，但為了不讓姐姐掛意，嘴上一句話也沒說；還有一次，在靖娟四、五年級擔任糾察隊時，因為無法回家吃午飯，都由大妹為她送飯，其中有一次大妹不小心打翻了靖娟的便當，靖娟知道了也不像孩子般氣急敗壞的跑回家告狀，只是默默地忍著挨餓等待放學。

小學時期的靖娟個頭比別人高大些

，和鄰家孩子玩在一起，一會兒扮黃帝，一會兒帶領小朋友玩遊戲，總是像孩子王一樣勇敢而獨立，感冒了，自己買感冒藥；跌倒了，拍拍身上的灰塵，勇敢的自己站起來，而且她也很懂得照顧、呵護其他小朋友。就讀初中、高職時，靖娟沒有青少年的叛逆行為，依然很聽從師長和父母的諄諄教誨，也能善盡自己的職責，總把制服燙得平順、疊得整齊、穿得乾淨又帥氣；放學後，除了作功課外，更會主動幫忙照顧二妹和三妹；此外，她還利用時間參加學校醫務團的急救訓練和英語研習活動，還曾經贏得學校英語演講比賽第二名。

雖然靖娟念的是高職商業科，也曾擔任學生文摘雜誌社的會計，但因為在偶然機會下幫助在幼稚園工作的姐姐照顧幼兒，有了與幼兒相處的經驗後，她逐漸發覺，天真無邪的孩子們才是她的至愛，也是她一心想去關懷和付出的志業。

靖娟的工作階段： 獻身幼教，全心投入

在發現自己喜歡的志業後，靖娟決定將「幼教教師」當作自己人生的目標。於是於1980年起，靖娟就跟隨大姐在幼稚園幫忙，晚上又至國立台北師範學



靖娟老師於台北市私立健康幼稚園通勤車上陪伴孩童。資料：(林明珍先生提供)

院幼師科進修，於1985年畢業，獲得幼教教師資格，從此投身幼教工作。家人回想靖娟幼師科畢業時說出的看似平凡卻偉大的志向——要做驚天動地的大事，不想庸庸碌碌過一生。

靖娟從1980年投入幼教工作，在長達12年的教育生涯中，不但認真教學，對幼童又備具愛心與耐心，也因此曾任教務主任、總務主任和園長等要職；在幼教服務期間，靖娟不但對幼兒照顧有加，也與家長和同事建立深厚的友誼。

有一次，靖娟因為不小心扭傷了腳，不得已放棄遠在蘆洲之幼稚園的教學，返回家中休養了一兩個月，此事件對熱愛幼教的靖娟，可說是人生中的波瀾，於是又興起她繼續上大學的念頭。然而因緣際會，最後她仍決定重新回到她摯愛的幼稚園服務——健康幼稚園。此

後，靖娟變得更積極，她用整顆心去疼愛園中的孩子，照顧孩子的時間幾乎佔據了靖娟所有的時間和心思。

在幼稚園裡，靖娟視孩子們如己出，無微不至的照顧他們，尤其她總是耐心地餵食園內一些咀嚼比較困難的小朋友；有時為了陪孩子演話劇，她甚至剪掉自己新買的花裙，讓孩子做道具。「林媽咪！」是孩子們對靖娟的親暱稱呼。靖娟此等教育熱忱一直顯露於她的教學生涯中，無論在哪所幼稚園服務都未曾中斷。例如，服務於中和市私立華泰幼稚園時，班上一位患有嚴重自閉症的小朋友，整天都不開口，孩子的母親多次嘗試，仍告無效，於是求助靖娟，靖娟以其溫馨的教育愛和無止盡的毅力和耐心，時時擁抱他，耐心地和他說話，經過一年的努力，有一天，那位小朋友



於台北市私立道生幼稚園運動會與孩童開心合照。資料：(林明珍先生提供)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Ⅳ

竟然開口說話了，靖娟喜出望外，立即將此喜訊告知家長，日後這位小朋友也漸漸能和其他同伴一起玩耍。1987年，靖娟服務於道生幼稚園時，班上有一位罹患小兒麻痺的小女生，每天都是奶奶送著來上學，但卻都是靖娟背她到四樓的教室上課，靖娟的愛心表露無遺，至為感人；當家長有事外出，小孩乏人照顧之際，靖娟教師也是很熱心的帶小朋友回家照顧，甚至過夜，類似這些義行，不一而足，尤其令人感佩的是，靖娟總是默默行善，因為靖娟教師認為助人是自己人生的義務，也是其彰顯生命意義的重要方式。

服務於健康幼稚園時，靖娟也常義務幫家長照顧小孩，當時任台北市刑大副大隊長的侯友宜（現任中央警察大學



1992年靖娟老師於台北市私立健康幼稚園教導孩童做體操。

資料：(林明珍先生提供)



靖娟老師於台北市私立道生幼稚園與師生合照。
資料：(林明珍先生提供)

校長），因公務繁忙，每天一大早即將其幼子侯乃維送至幼稚園，靖娟體恤家長的需求，每天義務照顧侯乃維，餵他喝牛奶，幫他換尿布，侯乃維還稱靖娟教師為「乾媽」，師生情誼之濃郁溢於言表；可見靖娟與小朋友之親密的情感。記得有一次時值放學時間，小朋友手部疑似骨折，有些腫脹，家長尚未來園接孩子，於是靖娟雖然繁忙，但仍然本著愛心與熱心，儘速送小朋友就醫，此種助人的熱忱深獲園內同仁的肯定與家長的愛戴。

靖娟對幼教工作的投入與奉獻，孩子是她生活的全部，她期望讓純真的孩子都能感受世界的溫暖，於是不畏風雨，每天早出晚歸，平時教學認真，用心設計教學，和孩子一起動手作教具，每週還將幼童的聯絡簿帶回家仔細批改，

鉅細靡遺的將幼童的生活狀況、學習行為及各種表現寫在聯絡簿上，不僅如此，靖娟為了增進與幼童家長的彼此認識，更會主動於開學前與家長聯絡，其和藹親切的教育熱誠深受家長肯定。總之，靖娟的教育熱誠與積極態度，堪為全國教師表率，在擔任幼稚園主任期間更經常忙至凌晨二、三點才回家休息，不但從未聽到她喊累，更樂在其中。

靖娟的孝心：發大願治母病，孝行可鑑

靖娟家住廈門街，214公車成了她每天到仁愛路上下班的交通工具，為了縮短來回的時間，本想買摩托車代步，但父母以危險為由不贊成，靖娟為了不讓父母親擔心，便不再堅持。靖娟的孝順之情，由此可見一斑。

儘管她愛孩子，但是她心中仍然惦記著家人，每當爸爸收工時，她就會和姐妹們一起幫忙爸爸搬鐵條、拉鐵門；有一次，媽媽罹患類風濕關節炎，且看過無數名醫都無法治癒，靖娟聽朋友說台北縣九華山廟非常靈驗，廟裡的古井水可以醫治百病，靖娟遂發願求水，從山下一路三叩九拜，一直跪到神明前，足足跪了3個小時，兩個膝蓋都跪腫跪破了，仍然一心想為母親求得神水，雖

然母親的病情沒有因此而好轉，但是其孝心可感，孝行又添一樁。此外，為了慰勞常年為家事忙碌的媽媽，她也常帶媽媽一起外出旅遊；又因為媽媽識字不多，為了讓母親增長見聞，靖娟常常花時間將自己讀過的聖經或佛經上的小故事耐心地唸給母親聽，可見母女感情甚篤。

靖娟在家人眼中是位乖巧、孝順又樂於和人分享的女兒，常買東西回家，也常幫母親做家事，燒一手膾炙人口的美食，一有客人來，便會下廚，只要一學會新點心，就會在家人前面露一手，和家人一起分享。也許是樂觀個性使然，靖娟喜歡亮色的服飾，但也樂於和姐妹們共享，姐妹們也會相約看電影、喝永和豆漿、逛街等。她喜歡喝鮮奶，愛啃雞翅膀，吃虱目魚肚，但為了健康不吃零食，以免父母操心。

靖娟的滿腔理想：未逮實現先葬火海

健康幼稚園的教學嚴謹，班級導師必須從小班帶到大班，靖娟認為這樣的教學方式很好，因為這樣才能夠真正和孩子們做朋友，和孩子們一起成長，不會因為一年換一次學生，造成師生關係的疏離，影響孩子的學習與成長。靖娟

教育學

台灣教育人物誌Ⅳ

常和園內的姐妹們談及：「有一天我一定要闖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當時她擬定了好多計畫，例如：年初要開一家小型輔導班；5月份要報考師專學歷升級師院的補修考試；暑假則要帶媽媽暢遊歐洲…。

1992年5月14日——出事前一天，因為造訪學生家長，她只打了通電話回家，告訴爸媽：因為學校有事會晚點回家；第二天一早出門後，就是在一個這麼平凡的日子裡，一別竟然成永別。



靖娟老師與孩童開心合照。
資料：(林明珍先生提供)

1992年5月15日，台北健康幼稚園舉辦春季旅行，目的地是六福村野生動物園，靖娟也帶著她班上的小朋友快樂地在車上唱著兒歌。11:40分，在平鎮的公路上，因車輛震動電源變壓器，以致電源線發生短路、電線走火，引燃車內的易燃物，爆炸起火。然因滅火器早已逾期3年，導致失事當時無法滅火，此時司機開啟右前車門讓大家逃離，惟因間距太小，且安全門把手年久失修，致無法打開，遂踢破安全門玻璃，隨後有位教師和家長引著前面幾排的孩子迅速下車，靖娟攜著6位小朋友直衝過火苗，安全下車，但當她聽到車內還有28位小朋友淒厲的驚叫聲時，又不顧一切地衝入車內…路人也趕忙合力用石塊打破車窗，接駁出靖娟拼命由火堆中救出的小朋友…大火蔓延太快，眾人勸靖娟趕快逃離，但她不為所動，一心只有尚在火海中的孩子，等到她繼續救出第8位小朋友時，大火突然間就將車內的人都吞噬了。

不久，大火雖然被熄滅了，但歷歷在目，讓人永難忘懷的景象卻是被燒成漆黑的靖娟緊緊抱著4位小朋友的慘狀，令人不勝歎噓。靖娟盡一切可能，奮不顧身搶救孩子，臨死前還護衛著學生的場景，道盡她捨身護生的教育大愛，



1998年靖娟老師父母於林靖娟老師塑像揭幕典禮留念合照。資料：(林明珍先生提供)

是教育良心最高貴的顯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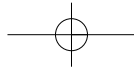
靖娟遺愛人間，精神不死

5月28日公祭，靖娟的媽媽為她準備了她生前喜歡的衣物，準備考試的書籍，希望在另一個世界能夠完成她想做的事。輓歌中唱著：「我們不要火燒…」令人心酸不捨；5月27日，「靖娟幼兒基金會」成立，期能讓靖娟的教育大愛永存人間。先總統經國先生曾說：「偉大出於平凡」，靖娟就像你我一樣的平凡，但她卻以無比的愛心為社會撰寫這份偉大，或許藉此更能讓人間充滿更

多的大愛，讓孩子們都能在愛的氛圍下學習與成長。

參考文獻

- 陳梅華（1992）。永遠的光—林靖娟教師紀念專輯。台灣新生報。
- 台北市中正區私立健康幼稚園（1992）。台北市中正區私立健康幼稚園戶外教學事故及林靖娟教師事蹟調查報告。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教育愛：台灣教育人物誌IV／國立教育資料館編.--初版.--臺北市：教育資料館
民98.10
面：公分
ISBN：978-986-01-9908-6（平裝附數位影音光碟）
1.教育人員 2.臺灣傳記
520.9933 98017214

教育愛—台灣教育人物誌IV

發行人：王世英
編輯委員：伍振鶯、吳文星、吳清山、郭生玉、黃炳煌、溫明麗、楊國賜、歐素瑛
執行編輯：張雲龍、陳惠玲
出版機關：國立教育資料館
地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79號8樓
電話：(02) 2351-9090
出版年月：中華民國九十八年(2009)十月
版次：初版一刷
電子出版品說明：本書同時登載於國立教育資料館網站
網址：www.nicerar.edu.tw
定價：新台幣550元（含DVD光碟）
排版者：倉頡印刷設計有限公司
電話：(02) 2763-1001
展售處：國立教育資料館教育資源服務中心
電話：(02) 2351-9090 # 173
教育部員工消費合作社 (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電話：(02) 7736-6054
五南文化廣場 (400臺中市中山路6號)
電話：(04) 2226-0330
網址：www.wunanbooks.com.tw
國家書店 (104臺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02) 2518-0207
網址：www.govbooks.com.tw
法律顧問：王東山律師

本館保有所有權利，欲利用本書（含DVD光碟）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徵求本館同意或書面授權

圖書GPN：1009802565

ISBN：978-986-01-9908-6

光碟GPN：4509802359

視聽編號：EB-CD494

隨書附「教育愛—台灣教育人物誌IV」DVD光碟（光碟與圖書不分售）

